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吴琼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哲学文库)
ISBN 978-7-300-13301-0

I. ①雅… II. ①吴… III. ①拉康, M. L. (1901~1981)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805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哲学文库

雅克·拉康

——阅读你的症状 (上、下)

吴琼著

Jacques Lac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60.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16 000	定 价	136.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如何让驰骛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能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已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回应方式接续着哲学长河中的伟大传统，举其卓有成效者，或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与哲学大师晤对，与时代问题对接；或直面哲学问题，以锐利才思洞幽烛微，以当代立场梳理剖析；或在反思中考问现实哲学问题，举

凡伦理人生谜题、宗教信仰困境、科技生态难题，皆以哲思相发明，力求化危机为契机。

在回应这些挑战的学者中，既有涵泳覃思的学界耆宿，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才俊。以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之佼佼者而言，视野开阔而不故步自封，沉着稳健而能破门户之见，多能将本土资源与异域资源相贯通，将才气与襟怀相融会，管窥锥指，亦能以小见大，旧瓶装新酒，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让这些当代的回应更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遴选佳作，荟萃英华，推出“哲学文库”系列研究丛书，以期回应哲学应当直面的各种挑战，应当反思的各种难题，力图敞开更广泛的理论视域，力求奠定更深厚的思想地基。假以时日，集腋成裘，汇成系列，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大有裨益，亦能于国际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是所望焉。谨序。

哲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1月1日



如何阅读拉康？——代序

拉康或者说拉康的“作品”可以拿来阅读吗？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拉康本人，他一定会断然地告诉你：“不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我的东西，那就去听我的研讨班吧，在那里，即便你依然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理解，但通过现场，你所获得的将是任何阅读都无法给予的。”

是的，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因为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或讲台上宣讲出来的，而不是专为“阅读”而写作的。以德里达主义的角度说，拉康似乎属于那种重声音而轻文字的在场形而上学的传统，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声音和意义的在场相等同，相反，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把“声音”看作是其本身不表征任何意义的语言“废料”。拉康把课堂和讲台视作是分析设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分析实践作为一种症状“阅读”活动只存在于倾听和阐释中，而这种倾听和阐释又只能借助于言语、只能在言谈情境中来实现分析的“逐步突破”，这就是说，对他的思想或“声音”的“阅读”和“理解”根本上离不开主体间性的结构，离不开横亘在主体之间的言语场域的作用。

拉康的不可阅读还在于他是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论家，是一个处处将论说掩藏在巴洛克式的修辞中的演说家，是一个喜欢逻辑跳接和语义滑动、喜欢对他人的概念做劫掠式挪用、喜欢运用连专业的数学家都看不懂的拓扑变换、喜欢装备许多“科学化”的伪形作为理论盔甲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可阅读性，使得他成

为了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那种“可写的”作家，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阅读、阐释他的理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看到有哪一位阐释者敢说他/她的阐释是完备的，至于哪一种阐释才是合法的或正确的，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的结论，甚至说，如果有哪位阐释者敢说只有自己的阐释是唯一正确的，那他/她一定属于拉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主体”，一个早已为幻象所捕获却又全然不知的主体。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这恰是我们“必须”阅读拉康的理由，也是我们阅读拉康时必须信守的边界，是使我们的阅读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按照拉康的逻辑，只有在不可能性中，才有可能开出一条可能性的道路。其人已去，现场的倾听已不再可能，阅读——包括听现场录音，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因为你听到的将不过是作为“剩余”的声音，以拉康自己的话说，那不过是一堆有待处理的“废料”——便成为我们再次走向他的唯一路径。于是，我们必定要面临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如何阅读拉康？”

是的，这同样是一个愚蠢的主体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已然隐含了对某个“正确”读法的渴望。不过，如同拉康自己把所有的“阅读”皆视作主体对自身症状的“阅读”，而症状“阅读”是一个逐步突破而非逐级还原的过程一样，对拉康或者说拉康文本的阅读亦当在这一症状阅读的层面进行，换句话说，面对“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要想自己不至于因为“正确读法”的诱惑而被引入意义的封闭，就需要对问题本身做一方向性的置换，即把“如何阅读拉康”置换为“如何通过阅读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以及如何有效地突破拉康在文本中刻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在他伏击阅读主体的地方找到进入症状结构的入口？

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已然发生的对拉康的阅读。

有人称拉康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一不无讥讽的描述的确道出了部分的真实，至少在英语世界，我们看到，拉康研究确实已成为

一个庞大的学术作业，专著、期刊、特刊、丛书、论文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业网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且发展势头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不降反升。

面对这个庞大而且庞杂的研究队伍，通观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不仅大家对拉康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描述纷繁杂陈，即便是针对同一个论题甚或同一个概念，大家的阐释也是各执一词，就好像各自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从拉康自己的方面说，其文本刻意的艰涩和模糊风格，其理论阐发技术的曲折回转，其对自己已有观点的不断“返回”和修正，这些都是引发歧义的关键；再比如，从研究者的角度说，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目标、不同的阐释方向等等，使得拉康的文本成为了一个欲望纽结点，一个既会聚欲望又生产欲望的机器，对拉康的阅读成为每个人阅读和阐释自身欲望及其症状的一种分析行为。

在西方，投身于拉康研究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批评家、文化研究者，乃至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等等——当然有许多研究者（比如汉语世界比较熟悉的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身份是跨界的。如此复杂的身份构成使得人们在研究路向上常常呈现出一系列的差异甚至对立，比如我们首先在拉康派与非拉康派之间、临床实践者与非临床的研究者之间就会看到运作方向的不同；而在临床实践者当中又有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差异，在非临床的研究者当中也有哲学家、批评家、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差异。这一系列的差异——它们当然不只是涉及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还关联到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求真”意志的问题——不仅导致了阅读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构成了学术话语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至于即使面对同一个概念、同一段文本或同一个论题，持有不同话语模式的阐释者或研究者会得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举一个例子。拉康在讨论转喻和隐喻的时候曾在不同场合说到两者的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转喻对于意义的构成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单单从理论的层面说，拉康这里的意思大约是：就转喻是为意义生

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而隐喻是产生意指效果的机制而言，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而隐喻是使意义得以呈现的充分条件，并且是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但是，当研究者把拉康的这一看似清晰明确的论断置于不同的语境——比如语言学、诗学或修辞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语境——来理解的时候，就得出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解读。

比如解构主义者让-卢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在《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1973年）^①一书中——该书专一地对拉康讨论转喻和隐喻的著名论文《自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下文简称《字符的代理作用》，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57年）做了详尽的批判性阅读——强调了隐喻之于拉康的“能指的科学”的主导性。在他们看来，《字符的代理作用》这一文本整个地就是拉康的“符号学”，而拉康的“符号”又是抹除了所指的符号，亦即他的“符号学”是一种能指的科学，该科学的目标整个地就是“能指的逻辑”^②，转喻和隐喻则是对这一逻辑的说明。进而，他们认为，拉康对能指逻辑的阐述整个地就是对“隐喻”的阐述，因为他强调无意识的意义只有“在隐喻中”且通过“认同于隐喻”^③才能获得。具体到转喻和隐喻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拉康强调隐喻之于转喻的优先性、主导性，这表明他的思想包含了一种“意指秩序的内在目的论”^④，就是说，拉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德里达所批判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的陷阱。可是，这两位作者在批判中忘了最为根本的一点：拉康虽然强调隐喻在意义生产方面相对于转喻的优先性，可他也强调在隐喻中产生的并非确定的意义本身，而只是意义的诗意的火花；并且，虽然拉康承认能指的结构是先行刻写在意指秩序中的，可他同时又强调，能指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能指的意义只存在于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差异性的间

① Jean-Luc Nancy and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trans. François Raffoul and David Pettigrew,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② Ibid., p. 14.

③ Ibid., p. 13.

④ Ibid., p. 75.

隙中，其对于主体而言是偶然的，是通过能指链的回溯运动被缝合到主体之中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确定的意义。解构主义者在拉康的隐喻逻辑中指认出来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论误认或“误读”。

与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针锋相对，德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萨缪尔·韦柏（Samuel Weber）在《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1990年）^①一书中指出，在拉康那里，转喻和隐喻乃是“能指的统一运动的两种功能”，就是说，能指只有在它们的“同步联系”中且通过这种联系来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虽说这两者对于能指的运作是“必要的和相互依赖的”，可它们的地位并不相同：“能指只有借助一种同步联系才成其为能指，而这似乎也暗示了转喻之于隐喻的某种优先性。意义（亦即某一确定的所指）的效果要以链条中能指的运作作为先决条件。”^②韦柏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他对梦的移置和凝缩机制的考察，就是说，他是通过“回到弗洛伊德”来理解拉康的能指运作机制。是的，拉康的确把能指的转喻性运作视作是意义效果产生的条件，可他明确地讲到那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隐喻才是意义产生的充分条件，以逻辑的角度论之，必要条件充其量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充分条件则代表着“逻辑上”的优先性。韦柏的阅读恰恰遗漏了“时间上在先”和“逻辑上在先”的这一区分。再者，韦柏的“误解”还在于他把拉康的能指链概念只理解为能指的历时运动，这样，确定的意义或所指的获得当然要以转喻作为先决条件，可问题在于，拉康的能指链并非线性的能指链接，而是一个拓扑式的结构，是能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同运作，脱离这个语境去谈论所谓的意义生产是没有价值的。

还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简·盖洛普（Jane Gallop），她在《阅读拉康》（1985年）^③一书中把隐喻和转喻当作两种阐释类型：“隐喻性的阐释在于提供另一个能指来取代文本中的能指（a意味着b，其联系代表了非

① Samuel Weber, *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Michael Lev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Ibid., pp. 66-67.

③ Jane Gallop, *Reading Lac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勒斯)，转喻性的阐释则是为联想提供一个总体的语境。这一转喻性的阐释也许可称作女性化的阅读。”^①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她挪用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称拉康强调隐喻对转喻的优先性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并以其女性主义的怨恨腔调说，拉康“对隐喻和垂直性的偏爱是一种‘幻觉’，且会使我们全都沦落为它的‘牺牲品’”^②。盖洛普的阅读的关键在于转喻和隐喻作为两种“阐释”类型：女性化的阐释总是转喻性的，因为女性代表着菲勒斯的根本缺席，亦即意义的根本缺失，故而其欲望的阐释离不开能指的转喻性链条；相比之下，男性作为菲勒斯的拥有者，其欲望可通过认同于某一象征的菲勒斯而使能指链的意义暂时得以凝定，故而其欲望的阐释是隐喻性的。这一女性主义的阅读的确颇具创意，但盖洛普急切地投向解构主义的怀抱使得她丧失了深入拉康性别理论的腹地的机会，至为根本的一点在于，拉康所谓的“男性”和“女性”指的是任一主体在意指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获得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并无必然关联。

以上列举的远不是全部，但这三个例子已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话语背景下人们对拉康的读解的多样化。当然，读解的多样化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第一，并不存在一个大写的“拉康理论”（Lacanian Theory），而只存在各种小写的“lacanism”或“anti-lacanism”，包括拉康本人也有着多个版本的“拉康主义”，而他在晚期还声称自己是“反”拉康主义的；第二，所有对拉康的阅读都可能是转喻性的或隐喻性的，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话语构型，需要知道自己与拉康的对话是有语境参照的；同时还要明确一点，即我们在阅读中有意或无意地设定的语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任何对拉康的阅读首先都是对我们自己的症状的阅读，并是从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开始的。

当然，不同的专业背景只是影响阅读方向的一个因素，换句话说，阅读方式的差异实际是多元决定的结果。而许多时候，人们在组织和阐释拉康理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阅读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以至于

^① Jane Gallop, *Reading Lacan*, p. 129.

^② Ibid., p. 128.



时常陷入一种想象性的幻觉，以为只有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以为自己读到的恰是拉康想说的。理论上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只存在多种可能的阅读，而不存在“最终的”阅读，拉康的文本尤其如此。因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已完成的阅读总是有限的——不只是数量的“有限”，更是阅读视界的“有限”——对于像拉康这种具有“可写性”的作者而言，阅读的有限性乃是其文本存在的一个宿命，因为每一个新的阅读不仅要以已有的有限阅读作为基本的前视域，而且其本身最终必定要成为有限性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是已有的有限性的一个增补。

具体地说，在英语世界已有的拉康阅读中，下面几种阅读方式最为常见。^①

第一，文本化的阅读。

这一阅读直接面对拉康的一个或多个具体文本，或是对其进行注解和导读，或是参照相关文本来梳理拉康的问题与论述逻辑，总体上，这种文本细读是英语世界面对“经典”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于初学者，这种阅读可为其进入拉康的世界提供诸多便利，但决不能用它来完全取代自己的阅读，那样的话，其作为“导读”的存在价值相当于被取消了。

拉康还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阅读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的《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中语言的功能》（1968年）^②。这大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拉康的专著，其所讨论的文本是俗称《罗马报告》的《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年），作者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完整英译，还为它做了极为详尽的注释，而且写了一篇十余万字的评述文字，对拉康的思想及其理论源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当然，这个梳理是简约化的和不充分的，因为作者当时所能参照到的拉康的文本主要是《文集》（1966年）及一些论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下面的梳理中，第一，我只限于英语文献——但作者不一定都来自英语世界；第二，我的梳理不包括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单篇论文，因为它们的数量太过庞大，主题也太过分散；第三，我在每一个类型下列举了一些例子，但它们只是“例子”，并不代表该类型的研究的全貌；第四，有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成果可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类型，所以他们/它们在分类中的位置不是单一的。

^② Anthony Wilden,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8.

文，“研讨班报告”基本参照的是拉康的学生整理发表的提要。以今天的角度看，威尔登的阅读太过粗略，更多地只具有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

再如约翰·缪勒（John Muller）和威廉·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的《拉康与语言：〈文集〉导读》（1982年）^①。这个导读依据的文本是阿兰·谢里丹（Alan Sheridan）于1977年翻译出版的拉康《选集》^②。两位作者先是概述每篇论文的基本背景和思路，然后为其提供一个提纲式的结构分解，最后是简要的注释。严格地说，这个“导读”有点名不符实，因为作者基本上只提供了每篇论文的骨架，对拉康具体的论证环节缺乏足够的解析，并且整个导读缺乏整体感，其对文本结构的分解不仅无助于我们的理解，反而会把文本的意义生成简约为一个线性的逻辑展开，拉康理论的拓扑学意蕴丧失殆尽。一句话，作为“导读”的功能，这个本子很难胜任。

1988年，约翰·缪勒和威廉·理查森还编辑出版了《被窃的坡：拉康、德里达与精神分析阅读》^③。这是一本类似于汇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以拉康有关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的研讨班报告为对象，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译文、概述、文本结构和注释，还收录了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拉康的报告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回应与评论。其实，两位编者的意图是想以《被窃的信》作为案例，来讨论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讨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阅读与批评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可问题在于，拉康对《被窃的信》的“研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批评”，至少拉康自己的意图首先不在于如何将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批评，而在于讨论主体位置的确立与能指的位移的关

① John Muller and William Richardson, *Lacan and Language: A Reader's Guide to Écri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82.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后来，布鲁斯·芬克还出版了一个全新的选集译本，其篇目与谢里丹的版本完全相同：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一直到2006年，英语世界才有了《文集》的全译本，译者依然是布鲁斯·芬克：Jacques Lacan,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③ John Muller and William Richardson (eds.), *The Purloined Poe: Lacan, 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关注的是能指的“重复”如何决定了主体的命运。总之，拉康只是“盗用”了“字符”（letter）的运作即“信”（letter）的多次“被窃”来对相关主体的命运进行症状式的阅读，在此，文学文本就如同一个梦文本，其关键的要素并非它所谓的“文学性”，而是结构文本叙事的那些无意识场景以及能指在场景中的运作。所以，即便我们认为在拉康那里存在一种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那也不能把它理解为精神分析学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因为他的阅读和批评是以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化作为前提的。

顺便做一个说明。拉康在研讨班中阅读过许多文学文本，除爱伦·坡的《被窃的信》以外，除在许多地方对雨果、瓦雷里、马拉美、兰波这类诗人的诗歌短句一带而过的讨论以外，他还集中阅读了大量作家的作品，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法国淫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的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为芬内根的守灵》（1939年）；法国剧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的历史三部曲《人质》（1911年）、《硬面包》（1918年）和《受辱的父亲》（1916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的《史坦因的狂喜》（1964年），等等，也许，你还可以把柏拉图的《会饮篇》也包括在内。有关拉康的这些“文学阅读”，英语世界有许多研究性的论文和专著，但大部分都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①

文本化的阅读一般都集中于具体文本，有一些甚至只针对某个特定文本，或是围绕某一文本来组织拉康的理论。

比如上面提到的让-卢克·南希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的《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就是一个典范。1973年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拉康就在研讨班（第20期研讨班）上向听众推荐它，并对两位作者的

^① 有关拉康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可参见 Ben Stoltzfus, *Lacan and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Jean-Michel Rabaté, *Lacan and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Ehsan Azari, *Lacan and the Destiny of Literature: Desire, Jouissance and the Sinthome in Shakespeare, Donne, Joyce and Ashbe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文本阅读技巧及理论才华颇为赞赏，称他们的文本细读令他十分的满足——虽然他对书中的德里达主义给以了措辞激烈的批评。

再如来自比利时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普·凡·胡特（Philippe Van Haute）的《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①和来自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多·艾德尔斯坦因（Alfredo Eidelsztein）的《欲望图：对雅克·拉康的著作的运用》（2009年）^②。这两本书阅读的是拉康的同一篇论文，即《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下文简称《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60年）。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按照胡特的解释——艾德尔斯坦因其实也持相同的观点——就因为它在拉康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居有纽结性的地位，即它一方面是拉康对自己此前的思想的一个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接下来几年的研究主题的一个纲领性提示。虽然读的是同一个文本，且都是以四个欲望图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但两位作者的阐释路径大不相同：胡特的阅读是以主体的无意识构成作为锚定之地，从欲望、幻象、认同和原乐等方面展开对欲望图的论述，而艾德尔斯坦因的阅读是以四个欲望图的问题为线索，在每个问题的语境中来逐一解释四个图的结构。两种阅读各有所长，为我们理解拉康的这个文本提供了很好的导引。

还有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的《一字一句读拉康：〈文集〉细读》（2004年）^③。芬克是《文集》完整本及第20期研讨班《再来一次》的英译者——他的翻译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给原始文本添加了极其充分的注释——也是一个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这一双重身份使得他的阅读充满一种专注于细节的力量。与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阐释性阅读不同，芬克的阅读更加追求“客观”和“忠实”。在《一字一句读拉康》中，芬克集中阅读了拉康《文集》中的三篇论文（同时还讨论了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以及拉康在晚期研讨班中对“知识与原乐”的论述），他的阅读简洁、清晰、重点

① Philippe Van Haute, *Against Adaptation: Lacan's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trans. Paul Crowe and Miranda Vankerk,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2.

② Alfredo Eidelsztein, *The Graph of Desire: Using the Work of Jacques Lacan*, trans. Florencia F. C. Shanahan, London: Karnac Books Ltd, 2009.

③ Bruce Fink,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Ecrits" Close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突出,尤其对拉康文本中的逻辑疑难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一般地,《文集》是人们阅读拉康文本时的首选,但拉康派似乎对阅读拉康的研讨班更感兴趣,因为相较于《文集》而言,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临床问题在他的近30期研讨班中有更为充分的阐述。在英语世界,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看到有关第1、2、7、10、11、17、20期研讨班的专题阅读^①,它们有些是论文集的形式,有些是专著的形式,但作者大都以拉康派分析家为主。这些阅读有的重在概念的说明或文本逻辑的梳理,有的重在临床经验或应用,但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二,阐释性的阅读。

我所谓的“文本化”阅读和“阐释性”阅读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分: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本阅读必定离不开阐释,而任何一种阐释也必定以文本阅读作为前提。我对两者的区分只是针对各自的侧重面而言:“文本化”的阅读主要面对具体的文本,重在梳理文本本身的概念和逻辑,有点就事论事的味道,所以阅读者的阐释是隐藏在“客观”表述之中的;相比之下,“阐释性”的阅读主要是面对拉康的理论问题,重在以问题来梳理拉康的思想,所以阅读者的问题框架主导着其对文本总体的阐释角度。一般而论,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本来应当相互补充,但具体到研究过程中,拉康文本的特殊性常常使人们很难做到两种方式的协调运作:或则因为过于关注具体文本的细节而使得阅读缺乏整体感和连贯性,或则因为过于追求体系化而导致阅读的简约化。例如注重具体文本的凡·胡特在《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一书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s I and II: Lacan's Return to Freu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Marc De Kesel, *Eros and Ethics: Reading Jacques Lacan's Seminar VII*, trans. Siqi Jöttkandt, Albany: SUNY Press, 2009; Roberto Harari, *Lacan's Seminar on "Anxie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1;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Roberto Harar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rans. Judith File,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4; Justin Clemens and Russell Grigg (eds.), *Reflections on Seminar XVII: Jacques Lacan and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zanne Barnard and Bruce Fink (eds.), *Reading Seminar XX: Lacan's Major Work on Love, Knowledge, and Feminine Sexual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的“卷首语”中就曾提到对拉康文本的两种阅读方式——与我的区分刚好部分地对应——并对那种体系化的阅读提出了批评：

想要为拉康的作品提供导读的作者们必定要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或是用一个一般性导论来处理拉康的所有作品，或是集中于一个或多个纲领性的文本，尝试为其提供一个详尽的评注。我们已经有多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导论文字。它们的总论性即是其力量所在，但也是其弱点所在。它们为拉康的全部作品（以及里面所发生的必然发展）提供了一个概览，但恰恰因为这一点，它们有一种对构成作品总体的具体文本进行抽象的倾向。这一程序会产生出双重的后果：在第一种情形中，它可能会过于轻率地做出结论，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个封闭的、人们只能或是接受或是拒绝的体系；在第二种情形中——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它会无意间强化许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即拉康的文本是不可理解的。确实，这些文本因为过于艰涩和含混而颇受诟病，并且，若是没有一个指南性的评注，拉康的许多文本也确实难以理解。然而，如果说一般性的导论几乎不能够或根本不能够涵盖扩展性的文本分析，那它们对于阅读拉康的作品本身通常会毫无裨益。这样，读者总会产生不满，因为不论读多少导论，拉康的文本对于他们仍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他们会由此得出结论说，拉康的作品肯定是讳莫如深。如果我们想把拉康从这种争议中解救出来，导论和评注无疑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具体文本，关注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容易理解。^①

阐释性的阅读也有很多种，其中以语境化和主题化的阅读最为常见。

语境化的阅读重在于一定语境中来考察拉康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其中理论语境是拉康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因为拉康自己挪用他人理论的风格是非语境化的，他从不考虑所挪用的概念或思想在原初文本中是如何运用的，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种跳接的方式将其嵌入自己的逻辑中，这使得我们对他的理论语境的阅读和阐释必将面临诸多陷阱。

^① Philippe Van Haute, *Against Adaptation: Lacan's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Foreword", pp. xi-xii.

比如大卫·梅西 (David Macey) 的《语境中的拉康》(1988年)^①就着重梳理了拉康与黑格尔或科耶夫、弗洛伊德、索绪尔、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我们见到的英语世界对拉康的理论语境做的最为系统的考察。但由于缺乏对拉康文本的具体阅读，也缺乏对拉康挪用他人资源的策略的分析，所以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语境时常是大而无当，无法加深我们对拉康的理解。

与大卫·梅西的做法不同，理查德·博斯比 (Richard Boothby) 喜欢用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或论题来梳理拉康思想的某个方面，让我们既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拉康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渊源关系，也能对拉康的某一理论本身获得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比如他的《哲学家弗洛伊德：拉康之后的元心理学》(2001年)^②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语境化研究。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作为基本论题，讨论了拉康在这一论题上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实施的“激进重述”，以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在元心理学的理论语境中来“澄清”拉康思想的某些关键方面，并“勾勒”这些方面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博斯比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通过他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拉康的某些理论的隐秘源头，而且可以看到经过重新阐释的弗洛伊德及其元心理学的另一种图像。

当然，对拉康的语境化研究应当是多方面的，除梅西和博斯比所关注的那种理论语境以外，至少还有社会文化语境也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个方面，同样有人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比如拉康的女弟子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 (Elisabeth Roudinesco) 的鸿篇巨制《百年大战：法国精神分析学史》的第二卷《雅克·拉康集团：法国精神分析学史，1925—1985》(1986年)^③——第一卷出版于1982年，以弗洛伊德为主角讲述了1885—1939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就以拉康为主角讲述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中对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

① David Macey, *Lacan in Contexts*, London: Verso, 1988.

② Richard Boothby, *Freud as Philosopher: Metapsychology After Lac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③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trans. Jeffrey Mehl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协会及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冲突有十分详尽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拉康的精神分析政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背景资料。再如谢利·图克勒 (Sherry Turkle) 的《精神分析的政治：雅克·拉康与弗洛伊德的法国革命》(1992年)^①，作者把拉康的精神分析活动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通过把它置于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透视了法国精神分析文化的发展，书中尤其对1968年前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进程以及拉康学派的历史命运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和分析。类似于鲁迪奈斯科和图克勒的这类语境研究虽然较少进入对拉康文本的具体阅读，也很少去系统阐述拉康的思想，但他们提供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我们理解拉康的思想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所谓主题化的阅读，指的是围绕某一主题或主题性框架对拉康理论的一种系统化重构，这种阅读比较强调框架的设立和逻辑的贯穿，整体感很强，但做得不好的话很容易走向胡特讲的那种简约化。并且，即使我们可以暂时把拉康理论究竟有无体系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就是说姑且承认它是有体系的，我们也一定要警示自己：体系化的努力仅仅是我们对拉康理论进行重构的一种策略，这种重构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形态，而每一种重构或对拉康理论的每一种系统化阐释都不能是封闭的，因为拉康的理论自始至终都在向新的可能性开放，在他那里，没有一个概念或问题称得上是已经完成的。

总体上，单就英语世界对拉康的主题性阅读而言，到目前为止，成功的范例极少，其中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得最清楚。首先是文本方面的。在英语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康研究者借助的基础性文本是上面提到的由谢里丹翻译的《文集》选本，该选本从《文集》的近三十篇文章中选译了九篇，且所选文章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1949—1960年。^② 至

^①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Jacques Lacan and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2.

^② 这九篇文章分别是：《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1949年)；《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1948年)；《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年)；《弗洛伊德的事务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1955年)；《自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1957年)；《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初始问题》(1958年)；《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1958年)；《菲勒斯的意义》(1958年)；《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60年)。

于研讨班, 只有第 6 期的部分和第 11 期在 1977 年就有英译本, 其他各期的翻译出版都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且目前还在进行当中。^① 这一出版状况对英语世界的拉康研究——尤其对那些没有法语背景的研究者——有很大影响。比如对于“三界”体系中的实在界——拉康在 1960 年以后才真正转向实在界的思考——在 80—90 年代的研究中, 它要么被付诸阙如, 要么也只是一些含糊其辞的表述; 再比如对于拉康的拓扑学, 由于缺乏研讨班的论证细节, 许多时候人们都只是一笔带过。这种情形直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有所改观。

由于文本阅读范围的局限, 英语世界的拉康研究, 至少在 90 年代以前, 多数是依据《文集》或《选集》中的若干篇核心论文, 如《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下文除个别地方外简称《镜像阶段》)(1949 年)、《罗马报告》(1953 年)、《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 年)、《菲勒斯的意义》(1958 年)、《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60 年) 等。于是, 拉康的理论就依照这些论文而被切分为几个主题, 如镜像阶段、想象界和象征界、言语和语言、欲望的辩证

① 到今天为止, 英语世界已经正式翻译出版的拉康研讨班有第 1、2、3、7、11、17、20 期以及第 6 期的部分, 它们的出版情况分别是: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Sylvanna Tomasel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The Psychoses 1955—1956*,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Russell Grigg, London: Routledge, 1993;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V,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Dennis Port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V,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1969—197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Russell Grigg,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以上译本依据的法语版本都是雅克-阿兰·米勒编辑的“标准版”, 其他的研讨班很大一部分也有英译本, 只是未经授权, 也没有采用“标准版”, 所以多在“地下”流行, 我手头仅有其中的第 12、13、14、22、23 期: *Crucial Problem for Psychoanalysis, 1964—1965*, unpublished; *The Object of Psychoanalysis, 1965—1966*, unpublished; *The Logic of Fantasy, 1966—1967*, unpublished; *R. S. I., 1974—1975*, unpublished; *The Sinthome, 1975—1976*, unpublished.

法、菲勒斯的功能等等。比如玛尔考姆·波微 (Malcolm Bowie) 在《拉康》(1991年)^①一书中就讨论了这样几个主题：“虚构的‘我’”、“语言和无意识”、“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菲勒斯的意义”，而他对每一个主题的阐述又很少紧扣所据文本的逻辑，反倒是动不动就游离到文本以外做一些无关紧要的联想和评论——不客气地说，在我所见的西方世界的拉康研究中，波微的这本书属于最不着调的那一种，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再如萨缪尔·韦柏的《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1990年)和简·盖洛普的《阅读拉康》(1985年)也属于这种多主题的并置，每一个主题下大约对应着上面提到的某个相关文本。^②这样做固然便利，但显然无法照顾到拉康思想的前后发展，尤其是，以若干主题来归约拉康理论的庞杂性，不仅无助于对所论文本的展开论述，反而容易把人引向简约化的陷阱。

在以主题进行的系统化阅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主题框架就是以拉康的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构成的一个“三界”系统，这大约是导致主题化阅读走向失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三界”为主导叙述框架看起来简便易行，而实际上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就是最简便、最恰当、最合理的。比如“三界”当中究竟该以哪一个作为开始或以什么样的顺序加以排列就远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使用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体系结构方式并非必然的、只能如此的，如果对拉康的思想发展做一整体性的反观，你会发现，这种排列可能恰恰是拉康最不能接受的。再有，用“三界”来结构拉康的思想体系有时会带给人一个误解，以为那就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内容。其实，在拉康的理解和运用中，“三界”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三个界域首要地是用来揭示主体之构成的一个认识论框架，他要用这个框架来讨论主体性的认同、欲望的辩证法、原乐的伦理学、移情关系、分析师的欲望和位置、临床结构、主体的性别位置等等，这些才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内容，它们与“三界”的关系——用一个不甚妥当的说法——是

① 玛尔考姆·波微：《拉康》，牛宏宝、陈喜贵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② 韦柏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理论语境的描述上了，对拉康的理论本身则采取了简约化的处理；盖洛普则干脆在每个主题下标出所要讨论的一个具体文本，尽管其女性主义的视角使得她的阅读别有一番情致。

“材料”与“空框”的关系，就是说，对于所有这些内容，只有置于“三界”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所以，单纯以“三界”为主题框架来阅读拉康，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空疏的危险。

在我所看到的以“三界”为基本框架的研究中，乔纳森·司各特·李（Jonathan Scott Lee）的《雅克·拉康》（1990年）^①和洛伦佐·切萨（Lorenzo Chiesa）的《主体性与他者：拉康的哲学阅读》（2007年）^②属于比较有特色的两种。前者把“三界”放置到一种运动中来考察，比如“从想象界到象征界”、“从象征界到实在界”、“不可能的实在”^③，虽然作者在此并未进入拉康的拓扑学逻辑，但他的梳理有着难得的清晰，且文本阅读的范围不只限于《选集》的篇章。对于初学者来讲，司各特·李的这本书还是较为理想的一本入门书。切萨的书出得比较晚，所以在阅读范围上有很大的优势。作者以“三界”为叙述框架，以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作为结构每一界域的功能要素，在精神分析学的场景中对拉康的理论做了系统阐述。尤其是，与同类著作相比，切萨的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他的阅读范围不再局限于《文集》，而是对研讨班也给以了充分的关注；第二，虽然他对“三界”是分开论述，但“三界”的拓扑学联系是贯穿始终的；第三，具体到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内容”，切萨把它们分别配置在“三界”的不同界面加以揭示，不仅提供了结构或逻辑层次分析，而且结合拉康思想的发展给出了多种解释。大体上，如果说司各特·李的研究可作为入门书来看，那么切萨的研究就可以视作是“三界”理论的一个中高级的“教程”。

相较于常见的“三界”结构框架而言，英语世界还有许多研究是依照某一特定的主题进行的，这一研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让问题更加集中，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就拉康的思想提供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图像。

比如布鲁斯·芬克的《拉康的主体：在语言与原乐之间》（1995年）^④

① Jonathan Scott Lee, *Jacques Laca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② Lorenzo Chiesa, *Subjectivity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Lac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7.

③ 这是司各特·李的三个章节的标题，除这三章以外，他还有三章分别涉及拉康的早期思想、拉康的文学阅读和第20期研讨班有关女性性欲的思考。

④ Bruce Fink, *The Lacanian Subject: Between Language and Jouiss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化角度。在这本书中，芬克把拉康的理论总体地分为主体的方面和对象的方面，在前一方面主要结合主体与能指、主体与他者欲望的关系讨论主体性的构成，在后一方面则围绕着对象 *a* 和原乐的问题讨论欲望对象的功能。单就这一体系结构而言，芬克的划分也许太过主观化，其论述同样未能逃脱简约化的命运，但由于他十分看重拉康晚期的研讨班，并力图用晚期拉康来重述 60 年代以前的“古典”拉康，所以他的阐释时常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拉康理论中的难点，他总能做到举重若轻。还有逻辑清晰也是芬克的研究的一大特色。

再如法裔美籍的精神分析哲学家米克尔·博尔奇-雅各布森 (Mikkel Borch-Jacobsen) 的《拉康：绝对的主人》(1991 年)^①。米克尔曾在拉康派所主导的文森大学精神分析学系任教，80 年代中期定居美国，后成为精神分析学的揭黑幕者，以“绝对的敌人”的姿态对抗“绝对的主人”，其有关拉康的这本书虽算不上是咄咄逼人，可也锋芒毕露。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能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性武器，他依照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来对拉康进行主题化的阐述，虽然算是抓住了拉康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但他对拉康文本的阅读常常流于浅表，错漏之处甚多。

再有理查德·博斯比的《死亡与欲望：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中的精神分析理论》(1991 年)^② 也是典型的主题性研究。与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一样，作者在此依然是围绕弗洛伊德的一个论题即死亡驱力理论来思考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激进重写，重点说明了死亡驱力概念在拉康的想象界和象征界中的作用——其实，拉康在晚期教学中又把死亡驱力和实在界联系到了一起，但博斯比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讨论这一点。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者后来在《哲学家弗洛伊德：拉康之后的元心理学》(2001 年) 一书中对实在界的相关问题给予了更为充分的关注。

还有汉语世界的拉康研究者比较熟悉的伊丽莎白·格罗兹 (Eliza-

① Mikkel Borch-Jacobsen, *Lacan: The Absolute Master*, trans. Douglas Bric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Richard Boothby, *Death and Desire: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Lacan's Return to Freu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beth Grosz) 的《雅克·拉康：一种女性主义导论》(1990年)^①。在这本书中，作者关注的是拉康的女性理论，其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论述——但作者同样没有太多论及实在界，而这里才是拉康女性理论的落脚点——基本上是为这一角度服务的，但很显然，拉康晚期思想在其论述中的缺失使得她根本无法进入拉康的“女性”的幽暗领域，她的讨论最终只是助长了人们对拉康的女性理论的误解。

第三，批判—批评性的阅读。

主题化的阅读基本以阐释拉康的理论为主，就是说，拉康始终是其中的主角，而批判—批评性的阅读是以拉康理论的应用为主，阅读本身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以中国人的话说，前者属于“我注六经”式的研究，后者属于“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应当说，这两种研究有着同等的价值，但在现今的发展趋势中，人们似乎更看重后者——在一个不断寻找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的“批评的时代”，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当是这种批判性阅读——在此的所谓“批判”不是否定意义上的攻击或反对，相反，它指的是对源头理论的某种修正和扩展，是把源头理论确立为“主人”的过程，就像拉康自己所做的那样——的开路先锋。早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阿尔都塞就认识到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巨大价值，并在这一口号的启示下开始了对马克思的返回，而这个返回也是以阅读或重读创始之父作为基础，以“修正主义”作为攻击目标，以理论的“科学化”作为努力方向，通过挪用或嫁接其他理论武器，最后完成对源头理论的根本性重写。例如阿尔都塞尝试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把拉康的主体性认同嵌入到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中，提出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的问题，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批评武器。

阿尔都塞的介入改变的不只是拉康理论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改变

^① Elizabeth Grosz,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路线图。在他之后，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阿兰·巴丢（Alain Badiou）、亚尼斯·斯塔维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等人——他们都是在政治问题上有深度介入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他们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政治学领域耀眼的明星——对后现代状态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谋划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都给出了激进的阐述，其中拉康和阿尔都塞是他们批判性地挪用的重要资源。尤其齐泽克，马克思、黑格尔和拉康乃是他的三位“主人”，他们的理论是他借以图绘意识形态主体的三种主导话语。当然，在他那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被重述的，其中以对拉康的重述最为有名，以至于中国的某些拉康研究者干脆把齐泽克的重述视作是阐释拉康理论的权威版本。

的确，相较于齐泽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言，他作为一个拉康主义者的身份可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拉康就像是一个寄生在他处的幽灵，在齐泽克亦庄亦谐的言述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个幽灵的异样返回，以化为肉身的形式叙说着一个幽灵的幽灵学。作为一个拉康主义者，齐泽克对拉康的阅读和阐释是从拉康的后期思想开始的，所以，在他对拉康理论的读取中，能指的失败、主体的无能、实在界的返回、对象 a 的不可能性、基本幻象的悖论逻辑、主体间关系的非对称性、部分驱力的循环、他者的欠缺与匮乏、欲望的不可满足等等，都成为他解读各种叙事形态——不论是政治、哲学的“叙事”，还是流行文化甚或黄色笑话——最有效的武器，而他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阐释最终都要被缝合到某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政治效果中。如果说拉康在晚期研讨班中还只是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的政治分析的雏形，那么齐泽克就是这种政治分析出色的践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齐泽克首先是一个拉康派的政治理论家和批评家，虽然的确如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他也是一个拉康派的文化批评家和电影批评家，但这后一种身份只有置入前一种身份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

那么，齐泽克的阅读到底完成得怎样？在前面我已经强调，对于拉康，没有一种阅读可自称是完整的和已经完成的。齐泽克的阅读亦是如此：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对拉康的“半说”——拉康在晚期研讨班中称主体对欲望之真理/真相的言说总是一种“半说”；他的解释再正确——

与许多人的阅读相比，他的阅读大部分时候的确称得上是“正确”——也只是说出了拉康的“一半”，因为按照拉康的“不完全性定理”，根本没有人可以做到对真理/真相（当然包括拉康自己的真理/真相）的“全说”，根本就不存在对真理/真相的“全说”，若是有人敢自称如此，那他一定是陷入了自我想象的幻觉。

对拉康较早进行批判—批评性阅读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法国女性主义者。自弗洛伊德的时代开始，女人就一直是精神分析学的特别“主体”，她们不只是特别的临床对象，更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中充当着特别的结构功能。如同弗洛伊德的躺椅曾吸引了许多堪称杰出的女性一样，拉康的研讨班上也有许多女听众，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法国新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代表，比如露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她们与海伦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一起并称为法国新女性主义的“三巨头”，后者虽然走的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路线，但同样受到拉康的影响。就立场而言，这些人大约算是反拉康的拉康主义者，因为她们经常是作为拉康的性别对立面来阅读拉康，她们对拉康的阐释是片断性的、直觉的和想象的，而非逻辑的和文本化的；她们有十分强烈的位置意识，她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女性理论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若是没有弗洛伊德和拉康作为批判对象，她们还能不能定位自己的理论方向，她们还有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女性立场！以此言之，女性主义者与拉康的关系是悖论性的，一方面她们在拉康的性别理论中——比如菲勒斯作为定位性别位置的优先能指；女性作为“非一”（not-One）之性；女人根本不存在；性关系不可能等等——找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样板，另一方面她们又把拉康当作滋养自己的养料，从论题到写作风格都有着对拉康的“女性主义”盗用。在她们的文本中，拉康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萦绕不去，她们总是以驱逐幽灵的方式让幽灵更加坚强地返回，她们以自己飘忽不定和另类的行为与写作证实着此一性别的“非一”特征。

就对拉康的阅读而言，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挑衅的姿态，所以她们的阅读更像是对拉康的强力改写，这样说并不是要贬损她们的阅读的价值，相反，在许多时候，对经典的强力性误读正是创

造性的肇始。正如拉康是通过弗洛伊德的强力误读来开启其精神分析学的革命一样，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待拉康的“任性”也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拉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与法国女性主义者执著于在所谓的“女性写作”中来营造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不同，英美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当她们走向拉康的时候——更倾向于在批评实践中挪用拉康，就是说，她们喜欢把拉康的理论工具化，喜欢从拉康的理论中抽取一些“有用的”概念与观点，并将其与其他理论工具相结合，广泛地运用于文学批评、电影批评、文化研究等等领域。虽然她们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但在阅读拉康的方面，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她们的文本阐释能力要弱得多，多数时候，她们与拉康的文本维系着一种想象性的关系。

除上面两大群体以外，对拉康做批判—批评性阅读的还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比如伦理学领域的阿伦卡·祖潘西卡（Alenka Zupančič）^①、法学领域的珍妮·罗莱恩·施罗德（Jeanne Lorraine Schroeder）^②、传播学领域的安德烈·诺色德（André Nusselder）^③、教育学领域的简·雅哥钦斯基（Jan Jagodzinski）^④，等等，至于文学批评、电影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更是人才济济，难以尽述。

一般地说，批判性的阅读是一种强力阅读，因为这一阅读的根本不是为了“还原”拉康的理论，而是为了在一种强力性的阐释中，甚至在一种合理的误读中打开通向自身理论建构的道路；而批评性的阅读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工具化的阅读，因为在这一阅读中，经过阐释的拉康理论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之间结成的是一种象征交换的关系，一方作为一个一般等价物，通过对另一方的介入使交换关系得以实现，双方的价值看似在这一交换行为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实际上那只是拉康意义上的一

① Alenka Zupančič, *Ethics of the Real: Kant, Lac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② Jeanne Lorraine Schroeder, *The Vestal and the Fasces: Hegel, Lacan, Property, and the Femin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The Four Lacanian Discourses, Or Turning Law Inside-Out*, Oxon: Birkbeck Law Press, 2008.

③ André Nusselder, *Interface Fantasy: A Lacanian Cyborg Ontology*, Amsterdam: F & N Eigen Beheer, 2006.

④ Jan Jagodzinski (ed.), *Pedagogical Desire: Authority, Seduction, Transfer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Ethics*,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2002.

种“剩余价值”，是经过计算后的价值剩余。为了让拉康的理论变成一般等价物，阐释者就必须简约甚至删除隐含于其中的不可通约的特殊性，用平滑的光泽来取代那灼人的光芒。例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年）一文被公认是英语世界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经典甚至奠基之作，其用来批判西方主流电影叙事的强有力武器就是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按照她的解释，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不约而同地把男性设定为凝视（观看）的主体，女性设定为被看的对象，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男性/主动与女性/被动的叙事程式。穆尔维所叙说的观影“事实”也许是存在的，但她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挪用都是基于某种理论上的“错觉”：比如她把弗洛伊德的“窥淫癖”机制解释为主动的看/被动的被看的关系就只是看到了这一理论的表皮，因为那一机制的根本不在于一个主体（男性）对另一个主体（女性）的关系，而是主体对自身幻象中的对象的关系；至于拉康的方面，她充其量只是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层面来理解拉康的观看理论，而没有看到拉康在1964年的第11期研讨班中就已经把“观看”和“凝视”明确地区分开来，前者是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交互作用，后者则属于实在界向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延伸或侵入，“凝视”从来不是主体对对象的凝视，而是处在实在界的创伤性内核对主体的凝视，是主体在幻象中想象有一个令人惊骇的不可穿透之物在看着自己，并因这一幻象而使主体之分裂成为一个永恒的在场。在穆尔维那里，正是由于实在界的这一缺失，使得她的拉康阅读走向了拉康的反面，也使得她在论文中对希区柯克的影片《晕眩》和《后窗》的分析与这两个文本本身的视觉逻辑处在一种悖谬的关系中，因为正如后来的齐泽克等人对希区柯克的“重读”所显示的，对于这两个“拉康主义”的文本，实在界的凝视才是解开叙事之“纽结”或主体无意识的“波罗米结”的根本。

当然，对于穆尔维的阅读的“创伤性内核”，不是这里的三言两语可以打发的，那需要一个长长的专论来解决。我并不否认她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我称她的阅读有一个理论上的“错觉”，说的是她对拉康的“凝视”概念的挪用因为实在界的缺失而给她的文本留下了一个死结。实际上，穆尔维的“错觉”并非个别现象，在英语世界对拉康理论的批评性挪用中，这种情形是极为普遍的。

二

在对拉康的阅读和阐释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拉康的“写作”风格：语义含混、概念叠加、论题跳跃、逻辑缠绕、表述艰涩、科学化与玄学化并存，等等。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的“写作”也是一种典型的先锋式写作：前一刻还在有板有眼地进行理论阐述，可接着就突然插入一段无意识般的梦呓或高度修辞化的寓言式文字；这会儿还是超现实主义的文本嫁接和语义滑动的高级仿写，可接下来就煞有介事地引入其科学的伪形。面对如此风格化的“分析话语”，每一个读者都会先是被它吸引，循着一条看似可行的通道走入其语词的丛林，接着就会因为岔口太多而迷失路径，进而发现自己根本无路可走，最终你只能或是在里面困兽犹斗，或是备感挫折转身离去，有时你甚至会觉得进入拉康的世界实在是一个错误，因为其唯一的功能似乎就在于引诱你去接受一次羞辱——为了挽回一点面子，有人以貌似看穿了拉康的把戏的口吻称他不过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是的，在我们的认识中，任何一个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理论——不论多么艰深和缠绕——总会有一个入口，也会有一个出口，以便我们能够循迹探幽，得其门径。然则，对于拉康而言，如果你也怀着这样的期待进入他的理论，那你可能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当你沿着自认为的某一入口——例如镜像阶段——进入他的领地时，会发现里面处处充满歧途和分叉：同一主题的不断重述，不同主题的交叠回环，多重界域的相互指涉，相异学科的嫁接穿插，更别说他的作品中术语的多重意义的缠绕，数学型的微言大义，格言警句的层出不穷，对他人文本出人意表的阐释以及对典故的不断援引和对病例的不断引申，等等，这种迷宫式的巴洛克风格使得他的文本——不论是口语的还是书面的——中充满了高难度的、令人应接不暇的理论炫技，最后你会发现，你所认为的那个人口原来只是无尽链环上的一环，它其实只是一条任意的斜切线，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拥有逻辑必然性的某个当然的开端。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拉康的文本视作一个总体，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块找不到进入和返回之路的语词禁地，是一个用以捕捉我们的欲望

的言语机器。当我们深入这块禁地的时候，就能知道，那里根本没有专一的入口和出口，换句话说，在那里，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入口——但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出口。^① 拉康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拓扑学”，里面是一系列的回形结构，或是多个主题在其中交错、重叠、折返、环绕，或是同一主题的多个动机在其中延宕、重复，甚至在刻意的赘述中滑行和消隐。拉康是不可进入的，可正是这种不可进入性，构成了致命的诱惑，成为我们总是欲望进入的成因，就像珠穆朗玛峰，正是其在“象征”层面的不可攀登性，才使得攀登具有了难言的诱惑——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致死之诱惑；也才使得那一次次的征服行为拥有了意义——尽管这意义最终指向的可能是一种虚无。

面对如许之多的陷阱，使得我们朝向拉康的返回之路变得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返回是徒劳之举，更并不意味着返回本身是无意义的。从拉康的分析思维来说，不可能恰恰是可能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可能变成使回视得以可能的视线和界限，说不定就可以让这种不可能以某种可能的方式绽出，就像拉康的不可能的实在界，就是由于这种不可能，才有它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悄然绽出。所以，如果说拉康的文本是一个没有入口也没有出口的迷宫，那么，明确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进入一种可能的阅读的前提——当然它也是任何一种可能的阅读的边界。对此拉康自己其实在许多地方已经给了我们忠告，比如他曾在1972—1973年的第20期研讨班中针对那种封闭的体系化“理解”或阅读声明说：“你们不必理解我的著作，如果你们的理解不是很充分——你们就有机会解释它们了”^②；他甚至还说，“很显然，阅读的条件就是它必须给自己设限”^③。

拉康到底有多么缠绕？不妨举一个例子。《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年）一文是拉康《文集》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们所熟悉的——但未

① 在《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年）一文的开篇，拉康曾这样描述文字文本和口语文本的区别：“事实上，书面语的特点就在于‘文本’的主导性，相对而言，我们将看到话语的这一因素就呈现在那里——它允许凝练，以我的口味，这种凝练留给读者的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而我宁肯这是一个困难的入口。”（Jacques Lacan, *Écrits*, p. 412.）

②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p. 34.

③ *Ibid.*, p. 65.

必都理解了——隐喻和转喻的公式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论及能指结构之于意义生产的关系时，拉康有这么一段文字：

事实上，没有一个意指链不是维系着显见的语境的一切，就好像是附着在其每一个单位的节点上，而其语境可以说是“垂直地”连接着那些节点。

这样，如果我们重新看一下“arbre”（树）这个词——但不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名词，而是作为那些节点之一的一个终点——就可以看到，它之所以可以穿越索绪尔算式中的横杠，并不是因为“barre”（横杠）这个词即是它的字母位移变异词。

因为，倘若将它拆解成元音和辅音的双重幽灵，它就可以以桥树和梧桐来召唤出其在我们的植物群中代表的力量和尊严的意味。受惠于其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被运用的所有象征语境，它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立起了十字架的影子。再有它还可以缩略为大写的Y这一表示二分的符号——这个符号若不是用作装饰徽章的图样，本来与树没有什么关联，尽管人们声称它表示着谱系。血液循环之树、小脑的生命之树、农神或月神之树、雷电击打树木而形成的晶状：你们的形象不就是为了在火炙的龟壳上图绘出我们的命运吗，或者说你们的闪电不就是为了让无尽的黑夜显形从而在语言的“万物归一”中引起存在的缓慢改变吗：

“不！”那树说，它说“不！”

在它那高昂的头颅的光华上

这两句诗我认为听作树的同声相应和听作这种谐音的反面同样合理：

暴风雨对待它

整个地就像对待小草一个样。

因为这首现代诗是按照能指平行论同样的规则来组织的，这种平行论的和谐主宰着原始的斯拉夫史诗和最精致的中国诗歌。

这一点在树和小草得以被选择的共同存在方式中可以看到，正是因此，相互矛盾的符号——说“不！”和“像对待”——得以出现；也是因此，通过“高昂的”这一特殊性和简约它的“整个地”之间的分类对比，永恒的瞬间那无法觉察的光华可以在“头颅”

(tête) 和“暴风雨”(tempête) 的凝缩中得以实现。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个能指之所以能够运作，只是由于它就呈现在主体之中。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个主体已经转移到了所指的层面。^①

是的，这是典型的拉康风格。围绕一个“词”或者说一个能指，从它的发音到它所意指的概念，从它的概念所表征的形象再到该概念所意指的含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差异，这整个就像一个妄想症式的联想，在极度凝缩的句式、在文字游戏的功能机制中、在语境和语义的迅捷滑动中、在从神话到宗教到诗歌乃至历史文化的跨界旅行中，完成了对这个词作为一个能指的意义生产机制的说明。可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能找到进入这段文字的入口吗？很难。别的且不说，单是一字一句把这段话解释一遍也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不光一般人说不清楚，就连专家也是众说纷纭。对于这段有关法语词“arbre”（树）的冗长论述，西方研究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②有的人称这段文字是拉康式的诗学对其理论话语的一种强行插入——因为在它的前面是拉康对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的改写和对自己的能指算式的理论化说明，在它的后面则是拉康对能指链的运作即他自己的隐喻和转喻公式的讨论——它除了导致论述的断裂以外，别无他用。有的人（比如南希和拉科-拉巴特）则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称它表明拉康仍持守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在场中心主义——因为拉康在这里对作为能指之树的隐喻功能的说明旨在强调能指对意义的坚持，这段话整个地就是一个“语言炼金术”，是拉康的“隐喻诗学”。还有的人（比如萨缪尔·韦柏）称这段话暗示了拉康对能指链中语境的线性化的批判——因为语言的垂直维度表明隐喻轴是依据句法而非语义被构成，就是说，对于语言的“联想”方面，再也不能依照意义的多样性来考虑，相反，意义本身已被铭写在能指赖以出现的语境关系的运动中。反正类似的评论有许多，但入口到底在哪里——是修辞学还是隐喻的诗学？是语言学抑或只是一个妄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419-420.

② 参见 Gilbert D. Chaitin, *Rhetoric and Culture in Lacan*, p. 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想症的话语？——各人因取向不一而有不同的结论。

毫无疑问，对于这段文字，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入口，可这不意味着我们在阅读和阐释它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虽然晦涩，但并非没有自己的“逻辑”。

首先，你要知道，拉康选择“树”作为例子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索绪尔在说明符号的构成时用的就是“树”的例子，而拉康在这段话的前面改写索绪尔的符号概念时也用了“树”的例子。在索绪尔的运用中，主要是想说明构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而在拉康的运用中，则是为了强调能指之于所指的优先性，进而他要在这段文字中说明作为能指的字符在意指链的语境中与所意指的意义的关系，由此而引出能指的意义生产机制（即接下来要讨论的隐喻和转喻）。

其次，按照拉康的说法，能指链的运动只是为意义生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就是说，能指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意义，所谓的意义实际是主体在能指链的回溯运动中和在某一能指的垂直轴上经由选择被缝合出来的，所以意义的产生既非自主的主体赋予的——因为这个主体已是“所指的主体”，是已然被能指结构化的效果主体；也非能指本身指涉出来的——因为在能指和意义所指之间总有一道难以穿越的横杠在抵制意义的到场。于此便有了拉康对“树”的一系列能指要素（它的发音；它的在神话和宗教中的形象、它的实际形象的比喻性运用，乃至中国甲骨文的书写形式等）与其多样的文化意义间的松散联系描述，这一以文字游戏的方式完成的描述既是为了强调意义生产的语境关联，也是为了说明主体纵向选择的语境化，说明能指的意义凝定的语境化。

进而，拉康从人类文化记忆中挑选出来的有关“树”的形象的众多比喻性运用看似毫无关联，可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意义轴在支配着他的选择，那就是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力量和尊严”以及主体的“命运”。至少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这个隐喻性的意义是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其实就是能指之“树”的“菲勒斯意义”——所以盖洛普称拉康的隐喻理论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有关拉康对树的这一主导意义的选择，英语世界著名的拉康研究者吉尔伯特·柴廷（Gilbert D. Chaitin）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因而，在树的段落中那明显不连贯的系列选项是对特殊的历史可能性那不可预见和不可控制的分叉的一种追述。另一方面，它们明显的连贯性又是来自多多少少系统的、普遍化的以及它们在这一回溯性的呈现中必然要服从的秩序。虽然没有一个单一意义或本质能把树的所有既定用法统一于一个总体性中，但总有某些固定的主题会让它们关联在一起。力量和尊严的菲勒斯意义被迅速地叠加到对命运的贯注中，先是在所有基督徒确认为象征符号的十字架中，接着是在毕达哥拉斯派视为十字路口的 Y 中——这也许暗示着俄狄浦斯面对的性命攸关的十字路口，再接着是在家族谱系树的链条中，然后是在出于预言目的而刻写在龟壳上的那种之字形图画中。一个图画之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它在一阵突然的闪电中得以显形，使我们想要认识自己命运的欲望得到满足——通过参照赫拉克利特-海德格尔的“万物归一”和瓦雷里的“梧桐树”的黑格尔泛音而得到体现，那树的“不！”回应着节点和横杠的否定性。^①

那么，拉康做如此的意义选择是为了什么？从拉康对法国现代诗人瓦雷里《致梧桐树》的诗句的引述可以看出，他是为了说明主体的命运与能指的隐喻性的关系。拉康所谓的主体的“命运”实际就是指主体或主体的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而主体的真理/真相就存在于能指的重复或坚持中，并且是有意识的主体所不知的，是一般的日常话语所无法言说的，但它能在主体之言说的缝隙或裂口中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它能在高度凝缩的诗性语言中显示自身的一角。在此，能指的隐喻性就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无意识的语言运作，相对于主体而言，语言或者说能指的结构是先期在场和已然在场的，它总在暗处支配着主体的言说，只是有意识的主体并不知道罢了，如同在瓦雷里的诗句中，暴风雨像对待小草一样地对待树，树却高昂起它的头颅对暴风雨说“不！”，树的这种英雄主义形象——它当然是历史文化中已先期存在的树的菲勒斯意义的回声——正是诗人（主体）所要认同的，但这一认同的完成并不是通过对已有的意义贮存库的直接提取——那些历史的可能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并且是作为无意识的、抽象的东西贮存在主体的

① Gilbert D. Chaitin, *Rhetoric and Culture in Lacan*, pp. 42-43.

记忆中——而是通过能指的差异化，即同为植物的“小草”和“树”面对暴风雨的侵袭展现的不同姿态，通过把主体置于某一能指即“树”的位置，来呈现主体对树的“高昂的头颅”所显示的特殊性的无意识认同，就像拉康说的，“通过‘高昂的’这一特殊性和简约它的‘整个地’之间的分类对比，永恒的瞬间那无法觉察的光华可以在‘头颅’（tête）和‘暴风雨’（tempête）的凝缩中得以实现”。在这里，“头颅”（tête）和“暴风雨”（tempête）的凝缩是一个无意识过程，是主体在诗的隐喻中把自身召唤到某个位置的语言运作，而主体作为运作的效果也就是把自己置于了一个意义所指的位置。

上面的说明已经十分冗长，但即便如此，我的读解仍是不全面的，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字面的说明，一种“弱”阅读。如何把这个字面逻辑导向某个阐释方向，或者说如何以一种阐释方向来重述这个字面逻辑，那就要看阐释者各人的话语立场。但不管怎样，在对拉康的阅读中，切忌把拉康的文本看作封闭的意义系统，以一种想象的投射关系来把文本凝固在某个单一的阐释中。

拉康不可阅读，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可读性构成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第一个诱惑，由此才有了对拉康文本无穷无尽的可能的阅读。风格终归只是风格，它就像一本书的封面，朴素也好，庄重也罢，终归只是以“嵌入”的方式“悬浮”在外层的东西，一个好的封面就在于它能提示被包裹在内里的宝藏，但那毕竟只是一个“提示”，以拉康的逻辑说，如果我们把“提示”视作充分、完整的“揭示”，那实际就代表主体在与对象的关系中陷入了一种想象的幻觉，代表主体对“提示”的另一功能即遮蔽的功能的不知。对于我们的阅读行为而言，风格终归只是存在之意义的一个外显装置，要想突破或破解风格对存在（文本）之意义“提示”/“遮蔽”的悖论性功能，除了需要在阅读中摆清自己的位置，明确阅读与文本的关系，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弄清楚结构风格、使风格作为所欲望的“对象 a ”的基本手段。对于拉康及其文本，我们在阅读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他的话语的逻辑，其所谓的“不可读性”很多时候都与他的逻辑有关——是的，拉康虽然不可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话语毫无逻辑，相反，逻辑正是他的捕鼠机。

在此，我把拉康结构其理论的基本逻辑分为五种（也许还有更多）：

失败的逻辑、剩余的逻辑、悖论逻辑、非对称性逻辑和拓扑学逻辑。我下面用一些例子来分别说明它们。

人们常说拉康的理论是一种有关主体性的理论。是的，拉康的确强调其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揭示主体的真理/真相，但他对这个真理/真相的揭示总离不开他者和主体间性的维度。一定意义上说，拉康的那些逻辑都与这两个维度的嵌入有关。

拉康所讲的“他者”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相对于某个主体的另一个主体，而是指结构主体的“另一个场景”，它既是构成主体的无意识的场所，也是主体的无意识构成本身。他者是一种他在性的结构力量，是能指的场域，是主体在此完成其认同的场所，所谓主体是被结构的，实际就是在他者秩序中构成的，主体总是且已然是他者的主体，是在他者场域中出现的效果主体，主体间的关系根本上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参与对话的两个主体相对于他者场域的位置关系。主体与他者的这一关系带给主体的一个根本性后果就是主体的异化和分裂，因为主体在他者场域中认同的是一个异己的、他在的东西，主体的认同过程实际是在把一个异于自身的他在性内置于自身的过程。

所谓失败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主体在他者场域中的认同终归要以失败告终，主体的认同不过是主体的失败和失败的主体的双重纠缠。那么，失败是如何嵌入到主体认同过程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存在的匮乏和他者的欠缺。

“存在的匮乏”，这个颇具海德格尔意味的说法是拉康对主体命运的一种本体论描述，它指的是主体性存在的某种虚无性和空洞性，某种莫可名状的特质。存在的匮乏有多个层次：在前主体状态，这个匮乏指的是一种彻底的空无，“彻底的空无”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什么也不是，因为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获得一个社会化的位置之前，其存在尚未被命名，是一个实在的混沌，在那里，既没有自然和文化之分，也没有“我”和“你”之分，按照拉康的解释，这个前主体的状态是一种神话状态，它未曾真正地存在过，它只是有欠缺的主体对某个完满状态的一种回想，是主体在回溯性的历史记忆中构想出来的某个已然失落的世界；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说，存在的匮乏也指主体的一种原初失落，即伴随诞生而来的与母亲的原始关系的切断——精神分析学称此为“诞

生创伤”——婴儿的降生即意味着与母体的脱离，意味着曾经完满的伊甸园状态的永远失去，这一原初的失落将在主体的心理结构中留下无法抹除的阴影，成为伴随主体一生的一个创伤性内核，每当主体遭遇挫折的时候，它就会作为一种构成性的力量主导主体的欲望行进和欲望阐释；进而，存在的匮乏还指属于象征秩序的语言和父法对主体的切割，例如，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个体终于在社会中获得了——一个主体性的位置，拉康称此为个体在象征秩序中的注册，可这个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个体必须接受父法的阉割和语言的铭写，必须牺牲或放弃自己的原始欲望即对母亲的欲望，而由于这个牺牲，通过象征秩序成就的主体本质上是一个被阉割的主体，一个有欠缺的主体，一个在欠缺和匮乏中不断欲望着的主体。主体根本上就是一个失败的主体。

如果说存在的匮乏还只是为主体的失败奠定了基调，那么，他者的欠缺将使这个失败成为主体必要遭遇的东西，失败的主体最终必要通过主体的失败获得实现。所谓他者的欠缺，指的就是语言结构的不完整性和断裂。拉康称语言对主体的欲望命名的过程实际就是他者对主体的一种切割，主体借此完成了在象征秩序中的注册，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但他对由此而永久失落的原初对象——母亲作为整一的存在——的欲望就只有在一系列的能指替代中寻得想象的满足，主体欲望的实现必定以失败告终，这不只是因为想象的满足终归是“想象的”，更是因为那个以能指替代构成的意指链条是不完整的。拉康说，他者作为能指的场域乃是众能指的集合，按照集合论的悖论逻辑或者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它们是拉康的“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集合的完整性实际是由集合以外的某个要素来规定的，比如“有理数”的集合是因为“无理数”才得以可能的，“有理数”即是“非无理数”，这意味着所谓集合的完整性其实是有条件的，即它是以不完整性作为前提的，拉康把这称作是他者秩序中的一种欠缺或他者的欠缺。他者的欠缺意味着意指链对主体的意义缝合总是会遭遇失败，总有一个无法能指化的东西即主体的原初失落对象落在能指的集合以外，最终导致主体认同的失败，导致主体在认同中成为一个失败的主体。就此言之，失败的逻辑实际是构成主体性的能指逻辑所内有的，是他者秩序所内有的。

失败的逻辑几乎渗透在拉康理论的每一个角落：能指链的意指作用

的失败；主体性认同的失败；主体的欲望满足的失败；主体的求原乐意志的失败；主体间的关系的失败；移情分析的失败，等等，这一切都与失败的逻辑有关。

第二种为剩余的逻辑。剩余的逻辑仍与语言切割的不彻底有关，它指的是语言对主体或欲望的命名总是会留有剩余，换句话说，在主体那里，总留有一个东西是无法命名的，主体的欲望满足总因为某个剩余而被延宕，并因为这个剩余而进入欲望的无尽链条，在欲望中不断要求“再来一次”、“再多一点”。

同样以主体对父法的认同为例。拉康说，父亲的功能说到底就是“不”的功能，是父亲向孩子和母亲宣布禁令的功能：孩子为获得主体性的位置，就只有接受父亲的禁令或父法的阉割，放弃对母亲的欲望。这个阉割当然是象征性的，它只是以法的形式把对母亲的欲望封存在一个不可能的场域，母亲一对象从此成为一个不可能的对象，一个激发主体的欲望的对象，一个剩余的对象。

这个剩余到底是什么？是残留的对母亲的欲望吗？严格地说，不是。对母亲的欲望是在象征界阐述出来的，而剩余是留在实在界的东西，是不可象征化的原初对象，是主体在诞生之时就已经永久失落的原质之“物”，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可能性，是“空无”，是欲望主体在欠缺中想象出来的一种原初失落。可这个剩余又是欲望的原因，是激发欲望、启动欲望的转喻性链条的东西，是主体总想在象征和想象中捕捉到它但又总是与之错失的东西。

剩余是一种无用之物，因为它没有“使用价值”，因为它是价值的剩余。但另一方面，剩余是激发欲望的原因，主体之为欲望的主体和原乐的主体，就是因为它的作用。正是基于主体与剩余的这种关系，拉康在研讨班中干脆称主体或欲望就是一种剩余、一种残渣，主体即是“人渣”（residue）。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乃是他者的欲望。比如我们总是欲望着他者欲望的东西，我们总是欲望成为他者的欲望对象，我们总是以他者的欲望来规定自己的欲望，总之，我们的欲望并非我们自己的，而是在他者中且通过他者被结构的。可是，他者究竟欲望什么？他者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主体对此完全不知，他者的欲望之谜令主体焦虑不已，在他者欲望的煎逼之下，在欲望满足的失败中，主体一次又一

次遭遇到自身的残余性，同时一次又一次在他者的欲望中、在对他人者欲望的欲望中把自己渣滓化：“在你的眼中，我不过是人渣”，因为我在你的眼中看到自己就是人渣。

同样地，剩余的逻辑可以用在许多地方：能指链的意义坚持；能指对主体的缝合；欲望的欠缺；他者欲望之谜；他者的原乐；女性的“非一”；移情的悖论等等，都可以借这个逻辑获得说明。

与失败的逻辑和剩余的逻辑一样，悖论逻辑在拉康的理论中也十分普遍。他曾以“要钱还是要命”这一被迫的选择来说明这个逻辑：要钱的话，人财两空——命丢了，钱也没了；要命的话，乖乖把钱交出来。在这个二者必选其一的选择中，不论选哪一方，都意味着损失。主体性的存在亦是如此。依照拉康的理解，主体的认同是在象征界完成的，且必定要通过象征界来完成，主体性的构成乃是象征界的语言或能指切割的效果，就是说，主体总是一个效果主体。

但另一方面，这一效果是悖论性的：主体通过对父法的象征性认同固然可以在社会中获得一个象征性的位置，可令主体深感挫败的是，这个位置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他需要放弃或压抑某些东西（比如对母亲的欲望），然后才能获得社会及文化的象征秩序的认可。

进一步地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性效果，根本还在于主体实现其认同的他者场域的功能是悖论性的，这可以在多个方面来说明。就能指的运作而言，主体性的获得就是主体与能指的一种意义缝合，可能指功能的另一面恰恰是否定，比如菲勒斯能指，它固然可以提供给主体一个认同对象，但这个认同却是基于父亲功能的“不”，主体与菲勒斯能指的缝合其实是以该能指的否定功能作为前提的。换从他者的角度说，主体化根本就是主体要在他者场域获得确认，可这个他者（在此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建制、文化规制这样的非人化力量，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处在那一建制或规制之中且代行其非人的意志的他人主体）是有欠缺的，不仅如此，这个他者还是一个淫荡的、不知饱足的他者，一个不断地向主体要求更多的他者，正是他者要求的这种过度，把主体抛入了欲望无尽的煎逼，他者的欲望令主体在他者中的确认陷入了僵局，这就是主体性构成的悖论。

拉康在研讨班中讲到了许多悖论，比如他者欲望的悖论、原乐的悖

论、爱的悖论、幻象结构的悖论、对象 a 的悖论、驱力的悖论等等，它们的存在无一例外地使得主体的命运必定是悖论性的。

拉康运用的第四种逻辑就是非对称性逻辑。所谓非对称性，指的是具有结构性关系的双方在交互作用中的某种单向运作，所以拉康时常用这一逻辑来说明主体间的关系。

拉康说，主体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之间互为主体或互为对象的关系，因为主体间关系得以可能要取决于处在关系结构或关系情境中的主体对自身位置的指认，而这一指认总是离不开他人位置的参照以及因这个参照而来的位置倒置和关系反转。

比如在爱的关系中——拉康通常把它看成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当我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之所以被爱看似是因为你的某些特质——比如你的美貌、你的气质甚至你生气时撅起小嘴的样子——使你显得可爱、值得我爱，而实际上，这些特质之所以可爱和值得我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我的力比多投注，是因为我在那些特质中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形象，或则是因为那些特质可填补我的欠缺与匮乏，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境中，“你”并不是作为一个被爱的主体甚或被爱的对象而在场，“你”只是居于了一个参照的位置，是我在这个位置所欲望的东西的一个代理或傀儡，以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说，我在这里爱的始终只是我自己，爱总是自恋性的。

当然，“我爱你”这个话语是要求得到回应的。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其实是欲望得到你的爱，我欲望自己成为被爱，我欲望你如我所要求的那样爱我，在这里，主体的位置被倒转了，“我”从主动者的位置转到了受动者的位置，这个位置倒转当然不是现实地发生的，它只是处在想象的幻觉中的主体的一种无意识运作。进而，如果对方以“我也爱你”这样的话语来回应，我们就说这里建立起了一种主体间的爱的关系。可拉康不是这样理解的。在他看来，这充其量只是表明对方也处在想象的幻觉中。爱的一方和被爱的一方的话语看似都是指向另一个主体，可在想象性的关系中，那“另一个主体”实际只是一个位置，甚至是一个空位，有待“我”用想象的幻觉来加以填充，双方的话语不可能真正地相遇和叠合，即便它们可能发生交会，那交会的地方也只是各自的匮乏之所在，是各自原初缺失的对象之所在，以拉康的话说，是

“对象 a ” 的所在。

除上面说到的想象性关系以外，主体之间还存在一种以语言或他者场域为中介的象征性关系，这同样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其逻辑的运作尤为复杂，在此就不做说明。

非对称性逻辑对于我们理解拉康有关主体间关系的理论至为关键，比如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主体的性别关系、受分析者与分析师的关系、学生与老师的关系，等等，都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拉康在晚期教学中对非对称性逻辑有极其频繁的操演。

其实，上面所说的四种逻辑都可以归于一个逻辑：不可能性的逻辑。对拉康而言，不可能性总是与实在界相关联，实在界作为主体的一个存在界域恰恰是主体不可抵达的场所。正是实在界的这一不可能性，才招致了主体的失败，招致了语言切割的剩余，招致了认同的悖论，也招致了主体间关系的非对称性。反过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完全的主体化是不可能的；主体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主体的欲望满足是不可能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爱是不可能的；乃至最后，精神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是拓扑学逻辑。拓扑学是拉康对精神分析学施以科学化和形式化的手段，它虽然取自数学，但拉康的运用并不是纯数学的。拉康的拓扑学既体现在他十分热衷的各种拓扑图形中，也体现在他的理论阐述中，这里讲的“拓扑学逻辑”主要是针对后者。

一般地说，拓扑学的根本在于结构的连续变换，拉康的拓扑学主要是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界”拓扑学，它思考的是“三界”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对于主体的效果。比如主体认同的问题，拉康把它分为想象性认同和象征性认同：在想象性认同中构成的是自我，在象征性认同中构成的是主体，前者以理想自我为认同参照，后者以自我理想为认同参照，前者是主体（自我）朝向对象的一种外投射，后者是主体通过对象完成的一种内投射。实际上，在主体的构成中，这两种认同形式是交互作用的。以观看行为为例，拉康说，镜像阶段的那种纯粹想象性的看并不存在，因为任一主体自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已然被象征界所铭写，例如在他——这时他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向镜中窥看的时刻，常常是代表着象征秩序的父母——他当

然还在父母的怀抱里——指给他某个理想的认同形象，比如父母对着镜中的形象说，“看，这就是我们的漂亮宝宝”；“这就是我们的小天才”等等，或者当婴孩以父母的形象或父母的期许、认可与赞赏作为参照来“完形”自己时，象征界的他者就在此发挥作用了，主体在这个镜像认同中完成的就不再只是理想自我，而且还有自我理想。这就是说，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自己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对体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换用拉康的拓扑学表述，与自我理想对应的观看方式是“我”“想象地”看那“象征地”看着我的他人，由此而形成了我“想象地”看自己的“象征形式”。这听起来的确十分缠绕，但如果你熟悉了拉康的拓扑学逻辑，理解它们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拉康的许多理论都有着“三界”拓扑学的框架，所以他提出了许多三元组的概念系统，比如需要—要求—欲望、想象的父亲/母亲—象征的父亲/母亲—实在的父亲/母亲、想象的菲勒斯—象征的菲勒斯—实在的菲勒斯、挫折—剥夺—阉割等等，它们都可以甚至都需要置于“三界”的拓扑学运作中来理解。

失败的逻辑、剩余的逻辑、悖论逻辑、非对称性逻辑和拓扑学逻辑，我不敢说它们是打开拉康的理论迷宫的万能钥匙，但我相信，如果你对 these 逻辑有基本的掌握，那一定可以帮助你扫除许多阅读上的障碍，为你深入拉康文本的腹地提供便利。

三

下面我要简单谈一谈汉语世界对拉康的阅读。^①

相较于对待福柯和德里达而言，汉语世界对待拉康的热情虽然同样高涨，但更多的还停留在叶公好龙的层次。我想阅读的困难应当是造成

^① 我这里主要只针对内地的拉康研究。在港台尤其台湾地区，人们对拉康的热情比我们高出很多，在拉康文本上所下的工夫也比我们远为深入、细致，其研究水准和应用能力自然是另外一番气象。

这种情形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们现有的拉康研究中^①，只有极少数人对拉康做了严肃认真的阅读，可另一方面，就连这极少数人的阅读也很不完整，这种不完整尤其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缺乏对拉康研讨班的系统阅读。拉康研讨班从1953年下半年开班到1980年结束，一共是27期。到2008年为止，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整理出版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有一些并不完整），英语世界至少翻译出版了米勒版——虽然拉康派对这个版本的权威性持有异议，但在拉康派以外，人们基本上把它视作是拉康研讨班的钦定版本——的七种，至于非米勒版的英译本，几乎涵盖了全部研讨班（但在市场上极其少见，这与它们属于“侵权”作品有关）。在汉语世界的拉康研究中，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对研讨班有零星涉猎，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只字未提，这种缺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接康的理解。

第二，缺乏对《文集》的全面阅读。出版于1966年的《文集》会聚了60年代中期以前拉康理论的精华，是拉康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法语版《文集》长达近千页，共收录论文约三十篇。前面已经说到，英语世界在1977年由阿兰·谢里丹翻译出版了《文集》的一个《选集》，仅收录了其中的九篇论文——直到2006年，英语世界才有了布鲁斯·芬克翻译出版的《文集》完整本。单就篇目而言，《选集》的九篇文字的确浓缩了《文集》的精华，可作为一般读者的首选。但从研究拉康的角度说，单单依靠这个选本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汉语世界已有的拉康研究大都完成于2006年（即芬克版）之前，而研究者中只有个别人读过法语版《文集》，所以他们依靠的只能是谢里丹的选本，由此而造成的理解上的缺失就可以想象了。

但有人会说，汉语世界早就有了一个大部头的译本《拉康选集》

^① 单就专著（包括港台地区）而言，我看到的有如下几种：1. 杜声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2. 梁浓刚：《回归弗洛伊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3. 王国芳、郭本禹：《拉冈》（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4.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 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9. 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2001年)^①——它不是比谢里丹的选本更完整吗？其实，这个“选集”并非1966年色伊版《文集》的全译本（虽然版权页上是这么注明的），译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删除了其中十分重要的几篇文字，比如《无意识的位置》（1960年）、《康德同萨德》（1963年）、《科学与真理》（1965年）等。更关键的是，这个译本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当然主要是针对翻译的质量。我不懂法语，所以不敢对译者的法语水准妄加评论，但我可以对他的汉语水准做一个判断：译者对汉语的句法表达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就以《文集》开篇的《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1956年）的第一段话为例。中译《拉康选集》的译文为：

我们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重复的机制（Wiederholungszwang）的原则存在于我们称为能指链环的动因之中的。这个观念我们是作为外在（也就是说：偏心的位置）的一个相应物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是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话，我们必须将无意识中的主体安置在这个外在之中。我们知道，在精神分析开创的经验中象征是通过想象的什么样的中介而左右了最为隐秘的人的结构。^②

这样的文字表达我们看得懂吗？！拉康的演讲真的有这么别扭吗？！我不妨把对应的法语原文和芬克的英译抄录下来，然后依据芬克的译本对这段话做一试译：

Notre recherche nous a mené à ce point de reconnaître que l'automatisme de répétition (Wiederholungszwang) prend son principe dans ce que nous avons appelé l'insistance de la chaîne signifiante. Cette notion elle-même, nous l'avons dégagée comme corrélatrice de l'ex-sistence (soit: de la place excentrique) où il nous faut situer le sujet de l'inconscient, si nous devons prendre au sérieux la découverte de Freud. C'est, on le sait, dans l'expérience inaugurée par la psychanalyse qu'on peut saisir par quels biais de l'imaginaire vient à s'exercer, jusqu'au plus intime de l'organisme

① 《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② 同上书，1页。

humain, cette prise du symbolique. ①

My research has led 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repetition automatism (Wiederholungszwang) has its basis in what I have called the insistence of the signifying chain. I have isolated this notion as a correlate of the ex-sistence (that is, of the eccentric place) in which we must necessarily locate the subject of the unconscious, if we are to take Freud's discovery seriously. As we know, it is in the experience inaugurated by psychoanalysis that we can grasp by what oblique imaginary means the symbolic takes hold in even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the human organism. ②

[我的研究使我认识到，重复的自动性 (Wiederholungszwang) 的根基就在我所谓的意指链的“坚持” (insistance, insistence) 中。我所离析出的这个概念乃是“外显” (ex-sistence) (亦即离心化位置) 的一个相关物，我们若想认真地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就必须在那里来定位无意识的主体。我们知道，正是在精神分析学所开创的经验中，我们才能领会到象征界是借何种晦暗的想象性手段蛰伏在人类有机体最隐秘的深处的。]

即便对拉康这里使用的概念不甚了解，也至多只能说这段话很艰涩，但其句法关系是很明确的，并不像前面那段译文那么支离，那么令人茫然。由此我给出的另一个判断就是：汉语世界的拉康研究从这个译本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若是有人依照这个译本来“做”拉康，那最后的成果一定是不可靠的。我这样讲不是说对拉康的翻译和研究存在一个“正确的”标准——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标准，但这并不排除有“错误的”标准。是的，有“错误的”翻译和“错误的”阅读，但什么样的翻译和阅读是“正确的”？至少在目前还只能说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标准。

顺便说一下，这段话之所以艰涩，主要是因为它里面隐藏着一系列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1,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6.

拓扑式的语义转换。在此，“重复的自动性”（*automatisme de répétition*, repetition automatism）乃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复强迫”（*Wiederholungszwang*）概念的“意译”，说的是被压抑的创伤性经验总是以语言的方式在主体的无意识中自发地、偶然地闪现，它总想、也只能在语言中并借助语言来表达自身，所以拉康说重复的自动机制的基础就存在于意指链的“坚持”（*insistance*）之中。而所谓意指链或能指链的坚持，说的就是能指链条对“意义”的坚持，这是能指的一种坚执性，且这种坚执性恰恰是因为“意义”的不在场，因为主体渴望在与能指的缝合中来寻得“意义”。也正是因此，意指链的“坚持”是与主体的“外显”（*ex-sistence*）联系在一起的，“*ex-sistence*”这个词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借过来的，有“绽出”、“去存在”的意思，但在拉康这里，主体的“去存在”并非其可能性的实现，而是主体在自身之外的某处显现或出现，是主体渴望在能指的“坚持”（*insistence*）中让自己“显现”（*ex-sistence*），正是在这一“进”（*in-sistence*）—“出”（*ex-sistence*）中，主体把自己嵌入了一个离心化的位置，成为了一个离心化的无意识主体，因为其在能指场域寻得的所谓“意义”并非他自己的，而是在它处结构出来的，是主体以某种不为自身所知的方式，即通过对能指之“意义”的想象地认同，在象征性的他者场域获得的。归总为一句话，主体是由他者场域中能指的自动重复结构出来的。

其实，文本阅读的不完整和翻译的不充分只是影响汉语世界拉康研究的水平的部分原因，除此而外，我们还面临其他的一系列障碍。

首先，要不要读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必须要读。抛开弗洛伊德来研究荣格并非不可想象之事，但抛开弗洛伊德来研究拉康是根本不可能的，拉康的几乎每一个概念、每一个问题都与弗洛伊德或他对弗洛伊德的阅读有关，他的“回到弗洛伊德”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

对拉康而言，所谓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不仅要回到弗洛伊德成熟时期的文本，还要回到他早期的文本，比如《科学心理学纲要》（1895年）和《歇斯底里研究》（1895年）；不仅要回到《释梦》（1900年）、《超越快感原则》（1920年）这样的奠基性文本，还要回到弗洛伊德讨论治疗技术的那些小论文，比如《移情的机制》（1912年）、《回忆、重

复和逐步突破》(1914年)等;不仅要回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文本,还要回到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尤其他的五大病例研究。总之,这是一次全面而彻底的返回。

但汉语世界在这里要再次陷入尴尬。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译介虽算得上历史悠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有许多重要的文本都还没有翻译过来),还没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弗洛伊德研究,也没有严格的精神分析临床。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在我们这里是缺席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弗洛伊德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虽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有关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书籍,但那纯粹只是一个商业符号。

所以,在中国,“回到弗洛伊德”仍是我们需要开始的第一步。这不只是为了拉康,也不只是为了纯粹的精神分析学,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研究,因为如果说现代性/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症状自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而马克思为其中的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最有效的一个角度,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为其中的心理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典范。若是能在重读的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理论——所产生的将是聚变式反应,并且西方世界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较早的法兰克福学派,当下的拉克劳和齐泽克等。

其次,要不要接受培训分析或做临床分析?拉康派特别强调临床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没有临床经验的拉康研究只能是隔靴搔痒,难入堂奥。在中国,四川成都有一個精神分析中心,自称中国的拉康派,据说已经培养了不少“分析师”。我对于这个团体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其分析师的临床水准和临床效果究竟如何也无从判断,但从中心的主题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团体成员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文本的阅读^①,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好的开端,但从已有的成绩看,翻译依然是他们的死结。

如果说弗洛伊德心目中的分析师主要地还是医生的角色,那么拉康心目中的分析师该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不止一个角色,但首要地不是医生。拉康称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谈话的艺术”,并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

^① <http://www.cpsac.org.cn>.

直奔主题的那种谈话，也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而是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是中国禅师的那种棒喝式谈话，它要求分析师把自己置于自知无知的位置，让受分析者在这一构成性的谈话情境中学会自己去阅读欲望的症状。拉康赋予分析师的这种形象向我们暗示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分析师，我们在躺椅之外的任意场景中——在阅读和写作中，在日常交谈中，在课堂上，在窥看街边行人的时刻——都可能成为做分析的人。这就是说，如果临床经验如某些分析家们所言是拉康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那么，作为一个非分析家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我所给予的回应就是，阅读拉康，这本身就是一种临床——要知道，拉康把研讨班教学也当作一种临床。

所以，要不要做临床分析呢？要，但不一定是在躺椅上，不一定是在那些故弄玄虚的分析“仪式”中。分析是一个事件而非一种秘仪，分析是一种偶然而非一个程序，分析是诗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而非资格、制度和团体。“去做分析吧”——我期待某一天这将成为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某些人的“权力”。

还有，要不要研读拉康的数学？这当然不只是汉语世界的拉康研究者的问题，西方研究者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所谓“拉康的数学”，我指的是拉康研讨班中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实施的各种数学化和形式化的尝试，里面不仅有控制论、博弈论、悖论逻辑、代数式或函数式，还有拓扑学、符号逻辑等等，它们一直以来都是阅读拉康的最大障碍。在西方，对拉康的数学的态度有明显的两极：反对或赞成。在中国，因为较少接触研讨班，所以没有形成任何态度，换言之，中国的拉康研究者还没有把它当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我相信，将来的某一天这个问题终会出现。

要不要研读拉康的数学尤其是他的拓扑学？我的回答是，因人而异——这等于没有回答。不研读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不会有损于你对拉康的理解。虽然拉康自己——尤其在晚期教学中——把他的数学提到很高的位置，但我认为那不过是拉康的故弄玄虚，尤其他晚期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纽结和拓扑变换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老人自娱自乐的游戏。研读又会怎么样？同样不会怎么样，那既不表明你真的读懂了拉康，也不表明你的智力比别人略胜一筹。拉康自己说，他的拓扑学可以

让人整体地和即时地领会其精神分析学的辩证法要义，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他的L图、欲望图、幻象公式、波罗米结等的确显示了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以外，不是所有的数学型和拓扑图都有这样的功效。^①

不过，拉康的拓扑学不仅体现在各种拓扑图形和代数式中，还体现在他的理论阐述逻辑中。对于这后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有简单的介绍，它们当然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实现“逐步突破”的有效工具。

毫无疑问，汉语世界面对拉康依然困难重重，我提出“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并不是要给它提供一个确定的回答，而是想为我们自己梳理一下可能的道路和可能的障碍。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如何阅读拉康”甚至“要不要阅读拉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阅读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他人、“通过”社会和建制、“通过”毫无生气的写作来“阅读”自己，而拉康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它们眼里，貌似身为主体的我们实际只是一个“residue”（“剩余”，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个词译作“人渣”），从这个角度说，“如何‘用’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似乎还有几分意义，正是因此，“如何阅读拉康”似乎也有几分必要。

“如何阅读拉康”，在中国颇有市场的齐泽克曾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②，不过他在书中要读的不是拉康的具体文本，也不是拉康的理论体系，他是要“从别处”来教给我们一种阅读拉康的方法——这个方法齐泽克此前已经实践了很多次，比如《斜视：通过大众文化看拉康》（1991年）^③、《享受你的症状！——雅克·拉康在好莱坞内外》（1992年）^④等作品都是这样一个套路——所以他在书中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

① 有关拉康的拓扑学，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给出的评价都不是很高，所以也很少做系统研究，但拉康派的一些分析家对它情有独钟，认为它在临床实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可以发挥效用，他们甚至把接受拓扑学训练视作是进入拉康的话语的重要条件。在我所看到的英语文献中，仅有一本书对拉康的拓扑学有十分精彩的解释，参见 Ellie Ragland and Dragan Milovanovic (eds.), *Lacan: Topologically Speaking*,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4.

②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③ 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④ Slavoj Žižek, *Enjoy Your Symptom! —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们“如何去读”拉康，而是“运用”拉康式的阅读来阅读包括哲学和大众文化在内的其他文本，他觉得，通过以拉康的方式来阅读其他文本，“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显明。齐泽克说：

拉康是一个贪婪的读者和阐释者；对于他而言，精神分析学本身是一种阅读文本——口语文本（病人的言语）或文字文本——的方法。因此，比起实践他的阅读模式来，“用”拉康来阅读其他文本当是更好的阅读拉康的方法。所以，本书的每一章都会把拉康的一段文字同（来自哲学、艺术、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另一片段对置在一起。通过对其他文本做拉康式的阅读，拉康的立场将可以得到阐明。^①

其实，身为主体的我们自己就是最好的“文本”，也是我们最需要去阅读的“文本”，对这一文本做拉康式的阅读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去阅读拉康：阅读拉康；通过阅读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通过阅读我们自己来阅读拉康，这大约是把我们带向症状享受的基本环节。

最后，我要简单说明一下我在本书中对拉康的阅读。

前面我讲到了所谓的“强力阅读”。强力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是强力意志的施为，在这一阅读中，主体的话语将与对象的话语进入一种相互对质的情境，阅读的效果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我没有齐泽克的才情，也缺乏阿尔都塞那样的使命感，我做不了他们的那种强力阅读。所以我刚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把我读到的东西说出来，把我认为需要解释的地方解释清楚。我起初还觉得这个目标算不上很高，但真到进入实施阶段，才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本有关拉康的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我用了接近于一小本书的篇幅来叙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的历史，这一叙述并不是为了展现拉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所以它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拉康传记——而是为了以“故事”的形式来揭示精神分析运动本身的

^①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p. 5.

某种“精神”以及这个精神内有的某个死结，我对拉康的经历的叙述基本是在这一语境中进行的。

在接下来对拉康思想的讨论中，我并行地排列了一系列主题，但与西方世界的“主题性阅读”稍有不同的是，在每一个主题下，我又叠置了一系列次级主题，这些主题相互之间实际是连通的，是可以转换的，我想以这种方式让拉康的理论形成一个链环或纽结式的结构，这样可以相对地避免体系和意义的封闭，避免单一视角的简约化。可这样做也存在致命的缺陷，就是容易陷入拉康式的缠绕和重复：当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的时候，总是要对已经说过的东西“再来一次”，这种重复可能会让你感到单调、累赘和不耐烦，但实际上，每一次主题的转换或叠加都应当使已有的“定论”发生变异，如果你没有看出来，那肯定是我做得不够好。的确，当这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我的信心变得越来越不足，总觉得已经说出的与真正要说的还隔着莫大的距离。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把本书的结构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拉康的事业”结合拉康的生平传记追述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及拉康思想与拉康学派的发展过程。

第一章——“弗洛伊德在法国”：追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及法国动力精神病学的关系，追述了精神分析学在巴黎医学界和文人圈子两大阵营的传播过程，还追述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历史，在这些追述中，我特别地凸显了法国文化及知识传统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复杂纠缠。

第二章——“自我认同的罪与罚”：追述了拉康青年时期的生平以及早期的思想发展，重点介绍了他介入的两个与犯罪和自我认同有关的案例，透过早期的精神病学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拉康与德国哲学的某种亲缘性，还可以看到后来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分裂的主体”的“科学”渊源。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在这个时期，由于对精神分析学、黑格尔哲学以及法国先锋文人集团的介入，引发了拉康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第三章——“镜像的神话”：以镜像阶段理论为焦点，追述了拉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初的思想发展。在这里，我们将会看到，镜像阶段不仅是拉康以黑格尔哲学对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的一次强力重

述，也是他在确立自己身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主体性身份时叙写的一个神话场景。拉康对镜像阶段的讨论成为了其精神分析理论的秘密诞生地。

第四章——“精神分析的政治”：围绕拉康的两次大决裂追述了他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冲突，尤其说明了这一冲突的政治维度。在此，我还以1953年作为一个时间点，梳理了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考察了他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的背景、意图及其返回策略，并叙述了他在5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

第五章——“拉康的王国”：追述了拉康学派的形成及其内部矛盾，回顾了1968年巴黎学潮对法国精神分析运动以及拉康学派的影响，另外还特别地叙述了《文集》的出版、研讨班的多次易地、拉康与拉康派的矛盾、拉康学派的解散等等。

第六章——“研讨班的岁月”：描述了拉康从1953年到1980年的27期研讨班的总体进程，其中既涉及研讨班的风格，也涉及研讨班报告的出版以及围绕这一出版引发的拉康派的内部冲突，还涉及研讨班的理论阐发技术。这一描述虽然算不上完整，但大约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地图。

整个“上篇”是以拉康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发展为线索，但上面已经说了，这一系列的追述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有关主人公的传奇——虽然拉康的故事的确富有传奇色彩。我的目的旨在说明一点：拉康是如何成其为“法国的弗洛伊德”的？所以，我力求把拉康的故事置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讲述，力求把握拉康的多次理论转向与时代知识氛围的关系，并特别地关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政治。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我所采用的故事素材很大一部分来自拉康的女弟子鲁迪奈斯科写的那本著名的历史传记——但我的讲述肯定不是对原书的编译——所以对拉康的生平感兴趣的读者更应当去读一下鲁迪奈斯科的原作。

下篇“主体间性的科学”将围绕主体间性的构架来讨论拉康理论的各个方面。之所以采用主体间性作为构架，乃是基于我对拉康理论的一个基本认识：拉康所讲的主体或主体性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性，他者则是这种主体间性的结构场域，主体的存在与命运必须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也只能在这个层面来获得解释。

第七章——“主体的真相”：围绕无意识主体、能指主体、言说主体、欲望主体这几个方面来讨论拉康的主体或主体性概念。有关主体的这种种称谓或说法其实是拉康从不同角度对主体的思考：主体之为“无意识主体”，说的是主体的构成总发生在“另一个场景”，无意识是主体的家；主体之为“能指主体”，说的是主体作为意指效果，作为能指运作或语言切割的效果，根本上是一个效果主体；主体之为“言说主体”，说的是主体作为一种言说性的存在，其言说总是自言说，主体的言语行为中总隐含着陈述和言说的分裂；主体之为“欲望主体”，说的是主体的真理/真相在欲望中的实现，人的欲望总是需要和要求的异化，总是他者的欲望。

第八章——“三界的拓扑学”：主要讨论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以及“三界”之间的拓扑学关系。在拉康那里，“三界”既是主体存在的三个场域，也是主体行动的三个场所，同时也是拉康用来讨论其主体问题的结构性框架，而“三界”本身又是三位一体的，各自之间交互作用，共同结构着主体的命运。

第九章——“他者的逻辑”：主要讨论他者之于主体的结构功能。他者问题是拉康主体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离开了他者的维度，就很难说清楚拉康的主体。我将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他者的逻辑：在“无意识的构成”中，主要讨论能指的运作，讨论转喻和隐喻作为两个基本的他者法则的功能；在“父之名”中，将讨论父亲（以及母亲）作为社会秩序中的他者功能之于主体的关系；在“他者的凝视”中，将讨论拉康对观看机制的思考，这一思考同样离不开他者的维度，因为主体的看根本上是由他者的凝视所规定的；最后在“移情与爱”中，将探讨拉康对移情的悖论的种种回应，探讨分析师的欲望作为他者的欲望在分析进程中的作用。我所选取的这四个方面并不是拉康的他者理论的全部，但透过这些方面，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他者维度的基本运作。

第十章——“欲望的辩证法”：主要讨论拉康的欲望理论，其中包括他者的欲望、菲勒斯的意义、欲望图、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 a 。在“他者的欲望”中，我将考察拉康的欲望理论与科耶夫-黑格尔的欲望理论的关联，尤其要说明主体的欲望与他者的欲望的关系；在“菲勒斯的意义”中，主要考察菲勒斯作为欲望的优先能指的功能；在“欲望图”

中，将重点解读拉康的四个欲望图，这是拉康对欲望运作的一种拓扑学描述，透过对四个欲望图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拉康对自身理论的一个系统表述；至于“对象 a ”，则是拉康从实在界的维度对欲望机制的另一种说明。

第十一章——“原乐的伦理学”：在此将讨论拉康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jouissance”（原乐）。拉康尤其强调了这个概念的伦理维度，我将通过对原乐的僭越性质的说明来呈现这一点，同时还将在“康德同萨德”的论题下来说明拉康对西方的现代性伦理的思考。接着讨论的是原乐的他者维度，通过这一讨论，我们将看到拉康理论的激进性。

第十二章——“话语的政治学”：主要讨论拉康的四种话语，即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家话语和歇斯底里话语。这是拉康晚期教学的重要内容，透过这一讨论，我们将可以看到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某种政治运用。

“下篇”是对拉康理论的考察，这一考察整个地围绕着主体间性和他者的维度来进行，就是说，在我对拉康理论的叙述中，将始终贯穿这个维度。至于把拉康的理论分为几个并列的主题，虽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但更多地是为了呈现拉康理论的拓扑学特色。

我深知我所做的只是通向拉康的第一步，它充其量只是拉康理论的一个“导引”。在一般的理解中，作为“导引”，至少要能够帮助人们清除阅读的障碍、理顺文本的逻辑、把握理论的脉络、抓住思想的症结，可对于拉康，这个工作的难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导引”，我自知离这些标准还有一段距离，我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努力了。

拉康之难无人不知，每一个拉康研究者都想对那些疑难提供一种解决，这意味着我们对拉康的文本必须怀有愚公移山的那种精神，但想要在一本书中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谁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也许，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破解方法，以摆脱拉康的纠缠，所以，对于那种障碍，我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拉康的理论充斥着对他人思想的任意挪用：他从不理会被挪用的思想在原始文本中的语境与基本含义，也从来不理睬别人的理论逻辑。在他重点重读的人物中，除弗洛伊德、黑格尔、索绪尔、雅各布森、列

维-斯特劳斯以及各种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学派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哲学家和理论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边沁、马克思、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罗素、哥德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等。对于他的重读和挪用技术，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过分寻求他实施理论嫁接的逻辑可能，肯定是徒劳，那只会把我们引向囚徒般的困境。为避免陷入这样的危机，我对于拉康的挪用对象——我只讨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采取的策略是：除做出必要的背景交代以外，我不会太多涉入具体的异同对比——这对于理解拉康的思想并无实质性的意义——而是会依循拉康的逻辑去面对他在挪用中想要提出的问题。

拉康的理论也是一个语词的丛林，里面涉及两三百个概念，有许多概念是我们自认为十分熟悉的，比如自我、主体、对象、他者、主体间性、爱与恨、需要、要求、欲望、死亡、快感、凝视等等；有一些对于相应的专业人士来讲是再清楚不过的，比如符号、意义、能指与所指、转喻与隐喻、拓扑学、莫比乌斯带、纽结、话语、阉割、症状、认同、移情、菲勒斯、神经症、歇斯底里、倒错等等；还有一些则是拉康自创的或自称自创的，如镜像阶段、父之名、主能指、对象 a 、剩余原乐、他者原乐等等。但另一方面，拉康对所有这些概念都有超出常规的自我理解，就是说，拉康对他使用过的“所有”概念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解释，并且这些解释时常还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所以，我们在阅读拉康文本的时候，对于他的概念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凭自己的理解去做主观臆想。我当然不可能对拉康的所有概念都一一给出解释^①，但对于他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在讨论中都会按照其理论的发展给以简单梳理。

拉康的理论还有许多科学的伪装，它们看似有着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都需要以“拉康之名”来重新命名，如拉康的光学、拉康的代数式、拉康的数学位、拉康的符号逻辑、拉康的拓扑学等等，这就如同拉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康的精神分析与传统理解的精神分析学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一样。这些伪装一直以来是阅读拉康的最大障碍。造成障碍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总是“想象地”把拉康的科学同我们自己的日常理解混为一谈，想在两者之间寻求想象的同一性；而问题的根本在于：拉康引入这些科学伪装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在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陷入想象的激情。拉康的“科学”名目繁多，我只讨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地，我都会先对那些公式或图形中的符号给出说明，然后解释它们的结构，最后再从逻辑的方面来理解其所表示的含义。但这些解释和理解不是唯一的，所以，它们准确与否还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

拉康的理论是一种多声部混唱：有时是在一个主题之下隐含着诸多交互重叠的副题；有时是多个主题并行发展，最终交会到另一个主题；有时则是同一个主题因语境的变化而与不同的另一主题发生反应，生出不同的含义；有时甚至只是借助一个纯粹的语义或语音游戏就从可能性的逻辑跳到了不可能性的逻辑，反正是花样百出。面对这种情形，我有时就只能采取鸵鸟策略，针对所论问题的语境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或是在新的语境中对前面已经阐述过的思想“再来一次”。但这都属于无奈之举：前一种做法会导致简约化的理解，后一种做法会让人感到重复、累赘。

最后，拉康的理论是一种无有终结的理论。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研讨班中，拉康不仅不断地返回到弗洛伊德，也不断地返回到自身，而每一次返回都是对此前的一次重写。于是，我们在他的研讨班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同样一个概念或问题，从50年代到70年代，经过不断的重写——它们既非简单的重复或改写，亦非完全的断裂或自我否定，而是不断的续写和叠加——便构成了一个缠绕不休的系列，有时，直到终了，这个系列还未抵达“结论的时刻”。比如对于“三界”框架、死亡驱力、对象 a 、移情、原乐等等，我们很难说拉康最终的结论在哪里，对此，我同样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虽然我也尽力去勾勒拉康的每一个概念和问题的“进程”与轮廓，但这中间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剪裁。所以，我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拉康理论的无有终结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症状：作为策略，它无非是想表明理论终归只是工具，是引导我们去阅读自己的症状的工具，是让我们学会穿越欲望的幻象的工具；

而作为症状，它是想表明，症状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无有终结的过程，幻象的穿越作为主体朝向死亡的道路意味着他在这个道路上必定要一次又一次与不可能性发生相遇。

总而言之，拉康是不可阅读的——所以我们的阅读必须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我在“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上所能给出的忠告。



目 录

如何阅读拉康? ——代序 / 1

上篇 拉康的事业

第一章 弗洛伊德在法国 / 5

- 第一节 创伤之矛 / 6
- 第二节 不愉快的开场 / 17
- 第三节 挥师巴黎 / 29
- 第四节 文人的实验 / 41

第二章 自我认同的罪与罚 / 54

- 第一节 妄想症书写 / 55
- 第二节 自罚性妄想 / 68
- 第三节 密涅瓦的猫头鹰 / 80

第三章 镜像的神话 / 93

- 第一节 一个失窃的文本 / 94
- 第二节 主体确证的时刻 / 107
- 第三节 终于到了镜像阶段 / 121

第四章 精神分析的政治 / 139

- 第一节 大决裂 / 140
- 第二节 狙击自我心理学 / 155
- 第三节 回到弗洛伊德 / 168



第四节 逐出教门 / 188

第五章 拉康的王国 / 206

第一节 光辉岁月 / 207

第二节 通关的政治 / 226

第三节 结构的街垒战 / 236

第六章 研讨班的岁月 / 253

第一节 声音的诱惑 / 254

第二节 研讨班的演进 / 268

第三节 科学的伪形 / 284



上 篇

拉康的事业



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弗洛伊德

为什么原始场景会如此充满创伤？

——拉康

“拉康的事业”，如果拉康本人看到这个题目，脸上一定会露出一丝狡黠的表情，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当我们说“拉康的事业是某某东西”或“拉康毕生致力于某某事业”的时候，看似居于主体位置的拉康实际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有待某个东西——使拉康成其为拉康的那个事业——来填充的空无，用拉康自己的话说，是有待某个大他者来给以确认的匮乏性的存在。所以，对于“拉康的事业”，我们需要在一种辩证的回转中来理解，那就是：虽然拉康是以革新精神分析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并以“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来标举自己对这一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可自他开始其事业的那个时刻起，至少在法国，是赞成还是反对拉康就已经成为了精神分析事业自身的要务，主体的位置在此真正地发生了翻转，拉康自己成为了界定精神分析事业的一道视线，成为了继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领域的又一个绝对主体，一个以其存在指认其他的一切但其自身不由其他东西所指认的绝对主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拉康为了他的事业而采取的所有行动，如在“返回”的口实下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强力阅读、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不妥协姿态、对自我心理学的激烈批判、与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多次决裂、与自己一手创建的拉康王国的政治纠缠直至最后自己宣布将它解散，当然还有他持续了近三十年的研讨班，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拉康式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逻辑在暗处的支配作用，那就是拉康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性运作中完成的其实是主体位置的位移，最终居于主体之位的只能是他这个绝对的主人/导师/父亲，精神分析学作为拉康所致力事业也不再是用来指认这个主体位置的一个能指，而是通过这个主体的言说所缝合出来的一种意义效果，因为自拉康以后，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谈论就再也离不开他的视线。

是的，拉康首先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就此言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革新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技术，颠覆传统精神分析建制（包

括组织建制和技术建制)的权威,创立属于自己的“学派”——像曾经的阿卡德米、吕克昂、斯多葛那样的学派。但拉康又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后者不过是把一些心理学化的精神分析术语附加到临床经验中去重新编排病人的生活史的剧作家,与他们相比,拉康的雄心真的称得上是鸿鹄之志,他要求的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分析化,他要求把主体以及与主体相关的一切都置于精神分析学的框架内来重新理解和阐释。为此,语言学、人类学、哲学、数学、物理学等等都可以拿来为这一目标服务,但前提是要对它们做精神分析化的重写,使它们符合精神分析学的逻辑,并构成一个相互之间可自由地穿行和叠加的理论生产机器。因是之故,当人们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称谓之外还称拉康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批评家、一个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者、一个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时候,一定不能疏失一点:他首先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是其理论最根本的维度,他在理论中挪用的其他的一切都必须经过精神分析化的运作才能得到理解。如果要谈论拉康的事业,这当然也是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在此使用“拉康的事业”这个题目,只是一个策略性的调用,其意图既是为了在历时的维度上指涉拉康毕生所致力目标,也是为了在共时的维度上回溯性地建构拉康自己的主体性认同。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一种语境化的运作来追述和考察拉康的事业传奇——是的,谁都无法否认,拉康的一生堪称是精神分析学的一部“传奇”。其实,熟悉精神分析运动史的人都知道,精神分析运动本身——它的诞生、它的理论、它的实践、它的历史,乃至它的组织建制和培训程序——就是一则传奇,这个传奇的第一主角当然是弗洛伊德,拉康则是弗洛伊德之后的又一位主角,一位令荣格这样的大师也不免黯然失色的主角。更确切地说,“传奇”就是结构拉康本人的欲望的对象 a ,是他的欲望之因,是激发他的欲望的机器。他的引起众多非议的“野性”分析、他的持续了近三十年的研讨班教学、他的时而低沉时而激昂的演讲技术、他的刻意而为的晦涩、他的非数学的数学化表达,以及他的炫技式的博学和超乎常规的旁征博引,等等,他所做的这一切一定意义上都是在追求一种传奇的效果。于此言之,拉康的事业其实是由一系列的传奇构成的。所以,我在对拉康的事业进行语境化运作的时候,将主要围

绕这一系列的传奇来加以展开，虽然这样做不免有猎奇的嫌疑。

我的追述将主要在三个界面展开：第一是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这是拉康步入精神分析“领域”（field）——他也许更喜欢“战场”这个说法——的基本场景；第二是法国后柏格森时代的哲学运动，这是拉康实施其精神分析革新的重要理论资源；第三是拉康王国的政治，这是拉康确立自身作为绝对主人/导师的位置的主阵地。我希望，这一追述不会因为太过浓重的传奇色彩而冲淡其真正的旨趣，那就是我想借此来表现一种精神分析文化的时代气质——作为题记的那两句话就是对这一气质的某种提示。



第一章

弗洛伊德在法国

与许多学术运动发生革命性转变时总以分裂作为催化剂的情形一样，精神分析运动的创新冲动也是以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撕裂作为其伴生物的。这一系列的撕裂让精神分析事业充满了许许多多戏剧化的场景，而进入这样的场景要求我们首先具有一种精神分析化的思维，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把这样的场景回置到某种分析情境中去加以理解，这样才能真切地领会到弗洛伊德所创立的伟大事业的内在创伤及其意义。

对精神分析学及精神分析运动本身做精神分析化的理解，这并非不可理喻之事。弗洛伊德本人就常常以这种运作来开始其创基性的过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回视和反省其理论与技术的漫漫求索路，比如他的书信尤其是他与密友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之间的通信^①、他的自我分析、他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系列争吵、他的自传和

^① 威廉·弗利斯是柏林的一位耳鼻喉科医生，1887年在维也纳与弗洛伊德相识，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弗利斯是一个满脑子奇思异想的“科学家”，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比如他曾著述讨论人体的鼻子与女性性器官的关系，还称女性月经的周期法则是同样适用于男性生理周期的一种自然法则。可弗洛伊德却深受弗利斯的这种妄想症知识结构的诱惑，他甚至称后者是自己“唯一的他者”。正如弗洛伊德的许多传记作家所说，弗利斯在精神分析学创始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在《释梦》出版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疏远。从1887年到1902年，弗洛伊德与弗利斯之间有十分频繁的书信往来，1928年弗利斯去世后，弗利斯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信函悉数卖给了柏林的一位书商，后来这些信函辗转流落到了波拿巴王妃的手中。弗洛伊德知道这个消息后，想出钱购回以便销毁——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些信函里面涉及太多个人的私密——但王妃坚辞不就。1950年，伦敦的一家出版社以“精神分析学的诞生”为题出版了这批信件，以今天的观点看，这些信函还真的算得上是精神分析学的“秘密诞生地”。

他为精神分析运动所写的回忆录、他与病患尤其女病患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引发的他对精神分析技术的阐发，都隐含有一个对分析行为施以精神分析化的维度。尤其当我们进入精神分析与法国性的遭遇战的时候，这种精神分析化的运作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去透视精神分析文化的创伤性内核。

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有法国人的一份功劳，可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学在法国的遭遇可谓一段充满创伤的记忆，法国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冷漠、中伤和排斥令弗洛伊德一直耿耿于怀，由此而演绎了一段曲折的传奇故事。有时，不愉快的开场就像是一种命运的预示，原初场景（创伤）的不断重复正是精神分析学论及主体成长时的一个基本主题，而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就是这个主题活生生的见证。

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姗姗来迟，并且自一开始就打上了法国性的胎记。出于某种文化偏执，法国医学界或精神病学界对作为一种治疗技术的精神分析学和作为一种哲学话语与道德话语的精神分析学自始就怀有矛盾的心理：他们既想在科学性的框架内吸纳和改造精神分析学的前一方面，但又因为害怕那后一方面——尤其它的泛性论色彩——会污染其纯洁的科学理想而对精神分析理论干脆采取拒斥的姿态。对精神分析学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其实是早期精神分析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唯独在法国，科学界的这种矛盾心理成为了精神分析学进军巴黎的最大障碍。

当然，科学界的矛盾心理并不是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全部。与科学界不同，出于某种文化想象，法国文学界与思想界则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把精神分析学置于其诗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核心。这样，两个渠道、两种倾向，如同没有交汇的两条河流，勾勒出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早期的地形图，那时——在拉康出现之前——并没有人想到要在这两者之间开掘一条通道，更没有人想到这样的举措会最终改写法国精神分析运动乃至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和命运。

第一节 创伤之矛

191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在

《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说道：“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①用这句话来描述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实在是再准确不过了，可以说，精神分析自它作为一种“运动”传播和发展的时候起，就与内部的争吵和分裂结下了不解之缘。导致这种争吵和分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三个方面的因素最为突出：理论与技术的、组织与建制的以及文化与传统的，并且这三个方面常常是相互纠缠在一起发挥作用，它们共同地构成了刺伤弗洛伊德及其帝国躯体的创伤之矛。

先说理论与技术的方面。

熟悉精神分析学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自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 1842—1925）合作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便开始着手自己的发现，这一发现在1896年获得了一个正式的名称：“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1900年《释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正式问世，接下来包括《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年）、《性学三论》（1905年）、《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年）等在内的一系列作品的相继问世使精神分析学创始时期的理论体系即有关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心理结构体系得以扩展和完善。在这个体系中，如果说由被压抑的力比多能量构成的无意识就像是某部神话剧的舞台或布景，那么，力比多或原欲式的性欲能量就是剧中唯一的角色，而压抑和转移便是这个独角戏的基本剧情，至于所谓梦的工作、日常语言障碍、儿童性欲和女性性欲、人类文明及艺术创作，乃至各种神经症的症状，都不过是这个剧情的轮番上演。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弗洛伊德开始对其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一个新的体系，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在20年代发展出来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无意识依然是神话剧的基本场景，但舞台上的角色已经变成了三个（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剧情则被还原为主体的某个原始创伤的不断重复，其中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成为结构其创伤叙事的两股助力，尤其是死亡驱力的设定，似乎隐然暗示出人本质上是一种向死的存在。精神分析学的神话剧不过是有关人类命运的一出悲情剧。

弗洛伊德为什么非要用性本能来装扮无意识？由被压抑的原始性本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49页，吉林，长春出版社，1998。

能所构成的无意识到底是一个神话场景还是一种真实的心理经验，或者说在无意识中所上演的神话剧究竟是一种文学虚构还是对主体经验的一种理论性回溯？弗洛伊德凭什么说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曾有过弑父娶母的冲动，这到底是他个人的一种妄念还是被我们所否认的一种真实？还有，弗洛伊德前后思想的转变究竟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修正与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究竟是一个骗局还是一种科学？精神分析理论的颠覆性力量究竟是出于创始之父的修辞学技巧还是果真源自现代性经验的创伤性断裂？等等，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是弗洛伊德遗产的继承者所必须面对的，对它们的回答自然也就构成了整个精神分析运动的一部分。不过，问题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弗洛伊德思想本身的多面性固然给追随者进行阐释和发挥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可同时也为引发理论上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其实，因理论分歧而引发冲突的情形在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弗洛伊德与“皇太子”荣格（C. G. Jung, 1875—1961）之间的决裂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理论上的：荣格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弗洛伊德怎么能把人的一切问题都归于性欲；弗洛伊德则坚持，对性欲的意义的任何否定要么是出于怯懦，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机会主义，反正都是对精神分析学的背离。还有如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对“小王子”奥托·兰克（Otto Rank, 1884—1939）的“诞生创伤”理论的恶意围剿，以及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885—1982）与女分析家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 1882—1960）之间围绕儿童精神分析的激烈争吵，都离不开对创始之父的理论的不同解读，更确切地说，离不开各自对那一理论原本就具有的裂隙进行的或激进或保守的运作。

至于技术的方面，引发分歧的因素就更多了。由于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治疗技术主要甚至唯一借助的就是语言或受分析者的自由联想，其效果则主要取决于分析师对所获素材的阐释，取决于受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于是，围绕着分析情景的设置、医患关系的确立、分析过程中的移情与反移情、业余分析与专业分析的分划、分析师的培训与资格认证、分析师在分析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分析师对分析过程的阐释与干预、分析的结束及治疗效果的评估等等技术问题，共同体内部的意见

可谓五花八门。弗洛伊德在世时，尚能借着创始之父的威名和建制的力量来平息和压制技术细节上的纷争，弗洛伊德逝世后，因技术（以及理论）问题引发的争吵和分裂就不绝如缕，以至于我们时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争吵和分裂似乎就是精神分析学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命运。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似乎也是推动精神分析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因。

实际上，精神分析技术自一开始就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例如弗洛伊德本人的技术就经历了至少五个时期：宣泄性催眠法、唤醒式暗示法、自由联想法、移情式神经症和情绪再教育，并且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变中，往往伴随有理论的阐发，就是说，其技术的发展是与理论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分析家们因各自理论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分析技术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但同时，因技术分歧而引发的争吵乃至分裂也接连不断，分析师的躺椅成了一个是非之地，病人则常常被当成分析家的筹码和牺牲品。

在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技术分歧和理论创新尚能并肩而行，各个学派的创立总归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可到弗洛伊德逝世以后，这种理论创新的冲动已经十分黯淡了，学派间的争吵变得越来越像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再有，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运动的范围扩展到分析家共同体以外，此处所讲的理论与技术上的纷争会更加令人眼花缭乱。在这当中，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多方面构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都知道，自创立之始，精神分析学就主要在三个方面同时展开：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描述人类心理结构或精神装置的构成形态及动力机制的学说，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分析与自我分析的技术和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实践，以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模式或者说作为一种特别的、关乎主体与文本的症状阅读技术与阐释技术。这三个方面虽说相互联系，可各自的侧重点和目标取向都有所不同，即使是在同一个方面，也会因理解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倾向，这使得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和阐释者常常会得出不同版本的精神分析学。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以及分析家，各自依照自身需要而把精神分析学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比如对于分析家的精神分析学、哲学家的精神分析学和批评家的精神分析学，要想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找到交叉之处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而许多时候，来自不同

领域的专家相互之间又维系着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这不可避免地将给精神分析运动制造诸多难题，为分裂埋下种子。

再就是组织与建制的方面。

还是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中，弗洛伊德曾称自己在创立精神分析学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困苦岁月，并自诩他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他所受到的孤立是一种“壮丽的孤立”^①。弗洛伊德在此说的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之初在维也纳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对自身处境及生存状态的这种指认与其说反映了一种客观现实，不如说泄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焦虑：他总在寻求得到别人的承认，可这个愿望似乎总是难以满足，至少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是这样，于是最终，这个未被满足的愿望以一种回转的方式投注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幻化为一个孤独的英雄的角色——在弗洛伊德的“自传契约”中，这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叙事策略。^②

那么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呢？的确，《释梦》（1900年）发表后，维也纳的主流学术界并未给以积极的回应，但其命运也没有完全沦落到弗洛伊德自己描述的那种悲情境地，因为他的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追随者，他们在1902年成立了一个沙龙式的“组织”：“星期三心理学社”（Wednesday Psychological Society）。每周三，学社成员聚集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家里讨论精神分析的技术和理论问题，有时还一起研读文学家的作品，例如里尔克（R. M. Rilke, 1875—1926）就是他们喜欢讨论的一位同时代作家。“星期三心理学社”成立的时候包括弗洛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62页。

② “自传契约”是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的术语，它指的是自传作者为在文本、自我与读者之间维系某种关系而运用的特别的叙事技巧与叙事规约。从某个角度说，“自传契约”根本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实践，暴露的律令与掩盖或掩饰的需要被结构性地缝合在“隐匿书写”的契约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自传的素材——它们不仅存在于他的《自传》中，也存在于他有关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追述中——与他所谓的自我分析之间存在一种逆向关系。与他在《释梦》这样的“科学”著作中的自我分析不同——在那里，他把自己或者说他要求读者把他完全看作一个科学研究对象，以便于他去“客观地”分析自己，“中立地”揭示自己的欲望——在自传中，他的自我分析被无限期延宕，他的欲望总是被无意识地掩盖在一系列具有非凡修辞效果的叙事技巧中，这意味着，在他的自我分析中，那貌似揭示欲望的过程有可能正是对欲望的一种遮蔽，而在他的自传材料中，那对欲望的极力掩饰和变形的描述有可能正是受到压抑的欲望的一种自动运作，故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逆写”的策略把这些素材读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分析。

伊德在内只有 5 个人，这个圈子的确不算大，但却令弗洛伊德备感温暖，至少能让他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到 1906 年，学社已发展到有近 20 人的规模，并且学社成员不再局限于维也纳的圈子，还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追随者，因为正是这个时候，精神分析学开始在维也纳以外的地区迅速传播，布达佩斯的桑道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 1873—1933）、伦敦的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1879—1958）、纽约的亚伯拉罕·布利尔（Abraham Brill, 1874—1948），尤其是瑞士苏黎世布尔戈霍兹利（Burghölzli）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路德维格·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卡尔·荣格和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等，都相继成为弗洛伊德的信徒。1907 年前后，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就像朝圣一样从外地来到维也纳向弗洛伊德表明自己的仰慕之情，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为弗洛伊德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有些人则成为精神分析运动最慷慨的资助者，当然也有人后来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而成为最凶险的敌人——至少弗洛伊德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随着追随者的增加和影响向国际化发展，精神分析学从一个人的理论演变为一种国际运动的趋势日益明显，组织化和建制化也就势在必行。1908 年 4 月 26 日，在荣格等人的努力和组织下，来自维也纳、苏黎世、柏林、布达佩斯、伦敦等地的四十余人聚集在萨尔茨堡召开精神分析研讨会，这是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的首次国际性大会，会上决定创办一份精神分析期刊：《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由荣格担任主编。萨尔茨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开始向国际运动的方向发展，可分裂的苗头也由此而显露，对荣格的任命已充分表明，此时，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维也纳“星期三心理学社”的位置远不及他的苏黎世盟友重要。

萨尔茨堡会议后，维也纳的追随者们觉得应当有一个更为正式的组织来把各地的精神分析学家联合起来，以更好地协调他们的工作。弗洛伊德对此表示认可，于是委托桑道尔·费伦齐起草一个关于未来组织设计的方案。1910 年 3 月 30—31 日，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纽伦堡召开，费伦齐的方案在会上遭到维也纳追随者们的反对——因为这个方

案确定由荣格担任将要成立的国际协会的永久主席——弗洛伊德亲自出面调解，最后出炉了一个折中方案，仍由荣格出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主席，但任期缩短为两年。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①按照费伦齐的设想，协会应对民主平等原则有所限制，因为他想把组织办成一个柏拉图式的学园，由“哲学王”进行统治。可在当时，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尤其是维也纳的追随者——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把协会办成一个自由主义的乐园，就像弗洛伊德在会议结束不久给费伦齐的一封信中说的，“这些维也纳人在纽伦堡之后的反应，是非常情绪化地希望建立一个由大公来领导的共和国”^②。虽然协会最后决定不给会员和各地的分会设置太多的规则限制，但领导权之争，尤其苏黎世的卡尔·荣格与维也纳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之间的斗争，已经给这个刚刚诞生的组织撕开了一个裂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将是引发精神分析运动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1908年的首届精神分析大会还只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但精神分析学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已开始酿成，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中回忆说：“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表现出来。”^③到1910年纽伦堡会议之后，随着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各地分会的成立，精神分析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运动，如弗洛伊德自己在会后不久给费伦齐的另一封信中所说的，这次会议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儿童期”已经结束，从此将进入一段“丰富且平顺的青年期”^④。可随之而来的情形却是运动内

① 当时只在柏林、维也纳、苏黎世成立了分会，分别由亚伯拉罕·阿德勒和荣格负责。英国的分会成立于1913年，由欧内斯特·琼斯负责；至于美国，1911年布利尔创立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1914年杰克逊·普特南（Jackson Putnam, 1846—1918）又创立了“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同年还成立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

②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上），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245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

③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69页。

④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上），243~244页。

部矛盾的不断爆发和分裂的不断发生。先是因为协会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11年阿德勒的出走和1912年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 1868—1940）的离开——这两个人都是“星期三心理学社”的核心成员——接着又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导致了1913年荣格的决裂，1914年，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职务，并宣布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对于这一系列的决裂，弗洛伊德1925年在《自传》中说：

在1911年到1913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发生了两起分裂运动。这两起运动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荣格领导下进行的。这两起运动声势都很浩大，而且很快就有很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都不是来自他们的内涵，而是借重他们所提出的一项诱惑，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的实际内涵，而把一些令人觉得可厌的成分驱逐出去。^①

就在荣格闹分裂的期间，欧内斯特·琼斯、桑道尔·费伦齐、卡尔·亚伯拉罕、奥托·兰克等人成立了一个护卫弗洛伊德的秘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的成员要互相分享讯息与想法，即使是最私密的情况下，也要互相讨论任何‘会从最根本的精神分析理论原则分离出去’的欲望”^②。弗洛伊德甚至要求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太多，必须是他完全可以放心的人，且委员会的存在和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就这样，在帝国内部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变得更像一个宗教组织，教主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协会对其成员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国际协会与地方分会的关系越来越等级化，由此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也越来越复杂。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55～5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请注意弗洛伊德此处的修辞，他把两起分裂都归于理论观点的分歧，而刻意压抑建制政治的作用，其用意无非是想纯化引起分裂的原因。可从精神分析化的角度说，对创伤点的这一拒认恰恰暴露了创伤的内核：阿德勒和荣格的出走如果只是因为观点的分歧，那正好表明弗洛伊德对来自他者的认可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以至于他在那渴望中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无以自制的焦虑感和强迫性的危机感。再者，从建制政治的层面说，如果一个权威主义的建制不能包容不同的声音，那这个建制就不只是权威主义的，可能还是专制主义的。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当他把自己作为精神分析学的主人的身份委任给一个建制来确保时，他也就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建制的傀儡。其实他对此并非毫无知觉，只是领袖身份的幻觉已经瘫痪了他的科学精神，短路了他的怀疑意识，让他陷入了主体性的麻痹。

^②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上），255页。

有意思的是，对于组织与建制的心理学问题，弗洛伊德恰好有所论及。在1921年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中，他以教会和军队这两个群体组织为例对组织与建制中个体心理的变化进行了精神分析化的说明。按照他的分析，一个组织的秩序总要涉及领袖/长官与信徒/下属之间的纵向关系和信徒/下属相互间的横向关系，在那里，群体的个人先是把完全不同的对象置于其自我理想的位置（纵向认同），然后再在他们的自我中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横向认同），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秩序的有效运转。反过来，如果这类认同发生了断裂，如果维系组织联系的情感纽带消失了，组织就会解体，而组织中的个体将会陷入特别的“恐慌”：

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立意义深远的类似性。个人的恐惧不是被危险之巨大所引起，就是被情感联系（力比多贯注）的中断所引起；后者就是恐怖神经症或焦虑神经症。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慌的产生不是由于普遍危险的增长，就是由于维系群体的情感联系的消失；后者类似于焦虑神经症的情况。^①

尤其是，弗洛伊德还谈到，在军队的认同情形中，如果一个士兵在把长官作为他的典范加以认同的时候，真的把自己等同于长官或者说把自己也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那他就会变得滑稽可笑；而在教会的情形中，基督徒把基督作为他的典范加以认同，并凭借认同作用的联系感到自己与其他基督徒是结合一体的，同时，教会也要求他们把自己置于典范的位置，像基督爱他们一样去爱其他基督徒，这样他们才真的达到了宗教所要求的更高的道德水平。在此，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作为科学家的时候的那一份清醒和冷静。可是回到他自己的组织和组织关系，精神分析协会到底属于哪一种组织呢？表面上看，他所描述的教会类型大约属于协会的理想状态，军队类型可能是协会的实际状态，而实际上，这两者在某一个点是重叠的，就是在教会的典范认同中，基督徒仍然不能真的把自己视作伟大的救世主，他去爱他的同类，不是因为他是救世主，而是因为他所认同的典范要求他、命令他这样做。所以，在弗洛伊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79～80页。

德的心目中，当那些分裂分子想要像他们的创始之父一样居于绝对主体的位置的时候，会显得多么的滑稽可笑。

最后要说一下文化与传统的方面。

美国学者爱迪丝·库兹韦尔（Edith Kurzweil）在《弗洛伊德学派：一个比较的视角》（1989年）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评论：

起初，弗洛伊德的信徒没有认识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那广泛的国际范围将是不可控制的冲突的诱因，而其不严格的委任——为了传播精神分析学——将与极其多样的地方规约和传统发生冲撞。……弗洛伊德的信徒也没有注意到组织的常规问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认识到所有组织的贪婪本性——那就是，它们总是想扩张，总想掌控一切。相反，他们信奉着那个时代的宇宙观——相信进步，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在精神分析学的帮助下，“人性”最终且必然会超越“民族性”。^①

库兹韦尔的评论可能略显粗糙，但他点明了一个事实，精神分析建制的扩张与地方的文化传统之间并不总能达成一致。可以说，自精神分析学诞生之日起，自它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开始，因文化冲突引发的矛盾就一直回荡于它的历史之中。作为一个带有犹太血统的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泛性论色彩的学说，作为一个等级化和建制化倾向越来越强烈的组织，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必定会因为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卷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许多时候，组织内部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也会以文化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会最终体现为理论上的分歧，由此言之，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版本的精神分析学。

研究一下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史，我们就能看到，在早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论是在德语世界还是在英语世界，它的传播主要局限于医学界和临床心理学界，对于其理论中浓重的泛性论色彩，追随者们则谨慎地保持着一种道德主义的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弗洛伊德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和公众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兴趣日渐增大，精神分析在英美世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不仅医学界和临床心理学界

^① Edith Kurzweil, *The Freudia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41,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精神分析学的事业，文学艺术界的先锋文人也大量介入精神分析运动，精神分析学的传播进入其黄金时期。^①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英美世界没有出现道德主义的抵制。在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史中，因为其理论上的泛性论色彩以及血统上的犹太背景而引起的文化抵制在所有地区都是存在的，但在英美地区，这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人们对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技术的接受。

然而，在法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在这个国度，文化的敏感似乎远大于其他地区，不仅公众，就连医学界都对精神分析学怀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见，直至今日，法语世界的学者在追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早期的历史时，都特别热衷于从文化的方面来谈论那时的法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抵制。的确，精神分析学在法国的传播自一开始就与一种顽固的抵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且经常将根源追溯到法国人的文化偏见和文化沙文主义。

为什么文化因素在法国的精神分析传播史中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呢？这个问题我在下面会具体地论及，这里暂且引用美国学者谢利·图克勒比较美国和法国对待精神分析学的不同态度时的一段论述。他在其研究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代表作《精神分析的政治：雅克·拉康与弗洛伊德的法国革命》（1992年）一书中说：

在美国，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特殊混合使得人们容易基于一个信念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即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只要他愿意——来改变自己。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于把个体说成是他或她自己的自我的管家或掌控者。虽然它也强调个体的自主，可它不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构成我们的“人性”的不可侵犯的内核。因而它与法国有关个人主义的传统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后者关注的是个体的界限，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法国人有关自我不可改变的观点与精神分析的干预主义的能动观点几乎是格格不入的。^②

^① 有关精神分析在英美世界的传播，可参见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第2、3章，王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②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7.

不过，我们不可以把法国人的抵制单一地归于文化上的差异，至少这并不是影响法国态度的唯一因素。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在说明法国人的傲慢时过分地夸大了其文化沙文主义的作用，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过分地依赖于弗洛伊德的“洞识”，以至于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合力。这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不同地区精神分析的传播史时，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是应当在具体的语境中来综合地把握问题发生的复杂脉络。

理论与技术因素、组织与建制因素和文化与传统因素，三者就像是精神分析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总是相互纠缠在一起，成为引发运动内部分裂的种子，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为给精神分析帝国致命一击的创伤之矛。不过，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这些都没能导致根本的决裂——只要这个象征性的旗帜还没有倒下，精神分析运动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它的扩张，去建立其作为一个帝国的基业。

第二节 不愉快的开场

当弗洛伊德兴奋地看到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以及在美国受到热烈追捧的时候，同时也沮丧地发现法国人始终无动于衷，后者甚至基于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倾向而对精神分析学表现出顽强的抵触情绪。不过，最令弗洛伊德愤懑不已的是，有一位法国人居然想要挑战他对精神分析学的发明权，由此而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这个不愉快的开场就像一个原始胎记，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精神分析学在法国的命运。下面，我将追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这一早期历史。通过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将被带回到历史源头的隐秘处，那个被语词的迷雾所布满的时间丛林。

巧合的是，精神分析学的诞生与法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前精神分析学时期。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始于他对歇斯底里的研究。按照有着法国血统的瑞士著名史家亨利·弗雷德里克·艾伦伯格（Henri Frédéric Ellenberger, 1905—1993）在其研究精神病学史的名著《无意识的发现》（1970年）中的描述，在19世纪末，欧洲的精神病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建制化和科

学化的时期，并形成了众多的学派，其中法国的沙尔彼得里哀尔（Salpêtrière）学派和南锡（Nancy）学派在当时居于中心地位，尤其两派对用来治疗歇斯底里的催眠法和暗示法的运用构成了与德国的实验心理学研究迥然不同的传统。早在1885年，为了研究神经性疾病，弗洛伊德博士——那时，他刚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师——曾专门到巴黎随当时欧洲最优秀的神经病学专家、沙尔彼得里哀尔学派的代表人让-马丁·沙考特（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学习数月，在那里，他第一次领略了催眠法的神奇效用；1889年，他再次前往法国，到南锡向这一派的代表人伊波利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 1840—1919）学习治疗精神病的暗示法。弗洛伊德的两次法国之行虽然时间都很短，但收获却很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后来创立自由联想的“谈话疗法”和精神分析学都从这两位法国人的方法中得到了启示。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称自己是这两位法国人的学生，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按常理来说，如此深的渊源关系本可以给法国人接受精神分析学提供一条便利的通道，可事实恰恰相反，法国人对精神分析学这门犹太人的学问似乎缺乏信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对其保持冷漠的态度——弗洛伊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与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人的那种过度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之前的两次法国之行就如同一个心理剧的原始场景，自一开始就给他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是的，弗洛伊德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他曾经问学的两位法国老师表达过敬意，可正是在这个执以学生之礼的场景中，常常有一个人出没于弗洛伊德的记忆，其挥之不去的存在令他深感不安和不快。这个人就是比弗洛伊德年长三岁的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 1859—1947）^①，精神分析与法兰西文化的第一次遭遇就是在弗洛伊德与这个法国人的争吵中开场的。

^① 艾伦伯格在《无意识的发现》一书中以专章对让内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做了详尽的论述，这仍是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对让内的最系统、最权威的研究。参见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p. 331-409,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皮埃尔·让内，1859年出生于巴黎，1882年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所中学教书，在从事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也开始随沙考特及其门徒一起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1889年让内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心理的自动作用》通过对歇斯底里和催眠疗法的临床分析，研究了“心理的自动作用”（Psychological Automatism）这一特殊的、与意识状态有关的心理现象。1893年让内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他创立国际心理学协会，并开始奠定其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声誉。让内一生著述甚丰，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猎哲学、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实验心理学、犯罪学、生理学等等。其在心理学和动力精神病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先于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他常常称之为“下意识的固持观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有时则径直称之为“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并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他与弗洛伊德的纷争一定意义上就是由此而起。

为了便于理解弗洛伊德与让内的纷争的实质，在此有必要对让内有关“心理的自动作用”和“心理分析”的观点做一简单介绍。

所谓心理的自动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指主体在某些特殊情境中以自动或自发形式体现出来的特殊心理活动或行为。让内把心理自动作用的体现分为两大类：整体自动和局部自动，前者指的是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表现，后者指的是部分人格从觉醒状态的人格中分裂出来，并遵循一种自主的、下意识的发展过程。例如，强直性昏厥（catalepsy）就是整体自动的最基本形式，在强直性昏厥中，个体处在意识状态，但没有自我意识；还有人为的催眠梦游症（somnambulism）也是一种整体自动。至于局部自动，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精力不集中，即主体的注意力总是在别的地方，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也会下意识地给以回答，让内解释说，当对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主体施以暗示的时候，其意识表现与下意识表现会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比如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①

^① “自动书写”，即中国俗称“请笔仙”的游戏，自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盛行，其程序大约是：让一个人手握一支笔，通过暗示或略微的催眠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别处，当他进入到意识与下意识混合的状态时，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写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实际是他下意识的材料的片段。

的现象就是这种局部自动的体现。

让内主要关注的是局部自动，尤其通过案例研究了许多被下意识观念所控制的行为、观念和幻觉，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个常常无缘由地出现阵发性恐惧的19岁女孩，让内通过自动书写找到了其恐惧发作的原因和意义，那就是在这个女孩7岁的时候，两个男人跟她开玩笑，从屏风后突然跑出来，让她受到了惊吓，所以其阵发性恐惧的出现实际是在下意识中重现那一初始场景。让内通过催眠和自动书写的方法让病人的症状得到释放，最终彻底解除了她的下意识固念。让内说，这些下意识固念就像是主体的第二人格，总在暗中支配着主体的行为，而主体对它又一无所知。比如那个女病人，她在发病的时候总是说：“我害怕，但不知道是为什么。”让内解释说：“那是因为无意识有它的梦；它看到了躲在屏风后的男人，并让身体表现出恐惧的样子。”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透过整个的心理不适和部分的生理不适去看心理和身体的失调，这样就能发现，后者其实是某种思维被禁止进入个人意识的结果。”^①

从让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理自动作用的概念虽然在刻意与传统哲学和心理学中将知、情、意区分开来的理论框架保持距离，强调了感觉、情感或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它明显地还带有法国传统的身心平行论的色彩。例如他在解释歇斯底里的症状时说，有些症状是与人格的分裂部分即有着自主发展过程的下意识固持观念相关的，而这些观念的根源就在于过去的创伤性事件，所以要解除或治愈这些症状，关键就在于发现其下意识的心理系统，然后以催眠或暗示的方法使那些固持的观念得到释放或解决。很显然，在这里，没有平行论作为支撑的话，要找到那主导第二人格的行为的下意识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谓“心理分析”，实际上是让内对自己用来解除病人症状的方法的一种描述。让内相信，有些主体的心灵在早期经历中若是遇到外部创伤就会发生分裂，其中有一部分从意识中分离出来形成下意识的观念固

^①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p. 360-361.

持在某处，这就使得主体心灵的聚合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就是神经系统无法把意识的诸方面完全地综合起来，他把这称为“精神衰弱”（psychasthenia），体现在主体的行为上就是各种神经症和歇斯底里的症状。要消除这些症状，首先就需要找到或让病人回忆起引起症状的原始事件，通过让病人在事件和病因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使他的创伤记忆得到宣泄，然后再帮助他重建心灵的综合能力。这就是让内所讲的心理分析。

显然，让内的心理分析是建立在下意识的固持观念的基础上的。按照他的解释，下意识的固持观念的形成与主体早期的创伤性经历有关，所以，了解病人的生活史对于探究固持观念的成因是必不可少的；下意识的固持观念是主体心灵的综合能力的一种“衰弱”或分裂，它通常会以症状或替代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甚至会出现于梦中，据此，让内说，症状或梦时常具有象征的特征，从它们那里将可以找到固持观念的某些线索；同时，下意识的固持观念既是精神衰弱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因此，治疗必须以固持观念为目标，不过让内也强调，“把下意识观念带到意识中并不足以治愈病人。那仅仅是把这种观念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固持观念。要瓦解固持观念，就必须借助解离或转变”^①。让内甚至说，除了催眠、自动书写这类常规方法外，有时也可以用“自动谈话”（automatic talking）来帮助完成这一解离或转变的工作，让固持观念归于解体。

至此，我们大约已经清楚了让内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经完成的对下意识过程的理论建构。这一建构无疑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但纷争却也因此而起。

引起纷争的苗头早在 1893 年就显示出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实际上，弗洛伊德是主要执笔者——发表了一篇有关歇斯底里的论文《初步交流》（该论文两年后作为第一章收入《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在文中，作者一上来就亮出了自己的“发现”：歇斯底里或癔症的现象与心理创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当我们能

^①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 373.

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①。无须太多解释，我们至少从字面上已经看到了让内的回声。而就在这段文字的下面，作者加了一个注释，其中提到了让内对心理自动作用的研究，“在让内的有关心理自动症的有趣研究中，说到了使用类似我们的方法治疗了一个癔症女孩”^②。看看作者在这里的用词吧：“有趣”的研究，“类似我们的方法”——在这些修辞的背后，在这种略显轻佻的语气中，还有在语法上对自我的先期置入，我们在此不是也能看到弗洛伊德挂在嘴角的一丝暧昧的笑意吗？！

不过让内没有看到这种修辞的狡计，他只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别人的文字的一角出现了。也许是作为一种善意的回赠，在同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的某些最新定义》一文中，让内长篇评述了《初步交流》的研究成果，并对这篇文章给以了高度赞扬。1894年，让内还把这个评述收入了他的《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一书的最后一章。可这一评述似乎引起了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不满，这一点从两年后他们的回应中看得出来。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其中第二章的五个病例为弗洛伊德所写，在评论第二个病例时，弗洛伊德提到了让内对歇斯底里病症的解释，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按照让内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圣痕的折磨，被定为单一观念，并在正常生活中失去意志行动。我认为让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由于癔症而发生的意识改变的后效提高到癔症的原发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③。同时，在布洛伊尔所写的第三章中，也对让内的“精神衰弱”的观点进行了批评。^④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批评都直接针对着让内在1893年写的那个评述。

1900年，让内创立了国际心理学协会，弗洛伊德则在同一年出版了他的《释梦》，两个人的学术声誉和影响随即扩大。1908年4月，第

①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25页。

③ 同上书，101页。

④ 但布洛伊尔显然比弗洛伊德更为客观，他说：“让内具有许多有关癔症的理论，我们赞同他的大多数理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接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202页）。

一届精神分析大会在萨尔茨堡召开，这是精神分析学成为一个国际性运动的开端，次年，弗洛伊德应邀赴美讲学，受到美国人的热情款待，而此时的让内也已成为一名国际性的知名学者，他于1906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系列演讲同样受到热烈欢迎。虽然这两个人在研究的领域和学术观点上有诸多重合之处，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不过隔空的对话时有发生，尤其弗洛伊德，每当论及精神分析学创始期的历史时，似乎总是不能忘怀让内的存在。

1907年6月，荣格——他刚刚于这年3月在维也纳与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两人立即建立了父子般的情谊，弗洛伊德称他为“皇太子”——打算到巴黎与让内会晤，临行前，弗洛伊德写信告诉荣格，在法国，最大的障碍就是民族性的问题，任何想要输入法国的东西首先都会遇到这个困难，接着他还不忘告诫荣格说，让内为人心思缜密，难以对付，不过目前已经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荣格与让内的会晤并不成功，因为当荣格向让内谈及自己刚刚出版的《早发性痴呆症的心理学》一书时，让内对其中所探讨的问题似乎所知甚少，这令荣格颇为沮丧和恼火。回到苏黎世后，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让内自负而且肤浅，拒绝接受任何新的理论，他“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但远非出类拔萃，只是一个空谈家，一个典型的平平常常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已”^①。很快，弗洛伊德就写了回信，得知荣格的评论后，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甚至有点亢奋地说，“荣格已经认识到沙考特的伟大时代结束了，精神病学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在苏黎世和维也纳，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已经渡过了第一个难关而安然无恙”^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关居然会让对自己的理论那么自负的弗洛伊德有如许的压力，令他在压力释放后居然有劫后重生般的感受呢？

还是在1907年，第一届国际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大会将于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弗洛伊德也接到了大会的邀请，他在给荣格的信中说，那些“高贵的乌合之众”是希望他扮演格斗者的角色，在会上与让内发生冲突，而他根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发现提交给那些冷漠的听众来

^{①②} 温森特·布罗姆：《荣格：人与神话》，文楚安译，1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表决，就是说，他不打算赴会。可就在会议即将举行时，弗洛伊德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安的预感，他觉得应该有人代替他，去捍卫他的事业。于是他又给荣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弗洛伊德就像一个受分析者向他的分析师做内心倾诉一般，历数着自己多年来所经历和感受到的自豪与痛苦，可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会得到“呼应”。而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他告诉荣格说，“我听到了你的呼应！”他的意思是说，你帮我去做一次冲锋吧！荣格于是作为弗洛伊德的代言人出席了会议。果不其然，在会上，让内咄咄逼人，以一副学术讨论的面孔对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大加嘲讽。那么荣格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居然说弗洛伊德的研究的理论前提“首要的就在于让内在实验中的发现”。虽然他接着也表示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忠诚，但显然他的“呼应”是不力的，并且据一起与会的琼斯的回忆，荣格由于没有掌握好发言时间，招致会议主席多次警告。

弗洛伊德的不安有时也表现在他对自己与让内的理论差异的分析上。例如在1909年访美的系列演讲中^①，弗洛伊德先是承认他和布洛伊尔的歇斯底里研究受到了让内的启发：“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②可他更为强调的是双方在这一研究上的分歧：让内把歇斯底里看作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而他和布洛伊尔则把歇斯底里看作是对立的心理力量冲突的结果。弗洛伊德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让内的理论：让内的病人让人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包一大堆，可她根本拿不了这么多东西，于是先是一样东西掉到了地上，当她弯下腰去捡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③接下来，弗洛伊德总

^① 1909年，弗洛伊德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的邀请，参加该校20周年校庆，给美国听众作了五次演讲，该演讲于1910年在英语世界以《精神分析五讲》为题出版。另外，让内也曾于1906年访问过美国，并且也作了系列演讲，这些演讲于1907年在英语世界以《歇斯底里的主要症状》为题出版。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13页。

^③ 同上书，14页。

结说：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①

我们不能把弗洛伊德的这种对比视作是一种挑衅，可它的确显示了他内心深处有某种心理阴影存在，他对分歧的刻意强调更像是潜意识里一种压抑机制在起作用，体现了他对某个理论缝合点的无意识抵抗。造成这一心理阴影的根源是什么？弗洛伊德自己未必清楚，其实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一阴影的存在，但让内的一次反击行为使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露出了冰山一角。

1913年8月，第十七届国际医学大会在伦敦召开。在精神病小组的一次讨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讨会上，让内作了一个批评性的发言。弗洛伊德本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作出回击的是当时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已告破裂的荣格。让内的批评主要围绕着两点：第一，他宣称是他率先阐述了神经病的创伤性根源，而精神分析学不过是对那一基本概念的发展，甚至“精神分析”这个词也不过是他的“心理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第二，他严厉地批评弗洛伊德对于梦的阐释方法及其有关神经病源自于性欲的理论，认为它们不过是弗洛伊德的主观臆想，并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个泛性论的、形而上学的体系。^② 对于让内在批评中所表现出的这一激烈态度，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以及他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认为是出于一种嫉妒，因为让内觉得弗洛伊德的声誉已经超过了自己；而对让内深怀敬意的历史学家艾伦伯格则评论说：“在那一环境中，让内似乎偏离了他在科学讨论中惯有的温和态度。习惯上，他总是极其谨慎地列举他的材料，对他的前辈给以应有的评价，哪怕是在微小的细节上。然而，他也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同等的礼遇，因此，当看到弗洛伊德发展了他觉得原本属于他自己的思想而同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的时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17页。

^② 参见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 344, pp. 817-818.

候，他无疑被伤害和激怒了。让内后悔自己表现出的这种愤怒，但他在余生中始终坚信弗洛伊德对他是不公正的。”^① 相较而言，艾伦伯格的说法要更为客观、公正一些。让内有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过激言论也许有失之草率之处，但他真正不满的其实是弗洛伊德对自身理论原创性的那种大言不惭。另外，有一件事也许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让内的为人可以提供一点参照：1914年6月，在法国精神病治疗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猛烈地攻击弗洛伊德的时候，正是让内站出来给予了回击，要知道，此时的法国和德国即将作为敌对国进入战争状态。

1913年让内发难的时候弗洛伊德并不在现场，可与会的荣格和琼斯肯定回去向他汇报了相关的情形，所以，当1914年弗洛伊德写作《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占优势，让内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一切却是不好的。……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工作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②

在弗洛伊德看来，让内向他发难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同他争夺精神分析学的发明权，所以，当他对让内的理论“价值”进行定位的时候，总是会让后者沿着一条弧线悄无声息地滑出精神分析学的范围——这正是弗洛伊德避重就轻的策略，在发明权的问题上，他是决不会让步的。1925年，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了：

读者诸君或能从我的叙述之中看出，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精神分析和詹尼特〔即皮埃尔·让内。——引者注〕的学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就是精神分析的内涵也和他的学说大异其趣，远非詹尼特的学说所可望其项背的，詹尼特的学说绝没有使精神分

^①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 344.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72页。

析成为心理科学中重要一环的内涵，也没有能耐使精神分析吸引全世界的兴趣。^①

如此决绝的态度不正是无意识中受到压抑的东西的一种症状体现吗?! 弗洛伊德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分析家，面对“精神分析学”这个被劫持的欲望对象，他难以自持了，那流露于笔端的不屑和愤怒，指向的与其说是那刺伤了他的矛，不如说是自己内心中那脆弱的盾。因为发明权之争，让内已经成为了弗洛伊德内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他必须让自己挣脱这个法国人的纠缠：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接到许多出自法国的论文，表现出对精神分析的强烈反对，并且对于我和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有最不正确的武断说法，比方说，他们指出我利用巴黎之行去熟识皮尔·詹尼特〔即让内。——引者注〕的学理，然后据为己有。因此我得在此明确地指出，在我整个留法期间，皮尔·詹尼特还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有名。^②

注意，弗洛伊德在此玩了一个时间逻辑，就是在他的巴黎之行和让内的发明之间打了一个时间差，因为前者是在1885年，而后者是在1889年。可是，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法国之行恰好就是在1889年，这是他没有提及的。这一遗忘是他刻意为之的吗，或者根本上就是一种压抑机器的无意识重复？我无意在此对弗洛伊德的书写策略进行精神分析，但稍微回顾一下那个原始的历史场景是有必要的。

1885年弗洛伊德到巴黎学习时，让内还在距离巴黎两百多公里的勒阿弗尔教书，并且步入医学界时间不长，的确如弗洛伊德所说，谈不上有什么名气。弗洛伊德第二次法国之行是1889年7月，当时他刚刚翻译了南锡学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海姆的一本书，所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南锡去拜访这位作者。在南锡逗留几周后，他又转道巴黎参加一个国际心理学大会，让内正好是这个大会组委会的成员之一。并且，让内此时在巴黎正因为刚刚出版的《心理的自动作用》而引起学界关注，正是在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29~30页。

② 同上书，8~9页。

这本有关歇斯底里及其治疗方法的书中，让内提出了他的“无意识”概念，而这一概念也是他此后几年间确立其“心理分析”的基础。虽然没有记录显示弗洛伊德在第二次巴黎之行中与让内有过直接接触，但共同的治疗实践和研究方向应当会使弗洛伊德对让内发生兴趣，他不是1893年提到了让内的著作吗？

实际上，在弗洛伊德与让内围绕着发明权的争吵中，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谁先发明或提出了“精神分析”这个概念，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仅就事实而言，无疑是让内的“无意识的固持观念”和“心理分析”在先，弗洛伊德直到1896年才在用法文写的《神经症病因学》一文中正式使用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而在此之前，他曾在1894年的一篇论文中使用过“精神的分析”（psychical analysis）、“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和“催眠分析”（hypnotic analysis）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显然是受到了让内的启发。可即便如此，就理论的层面看，正如弗洛伊德正确地指出的，他的精神分析与让内的“心理分析”无论是在精神旨趣上还是在理论的结构形态上皆有根本的不同。因此，让内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过是他的心理分析的改头换面，这显然失之武断。可弗洛伊德呢？真的如他自己所说，让内的“心理分析”对他毫无启示吗？他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让内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比较一下两种理论之间的相似点，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些踪迹。艾伦伯格在《无意识的发现》（1970年）中对两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比较：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甚至包括在术语使用的方面，让内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弗洛伊德使用了让内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分析”这些词。在1896年，弗洛伊德称他的体系为“精神分析”，以区别于让内的“心理分析”，他还开始强调他的思想与让内的思想之间的不同。在这么做的时候，弗洛伊德对让内的概念做出了歪曲的描述，认为让内的歇斯底里理论是基于“退化”的概念。实际上，在区分部分构成性因素与精神创伤的时候，让内教导说，歇斯底里乃是源自两者的相互作用，而这恰恰是弗洛伊德后来所说的“补偿系列”。弗洛伊德强调压抑在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中的作用，但忽视了让内理论中的“意识领域的狭窄化”。让内

争辩说，“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意识领域的狭窄化’”，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都可追溯到赫尔巴特，因为后者把这两者看作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弗洛伊德还批评让内把歇斯底里的根源说成是“综合功能”的虚弱。然而，精神分析学后来以“自我的虚弱”之名采用了一个类似的概念。让内从研究“下意识”现象转向研究“心理紧张”也预示了精神分析学从“深度心理学”转向“自我心理学”。让内的“现实功能”到精神分析学那里变成了“现实原则”。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让内在D女士的病例中使用的“自动谈话”的技术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的方法之间也有某种相似。还有，在精神分析的移情与让内所说的“梦游性的影响”和“方向需求”——让内以此来系统说明医治者与病人之间的多样联系——之间，则有着更为明显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为琼斯所承认。^①

总之，弗洛伊德肯定是受到了让内的影响，但由此认为让内更应当享受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的特权也肯定是过分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让内的理论仍属于19世纪的精神病学的传统，他对于人的心理构成或人格结构的理解仍是启蒙主义的，是基于一种自我统一性的思想，而弗洛伊德创造的是一个属于20世纪的新体系，他的心理构成和人格结构的理论所勾画的乃是一个分裂的主体的图像。因此，对于弗洛伊德在发明权问题上的这种较真，我们所能给出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问题肯定是触动了他无意识中的某个难以向外人道说的真实，用拉康的话来说，它体现了主体对想要获得他者确认的欲望的某种屈从。

第三节 挥师巴黎

我如此纠缠于弗洛伊德和让内之间的恩怨，并不是要给这场笔墨官司断出个是非曲直，而是为了给精神分析与法国知识界的关系提供一

^①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 539.

个原始的历史场景，因为这个场景颇具暗示性，就像一个涂抹不去的原始的字迹，将永久地刻写在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并将在某些时刻以各种变换的面孔不时地隐现出来，如同主体的心理创伤总要以重复的方式来显示自身一样。

其实，弗洛伊德自己对这个原始场景已经造成的主体性怨恨已有某种模糊的预感。早在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他就说：“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①而在1925年的《自传》中，他又针对精神分析学介绍到法国后所引起的症状和反应说道：

在我看来，那些反应犹如我曾身历其境的反应的重现，不过它别具一格：反对的理由极其简单，好像法国人的敏感受不了精神分析学专有名词的拘泥和粗略之类。另外有些批评则较为严酷：整个精神分析学的思想方法都与拉丁精神相矛盾，在这一点上，一向支持精神分析法，与法国同盟的盎格鲁撒克逊，显然不能一致。^②

的确，相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表现出的那种过分的热情而言，法国人在20世纪初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绝对称得上是冷漠，别说宣传和运用，连让内那样的批评和攻击的声音都微乎其微，就是说，它干脆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何以如此？精神分析史学家，包括弗洛伊德自己，常常将个中缘由归于两点：一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即20世纪初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外心理使得他们很难去接受一个德语世界的学说，更何况这个学说还是出自一个犹太人之手；再就是文化与学术传统方面的，例如瑞士的艾伦伯格和法国的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一致认为，法国强劲的精神病学传统及其理性的、人道主义的心理学传统都阻碍了法国人对精神分析学的接受。

并且，上面的第二个原因既是基于观念方面的，也是基于建制方面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个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哲学于一身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治疗技术，这一混杂的特征给它在法国的传播造成了很大的建制困难，因为正如伊迪丝·库兹韦尔所说的：在法国，“精神分析学显然危及了治疗心身性疾病的既有手段，后者乃是基于法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71页。

②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67页。

国人有关生物学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的联系的观点。教学性的医院已经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可以接受的话语也被规定好了：医生处理身体，哲学家和神学家处理心灵”^①。虽说在法国的大学里有关心身关系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可现实中心身二分的建制体系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至少在20世纪初仍是如此。对于那时的法国人来说，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哲学的魅力当然远远不及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学说，而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领域，精神分析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实践上也是他们自己强大的传统所难以认同的。总之，与英美世界相对顺畅的接受不同，在法国，哲学观念、学术建制、医学实践等方面的传统构成了其抵制精神分析学的最有力因素，谢利·图克勒甚至将这一抵制称为法国的“反精神分析文化”，并同样认为这一文化的确立与法国哲学和心理学的传统建制有着密切关联：

法国精神病学家倾向于把病人的病痛看作是器官损伤或道德堕落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中，“健康”的医生与“有病”的病患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却使得这一界限难以划定，因为它强调，如果精神病学家更全面地认识自己，就会发现，他们与病人之间的共同点可能比他们认为的要多。在亨利·柏格森和皮埃尔·让内身上，法国哲学和心理学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坚定地声称已经论述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论题，且论述得更为高雅（例如，他们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过分”以性为参照），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一个外国的理论家。而且，法国哲学和心理学一直致力于描画和强化这两者间的界限，以确定各自的领地在于心灵的哪个方面。精神分析学不尊重这一界限。它超越了传统的心理学，声称有权闯入哲学家指认属于自己的专业禁地的那些问题：自由意志的现实性、直觉的可靠性、意识的自主性等。

因而，医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专业建制的敌意以及沙文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受到冒犯的感受有助于确立法国的一种反精神分析文化。^②

① Edith Kurzweil, *The Freudia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18-119.

②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28.

总体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弗洛伊德与让内之间远距离的不友好对话以外，巴黎与维也纳之间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只是偶尔有一些知识交流，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曾提到这一点^①——1908年4月的萨尔茨堡会议和1910年3月的纽伦堡会议上都未见法国人的踪影。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到20年代初，局势才开始有所变化，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被翻译成法文，巴黎人开始重新认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价值。并且，这一认识的转变是在两个不同的集团当中分别以不同的态度开始的：一个是医学界年轻的“科学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国外移民来的精神分析家或弗洛伊德的信徒，还有一部分人是法国本土的医生，其中有的与弗洛伊德有直接联系，有的则是接受了移民的精神分析家的分析和培训，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法国本土的这些年轻人都对精神分析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让精神分析法国化是他们推进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策略，也是引发其内部矛盾的一个关键因素；另一个则是文学艺术界先锋的“文人”共同体，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这个共同体更倾向于从文化的方面来看待精神分析学，他们把精神分析的理论甚至某些技术同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分析联系起来，欲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激进观念来推进艺术和文化的革命，因而在他们的身上，少有医学界的那种抵制，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把接受精神分析学视作是对抗医学界的文化沙文主义、颠覆其顽固的建制壁垒的有力手段。

先看一下医学界的情形。如刚才所说，这个共同体由两个集团构成：一个是从国外移民来的分析家团体，他们在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早期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个是法国本土年轻的医生团体，他们是法国医学界最早接受精神分析学的一批人，但同时，他们对精神分析学又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而且他们与前一个团体的关系将是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早期历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法国医学界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开场颇具一丝反讽的意味，它居然是由弗洛伊德的直接介入拉开序幕的。1921年，弗洛伊德看到，在奥地利、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已经有了精神分析学会，连俄

^① 参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71页。

罗斯也在酝酿着成立学会，唯独法国这个西方文化的重要国度仍不见动静，而征服巴黎又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于是，他委派了一个使节到巴黎，希望能对现状有所改变。这位使节是一个女分析家，名叫欧也妮·索科尔尼卡（Eugenie Sokolnicka, 1884—1934），来自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曾在巴黎学习，听过让内的演讲，还与巴黎的文学圈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11年，索科尔尼卡到瑞士苏黎世的布尔戈霍兹利精神病医院从事研究，在那里接受了荣格的分析。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她又来到维也纳，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给她的身心造成了很大伤害，以至在战争结束后曾一度陷入一种妄想型迫害症的状态。1921年秋，索科尔尼卡受弗洛伊德的委派来到巴黎，可巴黎的精神病学家对她并不感兴趣，她只能利用以前在文学圈建立的关系，其中包括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为了普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索科尔尼卡在巴黎开设了系列的“弗洛伊德讲习班”，吸引了包括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 1852—1935）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在内的许多文学家的关注，尤其是纪德，他不仅接受了索科尔尼卡的分析（不过只约见了六次就放弃了），而且还在自己的杂志《新法兰西评论》上刊载评述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1925年他在小说《伪币制造者》中还以索科尔尼卡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女分析师的形象。

1922年，索科尔尼卡通过布尔热的介绍认识了圣安娜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乔治·埃耶尔（Georges Heuyer, 1884—1977），这是她到巴黎后与法国精神病学界的第一次接触。埃耶尔邀请索科尔尼卡到他的科室做临床分析，但实验似乎并不成功，很快她就被请出了医院大门，院方的理由很简单，精神分析实践要想得到认可，就必须将自身严格限定在医学（科学）的范围内。实际上，索科尔尼卡在法国一直没有赢得医学界那些同情精神分析的医生的真正支持，这极大地影响了她在法国精神分析团体中的地位。1926年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成立时，她被选为学会副主席，而这还是因为背后有弗洛伊德在为她撑腰。1934年5月，索科尔尼卡在巴黎的寓所打开煤气自尽。

就在弗洛伊德向法国派遣他的使节的同时，法国本土的一些年轻医

生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也正在发生改变。在第一批同情精神分析学的人当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尤其值得一提——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都与弗洛伊德有过直接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法国精神分析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安杰罗·埃斯纳（Angelo Hesnard, 1886—1969）和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 1894—1962）。

安杰罗·埃斯纳可能是法国最早以严肃的态度看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学家。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医，1912年成为他的母校波尔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伊曼纽尔·雷吉斯（Emmanuel Régis, 1855—1918）的助手。雷吉斯教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持有一种同情态度，所以他鼓励埃斯纳去研究弗洛伊德，可那时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未见有法文译本，幸得埃斯纳的哥哥——一位德语教师——的帮助，使得阅读可以顺利进行。其实，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埃斯纳就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在得知自己要到波尔多大学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时，他提笔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该信于1912年1月2日寄到了弗洛伊德手中，弗洛伊德当日就给他的信徒亚伯拉罕写信通报了此事，称这个年轻人在信中以“法国精神病学界的名义”对到目前为止法国仍对精神分析学持嘲讽态度深表“歉意”。埃斯纳为何要写这封信，我们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致歉与其说是为了向弗洛伊德表示敬意，不如说是一种礼节性的问候——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不是这样阅读的。

1914年初，埃斯纳同他的老师雷吉斯合作出版了长达400页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精神分析》一书，两位作者虽然称弗洛伊德的体系将构成这个时期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运动”，可同时又认为这一体系的方法乃是基于让内的“心理分析”，而其对性欲的重要性的强调则犯有“泛性论”的错误，至于其对梦所做的象征主义分析，或则是“教条主义的”，或则是“小说的虚构多于科学的论证”。这些让内式的批评当然令弗洛伊德十分不快，所以他在写于同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中立即给以了回应，称两位作者的论述虽然详尽，但却误解了他的思想。埃斯纳和雷吉斯的这本书是法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弗洛伊德理论的著作（其中四分之三的篇幅是介绍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内容，另外四分之一则是评述），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它一直是法国人了解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法文参考书（该书曾于1922年和1929年重印发行）。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开场所重现的那个原始胎记，而这个胎记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更像是一个原始创伤：埃斯纳和雷吉斯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乃是对让内的“心理分析”方法的搬用，对于他的性欲理论，则以“泛性论”的标签将其送上了道德的审判席，这两点也正是让内刚刚在1913年指出过的，它们此后还将作为一种文化抵抗策略不断回荡在法国精神病学界的上空；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两点简直就像是一个梦魇，令他束手无策，他只能强迫性地重复说：法国人总是把精神分析学中好的东西归之于自己，至于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埃斯纳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严肃对待精神分析学的第一个法国人，可他那时并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更确切地说，他只是以既定的法国传统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批判性的介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在拉福格的影响下重新回到精神分析学的领域，并且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勒内·拉福格1894年出生于阿尔萨斯。1870年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被划归德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重新回到法国，这就是说，拉福格年轻时的阿尔萨斯还归德国治辖。这一历史的插曲造就了拉福格的双语背景，这对于他后来走上精神分析的道路是很重要的。拉福格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便进了德国的大学，先是在弗莱堡，后又到了柏林，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弗洛伊德的《释梦》（19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福格在德国军队服役。1919年，阿尔萨斯回归法国后，拉福格决定留在法国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1922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论文的内容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精神分裂症的情感。1923年，他来到巴黎索邦大学从事感觉生理学的研究，这一年他接受了索科尔尼卡的分析，但仅仅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久，他成为圣安娜医院的一名助理医生。

1923年10月，拉福格和另一位年轻的法国医生爱德华·皮雄（Édouard Pichon, 1890—1940）合作发表了论文《精神分析方法在法国传播的障碍》。10月25日，拉福格致信弗洛伊德，在信中谈到了他和皮雄刚刚发表的那篇论文的主要内容。11月14日，弗洛伊德回信说：“要想有所收获，就不能向公众舆论或主流的偏见让步。这种行为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后者的技术决不会在意那些装模作

样的或故弄玄虚的抵抗。经验已经表明，那些走折中、故弄玄虚的道路的人，那些走外交机会主义的捷径的人，最终将发现自己偏离了他们正常的路线，不可能对精神分析学的根本发展做出贡献。”^① 弗洛伊德的这些话倒更像是提前说给拉福格的合作者皮雄听的。

皮雄本来是一名儿科医生，1923年经由拉福格的介绍，开始接受索科尔尼卡的分析，并且少见地持续了三年之久。他卷入精神分析，按他自己的说法，只是为了从“弗洛伊德先生”那里获取他认为适合于法国民族精神的东西。1927年，皮雄同让内的女儿结婚。他曾异想天开地想把他的岳父和弗洛伊德拉到一起作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但没有成功。皮雄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语言学研究对后来的拉康有很大影响——这种人文气质使得他对精神分析学常常带有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诉求，将精神分析本土化当然是他所致力的方向。

1924年，拉福格又和巴黎的另一位精神病医生、正在接受他的分析的勒内·阿伦迪（René Allendy, 1889—1942）合作出版了《精神分析与神经症》一书，圣安娜医院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亨利·克劳德（Henri Claude, 1869—1946）——正是他将索科尔尼卡赶出了圣安娜医院，不过他并不属于反对精神分析学的极端派，他只是要求在科学的范围内运用精神分析的技术——作序说，“精神分析学还不适合于探究法国心灵。它的某些研究方法在运用于私人情感的时候，与我们的趣味是相背的，其象征主义的那些牵强附会的例证，在我看来，会使它的某些一般性结论在拉丁世界的临床实践中无法接受，尽管它们可能适用于别的种族。”^② 这一年，拉福格还专程到德国拜访弗洛伊德，次年，在弗洛伊德的支持下，他被接纳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

在与国外精神分析团体接触的过程中，拉福格觉得，在法国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来推进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和实践。1925年初，拉福格、皮雄、阿伦迪、埃斯纳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组织：“精神病学的演进”（L'Evolution Psychiatrique）——这个名称带有向哲学家亨利·

^① 转引自 Alain de Mijolla, *Short Story of Psychoanalysis*, 见 www.aihp-iahp.com。

^②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22,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 致敬之意, 后者最著名的作品就是 1907 年出版的 *Évolution Créatrice* (中文译作《创造进化论》)——并创办了一份同名杂志, 由埃斯纳和拉福格任主编, 4 月, 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

“精神病学的演进”是一个由法国本土同情精神分析学的医生构成的组织, 这一身份构成对于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其典型的“法国性”——这一点从组织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到——或者更确切地说, 其对精神分析“法国化”的追求, 与一直以来法国对精神分析的那种沙文主义式的抵抗正相呼应, 它与其说是对后者的一种决裂, 不如说是对曾经的那种粗暴态度的一种开脱, 一种修正。从一开始, 这个组织就明确地让自己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保持距离, 而只对医学性的“事实”感兴趣, 并力图将这些“事实”交付给严格的科学控制, 就像英国人大卫·梅西所说的: “一方面, 它力图将资讯集中于法国在弗洛伊德方法的帮助下所从事的所有研究, 而另一方面, 它在翻译和解释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时又力图使其‘尽可能地适应我们民族的精神’。为此它必然要抛弃使德国精神分析学偏离正轨的那些教条和教义, 把弗洛伊德的发现交付于‘严格的科学控制’。”^①

但不管怎样, 法国医学界的精神分析运动终于起步了, 接下来的进展则与另外两位移民分析家有关, 这就是玛丽·莱昂·波拿巴 (Marie Léon Bonaparte, 1882—1962) 和鲁道夫·洛文斯坦因 (Rudolph Loewenstein, 1898—1976)。

玛丽·莱昂·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曾孙女, 1882 年出生于法国, 1907 年嫁给希腊的乔治王子。这是一个患有严重抑郁症的贵妇人和一个极其自恋的女作家, 曾出版过小说集, 那里面充满着对父亲的种种幻想。1925 年 4 月, 拉福格到她家造访的时候, 推荐她去弗洛伊德那里接受分析治疗。9 月底, 她果真出发了。据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弗洛伊德对她说, “我七十岁了。我的身体一向很好, 可现在出了点小毛病……所以我要事先向你挑明: 你心理上可不能陷得太深了。”多愁善感的希腊王妃听了这话不禁潸然泪下, 于是对他说她爱他。弗洛伊德很

^① David Macey, *Lacan in Contexts*, p. 28.

高兴，以他自己的话说，“都七十岁了居然还有人跟我说这句话”。就这样，两人一见如故，王妃很快取得了弗洛伊德的信任，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最好的朋友之一。波拿巴把弗洛伊德当作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伟大的精神上的“父亲”，这个“父亲”给予她的爱和期许可以帮助她获得所欲望的菲勒斯。当然，弗洛伊德也需要这样一个集权势、财力、人缘于一身的“助手”来发展他的国际事业。而事实上还不只是如此，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6月，正是在这位希腊王妃及其他友人的鼎力帮助下，弗洛伊德一家才得以逃出纳粹的魔爪，经由巴黎流亡到了伦敦，并于次年客死在异乡。

鲁道夫·洛文斯坦因是玛丽·波拿巴的好友（他们之间可能还是情人关系），1898年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家庭，他是在瑞士苏黎世接受的中学教育，然后在柏林完成的大学学业，并在那里接受了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一个分析家的分析训练，进而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年轻的培训分析师。洛文斯坦因可以同等流利地用波兰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同人进行交流，这给他在不同国家从事分析实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25年，柏林精神分析学会把洛文斯坦因推荐给拉福格去为法国培训分析师，洛文斯坦因于是来到巴黎，成为当时法国最有声望的分析师，包括乔治·帕尔赫梅内（Georges Parcheminey, 1888—1953）、萨卡·纳什特（Sacha Nacht, 1901—1977）、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 1903—1972）、雅克·拉康等在内的许多法国精神分析家都曾接受他的分析和培训。1930年，洛文斯坦因成为法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以医生身份在法国军队服役，法国被德国占领后，他逃到马赛避难，最后于1942年流亡美国，成为战后美国自我心理学学派的领军人物。

另外，在20年代巴黎的移民分析家中，还有两个来自瑞士日内瓦的人物需要提一下，这就是雷蒙·德·索绪尔（Raymond de Saussure, 1894—1971）和查尔斯·奥迪尔（Charles Odier, 1886—1954）。前者是结构语言学创始人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儿子，曾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后者是雷蒙·索绪尔的朋友。这两个人主要是在讲法语的瑞士人当中宣传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且是1926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法语精神分析家大会的主要组织者，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来自法国的分析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动议，

包括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在法国医学界推行精神分析的技术，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商讨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问题。

1926年，玛丽·波拿巴回到巴黎。虽然她并不是专业的分析师，但她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弗洛伊德的特殊关系使她立即成为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核心人物。通过她和拉福格，医学界的两支精神分析的队伍——外来的和本土的——开始会聚到一起。1926年11月4日，波拿巴、洛文斯坦因、索科尔尼卡、雷蒙·索绪尔、奥迪尔、拉福格、皮雄、阿伦迪、埃斯纳、帕尔赫梅内以及波拿巴和阿伦迪的朋友、神经病医生阿德林·博雷尔（Adrien Borel, 1886—1966）共十一人创立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由拉福格任主席，索科尔尼卡任副主席，洛文斯坦因任秘书。不久，与“精神病学的演进”圈子往来密切的奥德特·柯黛夫人（Madame Odette Codet, 1892—1964）也成为学会成员。

学会第一步的目标就是有效地实施日内瓦会议上的构想，即在法国推行精神分析的技术。当然，在法国，要实践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首要的是培训自己的分析师，在当时，学会只有四位专业的分析师，除洛文斯坦因、雷蒙·索绪尔和奥迪尔三位移民分析师以外，法国本土只有拉福格获得了这一资格，所以，新成立的学会会有一个雄心：要为“必不可少的教学分析”提供保证，为此它就必须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联合，作为后者的一个分支在法国展开活动，帮助巴黎引进像洛文斯坦因那样的专业分析师。

学会还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杂志，这就是《法国精神分析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可是，在杂志是不是——像其他地区的精神分析学会的杂志那样——属于“精神分析学”的专刊、杂志要不要非荣格化（因为这个圈子跟苏黎世有密切联系）以及杂志的封面上要不要出现“弗洛伊德教授”的名字等等问题上，学会成员间，主要是移民分析家与本土分析家之间，引发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在弗洛伊德的正式请求下，决定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任组织和杂志的指导，弗洛伊德为赞助者——实际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波拿巴王妃。1927年6月，《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一期正式面世。

争吵还不只限于上面的问题。1926年8月，日内瓦会议刚结束，

学会还未正式成立，成员们就组建了一个“语言委员会”，目的在于讨论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问题，因为自20年代初开始，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被陆续译成法文，但在一些关键术语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法：例如“Trieb”（驱力）这个词，有人译为“pulsion”（冲动），而有人却译为“instinct”（本能）；又如“das Es”这个词，埃斯纳译作“le soi”（它自身），玛丽·波拿巴和拉福格都译作“le ça”（它），柯黛译作“le cela”（这个），皮雄则译作“l'infra-moi”（本我），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译法——面对这一混乱的情形，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语言委员会”的讨论来给那些术语提出一个标准的译法。学会成立后，“语言委员会”便作为学会的一个学术机构进行运作，但讨论却引发了成员间激烈的争吵，面对各种可能的译法，到底选择哪一种呢？大家的意见始终无法统一。这种争吵不仅影响了弗洛伊德的作品在法国的翻译进度，也影响了人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读，并且直到拉康时代，精神分析术语的翻译和阐释仍是各学派之间进行较量的战场。

出现这样的争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巴黎组织从一开始就纠结了太多的不和谐因素：医生或精神病学家与非医学专业的人士之间、本土分析家或“精神病学的演进”集团与移民分析家之间、天主教精神病学家与犹太老师之间、弗洛伊德的“使节”或“代言人”与民族主义者之间、国际协会的权威主义与分会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巴黎的医生与讲法语的瑞士分析家之间，多重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相互交织使得学会成员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于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传统的文化抵抗机制再次发挥了作用，只是面目有所变化而已。巴黎本土的医生和分析家以“精神病学的演进”为中心，强调只在医学或治疗的层面引入精神分析学，并且还要以“可以接受的”形式，也就是必须把精神分析的技术和法国的治疗经验相结合，必须让精神分析法国化，所以他们对索科尔尼卡这样的“使节”、对波拿巴王妃这样的“业余”人士都很不信任，就连洛文斯坦因这样的专业水准很高的分析家也会因为其身上的那种“犹太性”而受到歧视。例如，在1931年10月的“第六届法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上，学会成员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阿伦迪、埃斯纳等为首的本土分析家声称，精神分析学——至少在法国——应当从属于一般医学、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否则就什么也不是；而以

玛丽·波拿巴、洛文斯坦因和奥迪尔为代表的移民分析家则回应说，精神分析应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临床的方面，另一个是心理学的方面，即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无意识心理学的方面。

总之，对“法国性”的坚守和对精神分析技术的某种迷恋使得法国本土的分析家常常会陷入一种矛盾心理，而当他们把精神分析法国化作为自身目标的时候，那也不过是他们用来化解这一内心矛盾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换句话说，是他们对自身欲望的一种屈从，且是一种双重的屈从。身为学会主席的拉福格就是这样的典型，正如图克勒所说：

勒内·拉福格的矛盾心理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他似乎觉得精神分析虽然有趣但却有点靠不住。作为《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拉福格不想让弗洛伊德的名字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他担心这样会“丢脸”。最后还是弗洛伊德自己出面干预，“说服”拉福格，称一份精神分析的杂志必须承认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依附，而不论后者在一个礼仪之邦是不是会获得首肯。拉福格强调，“精神病学的演进”这个医学学会将有助于削弱对精神分析学的抵抗，这种说法似乎只是其他动机的一种说辞。拉福格也希望“精神病学的演进”能帮助法国精神分析学去维持一定的独立性，以防止这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精神分析运动走向权威主义。多年后，他写道：“自一开始，我就觉得围绕着弗洛伊德的这个组织有点不对劲。‘精神病学的演进’使我们可以避免精神分析的教条主义，虽然对于这一教条主义的根源，我并不清楚。”拉福格有理由觉得他和他的同伴应尽力摆脱维也纳圈子的监控，因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是精神分析的非正统派的温床，也是矛盾心理的温床。巴黎精神分析学家的孤傲及其对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怀疑态度使他们的规则注定要发生偏离。^①

第四节 文人的实验

我们再回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早期历史的另一个原始场景，那就是

^①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101.

由先锋的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文人共同体所掀起的另一股小范围的精神分析浪潮。与医学界的科学家共同体不同，这个文人共同体对精神分析学的情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而更多地是一种非科学式的同情。

按照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史学家——也是拉康的弟子和拉康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的说法，虽然法国文人团体承认弗洛伊德的重要性要早于医学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国引入精神分析学的运动中“文学渠道”要早于“医学渠道”。这两者其实都属于同一个进程，在其中，对维也纳理论的抵制和对这一理论的接纳都属于同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关涉着法国本土的知识传统和时代精神。鲁迪奈斯科说：

事实上，自1914年开始，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在相当大一部分的法国思想中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先后的问题远不如多样性重要，因为这两种移植弗洛伊德理论的方式的相互对立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文学的渠道和医学的渠道都属于同一进程，在那里，对维也纳理论的抵制也是这一理论有力地推进的一个信号。根本不存在一个渠道先于另一个渠道的问题，而只有两种引进过程的齐头并进。在文学界的方面，倾向于把精神分析说成是某一真正新的发现的表现，而在医学界，则倾向于让它去适应所谓的拉丁精神或笛卡儿精神的理想。就这样，通过两种矛盾的方式，精神分析学得到了承认。一些人接受它，另一些人抵制它，这都是同一意识形态现象的体现。^①

另一方面，如果说医学界的抵制是基于一种科学传统、一种道德倾向、一种民族情绪等因而对弗洛伊德作了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解读的话，那么，文学界的接纳则是基于一种时代情感的艺术表达的需要因而同样对弗洛伊德采取了误读式的确认，因此，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谁的阅读更为“正确”这样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阅读方向的不同，即一方是朝向过去，要求精神分析学去适应传统，而另一方则是朝向现在和未来，认为精神分析学将有助于改变这个陈腐的时代的精神和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

心灵。

再有，与医学界的分析家们单一的医学指向不同，文人集团对精神分析学的诉求呈现出一种相对混杂的面向，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热情是一种人文式的而非科学的热情，这使得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移植更具有某种自由主义的倾向。性爱、罪感、自杀、迷幻、癫狂、梦境、通灵的幻觉、肉欲的解放乃至身体的暴力等等，战后一代年轻作家所热衷的这类题材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似乎都可以找到“支撑”——这当然有赖于对理论的一种误读，一种放任式的涂改。超现实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将精神分析技术从医学向写作的挪用引起了医学界分析家极大的不安。

最后，在文学渠道与医学渠道之间，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文人集团对医学圈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沙文主义、反犹主义、排外倾向以及那种排斥“业余分析”的权威主义和专业主义癖好始终持拒斥的态度，他们甚至要借一种精神分析文化来对抗那种精神分析科学，就像鲁迪奈斯科所说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其对无意识的绝对第一性的捍卫，与一种高卢无意识的理想构成了正相对立的一端。这个团体的诗人与皮雄、埃斯纳或拉福格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也不属于同一个法国。他们的弗洛伊德主义与后者的弗洛伊德主义是不一样的，在这一对立中，相反的双方展开了一场较量。”^① 这一较量是持久的、多方面的，它导致双方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几乎无法沟通，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文学批评家们运用精神分析不断做出的出色的作家研究和作品分析，医学界分析家仍经常对“业余分析家”的这一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在他们的“科学精神”看来，这一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可疑的前提之上的，就是它把文学家等同于精神病患者，把文学家的作品等同于受分析者的言谈——这的确是一个可疑的前提，可问题在于它并不是所有精神分析批评的前提。在30至50年代的法国精神分析批评中，如果说玛丽·波拿巴的爱伦·坡研究和拉福格的波德莱尔研究的确是基于这种病理学的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执著于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5.

分析家的技术所致——那么，在夏尔·博杜安（Charles Baudouin, 1893—1963）的雨果研究中、在夏尔·莫隆（Charles Mauron, 1899—1966）的马拉美研究中、在精神病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让·德雷（Jean Delay, 1907—1987）的纪德研究中，我们就看到，精神分析的技术不再单一地是重构某一主体的无意识传记的手段，而是转向了对文本本身的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

1925年，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不无兴奋地说：“在法国，起先是文人开始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①的确，在20年代初，对精神分析学发生兴趣的法国文人有很多。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他们的动机或者说兴趣点各有不同，因而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和运用也各相异趣。

例如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罗兰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与弗洛伊德结交于1923年，虽然两人只见过一次面（1924年），但时常有书信往来，罗兰在书信中甚至把弗洛伊德比作哥伦布。可是，罗兰并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对弗洛伊德所表示的那种敬意与其说是出于对精神分析学的真正欣赏，不如说是基于他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念，是基于他对德语文化的那种热情。

又如罗兰的朋友皮埃尔·让·茹弗（Pierre Jean Jouve, 1887—1976）。茹弗是一位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过一些象征主义的诗篇，1922年移居巴黎，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并热心于精神分析学，自诩是那个时代法国最具弗洛伊德主义气质的诗人。1925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这些小说常常以女性的受分析者为主角，以罪恶、性欲和死亡作为主题，以宗教的救赎为价值指归，试图将弗洛伊德主义的素材，如无意识的幻念、性欲驱力、死亡本能等，同一种强调罪感与救赎的宗教神秘主义相结合，由此构建了一个色欲形而上学的写作体裁。

茹弗迷恋上精神分析与一个女人有关，这就是他的妻子布朗夏·勒韦肖（Blanche Reverchon, 1879—1974）。勒韦肖曾在日内瓦和巴黎学习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1922年她随茹弗移居巴黎，并接受了索科尔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67页。

尼卡的分析。不久，她到维也纳拜谒弗洛伊德，这位对女性极具诱惑力的老师建议她去从事精神分析的实践。回到巴黎后，勒韦肖果然开设了自己的诊所，主要接诊上流社会的女性患者，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1923年，勒韦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按她的这些资历，她本应该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可事实上，她到1928年才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一名编外成员（也是在这一年，她接受了洛文斯坦因的培训分析）。

茹弗生活奢侈，可自己又没有固定收入，只有依靠勒韦肖的接诊，因此勒韦肖通常只接待家底殷实的病人。不只如此，勒韦肖的躺椅还是给茹弗提供创作素材的保证，茹弗小说中的那些女性形象与这位女分析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3年，茹弗和勒韦肖合作在纪德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临床研究《精神分析的时刻》，记述了一个病患的病历，并依据精神分析理论对这个病例进行了分析，这看似是一个临床研究，而实际上，由于过于讲究的叙事技巧，使人不得不怀疑其叙述的客观性，也许更适合把它看作是一个分析师与一个作家依据某个临床的素材创作出来的一部虚构作品。对于茹弗在文学中对精神分析的这种运用，鲁迪奈斯科评论说：“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茹弗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也是狂热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支持医学界对待维也纳学说的观念（甚至正统的观念）。在他作为诗人的生涯中，他培育了将创作者看作造物主、看作人类意识的代理的传统理想。与布勒东或里维埃的情况不同，他没有把弗洛伊德的发现看作是科学史的一次启示。相反，他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种宗教，能带给世界一种全新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他偏向于一种荣格主义。”^①

再如安德烈·纪德。纪德是一个早慧的文学奇才，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即便他不是作家，他在童年时期的那些梦魇、怪癖和病痛也可成为分析的最佳素材，他在21岁时（1891年）创作的第一批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和《论那喀索斯》就带有明显自我分析的痕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100.

迹。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德一生都在用他的笔和生活写着同一部作品，那就是“自传”：他的日记、他的小说、他的自恋、他的非道德主义、他的性取向，这一切都是他那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自白。他是一个天生的精神分析家，也是一个天生的精神分析对象，难怪1922年他听了索科尔尼卡在巴黎举办的弗洛伊德讲习班后会说：“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主义……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我一直在实践它，只是自己并不知道。”^①

其实，在索科尔尼卡到达巴黎之前，纪德就通过他的一个女崇拜者与弗洛伊德圈子发生了接触。1918年6月，纪德到伦敦做一次短暂旅行，期间结识了著名的斯特雷奇家族的两位成员：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 1887—1967）和他的妹妹多萝丝·布西（Dorothy Bussy, 1865—1960）。詹姆士于1920年到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后来成为弗洛伊德著作最著名的英译者，他的妹妹布西就是纪德的那位崇拜者。布西不只是一位崇拜者，还是纪德的狂热的爱慕者，且至死不渝，她后来成为纪德作品的著名英译者。当然，在这次旅行中，纪德还没有听说精神分析学。但是，1921年4月，纪德突然写信给布西，急切地希望通过她哥哥詹姆士的引见去拜访弗洛伊德，因为他于1911年匿名发表的阐述同性恋的对话作品《科里东》即将出版德文版，他想请弗洛伊德为他的这本书写一个序；另外，他还想在他的杂志《新法兰西评论》上翻译发表弗洛伊德的作品，希望詹姆士能推荐一些篇目。布西很快回信说，这是举手之劳，她的兄长现在就在维也纳。6月，从斯特雷奇那边传来消息，他已经同弗洛伊德说了纪德的请求，但弗洛伊德没有答应为《科里东》作序，也许是因为这部公开为同性恋和变童癖做辩护的对话作品令弗洛伊德也觉得难以接受。于是纪德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已经无从知晓，因为这封信在弗洛伊德1938年离开维也纳流亡英国的时候被销毁了。反正纪德想要弗洛伊德为他的书作序的愿望未能实现，他的维也纳之行当然也就没有付诸实施。纪德为什么如此迫切地希望弗洛伊德为他的书作序呢？鲁迪奈斯科解释说：“在出版《科里东》的时候，他急切地寻求一个科学的支持，仿佛仅凭

^① 转引自 Alain de Mijolla, *Short Story of Psychoanalysis*, 见 www.aihp-iahp.com。

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还不够充分。他梦想弗洛伊德为之作序，这样他就能采取一个特殊的倒置的姿态：在一本书的伪装下，把自己的‘案例’提供出来作为精神分析学的考察对象。”^①

虽然愿望没有达成，可纪德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1922年，他积极参与索科尔尼卡的弗洛伊德讲习班，还接受了索科尔尼卡的分析，不过只进行六次就停止了。同时，他的《新法兰西评论》也成为介绍精神分析的重要阵地，勒韦肖翻译的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就是这个杂志在1923年首先发表的，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的同性恋理论——它也许正适合于作为纪德所梦想的那个序言吧！

当然，说到20年代初法国文学圈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以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与茹弗、纪德等人主要是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精神分析的素材不大一样，超现实主义团体尤其看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他们不仅改变了精神分析技术的方向，即从治疗转用于创作，而且还把精神分析学看作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次革命，看作是对人的形象的全新揭示。同时，他们在引入精神分析学的时候，着意强调了自己与医学界之间的分歧，他们以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来对抗医学界的沙文主义和专业主义。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法国才有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文化。

布勒东原本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师从沙考特的学生、著名的神经科医生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 1857—1932）在一家军人医院的精神病中心任助理医生，其在医学上的天分曾赢得老师的激赏，以至于艾伦伯格后来说：“如果布勒东获得了医学学位，一直致力于精神病学的研究，他完全有可能凭着他的新方法而成为动力精神病学一个新学派的开创者。”^②可他并没有沿着科学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在战后弃医从文，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的开创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90.

^② Henri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p. 837.

者。布勒东是在1917年左右通过埃斯纳和雷吉斯的著作《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精神分析》了解到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可这并非他获得无意识的知识的唯一来源，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年轻人，心理学、精神病学、通灵术、哲学、文学，各个领域的著作他都阅读，因此，鲁迪奈斯科说：“布勒东的无意识概念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并不属于同一个知识领域。在这位诗人看来，无意识并不是一种以拓扑学方式形成为代理或力量的结构，而是一个与心理学家、催眠术士、通灵者、玄学家所描述的自动作用相一致的心理场所。”^①实际上，布勒东等人后来实验的所谓“自动书写”主要得益于两个传统：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的文学传统以及法国动力精神病学的医学传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是在超现实主义后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时被当作了理论的支撑，他们在早期的自动书写实践中的作用远不及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勒东加入了达达主义的团体，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9年3月，他和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 1897—1990）、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一起在巴黎创办了一份名为《文学》的杂志，旨在向一切文学传统和偏见宣战，要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把一切陈旧的东西都清除干净。1919年10月，《文学》杂志发表了布勒东和苏波合作的作品《磁场》，这是他们用“自动书写”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之所以名之为“磁场”，大约含有这样的意思：我们所处身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处于永恒振动之中、因而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干扰的磁力场，但由于传统、理性、日常语言等等的束缚，使得我们体会不到这个力场的振动；只要我们放弃了那些束缚，让自己进入一种下意识状态，那个力场的互动效应就会自动地显露出来。

自动书写让布勒东觉得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虽然这种写作在此前已为许多作家实验过。现在布勒东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来支持他，精神分析学就成为了他的航标。接下来的开场又与弗洛伊德有点关系。1921年10月，布勒东专程到维也纳拜访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2.

理学家。虽然布勒东后来曾多次强调精神分析学对超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但这次会见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并无标志性的意义，它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文学“革命者”去向一个年长的科学“革命者”完成的一次朝拜仪式，如布勒东自己说的，他在那个用来接待访问者（病人）的房间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已经弱不禁风的“小老头”，虽然这个“小老头”曾是现代冒险主义最大胆的“代理”。两人的谈话内容也了无新意，弗洛伊德对布勒东的文学运动毫无兴趣，为了活跃气氛，布勒东提到了沙考特和巴宾斯基的名字，可弗洛伊德对此反应冷淡，还是一味地抱怨法国人对他的理论的排斥——就好像他跟法国人之间只有这么一个话题值得一聊。弗洛伊德的冷淡令布勒东颇为不快，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此耿耿于怀。

1924年11月，布勒东起草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标志着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正式组建，同年12月，这个团体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超现实主义革命》，包括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 1895—1952）、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 1896—1987）以及1922年移居巴黎的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等在内的许多先锋的文学艺术家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布勒东是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但不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权威，因为这个团体的精神之一就是要打倒一切权威。

超现实主义者的团体当然不是以推进精神分析运动为目标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有过医学的背景，例如布勒东和阿拉贡；而有一些人还接受过专业的精神分析治疗，如米歇尔·莱利斯（Michel Leiris, 1901—1990）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接受过博雷尔的分析，勒内·卡尔维尔（René Crevel, 1900—1935）接受过阿伦迪的分析，但是，如上所说，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是文化上的而非医学上的，他们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挪用乃是基于先锋艺术的那种实验精神，而不是着眼于治疗的目的。虽然布勒东在1924年的宣言中论及这个团体的理论基础时曾说：“这要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根据这些发现，终于形成了一股思潮；而借助于这股思潮，人类的探索者便得以作更进一步的发掘，而不必再拘泥于眼前的现实。想象或

许正在夺回自己的权利……”^① 但这些话究竟有多少诚意呢？又有多少是出自对精神分析学的真正理解呢？或者说对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的革命性精神，布勒东究竟了解多少？当我们看看他在 1932 年发表的作品《连通的容器》中对弗洛伊德的奚落时^②，大约可以看到其中的些许端倪。又如布勒东的合作者苏波，他在其自传《忘却的回忆》中明确地把启示的功劳归给了让内：“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位精神病科医生皮埃尔·让内的著作《心理的自动性》[即《心理的自动作用》。——引者注]……这本著作对超现实主义的早期发展十分重要……事实上正是皮埃尔·让内第一个指出并描述了下意识书写，是他启发了我们。对于皮埃尔·让内这个医生来说，下意识书写仅仅是一种治疗方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可能性，是某种创作。”^③ 至于像巴塔耶这样的人物，他的色欲主义本应使他更为走近精神分析学，而实际上，弗洛伊德之于他的重要性远不及黑格尔，并且有趣的是，巴塔耶是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边缘”人物，他的后半生又因为拉康的“插足”而注定要与精神分析运动纠缠在一起，可是，如同他对超现实主义运动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样，他对拉康精神分析圈子的争吵也毫无兴趣。

因此，对于超现实主义运动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虽然我们认为超现实主义团体内部有一种精神分析文化，可那也是局部的，在 20 世纪初的法国，这一文化的范围十分有限——尽管其文化的力量不可低估。

具体来说，精神分析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要的关联或联系：对梦境的重视；自动书写的心理学前提；对精神病或癫狂现象的重新认识。

①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246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在这部作品中，布勒东运用弗洛伊德的释梦技巧分析了自己的梦境，但又批评弗洛伊德把“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分割开来犯有二元论的错误，而认为梦境与清醒状态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却是彼此沟通的，就像两个连接的容器一样。作品出版后，布勒东给弗洛伊德寄去了一本，弗洛伊德在回信中针对布勒东的批评作了一些辩解，并称他本人“离艺术太遥远”，无法理解超现实主义的那些东西。

③ 转引自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125 页。

梦境是弗洛伊德实践分析技术最理想的对象，也是他用来打开无意识领域的重要场所，超现实主义则把梦境或梦幻视作是进入另一种真实的中介，对它们的描述成为他们捕捉这一真实的重要手段。例如在1924年的宣言中，针对人们把梦境视为日常生活中一种毫无意义的插曲，布勒东说，“梦境与现实这两种状态似若互不相容，我却相信未来这两者必会溶为一体，形成一种绝对的现实，亦即‘超现实’”^①。他还说，在梦境中，“令人惶惶的‘可能如何’之类的问题不复存在。去杀人，去展翅飞翔，去爱别人吧！总之是要怎样便怎样。即使你一命呜呼，不是也满可以在白骨堆中苏醒复生么？”^②显然，在这里，梦境的意义已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而成为了反抗现实的力量，“科学的”分析被嫁接到文化的革命冲动中。

对于超现实主义所实践的“自动书写”，许多人说那是对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方法的运用。可正如前面所说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源头不止一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是其中之一，并且按照艾伦伯格和鲁迪奈斯科的描述，在这些源头中，法国本土的哲学、文学和精神病学的传统在发生学的层面似乎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至于超现实主义所实践的“自动书写”，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方法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根本上是服务于治疗的目的，是对症状的一种解除，而前者乃是一种表达无意识活动的方式，是让内所说的那种心理自动作用，按照布勒东的描述，这种自动书写颇类似于一种“魔术”：

找一个尽可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然后把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弄来。尽你自己之所能，进入被动的或曰接受性的状态。忘掉你的天才、才干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才干。……落笔要迅疾而不必有先入为主的题材；要迅疾到记不住前文的程度，并使你自己不致产生重读前文的念头。第一个句子会自动地到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以至于每秒钟都会有一个迥然不同于我们有意识的思想的句子，它唯一的要求便是要脱颖而出。很难预断下一个句子将会如何……只要你愿意，就一直往下写。请相信：轻声柔语是绵绵不断、

①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249页。

② 同上书，248页。

不可穷竭的。^①

其实，超现实主义对自动书写的实践更接近于 19 世纪下半叶在欧洲所盛行的通灵术。1922 年 9 月，布勒东和他圈内的一帮朋友做了一系列的通灵实验，通过催眠术使人进入一种梦游般的自动书写状态，可实验表明，这个游戏十分危险，有的人沉陷在入魔状态难以自拔，甚至陷入一种癫狂。所以，布勒东等人不得不停止实验。但自动书写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仍受到布勒东的推崇，因为要知道，它是超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革命性的写作模式，若是没有了它，超现实主义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运动，虽则运动内部真正以自动书写的方式完成的作品并不多，但它作为一个标识已被超现实主义者指认为一种文学态度和哲学态度，一种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旨趣相一致的时代精神。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说：自动书写“消解了‘笛卡儿主义的’观念，依据那一观念，语言乃是思维主体的所有物。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书写则是作为主体离心化或碎片化的一个工具而存在的，主体不再确认自己具有任何的自我确定性。通过它，诗歌不再是现实的再现或灵感的场所，而是语言本身，是语言作为一种存在形式被客体化。在法国，超现实主义就是这样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帮手的，因为它陪伴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冒险，它给后者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并且这一表达方式不是理论的，而是分析的”^②。无意识、语言、离心化的主体，这些术语表明，鲁迪奈斯科的解释是拉康式的，而实际上，她认为拉康在其思想形成时期显然是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这些写作观念的影响。

再就是对精神病和癫狂现象的认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改变了人们对正常与癫狂的划界认识，当他宣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经症患者时，他实际上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癫狂或精神分裂已成为 20 世纪西方心灵的一个重要症状。可是弗洛伊德的那些不忠的信徒——包括法国的那些分析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继续把癫狂视作一种需要救治的病态。超现实主义者则不同，如同梦幻、自杀、

①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262 页。

②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6.

性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主题一样，对癫狂的重新认识也与他们所要表达的文化理想有关。还是在那个著名的宣言中，布勒东说：

再就是疯狂……就是那“需要关禁闭的疯病”。……谁都知道，实际上，疯子之所以遭到禁闭，只是由于少数法律上可以施加惩罚的行为；而假如没有这些行为，他们的自由是绝不会受到影响的。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自己的想象力之害，我倒愿意赞成这种见解；换句话说，他们的想象力促使他们不遵守某些规则，而离开了这些规则，人们就感到自危，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①

对癫狂的禁闭就是对想象力、对自由精神的囚禁，这就是布勒东们所要表达的，因此他们要以“癫狂颂”来解放那被囚禁的精灵。1928年，布勒东发表小说《娜嘉》，描写了一个女癫狂者在“正常”世界中的困苦的命运以及那癫狂状态的诗性的光辉^②；1930年，他又和艾吕雅合作发表《无暇的观念》，把癫狂和正常视作像“连通的容器”一样，瓦解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那人为的界限——这些都是献给癫狂的狂想诗，是日后法国“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先声。

至此，我们应当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迪奈斯科会说法国早期精神分析运动中“医学渠道”与“文学渠道”之间的差别其实属于同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医学界的犹疑与文学界的热情在某一点上是合流的，即它们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化进入转型时期的见证，一方代表着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另一方代表着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两者的并存正是这个时代矛盾心理的体现。在30年代之前，这两个渠道很少有直接的交锋和对话，但它们的并存给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的选择。直到拉康出现，这两个渠道开始了真正的合流。拉康正是从文学渠道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情者，他给了“精神分析写作”一个全新的文体，而这个文体——如同他的阅读一样——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他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分析学”。

^①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241~242页。

^② 1930年，因为这部小说对精神病医生和疯人院的攻击，导致让内和几位精神病学家对布勒东提出指控，双方爆发了一场争论。

第二章

自我认同的罪与罚

1931年10月，在“第六届法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上，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本土分析家与移民分析家之间就学会的性质及发展方向、业余分析师的地位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与会的一位年轻人目睹了一切，他就是雅克·拉康。不过，此时的拉康在这个圈内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在会上争吵不休的权威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不久就要在他们的阵地掀起更大的波澜，更不会想到将来某一天他会以其“野性的”分析风格来颠覆他们靠着不断的争吵与妥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一点点基业，同时将在巴黎以他为绝对中心形成一个远非他们的组织所能企及的“精神分析王国”或者说“拉康王国”，并会因此而被加冕一个对他们来说尊贵无比的封号：“法国的弗洛伊德”^①。

那么，这位“法国的弗洛伊德”是如何成就出来的呢？要知道，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不只是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还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建制：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拉康之被称作“法国的弗洛伊德”也应当在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即：一方面，他以其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革命性阐述为一个精神分析化的文化时代描画了主体性的根本症状；另一方面，他因为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法国本土的精神分析共同体的一系列冲突而在“古老”帝国的身边建立了一个反建制的王国，一

^① 1972年，《耶鲁法国研究》杂志以“法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研究”为题编发了一期法国精神分析学专号，拉康当然是这一期的主角。“法国的弗洛伊德”，在此既是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法国”，也是指拉康作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个只能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王国。“自我认同的罪与罚”，这是拉康对主体在想象界的认同的一种理论说明，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不只是一种理论，也是一个有关自我生成的神话，而在这里我们还会看到，它也是拉康的事业的一个写照，是他的自我在他者中的一种遭遇。

在接下来的两章，我将追述拉康在 50 年代之前的活动，当然这个时候的他还不能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他还不是日后那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因为他的出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拉康的时代已呼之欲出。我的追述将围绕拉康早期的学术经历来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关注的只是拉康的学术写作，那仅仅是一个结果而已，而真正的“追述”应当是一种过程描述，应当是对写作史的一种考古式的重构，是书写场景的重建。对于这个时期的拉康而言，有四个原发性场景是至关重要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与超现实主义圈子的互动以及与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相遇，它们交替着进入拉康的视野，结构着他在这个时期的思考。因此，我的追述将把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尽可能以此勾勒出拉康早期思想的语境。在这一章，我所关注的是拉康成为弗洛伊德主义者之前的活动。

第一节 妄想症书写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全名雅克-玛丽·爱弥尔·拉康 (Jacques-Marie Émile Lacan), 1901 年 4 月 13 日出生于巴黎中上层阶级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他的父系曾是巴黎西南部奥尔良地区著名的食用醋生产商，后扩展经营食品和日用杂货的贸易，19 世纪末，生意的据点移到巴黎，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拉康的父亲就在巴黎做贸易代理，他的母亲则出身于巴黎的一个金匠家庭，两人于 1900 年 6 月结婚，雅克·拉康是他们的长子，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1907 年，拉康被送入耶稣会办的著名的斯坦尼斯拉斯学校 (Collège Stanislas) 接受启蒙教育，1916 年继续在这所学校开始中学阶段的学习，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和古典学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拉康的父亲被征召入伍，斯坦尼斯拉斯学校也有一部分被改为战时医院，少年拉康目睹着从前线上抬下来的伤员，会有什么样的触动呢？他后来走上医学道路与这个有关系吗？这些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的他好胜心极强，总想在学习上拿第一，但实际上，他除了宗教和拉丁语翻译的课程十分出色以外，其他各科都成绩平平。

中学阶段，正处在青春期的拉康爱上了哲学，开始阅读 17 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并在自己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自己画的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体系结构图。拉康的哲学爱好令父亲非常不安，因为后者梦想着儿子今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商业上有所发展。可对于拉康来说，这个开端有着特别的意义：正是通过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拉康放弃了家族的天主教信仰，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作为对这一信仰转变的见证，他后来把自己名字中那个具有信仰色彩的部分“Marie”去掉了，改“雅克-玛丽”为“雅克”。更重要的是，十多年后，当拉康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斯宾诺莎哲学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四十多年后，当拉康因为“短时会谈”而遭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驱逐”时，斯宾诺莎又成为拉康叙说自己的遭遇的一个镜像。

1918 年左右，正处在心理裂变时期的拉康开始光顾位于奥德翁街（Odéon）的莫尼埃书店和莎士比亚书店，这是巴黎左岸地区两家很有名气的文学书店，安德烈·纪德、保罗·克罗岱尔、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 1885—1972）等著名作家都是这里的常客，拉康正是在这里（1920 年）结识了超现实主义者和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也是在这里（1921 年）第一次听人朗诵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作品《尤利西斯》。对于拉康来说，这同样是有意义的开端：进入他视野的这些人物就像自我固恋的镜像，总有一天，拉康会把他们或者他们的作品一一纳入自己的精神分析视野；尤其是与超现实主义者的交往，将对他早期思想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

1919 年秋，从斯坦尼斯拉斯学校毕业的拉康注册成为巴黎医学院的学生。大学期间，拉康除完成学业外，继续保持着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一度对尼采的思想颇为狂热。20 年代初期，他还与一个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关系密切，偶尔还会出席组织的集会。但他并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出席这类活动与其说是

基于某种政治信仰，不如说是因为那种场合的激进主义和精英主义气氛给这个弃教后的躁动心灵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宣泄亦可以获得心理补偿的渠道。

1926年11月4日，拉康与人合作在《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临床报告，报告写得“冗长、详尽、技术性强、且少有情感流露”^①。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不过这时的拉康还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他的报告中还见不到精神分析的痕迹，虽然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已有所了解。

医学的学习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完成大学学业后，还要到医院接受临床训练，这又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1927—1931年，拉康接受精神病临床治疗的训练。他先是在巴黎圣安娜医院学习精神病及脑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指导老师是著名的神经科专家亨利·克劳德；接着到巴黎警察局附属医院任专职医师，指导老师是以研究“精神的自动作用”（L'automatisme mental）著称的加埃坦·盖丁·德·克莱朗博尔（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 1872—1934），正是在这里的工作，使拉康对精神病理学和犯罪学发生了兴趣；1929年，拉康又转到以治疗和研究精神病著称的亨利·鲁赛尔医院工作，并在那里取得法医资格；1930年8月，拉康到荣格所在的苏黎世布尔戈霍兹利医院做为期两个月的访学，不过他在这里并未见到荣格；第二年拉康又回到圣安娜医院做实习医生。

在接受临床训练的这几年里，有三位老师给拉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 1866—1946）、亨利·克劳德和加埃坦·盖丁·德·克莱朗博尔。乔治·杜马是圣安娜医院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皮埃尔·让内的朋友，也是反对精神分析学的强硬派，他的讲课生动有趣，十分受哲学和精神病学的学生的欢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忧郁的热带》（1955年）一书的开篇对这位老师有十分精彩的描述；亨利·克劳德是圣安娜医院的绝对权威，与杜马不同，他对精神分析学怀有典型的法国式的同情，即希望让精神分析学适应拉丁精神，适应法国精神医学的传统，他也是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7.

拉福格强有力的支持者；至于加埃坦·盖丁·德·克莱朗博尔，是三个人中对拉康早期的医学研究真正产生过影响的一位，他对精神分析学没有什么了解，对所谓的拉丁性也没有兴趣，因此对这两者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三个人同为巴黎当时著名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家，相互之间不免有文人相轻的毛病，这让拉康感到很为难，为了不让自己受到伤害，他采取了一种相对灵活的自保策略，鲁迪奈斯科描述说：

拉康对各有所长的这几位导师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亨利·克劳德这位成功但却有局限的资产阶级分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谦恭的学生。他总是以赞同来迎合克劳德的自恋，同时又以自嘲式的优越感来维系自己的安全。对于乔治·杜马，他十分尊敬：他欣赏其临床的天赋，且总想在其面前施展自己的魅力。至于克莱朗博尔，他与其保持着一种矛盾的爱恨交织的关系。^①

实际上，在拉康的内心里，相比于其他两位老师，他对克莱朗博尔可能更多一份尊敬——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恶化了。在1966年为即将出版的《文集》所写的类似于自我介绍的短文《关于我的经历》中，拉康称克莱朗博尔是他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唯一的导师”，还称后者有关“精神的自动作用”的研究在试图把握（病人）主体的文本的方面要比法国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更接近在结构分析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東西”^②。拉康的这个表述颇为隐晦。实际上，这里的所谓“在结构分析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東西”，就是他以语言学方法揭示出来的“分裂的主体”（the split subject），而这也正是克莱朗博尔的“精神的自动作用”理论的揭示对象，只是后者把它称为“分裂的自我”（the split self）。对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影响关系，我们在拉康的第3期研讨班《精神病》（1955—1956年）当中可以看到。

在接受临床训练的这几年里，拉康与人合作撰写了一系列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大体都依循神经精神病学的传统作风，先描述症状，接着是神经科的检查，再下来是病情进展的陈述，最后对病症予以分类，做出初步诊断。其中值得一提的如1928年发表的《战争后遗症：一个不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23.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51.

会行走的女病人》和《传奇警探：从慢性幻觉式妄想到想象性妄想》：前者描述了一个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惊吓而不会行走的女患者，这其实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例，但作者们并没有以弗洛伊德或让内的方式去解释这一战争创伤，而是采用了巴宾斯基的神经病学的术语；后一个报告描述的是一个患有妄想症的中年男子，他在另一个城市“看到”了发生在巴黎的窃案，并真的跑到巴黎去报案，结果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作者们的观察中，这个病人的妄想原本是以幻觉为主，但两个月后其妄想逐渐发展为以想象为主，原本的幻觉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小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想象，拉康们称其为“不稳定的诗人”，认为该病例应是一种形态可发生改变的慢性妄想。还有如1929年发表的《持续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个神经症病例；以及1931年发表的《共生性疯癫》和《启示性书写：分裂书写》。所谓“共生性疯癫”，指的是两个患者之间的疯癫存在着一种引发关系，即一方的癫狂是因为有另一方的引发，只要后者不在场，前者的症状也就会消失。但在拉康及其同事所描述的两组母女的病例中，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妄想有时会独立发展，有时会呈现为相互引发，他们在报告中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至于“分裂书写”，描述的是一个有写作妄想的女教师，她总是觉得自己在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她的写作将给法国社会带来一场革命，报告的作者通过分析患者写作的文本中那些不合常规的语义、风格及语法，界定了其妄想症的结构；同时他们还指出，患者的这一陷入启示的状态决不是唯灵论的，而是一种自动现象，可以在超现实主义所实验的自动书写的语境中获得理解：“不过，在这些文本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要归于情感倾向的退化性言语表达。……一些作家在其所谓的超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和他们极其科学地描述的方法中所进行的实验表明，脱离催眠术后，自动作用可以使写作的自动性达到何等程度。”^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7月，拉康还在《巴黎医院周报》上独立发表了一篇论文《妄想性精神病的结构》，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性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109.

文本。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依循传统精神病学的思路对妄想性精神病的病因和病征进行了研究，他综合病因和病征的特点把妄想性精神病分为三类：体质性妄想、解释妄想和激情妄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第一类精神病的描述，他采用传统的解释，提出了构成体质性妄想的四个要素：病态的自我高估；猜疑；判断缺陷和社会适应不良。在这之外，他还补充了一个要素：“包法利主义”（Bovaryism）。我们知道，包法利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发表于1857年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作家以科学家般的冷静与精细刻画了一个靠着幻想的自我生活的女人的不幸遭际，小说发表后，文学批评家、哲学家使用“包法利主义”来指称那种幻想性的人格，到20世纪20年代，有精神病学家将这一概念引入对妄想症的思考，将妄想性人格描述为病态的包法利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拉康当然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拉康的这篇论文有着他的老师克莱朗博尔的影响，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修正。克莱朗博尔也曾是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的学生，早年学的是法律，但却走上了医学的道路，致力于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的研究，其中以对钟情妄想（erotomania）^①的研究最为著名。为了对各种各样的妄想症症状做出系统的描述，克莱朗博尔提出了一个概念：“精神自动作用的综合征”（syndrome of mental automatism），即妄想症的那种种症状其实是精神和感觉障碍以一种自动作用的方式——克莱朗博尔的所谓“精神的自动作用”实际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过程——强加给主体的，它们看似有多样的表征，而实际在主体身上有着共同的本质或者说是主体心灵的一种“综合征”的体现。^②与让内强调心理的自动作用是基于主体心灵的“能力缺失”或“精神衰弱”不同，克莱朗博尔强调自动作用有着体质方面的原因，其所谓的“综合征”其实就是一种体质结构。拉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他的老师的体质论解释，但他用一个带有现象学意义的“结构”概念取代了老师的“综合征”的概念，

① 实际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痴”，属于歇斯底里的一种，患者一般多为女性甚至单指女性，其症状主要是相信某个名人或所敬慕的某个人对自己爱得发狂。

② 有关克莱朗博尔的精神自动作用的综合征理论，可参见 Marshall Needleman Arminator, *Lacan and the Ghosts of Modernity: Masculinity, Tradition, an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pp. 34-39,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这表明他对体质论持有某种保留，他想用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来冲淡“综合征”概念中过重的心理学色彩，虽然他并未明确地把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

克莱朗博尔为人保守而且多疑，拉康知道自己在两位老师之间采取的骑墙态度可能会引起其中一位的不快，所以他在文中对克莱朗博尔的理论公开表示了赞赏，并直引了后者的观点。但是，也许是出于对克莱朗博尔为人的了解，拉康在一处引文的下面加了一个有点奇怪脚注：“这个形象借自我们的导师德·克莱朗博尔先生的口头教诲，我们的主题和方法有许多都可归功于他，因此，为了避免被指控剽窃，我们的确应该承认他是我们所运用的所有术语的源泉。”这样表达敬意确实让人不太舒服。果不其然，文章发表后，克莱朗博尔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发难，把拉康发表的一堆文章扔在拉康面前，当众指控他剽窃，据拉康的朋友、那个以研究精神病学史著称的史学家亨利·艾伦伯格回忆，拉康表现得出奇的沉着，先对老师恭维了一番，然后告诉说剽窃的人正是老师自己。^①这场争吵使拉康在圈内一时暴得声名，从此他将脱离老师的轨道，摸索自己新的学术道路。至于克莱朗博尔，这个对物恋和镜前凝视一直抱有浓厚兴趣的精神病学家于1934年因精神分裂在自己家中面对着一面镜子饮弹自尽。

《妄想性精神病的结构》发表的时间比《启示性书写：分裂书写》要早几个月——后者发表于11月——同一年发表的这两篇作品显示了拉康早期思想的某些迹象，如鲁迪奈斯科所说：

如果我们把“启示性书写”同几个月前在《巴黎医院周报》发表的作品作一比较，就能发现，拉康对当时精神病学中的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他把妄想症结构的概念同一种体质论的精神病观点联系在一起，认定有一种正常存在，并认定必须对背离正常的倾向加以压制。另一方面，他又服膺这样一个观念，即疯癫可比作一种半是“装疯卖傻”半是有意为之的语言创造行为。这是一对奇特的矛盾：从克莱朗博尔的教诲和他自己对法国及德国古典作家的阅读中，他汲取了结构的观念，虽然这意味着要保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25.

留体质的概念；从动力精神病学的思考中，他获取了对疯癫语言的研究，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抛弃体质论。^①

在《妄想性精神病的结构》一文中，拉康多次提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但都是一笔带过，精神分析学虽然进入了他的视野，但似乎还处在阅读阶段。可紧接着在第二年即1932年，他就从阅读转向了运用。在这一年，他翻译了弗洛伊德写于1922年的一篇论文《嫉妒、妄想症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并发表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刊《法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照例是强调了幻想与力比多或者说性驱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恋都是受到压抑的性驱力经由无意识的运作而投注到外部对象上的结果。当然，拉康对这篇作品的兴趣主要还在于其对妄想症机制的解释上，这一解释的影响将在他同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有所体现。

上面的叙述已经让我们看到，1931年对于拉康的学术经历来说是颇为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他继续和同事合作发表病例报告，但病例评述已经开始从前几年的神经精神病学的传统逐渐转向动力精神病学的思考；同年他还独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精神病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对妄想症结构的分析可看作是他对传统的一次回视或整理，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告别礼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且很快地，这一阅读将引发他向弗洛伊德主义的靠拢，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一阅读看作是他完成思想皈依的一个仪式性开端；同样是在这一年，我们前面提到过，他出席了“法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这次出席也许得力于他在圣安娜医院的指导老师、拉福格的支持者克劳德的推荐，虽然在整个会议议程中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他对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皮雄。除上面说的这些以外，这一年还有两个事件对于拉康来说意义非凡：一是他与超现实主义圈子的密切接触，再就是他对埃梅病例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拉康早期的学术思考才得以迈出有意义的一步，或者说，他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早期经历因此而有了一个精彩的谢幕。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27.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 20 年代初，拉康就在莫尼埃书店与超现实主义圈子建立了联系，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联系是如何继续下去的，或者是不是一度有所中断。但是，到 30 年代初，这一联系明显地密切起来，对“分裂书写”的临床研究显然唤起了拉康对疯癫的文字的热情，先锋的文学写作与妄想症之间突然在一条清晰可见的心理结构线中合流了。这是一个契机，是引发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地形图的结构变化的契机，拉康适逢其时，并且抓住了这个契机。

触发这一契机的是一个真正的妄想症艺术家。1930 年 7 月，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创办了一份新的超现实主义杂志：《服务于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从这个刊名可以看到其浓重的苏俄主义色彩，是的，此时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他们不仅要作文学的革命者，也要作政治的革命者，要以更加具体地介入现实的形式来解决人类的矛盾，尤其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对应，写作形式也当有所改变，“自动书写”因其过分专注于书写者自身的下意识而遭到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具有现实的介入色彩的妄想症写作。而给这一写作形式提供理论论证的是来自西班牙的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

达利有一句名言：“我谵妄，故我存在；同样，我存在，故我谵妄。”这个自称为妄想狂的艺术家穷其一生似乎都是在为妄想症的诗学价值做神圣的见证，他在 1929 年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并立即成为这个素以狂妄自大著称的圈子的宠儿。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利的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才得以在其历史的新阶段迈出实质性的一步。1930 年 7 月，在《服务于革命的超现实主义》第一期上，达利发表了一篇短文《腐烂的驴子》，其中着重阐述了他所谓的“妄想症批评”（paranoia-criticism）的观念。达利称妄想症乃是以前的那种消极的自动作用和幻觉的积极对等物，因为它可以把一种解释性的结构强加给现实，或者说它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妄想性解释，而现实又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一解释行为的真实性；妄想症不同于单纯的幻觉，它是通过一种连贯的逻辑批判方法来维系自身的，所以它具有一种现象学的向度，能够生产出双重形象，“通过一种全然妄想症式的过程，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双重形象，亦即对某一对象的再现（没有一丝解剖学的或形象的歪

曲)同时就是对另一完全不同的对象的再现,这一再现同样不会有任何的变形或异常来显示出可能有的任何安排”^①。为了说明这所谓的“双重形象”,达利举例说,在绘画中,一匹马的形象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形象。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此我们要知道,达利所讲的“现实”其实是无意识中的现实,在他看来,外部现实不过是无意识的表征,或者说是妄想症过程的一种建构物,妄想之于现实的关系不是病态的扭曲,相反,妄想是对现实的一种连贯的、谵妄性的解释,是对现实的“系统化”,他把这种过程称为“妄想症批评”。所以,形象的所谓“真实性”不是来自形象与外部现实的一致,而是来自妄想对现实素材的某种有秩序的综合与再现,例如一匹马或一个女人的形象,在日常意识中它们是没有联系的两个孤立的形象,但在绘画中,艺术家可以通过将它们综合为一个“双重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幻想的“真实”,这一“真实”遵循的是不同于日常意识的另一种逻辑,换句话说,在这里,马与女人之间有着一种置换关系,这一关系在现实世界中是被压抑、被遮蔽的,只有通过妄想症式的阐释,才可以揭示出两者之间那隐秘的结构秩序。鲁迪奈斯科评论说,达利的这一双重形象的观点将使古典精神病学的理性主义精神病概念归于无效,因为依据那一概念,妄想症被说成是判断“错误”和理性的“疯癫”,而依据达利的观点,妄想乃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妄想症对现实的知觉乃是对现实的一种象征性的重新秩序化,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并且它依赖的不是歇斯底里式的变形,而是系统化的“逻辑”^②。据此言之,疯癫者不再是丧失了理性的人,而是使梦想获得客观性的先知。

拉康大约是在1929年与达利相识的,1930年读到达利的文章后,他给达利打电话相约就妄想症的问题作一次面对面的交流。画家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这个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作为一种挑衅,他在鼻子上粘了一个橡皮条,意图给来访者制造一点惊讶。可拉康不为所动,两人就达利的思想作了一番交谈。”^③两人还约定今后将定期作这样的专业交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31。

② *Ibid.*, p. 31.

③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110.

流，当然这只是个“约定”而已，不过1931—1932年拉康在准备其博士论文时的确与达利有过多次这样的约见。

单就思想的层面说，拉康与达利之间其实有着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表面上看，正是对妄想症的共同兴趣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各自领域的不同使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需要或者说所缺乏的东西：拉康从达利的妄想症批评中找到了把他带出精神病学领域狭隘的专业性的诗性之光，而达利则从拉康这个精神病学家的“科学”证词中找到了定义他内心的地狱之火的知性拐杖。对于30年代初的拉康而言，正是与达利之间的那种妄想症式的对话，精神病学的临床经验、弗洛伊德的教诲以及妄想症的分裂书写才得以被会聚到一起，为他的第一次炼金术实验提供了必需的素材，正如大卫·梅西在为《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英译本所写的导言中说的：“如果说有一个因素使拉康走向了同他所受训练的精神病学——它仍然依据体质论在思考，且仍然把退化看作一个诊断范畴来使用——的决裂，那可能就是与超现实主义的邂逅。”^①至于达利，他很快就会从拉康那里获得他意想不到的回赠，让他的妄想症批评因为“科学”的证言而变得更具野性的力量，达利在其自传《难以言说的自白》中这样说道：

早在1933年之前，在我读到雅克·拉康那篇令人钦佩的文章《论妄想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时，我完全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拉康对使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感到晦涩难懂的一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启示，凸现了“妄想症”一说的真正的重要性。在拉康之前，精神病学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它认为这种偏执妄想的系统化是基于已存在的事实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且这种现象被当作一例“推理过程的疯狂”的案例来加以考虑。但拉康却认为恰恰相反，这种精神极度兴奋的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化的过程，它生来就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活跃的因素，注定要引导现实世界环绕在它的力量线周围。^②

^①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Introduction", p. XV.

^② 达利：《疯狂的眼球：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引文中个别术语有改动，王光林等译，1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达利的“妄想症批评”就像是一把野火，把传统精神病学在正常与变态、现实与幻想之间人为建立的分界线焚毁殆尽，妄想症作为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谵妄式的阐释过程而被赋予了诗性的意义和形式，拉康立即领会到了这一理论所隐含的巨大力量，他要把它引入到精神病学的研究中，来重构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妄想症理论。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的出场直接给这个综合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或者说，正是通过这个人物的出场，拉康为自己的综合找到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和可行的切入点。

1931年4月10日，巴黎的圣乔治剧院将在晚上继续其《万事大吉》一剧的演出，深受巴黎人喜爱的女演员于盖特·迪弗洛斯（Huguette Duflos）——拉康在论文中称她为“Z夫人”——出演该剧的女主角。晚上8点，迪弗洛斯来到剧场，刚要通过演员专用入口，一名陌生女子上来问道：“您就是Z夫人吗？”这名女子穿戴整洁，言谈举止自然平和，所以Z夫人没有任何猜疑——她早已习惯了追星族“想要接近偶像的那种谄媚之举”——明确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就在她要离开的时候——拉康叙述说——“那个陌生女子神情突变，迅速从提包里取出一把打开的水果刀，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向她挥臂砍去。为了挡住这一击，Z夫人赤手抓住了刀刃，她的两根手指的筋脉被割断。这时两名助手上来制住了行凶者。”^①

这个行凶者38岁，拉康在论文中称她为“埃梅”（Aimée），她的真名叫马格利特·庞泰恩（Marguerite Pantaine）。袭击发生后，马格利特被押送到警局，不久被关进了一个女子监狱，在那里，她陷入一种妄想状态，且持续了三周之久。迪弗洛斯没有起诉她。1931年6月3日，埃梅被送到圣安娜医院，法医在鉴定报告上写着，她患有“基于解释性妄想的系统性迫害狂，且伴有夸大狂倾向和色情狂气质”。

在陷入妄想的期间，马格利特反复地说着她有多么憎恨那个女明星，因为多年来后者与文坛的一位男性作家共谋嘲笑她，威胁她和她儿子的生命安全，她还指控那位作家在其多部小说中影射她的私生活。面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马格利特要求他们帮着纠正公众对她的不良看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p. 112—113.

法，因为那会影响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前程”；她甚至写信给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为自己所受的迫害鸣冤叫屈，请求亲王来解救她。但在三周后，这一妄想状态突然消失了，她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称迪弗洛斯并没有想伤害她，也没有人要迫害她。她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马格利特被送到圣安娜医院后，拉康接手了对她的诊治，并立即对这个病例产生了兴趣。6月底，拉康以典型的克莱朗博尔式的风格——简洁、准确但却枯燥，理性、冷静但却冷血——出具了一份诊断书：“妄想性精神病。最近的妄想在于预谋的刺杀行为中达到高潮。那次袭击后强迫症明显有所缓解。梦一般的状态。解释富有意义、广泛而且集中，大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观念：威胁她的儿子。情感贯注：她对她儿子的责任。因焦虑而挑起了多个冲动：想接近一个作家和她未来的受害者。急切想要写作。成果曾寄给英国王室。好争论或者说有乡村野性。咖啡因依赖。饮食不规律，等等。”^①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拉康对马格利特不断进行诊视。在诊视中，他发现，这个女人也是一个作家，写有多部作品，这又是一个“分裂书写”吗？妄想症与这一书写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拉康调查了马格利特的整个生活史，尤其是她的童年史和婚姻史，他不仅翻阅她的作品和照片，甚至阅读这个病人读过的书籍以便从中寻找其人格生活的蛛丝马迹。在研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超现实主义的妄想症写作的观念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传统精神病学的妄想症范畴不断溢出其固有的范围，一个以非精神病学的方式建构出来的家庭罗曼司，被放置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话语中加以阐释，曾经的对妄想症的病理学描述转而成为一种传奇式的叙说所取代，妄想症动机的无意识意义成为一系列阐释的目标。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说：“到这位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完成其出色的研究时，他通过借用那个女人的遭际并将其变成一个‘病例’，不仅勾勒出了其有关女性疯癫的理论，而且勾勒出了他自己的幻想和家庭执念（family obsessions）。”^②

总之，1931年的一系列邂逅最后通过一个病例会合到一起，成就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34.

② *Ibid.*, pp. 34-35.

了年轻的拉康，到 1932 年，他将作为一名出色的精神病学家登台亮相，可这个出场同时也是他向传统精神病学的告别礼。

第二节 自罚性妄想

1932 年 9 月 7 日下午，拉康在巴黎医学院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为《论妄想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圣安娜医院的那个绝对权威亨利·克劳德。

在这篇论文中，拉康以三十三例妄想症临床病例为研究素材，探讨了造成妄想性精神病的病因机制，尤其是暗藏于人格内部的各种无意识因素的作用。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对马格利特或者说埃梅病例的分析，这一分析占据了整个论文的大半篇幅。

拉康首先回顾了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德、法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尤其是妄想性精神病的界定，其中既讨论了德国精神病学家艾米尔·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在《精神病学纲要》第 6 版（1899 年）一书中有关“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躁狂抑郁性疾病”（*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著名分类体系，也讨论了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的老师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用以取代克雷丕林的“早发性痴呆”一词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概念，还有动力精神病学家让内的“能力缺失”理论、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格·宾斯万格的精神病现象学观念和德国哲学家及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过程”理论等等。这些讨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对精神病尤其是妄想症的界定。在拉康看来，传统就这一疾病究竟是体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而引发的争论，不仅于问题的解决无益，反而使问题本身陷入了混乱，以至于妄想症至今在精神病学的研究中仍是一块黑暗的大陆。拉康强调，对于精神病现象，我们不能仅仅从症状表征上去描述，而是应从“可理解性”的角度全盘考量患者的生活史，尤其是童年经历和性生活史，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其妄想症的结构进行描述和解释。显然，拉康的这一研究是要把临床观察、医学探究和心理学考察结合在一起，以免落入传统

依据某一形而上学的假定来构想精神病病因的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拉康在界定妄想症时，有两个哲学家的思想给了他方法论的启示：一个是引领他走上无神论道路的斯宾诺莎，另一个便是雅斯贝尔斯。

论文一开篇，拉康便引述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的一个命题作为题记：“只要这一个个体的本质与那一个个体的本质不同，那么这一个个体的情感与那一个个体的情感便不相同。”^① 到论文结尾，拉康又回到这个命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翻译和评论。这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拉康想要把他的论文整个地置于斯宾诺莎的庇护之下，仿佛他整个理论的提出都来自斯宾诺莎的启发，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说，拉康实际上是把斯宾诺莎的哲学看作“唯一能对人格科学做出说明”的哲学。^②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拉康给予斯宾诺莎如此的地位呢？鲁迪奈斯科说，是斯宾诺莎的“平行论”（parallelism）观念。这一观念最明确的表述在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的“命题七”中：“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③ 斯宾诺莎的这个观点是为解释心身的统一而提出的。针对近代认识论哲学——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二元论观念，斯宾诺莎主张，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这实体既非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亦非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而是神或自然；神具有无限的属性，而为人所清楚认识的只有两种，即思想和广延，因为前者，万物才赋有心灵，才有所谓的精神世界，因为后者，万物才具有形体，才有所谓的物质世界；神和属性表现为样式，思想属性的样式可以统称为观念，广延属性的样式可以统称为事物；因而，观念和事物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两者之间既相互平行又相互一致。“所以无论我们借广延这一属性，或者借思想这一属性，或者借任何别的属性来认识自然，我们总会发现同一的因果次序或同一的因果联系，换言之，我们在每一观点下，总是会发现同样的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②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52. 实际上，在拉康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当中，有一股斯宾诺莎主义的思潮，虽然拉康的斯宾诺莎主义与这个思潮没有直接关系，但至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时代的契合。

③ 斯宾诺莎：《伦理学》，49页。

事物连续。”^① 且不说这种平行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有没有什么问题，仅就其自身而言，它本来与精神病学无关，但对于拉康来说，它正好可以用来抵抗法国精神病学界所流行的另一种平行论观念，那就是遗传—退化学派的主导观念，其所谓的平行其实指的是身体现象与心理事实之间的一种决定论关系，就是说，只要神经系统出现了生理的或器质性的病变，就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心理症状。而按照斯宾诺莎的平行论，身体和心灵乃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决定论关系，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同一或平行关系，拉康正是依此来界定他的人格学说的，他在论文中说道，人格“不是神经过程的平行物，甚至也不是个体的躯体过程的平行物，而是由个体和他或她自身的环境所构成的一个总体的平行物。而且必须把这一平行论概念看作是唯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如果我们记得这便是它的原始形式，是斯宾诺莎在教诲中第一个给出了它的表达”^②。

人格是一个由个体及其环境构成的复杂的总体，心理现象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这一斯宾诺莎式的观念将使精神病学中的体质论传统——它就是基于那种决定论的平行论——彻底归于无效，妄想症这一最常见的疯癫形式将不再看作是能力缺乏的现象，而是看作不同于所谓的正常人格的另一种精神状态，拉康称之为“不协调”（discordance）。有意思的是，对于已经有人在精神病学中使用过的这一概念，拉康非要以一种过度阐释的方式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这就是他对作为题记的那个命题的重新翻译。斯宾诺莎的原文为：“Quilibet unius cujusque individui affectus ab affectu alterius tantum discrepat, quantum essentia unius ab essentia alterius differt.”（只要这一个个体的本质与那一个个体的本质不同，那么这一个个体的情感与那一个个体的情感便不相同。）在此，斯宾诺莎使用了两个词：discrepat（不一致）和 differt（不同），可以往的法语译者——跟我们所见的汉语译文一样——在翻译时用的是同一个词：différer，拉康为更准确地传达斯宾诺莎的原意，把第一个词改译为“discordance”（不一致、不协调）。鲁迪奈斯科说，拉康这么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50页。

②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53。

做是为了从精神病学中借用这个词来修正它的含义，然后再把它引入依据斯宾诺莎的平行论所提出的那一疯癫观念的语境中，拉康说：

我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是，一方面是某一精神病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冲突、意向性的症状及冲动性的反应，另一方面是界定正常人格的发展、观念结构及社会张力的理解性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一不协调的比例则是由主体情感的历史来决定的。^①

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病态”情感与“正常”情感，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本质，并不存在说某些情感是“病态”，另一些情感是“正常”，任何一个主体的身上都存在着情感的不协调，只是其比例不同而已，这种不协调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的分裂”。我们当然不能说是斯宾诺莎的平行论直接启示了拉康的癫狂观——这一启示主要地是来自达利的妄想症批评——斯宾诺莎提供的是对癫狂或妄想症的某种方法论说明，通过把平行论与癫狂的人类学意义嫁接到一起，拉康不仅清除了传统精神病学的体质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向弗洛伊德的道路。

通过借用斯宾诺莎的平行论，人格被看作是一个由个体及其环境构成的复杂总体，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去认识这个总体的复杂性？或者说如何去解释构成总体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拉康在此引入了德国著名的存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过程”理论。

雅斯贝尔斯对 20 世纪精神病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综合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集现象学的描述、心理学的理解和因果说明于一体的精神病理学的方法论体系^②，他写于 1913 年的《普通精神病理学》1928 年被译成法文出版，当时在法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曾引起轰动。在这本书中，为了对精神病理学做出科学的描述，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方法论原则，即“解释”和“理解”：“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解释。只要外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54.

^② 有关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学理论，参见萨尼尔：《雅斯贝尔斯》，95～111 页（张继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亦可参见梦海的论文：《描述·说明·理解：卡尔·雅斯贝尔斯与精神病学新方法》（载《福建论坛》，2006（12））。

在于意识的事件被当作外在于心理的事件，解释的对象就外在于意识的事件中，解释者本人也就置身在外在于心理的事件中。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因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① 雅斯贝尔斯把前者称为“原因的科学”（sciences of causation）或“说明的心理学”，而把后者称为“意义的实践”（practices of meaning）或“理解的心理学”。雅斯贝尔斯指出，在理解的情形中，每个状态都有赖于前一状态，如爱人受到欺骗后的嫉妒反应，学生考试失利后的沮丧反应，所以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来领悟到“人格的发展”及主体的心理状态。但由于理解是基于一种主观的心理学，常常会受到局限，因此，当人格发展中出现了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时，就需要借助于解释，需要借助于与理解的逻辑有所不同的另一种逻辑。例如，某个陷入幻觉的人听到声音，一个妄想症患者想象的迫害，这些都属于不可理解的领域，但不可理解并不等于不可解释，“过程”的概念就可以用来对那看似没有意义的妄想做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能对一个人进行这样的考察，即根据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于是雅斯贝尔斯谈到去发展“某方面的性格”。这样，在迄今为止的生命发展中突然出现了可以逐步改变心灵活动这种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被“嫁接”到性格上，雅斯贝尔斯把这种“嫁接”称为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解释。^②

可见，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过程”是一个方法论范畴，其目标就是去对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因素做出科学的解释。拉康发现，这一概念对建构人格科学十分有用，它有助于我们去建构主体的生活史，以探求主体精神状态的变化。

拉康把“人格”理解为使主体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精神综合”（psychic synthesis）能力，他认为，人格通常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① 萨尼尔：《雅斯贝尔斯》，102页。

^② 同上书，104~105页。

“生平经历” (biographical development), 即主体对自身经历的反应方式; “自我观念” (self-concept), 即主体把自身的形象导入意识的方式; 以及“社会关系的张力” (tension of social relations), 即主体在他人那里留下印象的方式。^① 这一界定的重要性在于, 它表明拉康已经从主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来思考人格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人格具有一种把各个“现象学的”精神因素组织起来的特殊功能。依据这一人格理论, 拉康认识到, 妄想症和精神病的病因与主体同世界的关系的具体历史有关, 这显然已经抛弃了他的老师克莱朗博尔的心理自动作用综合征的概念, 因为这一概念强调精神病的谵妄特征与人格没有直接联系, 而可能具有某种体质方面的原因。

回到前面讲过的埃梅的病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具有现象学色彩的精神病学的方法, 既然个体生活中的许多传记事件将对主体人格的综合能力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 精神病学家的第一步就是要通过尽可能完备地收集、整理、描绘病人的生平材料, 来重建病人的生活史。拉康通过一年多的访谈、调查和阅读, 最后给我们描绘出了那个名叫马格利特的病人即埃梅的生活史。

马格利特·庞泰恩 1892 年出生于莫里亚克 (Mauriac) 的一个农民家庭, 她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她其实是袭用了她最大的姐姐的名字, 这个姐姐在埃梅出生前两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 所以埃梅出生后, 她的父母把大女儿的名字给了她。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 达利也有着与此完全相同的“经历”, 并视这一由父母强加的“经历”为他生命中原始的创伤性事件: “我还没有开始生活, 就已经经历了死亡。……在母亲的子宫里, 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 [指父母。——引者注] 的痛苦。……我深深地感觉到哥哥的永恒存在, 这既是一种创伤——它带来了一种感情疏远, 也是一种不如他的意识。因此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赢回我生命的权利。”^② 达利的这番话就像是对自己的“诞生创伤”做的一个精神分析, 这一分析的灵感是来自拉康的埃梅研究吗?

马格利特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她的母亲有点神经过敏, 自己内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45.

^② 达利:《疯狂的眼球: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6 页。

心的焦虑常常会变成对他人的猜疑，如果邻居说一只生病的动物会死，她就会觉得这个邻居要毒死她。马格利特小时候深得母亲欢心，这让她的姐姐们尤其是大姐（大马格利特活着的时候，她排行老二，但对小马格利特来说，她当然是大姐）很嫉妒。她的大姐 14 岁的时候到乡下叔叔开的杂货店打工，后来就嫁给了那个叔叔。马格利特 18 岁的时候搬到已婚的姐姐那里一起生活，不久被当地的一个浪荡子勾引失身，在离开乡下之后，她仍然很想念这个男人，常常给他写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格利特搬到一个叫默伦（Melun）的地方的邮局工作，在那里她与一个名叫 C 小姐的女同事发生了恋情，这个女人——拉康称她是一个“老练的阴谋家”——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只好靠工作来维持生计，虽然她根本瞧不起这份工作。这个 C 小姐在同事中是时尚权威，正是从她那里，马格利特知道了女明星于盖特·迪弗洛斯的的名字，也是从她那里，马格利特对那种贵族式的优雅生活有了许多了解。可以说，在这个时候，马格利特把这个“阴谋家”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后者对她发挥着一种类似于催眠暗示的作用，她开始梦想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那里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理念、男子气的力量和罗曼司”^①。马格利特与这个 C 小姐的同性恋关系维系了很多年，在这期间马格利特也与邮局的一个男同事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协调，她丈夫为人刻板，不喜欢马格利特的散漫任性，尤其不能忍受马格利特不做家务，把时间花在看书和学外语上。而她则抱怨丈夫对她不关心。双方不断地相互指责。不久，马格利特开始出现奇怪的行为：无缘无故笑个不停，走路时会间歇性地加快脚步，还有强迫性的洗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她大姐的丈夫去世了，大姐于是搬来和马格利特夫妇住在了一起，操持马格利特的家务。马格利特越来越疏远她的丈夫，也无力与自己的病态倾向做斗争。虽然她对姐姐的侵入和不断批评感到不满，但她任由姐姐支配，就像当初她顺从于那个阴谋家偶像一样。

1921 年，马格利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幸福”，而是引发了她的迫害妄想，并伴随有轻微的抑郁症状。拉康描述说，她同事的谈话，她觉得都是针对她，觉得他们是在批评她、嘲笑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36.

她、预言她的不幸。连读报纸都要在上面标出她觉得对她有敌意的地方。随着胎儿一天天长大，这种妄想越来越严重，晚上的噩梦也会让她增加白天的迫害妄想。第二年她产下了一个死婴，她把这归罪于她的敌人。当她以前的那个偶像即那个C小姐打电话来问候她的时候，她坚持要对方对这次意外事故负责。不过，马格利特很快又怀孕了，孩子在1923年顺利出生，是一个男孩，她全心扑在孩子身上，不准别人接近他。为了不让有毒的空气接触到孩子，她甚至在孩子身上裹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马格利特总想当一个作家，为此她甚至想到美国去发展，她的姐姐和丈夫极力劝阻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那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环境里，她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夸大妄想。但这次为期六个月的治疗并没有使妄想完全消失。1925年，马格利特离开家只身来到了巴黎，为的是追查那些她认为会毁掉她儿子的人。

在巴黎，她找了一份工作，仍是在邮局上班，从此她开始了一种奇异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邮局的日常世界，在那里，她多多少少要适应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由梦想和谵妄所构成的想象性的生活。她白天工作，晚上她就像是一个文化人，听讲座、上图书馆、泡咖啡厅。在这一双重生活中，她的妄想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她听人说到迪弗洛斯的名字，她记起自己曾说过她的坏话，确信这个女人要迫害她。看到报纸上不断有这个名演员的新闻，她十分愤懑，认为报纸关注过度了。除了迪弗洛斯，马格利特幻想中的迫害者还有其他名人，其中包括另一位女演员和一位男性作家。她还把威尔士亲王当作她的性幻想对象，给他寄去她的诗作和匿名信，要求他的保护，提醒他要警惕报纸上用革命和“斜体字”暗示出的攻击他的文字。

1930年，马格利特连着写了两部小说，都是献给威尔士亲王的。两部小说的故事差不多相同，都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一种卢梭式的理想化赞美和对城市的堕落的憎恨，其中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埃梅”，她代表着乡村的形象。马格利特把两部小说打印出来给了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够出版，但遭到拒绝。她跑到出版社去大闹了一场，骂那些编辑是杀人犯。从此她的迫害妄想转变成了报复的欲望，结果便是她在剧场所实施的那次袭击。

拉康重建的这个生活史读起来就像是一篇虚构故事，对一个病例进行这种现象学式的传记体叙述，而不再是按照传统精神病学临床报告的风格做客观记录，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决裂的姿态，而他对病例的分析更加表明，他已经从精神病学的领域走向了精神分析学的领域，虽然技术上还不完全是精神分析的，但他使用的术语却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并且，在分析中，拉康采用了马格利特小说中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称马格利特为“埃梅”——对于马格利特来说，这又是一次旧名的袭用，是她的“诞生创伤”的又一次强制性重复。

那么，在这个病例中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不同的学科领域或者说不不同的学科派别对此肯定会有不同的回答或解释，因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换个问法可能更确切一些：在1932年的拉康眼里，这个妄想症的病例彰显了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拉康的回答是：它关涉着妄想症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弗洛伊德所讲的自我理想（ego-ideal）的认同，也就是妄想症与人格的关系。依前面所述，主体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生活史，尤其是其童年史和其性生活的历史，正是那些原初的传记事件影响了主体人格的动力结构，影响了主体的自我认知方式和主体应对社会环境的方式。在埃梅的生活史中，袭用已故的姐姐的名字成为结构其自我认同的一个原初场景，她成为一个缺失的东西的替代，这一方面唤起了自我对某个理想形象的欲望，可另一方面其替代的身份使得这个理想的自我的位置总是为一个他人所占据。为摆脱这一困境，她只能不停地去寻求自我的确认，可每一次，这个寻求都只是把她引向另一个他人，就这样，自我理想的认同构成了埃梅人格发展中动力性的心理过程。“她为了把自己确认为自己，为了自己作为真正的自己生存下去，强烈要求向外部对象寻求确定自己形象的基础。埃梅先向占据着自己的中心位置的母亲，而后是向与母亲的形象重叠的阶级，然后是向C小姐、Z夫人寻求。对埃梅来说，她们是埃梅使自己作为自己来加以认知，并把统一完整的形象返投给她的、如镜中之像一般的人物。”^①由此可以理解，埃梅为什么常常会被社会名流所吸引，因为他们代表着她

^①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锋、李濯凡译，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的自我理想，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社会地位、他们的奢华生活和优雅外表，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注度，在埃梅的内心里幻化为一个完整的形象，令她痴迷，且欣然地与之认同。

既然如此，那埃梅为什么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去攻击这些理想形象呢？这里涉及主体认同的一种辩证法：埃梅虽然从对外部形象的欣然认同中获得了肯定性的情感，或者说她虽然在这些理想的形象中体验到了自己，可这终究是他人的形象，因此，对他人形象的认同无异于是让自己受缚于他人，换句话说，那令埃梅获得肯定性的情感和统一的自我的他人认同，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对她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的剥夺，这构成了埃梅自我认同过程的一个悖论。可仅凭这个悖论并不足以导致对理想形象的攻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他人认同，甚至若是没有这样的认同，我们就无法成其为自身，而我们之所以能成其为自身并不是靠着对所认同的他人形象的攻击，因而，从认同于某个理想形象转向攻击这个形象，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的作用，按照拉康的人格理论，那就是“社会关系的张力”或者说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埃梅生活史中受挫的那一面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她的被骗失身、她的失败的婚姻、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死产、她的作家梦的破灭，还有她与C小姐之间的关系、她姐姐对她的家庭生活的介入以及她对威尔士亲王的性爱想象，这些只是埃梅生活史中的一些偶然性事件，但在埃梅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它们成为了强化那一认同悖论的因素，即她通过妄想症的结构形式把这些挫折投射到自己所认同的理想形象的身上，把理想形象置于外部，置于可憎的掠夺者的位置，并从内心里不断强化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这一紧张关系，“这样一来，埃梅反而令人目眩地演出了一场与外部的他者激烈争夺理想形象的战斗，结果与其本意相反，她被卷入憎恨与嫉妒的旋涡”^①。

最后，埃梅的这一攻击对于渴望成为自身的埃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拉康的解释是：通过攻击女明星，埃梅是在攻击她自己的理想。埃梅通过将理想形象投射到外部，使其扮演迫害者的角色，然后对其施以猛烈的攻击，这样，“她就回避了面对自己悲惨的

^①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31~32页。

现实，否认了现实的对象，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理想形象”^①。但是，拉康接着说：

她攻击的对象纯粹只有一种象征价值，那一行动根本不会使她得到任何缓解。不过，通过那一击——这使她成为法律眼中的罪犯——埃梅也攻击了她自己，这带给她一种欲望实现的满足，妄想消失了，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在我看来，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②

正是基于这样一点，拉康认为埃梅的妄想症是一种“自罚妄想症”(self-punishment paranoia)，她攻击的是她自己，她是以此来对自己施以惩罚，以便保护自己的理想形象，因而，埃梅的攻击意味着她已经把对满足的妄想性需求变成了一种自我惩罚的妄想。拉康认为，迫害妄想症的这种解决机制是极其普遍的，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真正的原型或者说一个“新的类目”加入精神病的分类系统中。

“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拉康的这个论断意味深长。既然疾病的本质是由痊愈的本质来揭示的，那就表明，精神病不只有一个原因，也不只有一个本质，因为痊愈的本质取决于患者个体的人格结构，取决于影响人格结构的各种因素“不一致”的状态。依据这样一个认识，拉康抛弃了传统精神病学的遗传—退化理论，而认为妄想症或疯癫是多种原因决定的，对此，鲁迪奈斯科评论说：

换言之，疯癫源自一种生活，因而源自某种唯物主义的联系——而且这个唯物主义还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拉康赋予了人格史以特别的重要性：在这一语境中，妄想症是作为一种重新组织的人格、一种转变的自我、一种介于先前处境与疯癫爆发之间的习惯而出现的。至于自罚妄想症，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可以治愈的。如果这一特殊形式的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那为什么不去复活那一伟大的观念，即疯癫本身是可以治愈的，也是可以预防的？^③

①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30页。

②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48。

③ Ibid., p. 48.

拉康的这一立场不仅与传统精神病学家的观点相冲突，而且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析家的观点也不一致。实际上，正如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的，虽然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法国分析家们在对待弗洛伊德的态度上与传统精神病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但其沙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固念仍阻碍着他们对精神分析的运用，他们总是梦想着把精神分析学纳入精神病学的框架，因此在对待精神病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遗传—退化理论。现在，拉康在精神病现象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另一个版本的精神分析学，即以超现实主义圈子为代表的文人渠道所阐释的精神分析学，开启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新篇章。其依据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自我理论对妄想症作的新的阐释，其对妄想症写作和癫狂在人类心灵中所具有的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的强调，还有其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传入法国的两个渠道进行的综合，使得他成为了法国第二代精神分析学家的代言人。

至于拉康 1932 年所做的这个研究本身，埃梅病例在他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无疑具有某种本源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埃梅的身上，拉康发现了一条通向自我、他人、主体、欲望的现象学的幽径。在这一点上，埃梅就像是拉康的一个他者，她就处在源头的位置，不仅以她的妄想症结构映现着拉康的自我之镜，而且以她的自罚式的主体删除预演了他今后那一充满受挫感的欲望之真。鲁迪奈斯科也曾在本源的意义这样定位拉康和埃梅的关系：

如果说克莱朗博尔相对于拉康就如同沙考特相对于弗洛伊德，那么，埃梅相对于拉康就如同弗利斯相对于弗洛伊德。她的作为一个分析师的位置的特殊性就类似于施列伯博士，她之于拉康就如同安娜·O 之于弗洛伊德。在一个大师问世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拉康在自发的自我分析层面得到了历练，这使他不必要真的躺在一个男人的躺椅上了。^①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120. 施列伯 (D. P. Schreber, 1842—1911)，萨克森法官，一个妄想症患者，曾写有《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回忆录》，1910 年，弗洛伊德依据这个回忆录对施列伯的妄想症作过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安娜·O，布洛伊尔的一个歇斯底里女病患的化名，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性欲的意义，因此人们常把这个病例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奠基性案例。

最后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局。有趣的是，埃梅的儿子在50年代初也到拉康那里接受了分析，不过他们相互间在一开始并不了解对方与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渊源。而更具戏剧性的一幕是，50年代，拉康的母亲去世几年后，埃梅居然受雇照顾拉康的父亲，且服侍了十年之久，期间，埃梅多次找拉康要回她的手稿打算拿去出版——那是当初拉康从她那里借走的——可每一次，拉康都插科打诨，支吾了事。最后，一个纯属偶然但却让人觉得不无诡异的结局是，1981年6月，埃梅去世，三个月后，拉康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精神分析家拉康的开场和终局就这样被一个妄想症主体牢牢地圈定在这个宿命般的结构中。

第三节 密涅瓦的猫头鹰

虽然1932年的拉康已经显示出了对超现实主义立场的挪用，但他在论文中并没有提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名字及其作品，更别说引用相关文献，用鲁迪奈斯科的解释，此时的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他不想冒犯他在精神病学界的老师——他们拒绝先锋文人——甚至也不想冒犯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持者。“但是”，鲁迪奈斯科说，“他想错了：向他表示敬意的第一批人恰恰是他掩饰了其重要性的那些人，而诋毁他的第一批人恰恰是他力图去讨好的那些人。”^①

拉康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并未在精神分析学界引起任何反应，《法国精神分析杂志》上没有一篇评论它的文章，就连被拉康视为同道的皮雄也没有对它发表任何意见。至于精神病学界，除了拉康在圣安娜医院的同事兼好友、此时同样默默无闻的亨利·埃伊（Henri Ey, 1900—1977）写过一篇赞美的文字之外，再也没有有什么反响。学界的这种沉默令拉康既感到沮丧也很恼火。而更令他沮丧的是，他给弗洛伊德寄去了一本论文，寻求得到“教主”的确认，1933年1月，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短短的一行字：“谢谢你寄来的论文。”大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年轻人的东西当一回事，拉康就这样从弗洛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56.

伊德的视野中飘然而逝，后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的事业居然就是通过这个巴黎人而获得新生的。

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虽然在圈内遭到权威们的冷遇，但在圈外，拉康的论文却受到推崇。1933年，文学界多位名流接连对拉康的妄想症研究做出回应。第一篇评论来自萨特的朋友、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保罗·尼赞（Paul Nizan, 1905—1940），他于1933年2月10日在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是一篇为申请医学博士学位而作的论文，因此在这里来评论它似乎是很不合适的。但是，这是一本十分值得关注的书。它反对官方主流的科学界，尽管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作者不得不保持谨慎，但它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确定的和有意识的影响。拉康博士还没有阐明他全部的理论立场，但他的确针对当前正在腐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所有研究的各种唯心主义做出了反应。唯物主义终将战胜那些博学的教授们的无知，终将作为科学进步的真正方法而出现。”^①

1933年5月，曾接受过勒内·阿伦迪的分析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勒内·克雷维尔（René Crevel, 1900—1935）在《服务于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拉康是新精神的代言人：他的“唯物主义”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人个体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结合起来。克雷维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也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埃梅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曾写过有关于她的文字，但不是拉康式的临床分析，他把埃梅看作是女性无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叛逆的同性恋者和癔症患者。对于拉康的研究，克雷维尔认为，它破除了旧的精神分析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用一种与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相当的具体分析给精神分析运动带来了新的革命的精神。

还有达利。1933年6月，他在超现实主义的官方杂志《米诺陶》（*Le Minotaure*）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以妄想症批评的方法阐释画家米勒（Millet, 1814—1875）的作品《晚钟》的文字，在讨论妄想症批评的观点时，达利向拉康的论文表示了他的赞词：“由于它的出现，我们可以第一次获得一个完整划一的主体观念，完全摆脱了目前精神病学所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59.

陷入的那种机械论泥潭。”^①

可以见出，在文学圈的这些评论中，拉康既不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也不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反叛英雄受到关注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当时偏向左翼的文人圈子里，拉康的论文激发的是一种革命想象，其对妄想症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做的“科学”考察被看作是“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在科学实践中的伟大运用。所以，当他们用那些革命性的词汇来描述拉康的思想的时候，拉康被打扮成了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青年，而实际上，此时的拉康对这种革命政治并没有什么热情，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学术前程，他甚至也没有想到要以“反叛英雄”的形象作为获取学术声望的赌注，虽然他也很乐于接受超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授予他的这个奉承之辞。

是的，超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奉承似乎给拉康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位自我的镜像。1932年写作论文的时候，拉康的哲学主要地还是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以及他自己所理解的斯宾诺莎哲学，可是到1933年，拉康的笔下居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他果真把先锋艺术家们的奉承之辞当作武装自我的盔甲穿在了身上，以一种非革命的杂拌的方式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统一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名下。可我仍然要强调的是，拉康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是30年代超现实主义意义上的。

1933年，出于跟超现实主义者的友谊，拉康连着在《米诺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第一篇发在创刊号上，紧跟在达利的那篇文章的后面，题目为《风格问题和精神病学有关妄想症经验形式的概念》。从内容上看，该文的观点不过是对埃梅病例中表达的观点的一种概述，但他现在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出现了“理论革命”、“资产阶级文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需要”、“人类学”这类字眼。再者，该文的题目也让我们联想起达利的妄想症思想，因为依据那一思想，妄想症就是一种不同于正常状态的表征现实的活动，是对现实的另样的系统化，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阐释“风格”，拉康在此提出“风格问题”显然是在着意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60.

强调妄想症经验形式的现实阐释特征，是在强化妄想症的人类学意义。虽然他并未对“风格”问题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但他声称他的思想有助于说明“象征主义和艺术风格”。^①

接着，在同年12月出版的《米诺陶》3/4期上，拉康又发表了题为《妄想症犯罪动机——帕品姐妹的犯罪》的论文，对轰动一时的帕品姐妹的案件进行讨论。

1933年2月2日，法国西北部某小镇，两个女佣，27岁的姐姐克里斯蒂和22岁的妹妹莱亚，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她们的女主人及其女儿。这天晚上，女主人因为家里停电而与姐妹俩发生口角，这类磕磕碰碰平常也有出现，但这一次，事件的进展却突然急转直下：姐妹俩将女主人及其女儿打倒在地，活生生地挖出她们的眼珠，接着用铁锤、菜刀等工具砍砸对方的身体，打烂她们的脸部，进而又暴露出她们的阴部，切开她们的大腿，把一个人的血和脑浆涂抹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和阴部。事毕后，姐妹俩认真地清洗她们的手和犯罪工具，脱掉沾满血腥的衣服。按照她们俩后来的供词，事后她们只说了一句话：“该做清洗工作了。”这真是一句与她们的身份极其相符的话！半个小时后，警察赶到现场，姐妹俩蜷缩着靠在同一张床上，身上裹着一件睡衣。她们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说不出犯罪动机。

案情发生后，三位精神病学家对两姐妹进行了检查，专家们的结论是两人神志清醒，应对她们的行为负责。在拘押期间，姐妹俩既没有表现出对被害者的憎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愧疚，相反，两人唯一关心的只是两人共同承担的罪行，“两人以奇妙的相互依恋结为一体”。在分开关押五个月后，姐姐克里斯蒂开始出现异常行为：她试图挖出自己的眼睛，暴露自己的性器官；有时她宣称在来世，她将是她妹妹的丈夫，有时又说她在梦中看到妹妹吊在一棵树上，腿被切断了；当被问到她为什么剥掉女主人的衣服时，她说：“我在寻找使我变得更强大的东西。”至此我们看到了，这对姐妹之间似乎有某种共生的关系。可尽管如此，有一个精神病学家还是坚持说她在装疯卖傻，应该继续待在监狱里。但

^① 金·格兰特：《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王升才译，“注释38”，505页，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是，另一个专家出面为姐妹俩辩护，诊断她们精神不正常，有歇斯底里性的癫痫、性倒错、迫害妄想。

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媒体以各种专题形式进行报道和评论，激进知识分子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正好可以借帕品姐妹的事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个案件也引发了精神病学界的论战，拥护动力精神病学的一方和坚持传统的遗传论与器质论的另一方就姐妹俩的症状及案件的性质进行激烈交锋。

1933年9月29日，法庭上，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相持不下。在公诉人的眼里，帕品姐妹嗜血成性，毫无人道。可在有些人看来，她们是资产阶级残忍性的祭坛上的牺牲品。代表被害者家属的律师当然是坚持姐妹俩应对她们的行为负责，而辩方的律师则引述专家的诊断，坚称姐妹俩患有精神病。法庭上，姐妹俩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做出了一些解释，鲁迪奈斯科描述说：“她们说的话公众根本听不懂，半是方言，半是某种原始语言，因而表达的是某个行为的神秘含义，对于这一行为的意义，就连她们自己也不明白，就这样，罪行在迥异于理性的世界的想象世界中逐渐变得不真实了，但其逻辑却与理性的世界十分接近。”^①

法庭最后以谋杀罪宣判，姐姐被判处死刑，妹妹被判终身监禁。但不久姐姐被改判终身监禁。一年后，克里斯蒂又一次出现妄想症状，她被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三年后她在那里死于精神性消瘦：一种典型的自罚妄想症。她的妹妹在监狱里待了几年后，被释放回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拉康在他的解释中沿袭了埃梅病例中的观点，他依据报章所披露的犯罪细节做出诊断，认为姐妹俩的疾病并非歇斯底里性的癫痫，而是妄想症，并指出只有妄想症能解释帕品姐妹不可思议的行为的动机。拉康证明说，精神错乱的插曲表面上看是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偶然场合爆发的，而实际上，这一插曲对一直“正常”的两姐妹来说有着一种无意识的含义。拉康提出了一个假设：2月2日那个突然断电的夜晚有可能唤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p. 125—126.

起了剧中敌对者已经深陷其中的那种“黑暗”，这就是早就存在于女主持人与佣人之间的“沉默”，这一“沉默”并非毫无意义，尽管“演员”自己意识不到，可它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将映现出主体的现实，从而引发暴力性的攻击。

按照拉康的观点，如果说埃梅攻击的是代表着自己的自我理想的女演员，那么帕品姐妹也是基于同样理由谋杀了她们的主人。她们犯罪的真正动机并不是阶级仇恨，而是妄想症结构，谋杀者通过这一结构来攻击自己内心的主人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帕品姐妹的病例和埃梅的病例有着同样的性质，都属于妄想症，都有自我惩罚的妄想。并且帕品姐妹对待罪行的态度表明她们也有着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她们的封闭的生活使得每一方都构成了另一方的整个世界，正如拉康所说，“她们形成了一个永久封闭的世界。……她们在自己的孤独之岛上找不到其他的任何办法，她们只能靠自己解决心中的谜团，即人类的性欲之谜”^①。这一潜在的倾向最终在谋杀行为中以一种骇人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同拉康的传记作者凯瑟琳·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 1939— ）所解释的：“两姐妹一起找到了她们的快感；她们在谋杀中找到了一种神圣的狂喜形式；在杀害受害者并裸露其性器官之后，她们紧紧相拥在一起。”^②

但是，拉康也意识到这两个病例有不一样的地方，例如帕品姐妹的病例就与埃梅的“包法利主义”和性爱妄想无关，它也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去攻击另一个出了名的女人的故事，它是发生在相互认识多年、且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普通女人之间的一起残酷谋杀。“如果说马格利特·庞泰恩的故事就像是直接取材于法国19世纪小说的伟大传统，那么帕品姐妹的故事似乎让人回想起希腊悲剧，尽管它同时也例证了一个被日益加剧的社会、种族及民族仇恨所撕裂的世界的残酷性。”^③不过拉康证明说，帕品姐妹的故事看似反映了阶级仇恨的社会现实，而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另一个现实，即妄想症的异化现实。所以，这起妄想

① 转引自 Catherine Clément,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Jacques Lacan*, p. 73,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Ibid., p. 73.

③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64.

症犯罪不是由阶级仇恨或施暴者的报复欲望引起的，而是由妄想症结构引起的，两姐妹对自己的主人理想亦即她们的自我理想的攻击遵从的是某个“被异化的现实”的命令。

埃梅和帕品姐妹的案例都涉及精神病犯罪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法国，对于这一司法领域的问题，精神分析学涉入很少，即便有所介入，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拉康的研究固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但至少是一个有意义的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康重回学术界，精神病犯罪问题一度重现他的视野，1950年5月，在一次法语精神分析学家的大会上，他作了题为《精神分析学在犯罪学中的功能的理论导论》的发言，发言中，他再次提到，精神病犯罪是由于对他人的认同受挫，即当认同对象在自我的辩证过程中停顿下来时，就导致了罪行，并再次引用帕品姐妹的案例，认为这一案例表明：“只有分析家能够证明罪犯是与现实相异化的，在这个案例中，流行的俗见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其罪行只是对它的社会语境的一种反应。”^①

前面已经说过，埃梅和帕品姐妹的病例研究既是拉康早期接触到的多个思想源头的一次汇合，也是他后来的思想发展的一个开端。对于这后一点，凯瑟琳·克莱芒从女性之谜的角度做了一个说明，她在《雅克·拉康的生平与传奇》中写道：

在研究女性之谜的早期阶段，拉康来到了两条分叉的道路的十字路口。这两条道路只是在很久之后才重新相互交汇。第一条道路借助于家庭引向了永恒的、没有终止的爱的话语，《会饮篇》中的柏拉图、宫廷式的爱、中世纪的花毯、萨德侯爵以及伊曼纽尔·康德都与这一话语有关。第二条道路更为重要：拉康在帕品姐妹和埃梅所犯的罪行中发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镜像阶段”。在克里斯蒂和莱亚两姐妹的错乱之外，在埃梅为了毁灭的目的而借以认同于她的各种对体的面具之外，拉康窥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阶段在人格构建中的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一个人因为不再跟母亲一样而成其为自身的时刻。拉康在他的妇女研究中最终发现的且此后再也没有抛弃的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16.

一点，那就是过分亲近的危险性，或者说因认同于另一个人而产生的不幸。^①

1933年，拉康除了与超现实主义圈子交往密切以外，还在忙着另一件事。他已经32岁了，该考虑婚姻大事了。拉康并不是一个行为检点的人。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与他父亲的一位女客户发生过性关系。在圣安娜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他又同时与两个女人保持联系：一个名叫玛丽-特烈莎·贝尔热罗（Marie-Thérèse Bergerot），是一个寡妇，比他大十五岁，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喜欢柏拉图；另一个名叫奥雷西亚·西恩基维茨（Olesia Sienkiewicz），比他小三岁，是他的一个作家朋友的妻子。拉康喜欢旅行，并且喜欢带着女伴一起，他曾带着玛丽-特烈莎游览摩洛哥名胜，也曾带着奥雷西亚游览马德里、科西嘉、布列塔尼、诺曼底。他也擅长利用这两个女人对他的感情，他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让奥雷西亚帮他打印手稿，论文交给出版商后，又是玛丽-特烈莎出钱资助印制费用。论文答辩的时候，这两个女人都出席了，好在她们相互并不认识，没有给拉康带来麻烦。

到1933年，拉康已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他开始考虑终身大事了。这年8月，他把奥雷西亚留在巴黎，带着玛丽-特烈莎到西班牙度假两周。期间，他给奥雷西亚写了好几封信，一会儿称奥雷西亚是他最好的“朋友”，但用的却是这个词的阳性形式“ami”，一会儿又承诺幸福即将来临，并献上他最热烈的词汇：滚烫的吻、消魂的时刻、令人窒息的欲望。他请求对方再等他一段时间，他们即将拥有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冬天。可回到巴黎后，他又陷入了矛盾，他不想离开玛丽-特烈莎，而奥雷西亚似乎才是他的最爱。他必须做出抉择。10月底，他给奥雷西亚写了一封信，冬天即将来临，可2个月前的那种热情已经冷却了，他给自己找的借口居然是他有忧郁症倾向，对方更适合找一个有野性激情的男人。维系了四五年的一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女人进入了拉康的生活。她名叫玛丽-露易丝·布隆汀（Marie-Louise Blondin, 1906—1983），出生于巴黎，是拉康的好朋友、外科医生西尔文·布隆汀（Sylvain Blondin, 1901—

^① Catherine Clément,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Jacques Lacan*, p. 76.

1975) 的妹妹，所以拉康与她早就认识。布隆汀是一个美人，女人气十足，有艺术天分，既懂得现代女性的情趣，又恪守古典女性的美德，对爱和家庭持有传统观念。1933 年秋，刚刚“失恋”的拉康突然发现这个女人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而布隆汀因为兄长的影响也对这个才情横溢的学界新秀情有独钟。两人双双坠入爱河，这一次，拉康没有犹豫，立即向布隆汀求婚并获得同意。

1934 年 1 月，拉康和布隆汀在一个罗马式天主教教堂举行了婚礼。是的，他已经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宗教文化。接着他们到意大利度蜜月。蜜月中，拉康觉得对奥雷西亚有一种负疚感，就给她发了一个电报：“挂念你，亲爱的。雅克自罗马。”至于玛丽-特烈莎，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反正她是个寡妇。婚后，拉康夫妇搬到了位于马雷施尔贝斯大道的一套公寓，拉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文人生活。

前面说过，1931 年是拉康早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年，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阅读和与超现实主义圈子的接触，不仅给他正在从事的精神病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而且将把他引入一个全新的学术氛围，到 1933 年，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密切交往，使得他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的专业形象远不及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文人的形象那么醒目。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是把前一种形象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那么从这时候起后一种形象将是他所欣然认同的一个镜像。从 1933 年至 1936 年，拉康的思想明显处在一个潜伏期，这几年，他除了为《法国精神分析杂志》写过几篇短小的评论文字之外，并无重要作品问世。但某种转变也在酝酿之中。

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拉康所运用的哲学话语主要是斯宾诺莎的平行论和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过程”论，到 1933 年为《米诺陶》写稿的时候，他对哲学的兴趣明显增加，他甚至想到索邦大学再拿一个哲学学位，为此他专门跟随一个共产主义者学了四个月，可这个人自己也是一个新手，其哲学知识根本无法满足拉康的求知欲，拉康拜他为“师”可能只是为了通过他结识哲学圈子里的人。

其实，真正把拉康带入哲学圈子的是超现实主义者。在 30 年代初，法国哲学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三 H”（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时代，热情拥抱“三 H”的人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

一代，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当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于1933年至1939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举办的黑格尔讲习班。

科耶夫190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因为被控与同学一起染指黑市而被布尔什维克政权关押，在监狱里他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出狱后，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当局不允许他继续他的学业。1919年，他离开祖国，取道波兰到了德国，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1920年，他在沉思东西方文化时获得了一个启示，他看到佛陀和笛卡儿面对面在一起，就像是对“我思的讽刺”，是非存在对自我本体论的挑战，他称这是他的第一次否定性经验，这一经验让他领悟到了一个道理：“我思，故我不在”。

1928年，科耶夫移居巴黎，同也是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结下了友谊。柯瓦雷早在20年代中期就在向法国人介绍黑格尔，1932年，为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黑格尔1831年逝世），当时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开设“现代欧洲宗教思想史”课程的柯瓦雷专题讲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也是他讲授的内容之一。1933年，在柯瓦雷的推荐下，该讲座由科耶夫接手，从这年夏天一直到1939年5月，科耶夫一共讲授了六期，讲授内容全都是《精神现象学》。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事件，它直接影响了法国40年代以后的整个哲学格局。拉康在布勒东、乔治·巴塔耶等人的鼓动下参加了1934—1935年及1936—1937年的研讨课程。

有关科耶夫的讲课风格，鲁迪奈斯科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虽然科耶夫既无柯瓦雷的哲学天分，也无柯瓦雷作为一个理论家的那种技巧，但他拥有把哲学转变为生动的人类史诗的高超才能。他能把抽象的概念变成丰富多彩的比喻，就像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人物，并能把它同日常现实联系起来。如同演讲者把自己置于苏格拉底或一个雅典将军的位置时一样，黑格尔的思想居然可以跟当代事件完全关联起来。因为当科耶夫讲到精神、自我意识、绝对知识、确认、欲望、满足、不幸意识、主奴辩证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谈论标志着他自己和他的听众的年轻时代的

事件。^①

关于科耶夫的讲座对从萨特、梅洛-庞蒂到布勒东、拉康整整一代法国年轻人的影响，不是我这里所能讨论的，就连具体到对拉康的影响，也需要专题加以论述，因为这一影响不只关涉着黑格尔，还关涉着海德格尔，也不只关涉着某一个或某一些核心概念的挪用，而且关涉着拉康的理论结构和思维方式，关涉着科耶夫所读解出来的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与拉康所读解出来的弗洛伊德之间的相互润饰。相关的这些问题我在后面还会涉及，但有几点细节需要在此提示一下：

第一，虽然拉康在他后来的写作和演讲中很少提及科耶夫的名字，但他在某些场合曾称科耶夫是他的“导师”（master）。要知道，尽管拉康受惠于他人处甚多，但能够自他口中得享“导师”之名的却只有两位，另一位便是克莱朗博尔。1968年6月，科耶夫生命垂危，拉康急忙前往探视，“为的是能得到一本科耶夫亲手加了批注的《精神现象学》”^②，如许的无情之举难道不可以看作是拉康对自己的镜像剩余物的一种神经症式的固持吗？！

第二，1936年7月，科耶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列了一个要与拉康合作完成的写作计划，题目是“黑格尔与弗洛伊德：尝试一种比较阐释”，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自我意识的生成”、“癫狂的起源”、“家庭的本质”，打算发表在柯瓦雷主办的杂志《哲学研究》上。该计划并未完成，科耶夫为第一部分写了六个自然段的“导论”，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与笛卡儿的我思进行了比较，然后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拉康此时正在准备他的会议论文《镜像阶段》，根本就没有进行这个计划。但计划中第二、三部分的主体拉康并未放弃，至少它们在1936—1949年间拉康的思考中将萦绕不去，黑格尔与弗洛伊德的“比较阐释”将是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阐释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如果正是埃梅的病例把拉康引向了（动力）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那么，科耶夫的讲座则把他引向了德国哲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综合。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01.

②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142.

第三，如刚刚所说，科耶夫的黑格尔解读乃是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事件，对于拉康而言，这个重要性不只在它提供了一个富有原创力和再生力的思想资源，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院正统的教学技术和一种有关经典文本的阅读技术。20 年之后，当拉康在圣安娜医院主持他的弗洛伊德研讨班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一个镜像式的重复吗？如同科耶夫以他那终结论的腔调塑造了一代法国哲学才俊的心灵一样，拉康则以他那萨满巫师般的言语把新一代法国知识青年引向了不可能的欲望之真；如同科耶夫的讲座开启的不只是黑格尔主义的新时代一样，拉康的讲座开启的也不只是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时代；进一步地，如果说科耶夫的讲座带给了法国一个黑格尔幽灵，那拉康的讲座带来的则是一场精神分析学的瘟疫。

在参加科耶夫研讨班的同时，拉康也在同精神分析学界进行接触。他的目标已日渐清晰，他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并要以自己的方式开创新的时代。1932 年 6 月，就在研究埃梅病例的时候，拉康开始接受洛文斯坦因的分析，这一分析持续了六年之久。对于分析过程的具体细节，两人都很少谈及，外人也无从知晓，但据说不是那么顺畅。洛文斯坦因说拉康是不可分析的，拉康则称洛文斯坦因的才智还不足以分析他。鲁迪奈斯科认为，出现这种不顺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太不一样。按照鲁迪奈斯科的描述：

拉康步入成年之前所经历的仅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感伤：他的痛苦只是由于内心永久的不满足，由于急切地想要冲破限制，由于还没有成为世界的主人。简言之，这是一种伴随着极其常见的神经质的想象性的痛苦。他根本不知道何谓真正的匮乏：饥饿、贫穷、失去自由、迫害。他因为年纪太小而不必把最美好的岁月消耗在凡尔登的战火下，他只是从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的花园里看到了战争，唯一让他想到一点点战争的史诗性疯狂的就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残肢断臂和那等待着死亡的眼神。他从未领教过战场上那令人窒息的血腥的恶臭，他从未投入过反抗真正的压迫的战斗。从一出生，那些生活舒适的商人长辈们就对他娇生惯养，他唯一吃过的苦头就是家庭的约束，可这些恰恰不是为了使成为一个英雄。但是，伴随着英雄主义的这种缺乏，则是对任何意义上的顺从的坚决拒绝。

拉康是一个反英雄式的人物，决不适合于过庸碌的生活，注定是离心的，不可能屈从于无数庸常的行为规范——因此他对疯癫的话语十分感兴趣，视其为理解疯狂的世界的唯一钥匙。

鲁道夫·洛文斯坦因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的一生都是与流亡、仇视和羞辱联系在一起的。不像拉康，他对于压迫一词的完整意义有切身体会：先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帝国^①，在那里，教育和职业选择一直都受到歧视性的限制；接着是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移民四处漂泊。每当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都不得不去学一种新语言，他知道自由的代价，他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去贬低那个词或滥用它所代表的意义。在他漫长旅行的每个阶段，他对潜伏在前面的危险都只能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孤身一人，随身只有一张破旧的护照。^②

由于与洛文斯坦因难以沟通，拉康接着在 1934 年左右又转投到另一个分析师那里接受控制分析（control analysis），这就是来自瑞士日内瓦的查尔斯·奥迪尔。但十分奇怪的是，拉康从未向人提起他做过控制分析。他是想成为一个正式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分析师吗？因为那时接受控制分析是申请分析师资格的一个必需条件。

虽然在接受分析，并且偶尔也参加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一些活动，还在学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但 30 年代初的拉康并未引起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们太多的注意。1934 年 5 月，在接受洛文斯坦因的分析近两年后，拉康自己开始从事分析师的工作，他的第一个分析者名叫乔治·贝尔尼埃（Georges Bernier），一个从俄罗斯移民到巴黎的兴趣广泛的年轻人，分析持续了五年，开始的时候是每周会见三次，每次一个小时，拉康每两到三周会做一次总结，向受分析者详细解释正在发生的事。

1934 年 11 月，拉康顺利地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他的精神分析事业正式开始了。

① 洛文斯坦因 1898 年出生于波兰，那时波兰还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

②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71.

第三章

镜像的神话

拉康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生涯真正开始于 30 年代中期。1936 年，他以巴黎学会的成员身份出席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镜像阶段》的发言，这是他第一次以分析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镜像阶段》可以说是他进入精神分析王国的护照，在今天，《镜像阶段》已经成为大部分拉康研究者进入拉康的世界的导引。

然而，对拉康本人而言，《镜像阶段》的意义远不只在于它是一个源头性的文本，更在于围绕《镜像阶段》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正好在入口处结构了他身为精神分析学家的第一个神话。《镜像阶段》犹如——更确切地说，它就是——一个失窃的文本，在能指链般的滑行中闪烁地指示着那个隐秘的起源神话的意义缠绕，如同拉康在分析爱伦·坡的《被窃的信》时所说的，“被窃的信”其实就是“待领的信”，最终总会抵达它的目的地，拉康的“镜像阶段”同样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象征环路，它在始源处遗失，而后又在另一个始源处返回。在这个象征性的循环中，主体性的确证变成了向遗失之物所处位置的位移。

镜像阶段不仅是拉康借以结构自己身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主体性的神话，也是拉康有关自我之构成的神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用拉康自己的话说，是一出戏剧。个体在镜前的观看成为它完成自我认同和误认的一次倾情演出，成为主体之命运的先期送出，在那里，空间的迷思和时间的辩证法的交织令主体从此走上了无尽的欲望求证的不归路。拉康后来称镜像阶段是一个“装置”，是一架生产主体的分裂性自我的机器，它在弥合自我之躯那原始的无助感和破碎感的同时又在其中植入了一颗

异化的种子。拉康研究之所以总是从这里开始，很大程度上就因为镜前观看之于自我和主体的命运的那一预期效果。

在这一章我将围绕镜像阶段来追述拉康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到 40 年代末的学术经历，我会着重考察其间比较关键的几个文本，从那里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拉康在对精神分析经验进行理论化运作的方向上所付出的努力，会看到他对来自精神分析学以外的理论资源的早期调用，当然也会看到他在这个时期与精神分析学共同体的早期纠缠。

第一节 一个失窃的文本

拉康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正式出场的场景令人回味。

1936 年 8 月 2 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十四届会议在捷克的马里安巴德召开，玛丽·波拿巴、拉康、纳什特等作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代表出席，弗洛伊德因为病重没有赴会。8 月 3 日下午，在大会的第二次科学会议上，拉康作题为《镜像阶段》的发言，当发言进行到十分钟的时候，大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打断拉康，终止了他的发言。那时，每人发言十分钟已是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一个惯例，琼斯对拉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与会者所采取的举动不过是在依循惯例行使主席的权利而已，但拉康并不这么看，他把这视作是极不礼貌的冒犯。琼斯的打断令拉康十分不快，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琼斯的那种怨恨都没能消除，甚至整整过了十年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这个事件——我们不妨称它是一个有关“时间”的事件——时仍是余怒未消：

1936 年，我在马里安巴德大会上就此论题宣读了一个报告。就在我刚刚讲到十分钟的那一刻，主持会议的欧内斯特·琼斯突然打断了我。那时他是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我想，他得到这一职位大概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我所遇见的他的英国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对他的为人说好话的。然而，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他们就像即将迁徙的鸟群聚集在这里——却对我的报告报以相当的热情。我没有向大会简报提交我的论文提要，但在 1938 年出版的《法兰西百科全书》之“精神生活”卷里我写的关于家庭的文章中，

有几行乃是对其基本观点的浓缩。^①

反正 1936 年的这个事件在当时令拉康既愤懑又沮丧，结果他连论文提要都没有向大会提交，所以在 1937 年 1 月出版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只出现了他的名字和报告的题目：“J. Lacan (Paris), ‘The looking-glass phase’”，而没有报告的内容及内容提要——拉康的出场即是他的缺席，或者说，他本想借精神分析建制这个大他者来确认自己作为分析家的主体性身份，最后却招致了父法的阉割。尽管两年后拉康在《法兰西百科全书》之“精神生活”卷中论及了这篇论文的概要，十年后他又在《谈心理因果》中较为系统地提示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但它在 1936 年的面貌究竟怎样，已经无从知晓。^② 我们现今所见的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是他于 1949 年在苏黎世精神分析大会上重新表述的，其中添加的大量材料是此前的文本所不可能有的，就是说，这一在场的文本与那一缺席的文本之间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增补关系。套用拉康式的行话说，原稿的“失落”使得拉康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初啼之声成了一个“失窃的”文本、一个原初的失落对象。实际上，1936 年的事件更像是一个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场景：首先，这是一个有关“时间”的事件，而拉康精神分析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问题，他后来实践的所谓“弹性时间”俨然就是对这一“时间”创伤的回溯与修复；其次，这也是一个有关“侵入”的事件，是一个在主体间的关系中、在主体与大他者的关系中进行欲望确证的事件，拉康就像一个想在他者场域获得身份指认的无意识主体或言说主体，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分析的场景，在分析的戏剧中倾诉着内心的欲望，而琼斯就像那个以权威自居的分析师，以断然的方式打断了他的倾诉，给倾诉强行画上了一个意义分节式的句点，他者场域中的他人主体的侵入使得主体的确证最终归于失败；再者，正如拉康自己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所说的，人本来就是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150-151.

^② 实际上，在 1936 年 6 月 16 日，前往马里安巴德赴会之前，拉康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已经做了一次题为《镜像阶段》的学术报告，包括洛文斯坦因、波拿巴王妃、拉福格等在内的学会成员都聆听了这次报告，分析家弗朗西斯·多尔托留下了一份笔记，记述了报告的内容概要，其中涉及主体与“我”的构成、力比多与自恋、像与镜像、象征与人类知识等方面。

一个“早产儿”，各种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就被猛然抛入世间，使得“出生”本身就构成一种丧失——在母体子宫中所享有的那种自足状态的丧失——并因这丧失而产生一种受挫感，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早产儿”，各种思想的熔铸尚未成熟，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内部充满厮杀的大家庭的“图腾”政治还一无所知，对权威们的话语策略还一片懵懂，就贸然想要一鸣惊人，刚降生到这个世界就想要充当知识英雄，急切地想在自我的理想形象中完成躯体的整形，其结局除了受挫的创伤还能有什么?!

令人回味的还不止开始场景的这一幕。1936年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儿童精神分析。当时在国际协会内部，就这一论题形成了对立的两派观点：一派以梅兰妮·克莱茵为代表，另一派以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前者强调把儿童精神分析当作一个运用特殊技术的专门领域，后者则坚持在教育学的领域内并在父母的控制下对儿童进行分析。在这两派中，克莱茵的思想被认为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发展，这位在1926年移民伦敦的维也纳女分析家通过对弗洛伊德20年代的驱力与自我理论的修正提出了自己的“对象关系”(object relations)理论。^① 克莱茵强调，人自婴儿时候起的每一个冲动和本能都是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时，婴儿因为自我和知觉能力尚不成熟，其冲动和本能仅仅能朝向一个方向或部分对象，如母亲的乳房；并且婴儿这时仅仅能体验到满足和失去，因此，在其与乳房这样的对象的遭遇中，婴儿会通过投射、内射、分离、投射认同等一系列的心理机制来控制自己的内部需求和建立与对象的关系，并会依据需求的满足与受挫而把对象分为“好的”对象和“坏的”对象，由此而形成有关于对象的幻想或意象，创造出他的第一对象关系。“内射和投射，在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内部本能和环境之间，引起了紧密的关系。内射建立一个内部世界，这个内部世界部分地反映外部世界。内部情感的投射，渲染了婴儿外部世界的感觉。为了尽力防御他们自己，婴儿试着通过想象的过程，强制自己的内部世界进入外部世界，然后再内化这个世界。本质上，婴儿创造

^① 有关克莱茵的对象关系理论，可参见迈克尔·圣·克莱尔：《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贾晓明、苏晓波译，第三章，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了他或她自己的世界。”^①

克莱茵还指出，婴儿在最初的三四个月是以乳房为中介来建立与母亲和外界的关系，在这时，乳房这个部分对象在婴儿的满足感与丧失感中被体验为一个破坏性的对象，婴儿通过自身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或期望死亡的本能而在其中结构出一种类似于精神病的妄想，因此克莱茵称人的发展的这个时期为“妄想状态”（paranoid position）；接下来是所谓的“抑郁状态”（depressive position），在大约八个月的时候，婴儿的整合能力有所进步，他开始在自我的核心建立一个好的、安全的、完整的内部对象，并害怕这个对象失去，先前朝向爱的对象的攻击性倾向现在为另一种焦虑、为一种罪恶感所取代；再往下，如果“正常发展”，婴儿就开始把母亲作为一个完整对象看待，从整个人身上去获得满足，开始把母亲当作一个完整的人，通过在她那里获得快乐来增强自己的自信和力量，由此建立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其他关系。

克莱茵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包括琼斯在内的伦敦分析家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维也纳分析家的激烈反对，30年代初两派就儿童分析的问题争论不断，并常常把焦点引向谁才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正统代表这样的政治角力。尤其在1933年以后，由于纳粹上台，维也纳的许多犹太分析家纷纷移居伦敦，维也纳与伦敦之间的争吵转而演变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冲突，连刚刚移居伦敦的克莱茵的女儿都加入了反对母亲的一方。1936年的马里安巴德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召开的。

拉康对这一争论似乎并不知情，更别说能洞悉争论背后的政治隐情。他当然也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和征服欲，“不要向欲望让步”——因为人的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这是他后来从安提戈涅的悲剧中读解出来的有关主体的伦理真相，也是他自己信守的人生教义。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带着这样的驱力第一次步入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舞台时，才发现自己所思考的问题与克莱茵的问题正好是重叠的，只不过各自走的路线不同：克莱茵是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内部，通过某种自我理论的调焦来对弗洛伊德进行修正，而拉康是在一种哲学的语境中来改造精神分

^① 迈克尔·圣·克莱尔：《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54页。

析的理论方向。通过科耶夫的研讨班，拉康 1932 年在博士论文中所涉及的论题，如自我的发展、主体的位置、社会（对象）关系的结构、人类知识的妄想症状态等，获得了被重新阐释的可能，他所要做的就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话语与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之间作比较阐释或进行相互的重写，“镜像阶段”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正如鲁迪奈斯科所描述的：

就这样，在两次大战期间，梅兰妮·克莱茵就已经开始建构了一个有关主体的结构及其“想象秩序”的理论，对她所有的同时代人正在思考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这些问题当然也是拉康及整个第二代法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所关注的。……但是，克莱茵是在弗洛伊德体系的内部并利用弗洛伊德自己所提出的概念工具来实施她的变革，拉康则是不断求助于其他领域：精神病学、超现实主义、哲学。没有这些接连不断的外部参照，他就不可能以 1936 年开始的方式重新阐释弗洛伊德，因为他第一次接受的弗洛伊德是一个学术的弗洛伊德，是法国弗洛伊德主义的弗洛伊德。^①

虽然与克莱茵的理论有许多交叠之处，拉康的思考却与之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任何人都无关。镜像理论并非拉康的原创，而是他从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 1879—1962）那里借用来的。如果说琼斯的失礼和与克莱茵的偶合使拉康的“诞生”为一种受挫所纠缠，那么，瓦隆的存在对于拉康的“诞生”则构成了另一道创伤性的裂口，就像对待实在之洞一样，对于这道裂口，他也将以幽隐的方式穿过。

亨利·瓦隆出身名门，他的祖父因为对创立第三共和国的重大贡献而被誉为“共和国之父”。瓦隆 1899 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毕业后其学术兴趣却转向了心理学和医学，成为法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瓦隆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发展观乃是基于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体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强调个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他对个体的具体戏剧不感兴趣，也不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10.

关心体质性的固念，对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无意识，他也缺乏足够的兴趣，认为这个概念就像一个幽灵漂浮在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

1931年，瓦隆发表了一篇讨论婴儿的身体观念的发展的论文，其中谈到了一个“镜子测试”：通过比较婴儿和大猩猩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时的不同反应，发现6个月的婴儿和大猩猩看到镜子中的形象时会确认哪个形象是自己的；但两者间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婴儿在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时会痴迷于这一镜像并靠近做更仔细的观察，挥动四肢去探究形象与现实的关系，而大猩猩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转向其他事物。瓦隆将“镜子测试”中婴儿的行为解释为主体从镜像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一种辩证运作，认为婴儿正是通过这一运作来创造其主体的统一性的。

拉康是在1933年左右与瓦隆相识的，对于瓦隆的镜子测试及其解释，他显然很熟悉，1936年，他直接借用瓦隆的素材，提出了自己的“镜像阶段”理论。然而，拉康在其有关“镜像阶段”的所有文字中，不论是在正文还是在参考文献中，都几乎没有提及瓦隆的名字，反而不断在强调自己对于这一术语和理论的发明权。例如在1966年给自己写的学术履历《关于我的经历》中，拉康说：“我并非到这时才开始思考可导向对自我的理解的那些幻象，尽管我提出‘镜像阶段’是在1936年，那时我还不是是一名教学分析师，且是第一次参加给予我合作机会的国际大会，但我认为我值得赞扬。我发明的这个概念使我可以直抵理论和技术上的阻力的核心。”^①

那么，拉康为什么要对瓦隆的名字作这样的抹除呢？难道真的就像当初让内的名字之于弗洛伊德一样，瓦隆的名字对拉康的发明权亦构成了一种威胁——或者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在此我不敢擅用小人之心加以揣度，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即便他的“精神分析学”的提法是借自让内的“心理分析”，也并不等于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画上等号，那是两个从技术到理论旨趣都根本不同的东西；对于拉康，情形亦复如此，虽然借用了瓦隆的试验和术语，但解释却是拉康自己的，也就是说，当拉康把镜像阶段置于科耶夫式的黑格尔哲学的基础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52-53.

上加以讨论的时候，当他把镜像认同的阶段视为一出“戏剧”、一种个体将自身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的时候，进而，当他把镜像与妄想症的知识结构、把自我的构型与一种黑格尔式的主体间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镜像阶段”便不再是瓦隆意义上的一个心理学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富有理论阐释力的哲学—人类学概念。以此言之，拉康对瓦隆的名字的刻意抹除固然是不可原谅的，但似乎也有其充足的理由。

琼斯的打断虽然令拉康很是沮丧，但并没有影响到他观光的兴致，离开马里安巴德这个伤心地之后，拉康接着前往柏林去观看纳粹德国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这一次，他居然没有想到顺道到维也纳去拜访一下弗洛伊德，这个老人作为一个运动和组织的象征之于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拉康终其一生所感兴趣的只是弗洛伊德的文本，而非弗洛伊德其人，或者说弗洛伊德之于他不过是一个理论和运动的象征性能指，其本身并无任何意义。

从柏林回国后，拉康携怀有身孕的妻子到旺代省的诺尔莫提埃岛旅游度假，在那里，他完成了一篇论文：《超越“现实原则”》^①。乍一看，“超越现实原则”这个题目似乎对应着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感原则”，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无内在联系。拉康所谓的“现实原则”指的是联想主义心理学在传统的认识论或科学框架内界定心理现象时所依从的一种未经证实的“超验”原则，即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依据一种机械论的心理“印迹”概念和一个看似来自经验的“联想联系”的观点而把心理现象归结为有关现实的真实或幻觉的经验。拉康通过对这一原则的批判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革命就是从超越这一“现实原则”开始的。进而，他还想借着对精神分析经验作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来重建所谓的“现实”概念，重建属于精神分析学的“现实原则”，并以此明确“现实”与主体认同的关系。拉康的这篇文字在理论上并无太多实质性的东西，但它显示了一个重要的迹象：拉康想要掀起精神分析革命的野心。在文中，他第一次提到了“第二代精神分析学

^① 该文于1936年发表在《精神病学的演进》上，这篇文章本来有两个部分，但我们现在所见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根本就没有写出来。

家”，并将其与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的革命性原则联系在一起，在文章的开篇，拉康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性的话：“弗洛伊德学派的第二代可以依据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根本原则即现实原则来划定他们的受益和他们的责任。”^① 经历了琼斯的权威性压制之后，拉康是不是觉得精神分析学的革命事业应当由新一代取而代之，而他就是这新一代的代表？我相信，当拉康把那句话置于篇首题词的位置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在经受着某个东西的诱惑，在那一刻，他肯定意识到了，他的事业决不只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学本身，而是要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革命性的重新思考。

当然，这个革命性时刻的到来还有待时日，马里安巴德会议并没有带给拉康所渴望的东西，在第一代法国分析家的眼里，他仍是无名小辈。不过，在先锋文人的圈子里，他已经小有名气，超现实主义者在1933年就已经将他视作是未来一代法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代表，并且这一看法似乎也得到了另一些人的认可，瓦隆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受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百科全书》的总编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的委托，瓦隆主持编写《法兰西百科全书》第8卷，即题为《精神生活》的心理学卷。除自己亲自动笔之外，瓦隆还邀请当时法国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名流参加撰写，其中包括皮埃尔·让内、乔治·杜马、爱德华·皮雄等，同时他也邀请了精神分析学界的两个年轻人：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 1903—1972）和雅克·拉康。前者负责“性”的条目，后者负责“家庭”的条目。1936年，拉康将初稿交给了编委会，是两篇文章：《论家庭——情结：家庭心理学的一个具体因素》和《病理学中的家庭情结》^②，前者围绕着一系列的情结或意象考察了家庭环境对主体构型的作用，后者进一步说明了这些情结在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中的病因学作用。费弗尔和瓦隆看过后，觉得行文过于艰涩，尤其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部分令人费解，他们分别作了一些修改后，要求拉康再改一遍，但改后的稿子好像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58.

^② 1984年，两篇论文合在一起单独出版，题为《个体形成中的家庭情结》。有关拉康对家庭情结的论述，可参见巴齐莱的出色讨论：Shuli Barzilai, *Lacan and the Matter of Origins*, pp. 19–4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还是不太让人满意。费弗尔说：“拉康博士的文风不是‘不好’——只是在遣词上过于采用个人化的特殊含义，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或者再重写一个能让人理解的东西，或者要求作者再拿回去修改。”^① 如此几易其稿后，1938年，拉康的“论家庭”终于出现在百科全书的“精神生活”卷中。

有关家庭的这两篇文章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拉康思想形成时期的那种混杂性特征，同样也体现了他企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的雄心，这只要看一下他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就能感受到，它们包括：母亲的乳房、断奶情结、死亡冲动、怀乡病、心理认同、镜像阶段、阉割情结、超我、自我、他人、父亲意象的衰落、妄想性知识形式、自罚性神经症、社会环境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心理学，甚至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和领域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关于家庭的庞杂理论。需要提及的是，拉康在此第一次援引了克莱茵的研究——他对自认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够很快地消化吸收。

在拉康那里，家庭不只是弗洛伊德意义上展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心理剧场景，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构成单位，是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考察的人类学对象。他把家庭界定为一种“建制”，并强调单纯的“心理学研究”不足以描述或解释家庭与个体的关系或者说家庭在个体的“行为与表征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拉康首先阐述了“本能”（instinct）与“情结”（complex）之间的根本区别：本能是生物性的，因此有赖于有机体过程的支撑，它实质上是以某一固定的方式去帮助调节有机体的运作；而情结是社会性的，是由文化因素主导的，它只是偶尔与有机体过程有关，与本能相反，情结是以社会的和文化的调节来补充有机体的运作。通过这一区分，拉康把本能逐出了他的研究范围，而集中于情结来解决他的家庭问题。同时，相比于弗洛伊德主要着眼于个体的童年生活或纯粹的个体经验来解释情结的形成而言，拉康的情结理论更接近于克莱茵，即把情结理解为是社会和文化环境与主体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由于家庭在主体早期生活环境中的重要位置而使得情结的形成总是与家庭中某一成员有关，但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41.

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会通过家庭成员体现出来。

不仅如此，拉康还沿用克莱茵学派的思路把情结与“意象”（*imago*）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情结是对某一个人所代表的一系列意象的认同，是各种相互作用的意象的集合。意象不是单纯个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一种普遍的原型在个体心理中的实现，它以原型的形式影响着主体与他人作用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种“无意识表征”。拉康对家庭的思考就是围绕着情结或意象与主体构成的相互作用进行的。在他看来，家庭情结就是以“意象”或“无意识表征”的形式来“复制某种环境现实”，并且这种复制总是采用重复的方式，由此而构建着主体对待环境的各种身体的和心理的反应，正如司各特·李所说的，“拉康的目的在于说明存在于家庭结构中的无意识的关系表征是如何持久地构型人的行为的”^①。

拉康考察了代表着家庭基本结构的三种意象（它们同样是荣格学派提出的）及其相关的情结：母亲意象（*maternal imago*）、兄弟意象（*fraternal imago*）和父亲意象（*paternal imago*）；与母亲意象相关联的是“断奶情结”（*weaning complex*），与兄弟意象相关联的是“侵入情结”（*intrusion complex*），与父亲意象相关联的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不过，与克莱茵学派同等地强调情结和意象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不同，拉康基本上只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情结和意象与主体的关系。

首先是母亲意象。在克莱茵的理论中，母亲意象总是与乳房这个部分对象联系在一起，婴儿最初正是通过与这一对象的关系来获得满足或缺乏的体验，从而建构起他或她的母亲意象及其对环境的反应方式。可在拉康这里，母亲意象代表的不是母亲的乳房带给婴儿的满足，而是婴儿在其身体需要方面所面对的“先天不足”。拉康强调，母亲意象处在“断奶情结”的中心，不论断奶来得多晚，婴儿都会认为它来得太早，不论它有没有带来创伤，都会在人的心理中留下生物关系为它所中断的永久踪迹，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断奶这一“生存危机”总是伴随有一种“心理危机”，而对这个危机的最初解决将在个体身上形成一个永

^① Jonathan Scott Lee, *Jacques Lacan*, p. 14.

久的辩证结构，这就是“断奶情结”。拉康说：

断奶情结以一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感受到的需求所强加的寄生方式把哺乳关系固定在心理中，它表现了母亲意象的原始形式。因此，它是把个体与家庭联系起来的最古老、最稳定的情感的基础。^①

断奶在心理中留下了被它所打断的生物关系的踪迹，同时个体又赋予它的表现一个古老的意象，即以母亲的乳房意象来重新建立被打断的哺乳关系。这一意象的存在主导着人的一生，成为一种普遍的怀乡病。在成人生活中，母亲意象成为每一哲学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诉求中的运作力量：

如果必须在它被重新发现的地方来界定最抽象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它：对存在之总体性的一种完全同化。在这一稍具哲学意味的表述下，我们可以辨认出人性的这些怀乡病：形而上的宇宙和谐的幻象、情感聚变的神秘深渊、总体论的守护者的社会乌托邦，还有对出生时失去的伊甸园的执迷或对死亡的最隐秘的渴望的每一次爆发。^②

接下来是兄弟意象，它的特征就是“侵入情结”。在此拉康重述了他在1936年的镜像阶段的主题，把侵入情结看作是主体借以建立其社会认同时的关系结构。虽然侵入情结总是与嫉妒联系在一起，但它所表征的不是单纯的生命敌对，而是一种心理认同，兄弟间的侵犯性倾向事实上是他们更基本的相互认同的产物。拉康认为，兄弟意象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无意识基础，因而嫉妒是作为一种社会情感的原型而出现的，侵入情结则是通过心理认同来固定主体同他的同类的二元关系的。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论述的：“不论是在兄弟敌对的家庭剧中，例如当出生的次序把每一个体置于某个占有者或剥夺者的尊贵位置时；还是在镜像阶段，例如当每个个体重获其自身已失去的统一性时，自我的同一性的自恋结构都会随着将对体的意象视作其核心的要素而被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45.

② 转引自 Jonathan Scott Lee, *Jacques Lacan*, p. 14.

建立起来。”^①

最后是父亲意象，与之相联系的是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情结理论的核心，它尤其表达了主体对待与自己有着相同性别的父母一方的那种爱恨交织的无意识心理。在论家庭的论文中，拉康提到了三种情结，但前两种即断奶情结和侵入情结在后来便很少论及，只有俄狄浦斯情结在后来被保留下来并成为其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他后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有根本的变化。不过，在1938年的讨论中，拉康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解释并无太大差异，即他强调了这一情结在主体发展中的建构作用，描述了父亲意象借以升华为孩子的“现实”的平行过程。他指出，在潜伏时期，儿童对他或她的环境结构持有一种冷漠的、非性欲的理解，但这一理解必定是与自恋性的自私联系在一起的；而后俄狄浦斯儿童之所以能以一种非性欲的方式走近现实，恰恰是因为他或她的性趣味在内部被转变了。结果，在父亲意象中存在一种“倒错”的张力，并被资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建制所复制：父亲权威在压抑性欲的同时又作为自恋的儿童性成熟期的模范而发挥作用。在第二篇文章中，拉康还结合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考察了父权制家庭及父亲意象的历史，指出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将导致父亲意象的衰落，这一衰落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危机的结果，而精神分析学的产生就与父亲意象的这种衰落有关。必须指出的是，拉康对家庭中父亲意象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注把他引向了人类学的研究，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转向对于拉康的思想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36年的《镜像阶段》当然是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最重要的源始性文本，但由于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一个“失窃的”文本——尽管缺席本身恰恰也是其源始性的重要一维——使得人们总想为那个遗落的时刻寻找一个替身，于是1938年的《论家庭》便成为后来的研究者进行增补想象的重要参照。可由于某种联想性的关联的固念，这种增补想象时常会构成拉康文本的又一次失窃，是对拉康的时间逻辑的又一次强行打断，例如，鲁迪奈斯科在论及拉康的三个情结的理论时，居然认为它们预示了拉康后来的“三界”论，即断奶情结对应于实在界、侵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45.

人情结对应于想象界、俄狄浦斯情结对应于象征界。^① 这样的增补想象除了给拉康的理论提供一个简单化的平行论图像之外，并无其他作用。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拉康论家庭的论文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要强调这一联系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紧密，那种预示作用并不是在具体的理论方面，因为拉康 50 年代的“三界”学说是在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而 1938 年三种情结的理论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对象关系的心理学框架，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也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即 30 年代拉康的思维中已经显示了某种前结构主义的结构观，对此，司各特·李和舒里·巴齐莱的解释可能更客观一些。在《雅克·拉康》（1990 年）中，司各特·李说：

尽管拉康的三种情结（以及它们的基本意象）与弗洛伊德的幼儿性发展的阶段（口腔、肛门、阳物、生殖器）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是，拉康更感兴趣的是无意识表征如何主导着人类心理，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他所热衷的始终是行为被意象结构的方式，而且他的结构概念更多地是形式方面的而不是因果方面的。意象不是人类行动的因果决定因素，而是描述可能的人类行动的范围的模型或原型。在这些方面说，早期的这篇论文已经预示了拉康在 15 年后向结构主义的转变。^②

在《拉康与起源的问题》（1999 年）中，舒里·巴齐莱说，通过一种回溯式的阅读，我们可以追踪到《论家庭》与拉康后来的著作之间的某些连续性：

第一，1938 年的“侵入情结”是他将充分展开的镜像阶段概念的一个预示。第二，他未来对与本能相反的语言和法则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也明显地见于百科全书的文章中（“情结是由文化因素主导的”）。第三，在有关家庭病理学的部分（“病理学中的家庭情结”）中，拉康宣称父亲对于儿童的社会整合和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对当代社会中“父亲意象的衰落”进行了批判，这些都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145.

② Jonathan Scott Lee, *Jacques Lacan*, p. 15.

预示了他的父之名的概念以及与其排斥功能相伴随的心理危害效果（精神病）。

第四，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所谓的连续性，并不是指任何具体的内容或观念，而是指一种阐释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阐释策略）。《家庭情结》已经显示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和对其他前辈的对话立场的复杂性。他的论文通篇都在显示其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说明时常是一种激进的修正。虽然拉康偶尔会说明他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分歧，但对于根本的差异却常常是不置一词，或则是欲言又止。^①

第二节 主体确证的时刻

1938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撰写了关于家庭的条目之后，拉康的写作历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停顿一直持续到1945年战争结束。当然，受到战争干扰的不只有拉康，国际的和法国的整个精神分析运动都受到严重的侵扰。可以说，纳粹时代精神分析运动的传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情故事，弗洛伊德作为这一运动和组织的代理或象征当然是这个悲情故事的主角。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种妄想狂政治开始在德国风行，并将蔓延到全欧洲。伴随着排犹运动的升级，精神分析学这个带有明显“犹太性”的学说当然要被列入清洗的行列。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个城市的公共广场和大学城举行焚书大会，以弗洛伊德的作品为首的精神分析出版物也被投入熊熊烈焰中。这当然只是第一步，彻底的文化灭绝还有赖于对肉体的彻底消灭。1933年之前，德国精神分析学会一直为犹太分析家所主导，纳粹上台后，这些分析家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就是流亡，再不就是进集中营，到1935年，近50人的学会只剩下9人，控制了学会的排犹主义者开始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纳粹化。

^① Shuli Barzilai, *Lacan and the Matter of Origins*, p. 20.

至于弗洛伊德，纳粹的恶劣行径似乎更加激发了他的犹太身份认同，1934年他开始了《摩西与一神教》的写作，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这部著作于1938年付梓），他要借摩西的神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入到犹太性之中。1936年5月16日，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迎来了80岁的生日，许多国际友人和信徒纷纷给他发来贺信和寄来礼物，不久他荣膺英国皇家学会的通信会员，对于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这都是莫大的荣誉，弗洛伊德在这个时候获得国际科学界这样的承认对他当然是最大的安慰——更确切地说，这是国际社会对他的一种政治声援。

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局势已越来越严峻，她的命运其实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虽然维也纳的犹太人因为恐慌而纷纷出逃，但弗洛伊德还不想这么做，他知道，他是精神分析运动和组织的象征，如果他流亡，将意味着这个运动和组织的解体，他甚至还梦想着奥地利的天主教会能为他提供荫庇之所。1938年3月12日，德军进入奥地利，3月14日，弗洛伊德在他的日记中记道：“希特勒进了维也纳。”犹太人立即成为受攻击的对象，排犹暴行在奥地利盛放的速度甚至远远超过德国，不到一个星期，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了，连天主教会也承诺效忠于希特勒。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机构遭到查封，资金被冻结，弗洛伊德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弗洛伊德在国际协会中的代理人琼斯动用各种关系，为他的一家拿到了赴英签证，可弗洛伊德还是不愿离开奥地利。直到3月22日，他的女儿安娜被盖世太保带走——不过当天就放回了——弗洛伊德才下定决心走流亡的道路。可这时，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资产、藏书和出版社的财产全都被没收，弗洛伊德的现金和户头也全被充公，他已变得一无所有，无力支付奥地利当局所要求的“逃亡”税。不过没有关系，弗洛伊德的身边还有玛丽·波拿巴，后者为他支付了一切费用。其实，波拿巴王妃所提供的支持远不止金钱，在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之前的那一个多月里，她大部分时候都住在维也纳，帮助弗洛伊德处理移民前的众多事务，她所给予的支持是无私的和真正信徒式的，她的在场给了心身已极度虚弱的弗洛伊德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心理抚慰。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及其部分家人搭乘“东方快车”离开维也纳，走上了流亡之路。6月5日清晨，弗洛伊德一行到达巴黎，玛

丽·波拿巴王妃盛情接待，下午，在王妃的私邸，弗洛伊德会见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可拉康没有出席——他与弗洛伊德多次失之交臂，他们之间似乎总无法形成交集。对于这次缺席，拉康自己后来的解释是，那是因为他不愿见到玛丽王妃；而事实的真相可能是玛丽王妃根本就没有邀请拉康出席这次活动，因为她把这看作是一次小范围的私人会见，没必要人人都参加，更何况拉康此时还不是学会的“专职会员”。

在波拿巴王妃的私邸稍事休息后，当晚，弗洛伊德便乘船越过英伦海峡，于6月6日早上抵达伦敦，琼斯已在那里为他安顿好了一切。次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的消息，并引述他儿子的话说，弗洛伊德之所以选择到英国来，是因为“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这当然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虽然弗洛伊德自己也说过，他来到英国是为了“死于自由”，但他内心里还是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祖国，用他在抵达伦敦的第一天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的话说，他虽获得了自由，可心里却仍“深深爱恋着那个曾经囚禁着我的牢笼”。而在几天后回复瑞士分析家雷蒙·德·索绪尔祝贺他逃出纳粹魔掌的来信时，他还说：“也许你遗漏了一点，那就是移民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剧痛。那是来自对一种生活和思考的语言的失去，这种失去，是再多的努力也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弥补的。”^①

为了排解这种去国之痛，弗洛伊德重又投入了《摩西与一神教》的写作，到1938年底，该书已告完成。这是一部纵情于想象的作品，其桀骜不驯的思想和表述风格把精神分析对待传统的某种“后现代”精神推向了极致，所以，当第二年其英文版出版面世的时候，立即招致了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阵营的激烈批评。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种学理之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他的文本中，摩西这个形象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处理的，不如说是作为自己的一个英雄镜像来重述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冒昧地说，《摩西与一神教》乃是弗洛伊德最后的自我分析，是他对自己身上的那种犹太性的最后分析，他在这里再次把自己书写成了一个（享受）孤独的英雄。

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不堪病痛的折磨，在伦敦让家庭医生

^①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下），296页。

给自己注射超量的吗啡，以“安乐死”的方式自己选择了死亡，就像他所说的，他来到英国是为了“死于自由”，他真的将这一自由意志贯彻到了最后。

就在弗洛伊德与死神作最后斗争的时候，西方世界的妄想狂政治也正在走向最后的大爆发。1938年9月，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慕尼黑达成协议，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希特勒并吞捷克的“德国人区”，以换取一纸空洞的和平承诺；1939年8月，斯大林也和希特勒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就瓜分波兰达成秘密协定，这是斯大林对西方世界为换取自己的安全而不惜出卖苏联的利益所给予的一个回击——所以，当西方世界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对斯大林与魔鬼缔约的行为说三道四的时候，他们恰恰忘记了是他们自己投出的第一块肮脏的石头。9月1日，希特勒悍然入侵波兰，3日，英、法在无奈中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在宣战的那一天，巴黎的广播说：“这将是最后的战争。”可是，当第二年6月初德军真正向法国发起进攻的时候，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法国人就投降了，法国成为德军的占领区，只有南部和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得希特勒的“仁慈”所赐还暂时保持着“自治”，由战前第三共和国的余孽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 1856—1951）元帅在维希控制着。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巴黎作为占领区和维希作为“自由区”在自由的享用上居然呈现出一个令人难堪的矛盾景象，在维希政权下“苟且偷生”的纪德在1941年5月6日的日记中就记述说：“有一瞬间，我竟然想要逃离，去发现我的更爱。德国人在奴役我们。给我们带来令人痛苦的耻辱。但与维希政权所规定的愚蠢制度相比，在那里，我们受到的歧视要少多了，也体面些。”^①这绝非纪德一个人的感受，相较于贝当政府严厉而又任性的审查制度而言，四十年代初的巴黎还真的给了法国文人有限的自由。

当然，享受有限自由的前提是“政治正确”，比如要具有非犹身份，且不参加反对德国的抵抗活动，不宣讲和传播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仍

^① 转引自赫伯特·洛特曼：《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薛巍译，132~13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待在巴黎的萨特和加缪们在占领期间可以继续他们的写作，而同样由法国人从事的精神分析活动则被明令禁止。同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形一样，战争爆发后，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也陷入停顿。巴黎成为占领区之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被迫关闭，《法国精神分析杂志》被迫停刊，“精神病学的演进”组织也宣告解体。精神分析实践虽未被当局禁止，但弗洛伊德主义者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精神分析的治疗只能在私底下进行。

与此同时，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组织场景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一代精神分析学家正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索科尔尼卡已于1934年在自己的寓所打开煤气自杀；皮雄于1940年1月逝世；博雷尔已经退会；埃斯纳在战争开始后加入了法国海军；阿伦迪先是在军队行医，后搬到非占领区，1941年移居瑞士，1942年在巴黎逝世。奥迪尔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瑞士，雷蒙·德·索绪尔和洛文斯坦因则移民到了美国，至于玛丽·波拿巴，在非占领区漂泊一段时间后，于1941年回到了雅典，后又到了南非，在那里传授弗洛伊德的理论。1944年她又到了伦敦，一直到1945年才回到巴黎。只有拉福格成为唯一的合作者，他一度想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巴黎组建一个纳粹化的精神分析组织，但由于没有成员，他的计划宣告流产；而在战争后期，拉福格摇身一变，又成为犹太流亡者和抵抗组织的庇护者。

那么，战争期间拉康在做些什么？他没有犹太身份，所以不用烦心要不要流亡，但他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没有像同为第二代分析家的拉加什和纳什特那样成为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当然他也不会像拉福格那样为了组织的命运而寻求与纳粹合作。他选择的是一条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即完完全全地退回到私人生活中。

1937年1月，拉康和布隆汀的第一个孩子夏洛琳（Caroline）出生，拉康给她取了一个小名：“Image”，他显然是想以此来暗示他的镜像阶段理论。1938年12月，拉康完成同洛文斯坦因的分析，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专职会员。1939年8月，布隆汀又为拉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提波（Thibaut）。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女性闯入了拉康的生活，她就是拉康的好友、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乔治·巴塔耶的妻子西尔维亚·马克勒斯（Sylvia Maklès, 1908—1993）。西尔维亚出身于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1928年同巴塔耶结婚，随后进入演艺圈，曾在法国

著名导演让·雷诺阿（Jean Renoir, 1894—1979）的影片《乡村一日》（1936年）中出演女主角。拉康与西尔维亚的初次相识是在1934年，那时，拉康刚刚与布隆汀结婚，而西尔维亚与巴塔耶的婚姻已经出现了危机。此后，他们虽然还有过多次见面，但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1938年底，当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又一次相见时，双双坠入了爱河，随后两人便常常厮守在一起，尽管此时的布隆汀正怀着拉康的第二个孩子。

战争爆发后，拉康被征召入伍，在军队医院做助理医生，先后辗转于波城、吕克瑟伊、马孔、圣迪埃等地，到1940年8月底，随着德军在法国的胜利，拉康被遣送回家，此时他的妻子布隆汀在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又一次怀孕了。10月，西尔维亚移居到南部的非占领区马赛（马赛在1942年11月也被德军占领），不久发现自己也怀上了拉康的孩子。11月，拉康与布隆汀的第三个孩子西比尔（Sibylle）出生。可怜的拉康只好在马赛和巴黎之间来回奔波，好在他的医生身份和政治上的暧昧态度给他提供了不少便利，使他可以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相对自由地进出，据说，此后的两年间，拉康总是开着他的雪铁龙往返于马赛和巴黎。其实，在德军占领时期，拉康在政治上保持着一种低调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不拥护维希政权，对抵抗运动也没有什么热情。他的民族情感更多体现为某种仪式化或审美化的文化抵抗，并且这还局限在非占领区，例如在马赛，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亲英分子，他和朋友一起翻译T. S. 艾略特的诗歌，阅读钦定本英文《圣经》，甚至还穿英式服装；同时他在马赛还跟一些流亡知识分子的团体过往甚密。

1941年7月，西尔维亚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朱迪丝（Judith），但父姓却是巴塔耶的名字，因为西尔维亚和巴塔耶虽然早在1934年就已经分居，但两人一直未办离婚手续；而拉康这时与法定妻子也仍保持着婚姻关系。直到这年12月，拉康才与布隆汀离婚，而西尔维亚与巴塔耶的婚姻关系到1946年才正式解除，1953年，拉康才与西尔维亚成为合法夫妻。

1943年，拉康和西尔维亚一起搬到塞纳河左岸区，在那里过起了一种资产阶级文人的优雅生活。西尔维亚聪慧、美丽而且充满热情，一直是巴黎文艺圈里的宠儿，拉康通过她再次与巴黎的先锋艺术家们往来密切，并开始喜欢上了艺术收藏，毕加索、安德烈·马松（西尔维亚的

姐夫)、库尔贝等大师的作品是他的最爱。1951年,拉康又在奎特兰科(Guitrancourt)的乡下买了一套别墅,作为周末度假和接待朋友与病人之用,里面收藏有许多名贵的艺术品和图书,其中有一个房间里挂着一幅库尔贝的油画《世界的起源》,画面是一个刚刚做爱后的女人袒露着私处的裸体,拉康是1955年购得这件作品的,为了掩饰那过于露骨的情色展示,拉康在画布上盖了一块画有风景的木板,后来西尔维亚请她的姐夫马松重新设计,马松换了一块滑动木板,并以抽象的形式在上面画了原作的一个素描。^①

另外,拉康对东方艺术和原始艺术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据列维-斯特劳斯回忆,拉康在50年代曾从他手中买过一些原始艺术的作品。据说拉康还收藏有来自中国的画家赵无极(1948年定居巴黎)的作品。

1944年3月,拉康应邀出席由萨特、波伏瓦、加缪等人组织的一次小型文学集会,这是他与这些存在主义者的第一次接触。拉康对萨特的圈子似乎没有太大兴趣。1948年,当波伏瓦在准备写作她的关于女性的著作《第二性》的时候,读到了拉康论家庭的论文,于是打电话给拉康请教精神分析学对于女性性欲问题的见解,拉康颇为得意地回答说,那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才能说出个头绪。波伏瓦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耐心去听拉康的长篇大论,因此建议双方做几次面谈,拉康断然拒绝了。对于萨特,拉康也一直没有有什么好感,也许是妒忌前者在占领期间就以隐喻性的写作暴得声名,战争刚一结束,拉康就在重新拾笔的第一篇文章中把萨特设定为批判的对象,而在1949年重写的《镜像阶段》中,他公开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自我观进行了批评。

1944年8月,巴黎被盟军解放,1945年5月7日,德国在无条件的投降书上签字,战争的浩劫终于过去。然而,战争的创伤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抹平的。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唤醒了西方世界对自身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反思,自由、自主的主体、自我中心、个体的社会责任、存在的欲望、历史的必然性等等的一切都需要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图景中重新加以思考。法国知识界本来就

^① 有关拉康收藏这幅油画的故事,可参见 Shuli Barzilai, *Lacan and the Matter of Origins*, pp. 8-18.

有强大的现实“介入”传统，二战期间的民族遭遇在战后更是激发了他们空前的话语热情，战争一结束，巴黎的知识界立即活跃起来。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有了恢复活动，拉康也重新回到了精神分析的阵地。

1945年3月，为迎接巴黎解放，在战争期间被迫停刊的一份刊物《艺术札记》出版了一期复刊号，拉康应邀提供了一篇文章，即《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一种新的诡辩》（下文除个别地方外简称《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这是他自停笔以来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文章以一个逻辑推断的场景作为开始。监狱长召来三个囚犯，告诉他们他要释放他们中的一个人，但究竟是谁要由一场测试来决定：

这儿有五个圆盘，它们除了颜色以外是完全一样的：三个白色的和两个黑色的。我将在不让你们知道我的选择的情况下在你们每一个人的两肩之间放一个圆盘，也就是说放在你们直接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你们有充分的时间来观察你们的同伴以及他们戴着的圆盘。当然，你们不准相互告知你们观察的结果，再说你们的利益也不让你们这样做，因为最先推断出他自己的颜色的人可以享受到由我掌控的获释资格。^①

当然，囚犯们的结论必须是建立在逻辑的理由上而不仅仅是建立在可能性上。然后，监狱长在三个人的肩上都放上了白色的圆盘。三个人相互看了一会儿之后，一起走出了牢房，他们给出的回答是一样的，即自己肩上放的是白色的圆盘，而给出的逻辑推断也是一样的：

我是白的，并且我的理由是：既然我的同伴是白的，我就想，如果我是黑的，他们中的每一个就会这样来推理：“如果我也是个黑的，另一个必定可以直接认识到他是白的，并会立刻离开，所以我不是黑的。”这样他们俩会一起离开，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白的；既然他们没有那样做，那我必定跟他们一样，也是白的。^②

就这样，三个犯人因为得出了相同的正确推断而被同时释放了。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61.

② Ibid., p. 162.

这是一个颇具时代意味的场景，它似乎关涉着人的自由与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萨特的包括《存在与虚无》（1943年）在内的一系列作品的问世而在战后广受社会关注。1944年5月，萨特的戏剧《禁闭》（剧本最初拟以“他人”为题）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该剧通过被囚禁在同一个牢房里的三个犯人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一个典型的萨特式存在主义命题：他人即是地狱，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在从属于他人的境况里。拉康的三个卑贱主体的戏剧虽然发生在与萨特的戏剧相同的场景，但他并不想以此来探讨主体的自由及其选择的问题。与萨特将自由设定为主体之存在用来对抗异化现实的一种意向性力量不同，拉康要确立的是一种非主体性的主体哲学，因此他对于主体走向自由的那种意向性力量始终持怀疑的态度。在那个诡辩游戏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自由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自由与主体选择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主体获得有关自身的知识的结构性处境，用拉康自己的话说，是主体“对他人之现实的一种特别的误认”。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拉康一上来就对萨特在《禁闭》一剧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观进行了批判：“我并不属于新近的那种哲学家，在他们看来，高墙内的禁闭不过是帮助我们趋达人类自由至境的手段。”^①而在拉康那里，自由绝非主体所内有的的一种意向性能力，相反，主体对自身确定性的论定有赖于他人，有赖于一种“集体逻辑”，有赖于逻辑时间中那个“理解的时刻”（time for comprehending）的到来。

不妨具体地看一下那个逻辑游戏。它只会有三种可能的组合，主体的推断肯定是在这三种可能中进行：（1）两个黑的和一个白的，这时，如果甲看到乙和丙的圆盘是黑色的，他便能立刻推断出自己是白色的，从而离开牢房；（2）一个黑的和两个白的，这时，如果甲看到一个黑色和一个白色，他就会推断：“如果我是丙（他是白色），且看到两个黑色（甲和乙），那丙就可以离开。既然丙没有离开，我就可以推断我不是黑色，我可以离开”；（3）三个都是白的，这时，如果甲看到两个白色，他就会推断：“如果我是黑色，那乙和丙就会看到一个黑色和一个白色，他们每人都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是黑色，另一个白色的人就会看到两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62.

个黑色。’这样他们就会推断出自己是白色，然后离开。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所以我推断我是白色。”

拉康说，这三种组合在主体的逻辑推断过程中转换成了三个可能的“时间进程”或“明证的时刻”，就是说，任一主体的逻辑推断或“推断的时刻”（moment of concluding）其实有赖于对另两个主体的推断的理解，或者说有赖于“理解的时刻”的到来。在这三种可能的组合中，第一个推断依据的是逻辑排除法，“理解的时刻”在此是即时性的，推断在“看”的一刹那就可以做出：只要看到了两个黑色，某个主体立即就能推断出自己的未知特征（白色）。在第二个推断中，“理解的时刻”必定先于“推断的时刻”：甲必须把自己置于丙的位置来做出推论。第三个推断更为复杂，因为甲必须分两个阶段做出推论，先是假定他是黑色且把自己置于乙和丙的位置，再从乙或丙的位置去做出推断。由于三个囚犯做出了相同的推论，所以他们全都离开了牢房；但他们做出推断依据的是“预期确定性的论定”（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就是说，主体的推断必须引入“他人的形式”，且只有通过预先确定的他人的主观论定来论定自己，“‘我’是在逻辑时间的功能中通过使与他人的竞争的主观化而定义的”^①，在这里，论定的主体所确证出来的“我”乃是以与他人的互为主体作为参照的，“我”被当作是“他人的他人”，“我”只有在“理解的时刻”才能获得这一主体的形式，如拉康所说，“每个人都是通过他人而抵达真实的”^②。这看似是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的另一种表述，而实际上拉康在此强调的是主体自我确证时刻的“集体逻辑”，这一逻辑最本质的价值不在于由他人指认出主体自身，而只是指认出了主体的形式，即那个不确定的“我”的形式特征，因此这只是一一种非主体性的主体。^③

在《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中，拉康并未直接讨论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但其对主体性的确证的论述仍延续着 30 年代从社会关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70.

② Ibid., p. 173.

③ 对拉康的这篇论文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布鲁斯·芬克的论文《逻辑时间与主体性的预期》，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s I and II: Lacan's Return to Freud*, pp. 356-386.

系——现在被视为主体对主体的关系——探讨主体问题的主题，只是在论述中加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时间性的维度。这一改变自然有着科耶夫式的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预示了他后来的思考的一个基本向度，那就是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中来探讨主体及主体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一文在拉康的文本史中的地位决不亚于《镜像阶段》。拉康后来曾多次提及这个极具智性色彩的博弈游戏，如在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他把这个逻辑推断的故事引入了精神分析的情境：分析师占据着监狱长的位置，通过邀请受分析者去解决其处境之谜而承诺给予他“自由”，在这里，分析进程中“推断的时刻”的到来有赖于分析师在主体间的话语中如何进入“理解的时刻”，即如何在弹性时间的会谈中把无意识主体从无有意义的虚言导向创生意义的实言。

在文章的结尾，拉康论及“集体逻辑”时提到了这一逻辑可用于精神分析实践的“情结”运作，而在1966年该文收入《文集》时所加的一个脚注中，他又直接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中的观点。这个事后的小动作并非无谓之举——拉康在《文集》中总是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其思想的某种预期的成熟——因为它暗示着他在这个时期对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思考中就已经引入了他者的结构。

1945年9月，拉康到英国做了一个为期五周的访问，对英国在战争期间的精神病学研究进行考察。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法国一年多后，他给刚恢复活动不久的“精神病学的演进”小组做了一个题为“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①的演讲，演讲中，拉康不仅对战争期间英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主义表示了赞赏，而且对英国精神病学家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一项社会试验进行了精神分析化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精神病学家在大后方对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群”加以分类，然后依据各自的特点分配以不同的工作，由一个治疗师进行协助指导，而不是施以权威式的领导或压制，结果发现各个分组都可以独立地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拉康在这个社会试验中看到了

^① 该演讲1947年发表于“精神病学的演进”小组的杂志《精神病学的演进》上。

许多令他兴奋的东西，例如他认为这个试验乃是对他在 1932 年所批评的精神病学的体质论传统的有力反驳，也是对他 1938 年所提出的父亲意象的衰落的有力证明；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试验中看到了发展或修正弗洛伊德的自我认同理论的可能性。

1921 年，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文中以两种典型的“人为的群体”即教会和军队为例对群体组织的结构性关系进行了分析，“在这两种人为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通过力比多一方面与领袖（基督、司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①。在前一种（垂直）关系中，个体是将某一对象（上帝或司令）认同为他的自我理想，而在后一种（水平）关系中，个体是在自我的层面相互认同。弗洛伊德的这一群体心理学理论在战后被精神分析学家们广泛用于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群众心理基础，拉康也沿袭了这一解释，但他同时又发挥自己在 1938 年论家庭的论文中的观点指出，在父亲（或领袖）意象已经衰落的今天，弗洛伊德所讲的第二种即水平关系作为连接个体的社会纽带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虽然父亲意象在群体的金字塔式的垂直关系中已失去了其功能，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人的形象在水平结构关系中对于主体的功能也归于无效，相反，后者在现今的主体性认同中构成了更为基本的方面。英国精神病学家和社会试验及其研究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没有领袖的群体中，群体成员可以先通过一种自恋认同，然后通过认同一个共同的理想形象而结合为一个整体。拉康还指出，英国人的试验也向我们展示了弗洛伊德的方法所具有的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即它不仅可以用于说明法西斯主义，也可以用于分析民主制时代的社会关系。

如果说复出后的上面两篇文字在理论上还略显粗拙，那么到 1946 年，拉康便开始恢复他的自信了，这年 9 月他在他的好友亨利·埃伊举办的一个精神病学讨论会上宣读了题为《谈心理因果》的报告，声称自己在战争时代并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并且以一种黑格尔式的口吻说，人类的敌人对权力的迷恋只是又一次帮助了“理性的狡计”的实现，使他不致有负于真理的要求。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78 页。

在这个报告中，拉康对好友埃伊的机体动力论的精神病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埃伊是法国新一代精神病学家的大人之一，他 30 年代初曾师从克劳德在圣安娜医院工作，并且那时他便与“精神病学的演进”小组关系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出任《精神病学的演进》杂志的主编，成为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和拉康一样，埃伊对哲学也有浓厚兴趣，但与拉康的德国趣味不同的是，他对英国的进化论哲学更感兴趣。受到英国神经病学家约翰·胡林格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 1835—1911）的影响，埃伊将来自进化论哲学的机体动力论观念运用于心理障碍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心理生活总要受到个体的机能发展、个体发育、种系发育等等因素的作用。在拉康看来，埃伊的机体动力论学说并没有摆脱体质论的传统，其哲学的基础乃是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而非斯宾诺莎的心身平行论，正是这种二元论使得埃伊得出了“精神疾病是对自由的侮辱和障碍，它们……是完全的心理—遗传的”这种极端落伍的结论。

接下来，在对癫狂的心理发生的思考中，拉康概要地复述了他对埃梅病例的研究，指出这一研究乃是从病人以往经历的全部事实中、从癫狂与人格的关系中来把握精神病的心理因果的，但与 1933 年的研究明显地有所不同的是，拉康在此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强调了“误认的一般结构”（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misrecognition）在癫狂的心理发生中的作用：

这个误认就体现在反抗之中，通过反抗，疯子想要将他心中的法则强加于他眼中的世界的混乱之上。这是一个“荒唐的”事业……因为主体没有看出在这个混乱之中表现出来的正是他实际的存在，因为他所感觉为心中的法则的只是那同一存在倒置的以及虚拟的形象。这样他双重地误认了这个存在，并且恰恰是为了分离这个存在的现实性和虚拟性。然而他只有依靠这个虚拟性才能逃避这个现实性。这样他的存在就被封闭在一个循环里了。除非他以某种形式的暴力来冲破它，经由这个暴力形式，他打击了他视作混乱的东西，但由于社会对他的行为的反击，他的打击最终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①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40.

其实，误认的一般结构不只存在于精神病的心理发生中，而且也存在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人的辩证发展的各个阶段，存在于人的自由及其存在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指出，如果说误认即是人的一种妄想性认识的话，那么，“癫狂决不是由人的机体脆弱这一偶然事实而来的结果，它是在人之本质中开裂的一个缺陷的永久可能性。癫狂决不是对自由的‘凌辱’，它是自由最忠实的伙伴，跟自由如影随形。没有癫狂，我们不仅不能理解人之存在；并且如果人没有将癫狂作为其自由的界限随身带着，人就不成其为人”^①。这样的文字俨然是在讲述一种癫狂的形而上学，在里面我们仿佛听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声音，也仿佛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重音，甚至能听到十多年后福柯在癫狂史的研究中发出的尖利的音响，在这一重音的衬托之下，存在主义的主体观和自由观更像是一首虚无缥缈的悼亡的灵歌。

主体的历史是在一系列的认同中发展的，进而认同的过程显示了“意象”的功能，由此拉康转向了对30年代的镜像阶段理论的修正和重述，这一修正和重述在多个方面显示了他的全新理解。例如，他开始以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把镜像阶段看作是主体存在的最初阶段；他挪用现象学的方法把自我理解为个体形成有关自身与世界的妄想性知识的某种功能结构；他还对弗洛伊德后期即20年代提出的自我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在对镜像阶段的这一重述中，他开始运用“意象”、“格式塔”、“主体异化”、“他人欲望的辩证法”、“人的早产”、“自恋的视觉结构”、“自恋与侵袭性”等等概念，并大量引用1936年以后比较心理学的新成果来说明镜像或意象与认同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三年后以更为凝练的风格被归纳融汇，换句话说，三年后的那个著名文本实际上在《谈心理因果》（1946年）中就已经“完成”了。

《谈心理因果》是拉康在战后发表的又一个重要文本，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拉康对自己此前的学术观点的一个历史性回顾，这一回顾带有明显的谱系化动机，从博士论文到有关家庭的研究再到镜像阶段理论，拉康的叙述贯穿着一个逻辑性的时间运动，通过对此前文本的偷偷修正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44.

和综合，拉康既向人们表明了他的思想连贯性，也为自己进一步明确未来的理论走向，即围绕着镜像阶段的形象（意象）认同，探讨自我或主体（在这个时期，拉康尚未明确地把两者区分开，虽然他也意识到了两者之间可能有差别）发展的时间辩证法，探讨自我或主体在与作为镜像的他人的关系中的异化结构，直至最后揭示出自我或主体的存在“真相”。目标一旦明确，拉康的创造力便变得狂野不羁，正如他在《谈心理因果》的最后不无自负地说道：

我们的时代很流行“超越”经典哲学家，然而我却很想从那篇令人称道的对话《巴门尼德》开始。因为苏格拉底也好，笛卡儿也好，马克思也好，弗洛伊德也好，都是不可“超越”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满怀热忱从事研究，这个热忱就在于揭示有一个对象存在着，那就是真理。^①

第三节 终于到了镜像阶段

如上所说，1946年的《谈心理因果》既是拉康对自己在战前的思想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也是对自己的理论目标的一次明确，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还停留在单纯的接受层面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便开始有意识地加以修正和改造，直至50年代，随着他将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模式引入精神分析学的论述，他才真正开始对弗洛伊德著作的革命性重读。对弗洛伊德的认识的这一系列改变，与拉康自己的思想转变正好是重叠的：1932—1946年前后他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还处在不断了解的阶段，并且这一了解是服务于其精神病学的思考的；1948—1951年左右他已经着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这一修正主要围绕着弗洛伊德的自我观进行，修正的结果便是他对“镜像阶段”理论的重述以及对自我心理学的初步反思；到1953年，随着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这个“三界”理论的提出，“镜像阶段”又被纳入一个新的框架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57.

重新思考，对弗洛伊德的革命性重读和对自我心理学的直接批判也由此开始。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拉康思想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即阐述其“镜像阶段”理论的阶段。这个阶段有三篇标志性的作品，这就是1948年的《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1949年的《镜像阶段》和1951年的《对自我的若干反思》。其中前两篇被收入1966年的《文集》中，不过拉康在编辑时将这两篇作品的顺序作了一个颠倒，意在强调《镜像阶段》一文时间与逻辑上的先行。

1949年7月，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拉康在会上作了题为《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的报告。与1936年的情形不同，这一次他得以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的发言没有被打断。前面说过，1936年有关镜像阶段的发言就像是一个“失窃的”文本，如今仿佛是一次“收复失地运动”，这个文本又回到了失主的手中，但它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文本。尽管一开篇还是使用了瓦隆的材料，且仍然没有提及这个恩主的名字——他用另一位心理学家的名字“替代”了瓦隆的名字，就像一系列能指的滑动，那个所指或者说那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此始终是不出场的——尽管讨论的仍是认同、意象或镜像、“理想的我”的形成这样的问题，且尽管仍采用了黑格尔式的术语，可结构问题的框架、论说问题的方式明显地是拉康式的，已具有了成熟期的拉康风格。由于原始文本的缺席，在两个文本之间做这样的比较也许并不恰当，但如果看一下此前拉康在有关家庭的论文中对镜像阶段的论述，再看一下思想高度浓缩、用词凝练而沉着、论说果断有力的新版文本，上面的比较也许就不算唐突了。

“镜像阶段”的经验材料来自于比较心理学的一项研究，这就是六至十八个月的婴儿与黑猩猩、猴子等动物在情境认知方面体现出的行为差异，例如——拉康描述说——它们都能在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形象，但在黑猩猩和猴子那里，一旦发觉其镜像是空洞的，马上便会失去兴趣，而婴儿的情况就不同，他立即会以一连串的姿态动作作为回应，在这些动作中以游戏的方式体验到镜像中的运动与被反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体验到这一虚设的复合体与它所复制的现实——婴儿自己的身体、

他周围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拉康的这个描述并无新奇之处，它不过是对瓦隆等人的镜子测试的结论的综述。但瓦隆们对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贡献也仅限于此，也就是说，尽管“镜像阶段”的经验材料不是拉康的，但理论却完全是拉康式的，再或者说，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创新并不在于其对这一心理现象的描述，而在于他对这一现象的全新阐释和重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镜像阶段》乃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心理学中的“镜子试验”进行多重强力阅读的一个文本，其阅读的震惊效果就在于他把那个局限于情境认知的心理学素材引入了对构成自我的基本结构的说明，用拉康自己的话说，他要借镜像阶段来揭示“力比多机制……以及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①。

在描述了那一心理学现象之后，拉康立即以一种非经验的诗学方式重述了婴儿在镜像前的行为反应：

还不会自如地行走甚至还无法站立的婴儿被某些支撑物——人或人造物（在法国，我们称之为“宝宝学步车”）——紧紧地支撑着，但他却能在一阵欢快的挣扎中克服支撑物的羁绊，把自己固定在一种微微前倾的姿态中，以便在凝视中捕捉到那瞬间的镜像并将其保持下来。^②

这显然已经是一个神话学的“叙事”：不会行走的婴儿、既是支撑又是羁绊的“支撑物”、婴儿的欢快的挣扎和前倾的姿态、婴儿的镜像及其对镜像的凝视，这一切经由一种非经验的重述而变成了一个神话叙事的种种“单元”，变成了有关存在的某个原型式的“典型情境”，并使得“镜像阶段”脱除了作为婴儿心理发展之一个“阶段”的时间语境，而变成了一个空间迷思的场景，一出镜前魅影的戏剧。

接下来便是对这个“场景”的多重阐释。首先是精神分析化的阐释：

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只能把镜像阶段理解为“一次认同”——在精神分析赋予这个术语的全部意义上说——亦即主体认定一个镜像时发生于他身上的转变。^③

^{①②③}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76.

心理学家们，例如瓦隆以及拉康在文中提到的那些研究者，通常把这个场景解释为“情境认知”的一种表现，即某个智能的存在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和加以认知的某种行为模式，这一解释显然隐含了一个预设，即假定了某个经验的、认知性的自足主体的存在。而拉康的目标就是要颠覆这个预设。通过把那一凝视的场景置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他揭示了婴儿对自身镜像的那种欣悦认定所暴露的某个典型情境下的“象征基型”（symbolic matrix）：

在此，“我”突然被抛入了某种原始的形式，之后，又在与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被对象化，尔后又通过语言而得以复活，使其作为主体在世间发挥功能。^①

在如此高度凝练的句式叠加繁复的语义乃是拉康的拿手好戏，面对这样的语句，也许只有“过度阐释”方可让隐藏在诸如“我”、他者认同的辩证法、对象化、语言、主体等语词背后的鬼影幢幢逐渐显形。这需要一种“知识考古学”的热情。不过，在此我只能割舍这种热情，暂时专注于拉康字面的意思。在拉康看来，镜像认同的核心不是某个自足主体对环境的能动反应，而是空洞的“主体”在镜像环境中被构型的过程，是主体以“我”的形式在镜像魅影中被召唤的过程，其结果便是“理想的我”（ideal-I）的出现。

在精神分析的经验中，镜像阶段被视作是“一次认同”，是“我”的功能的构型，但拉康对“镜子试验”或“镜像阶段”的阐释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而在精神分析经验的基础上又以哲学化的方式对其实施了二度阐释：

这一发展过程可被体验为一种决定性地个体的形成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镜像阶段是一出戏剧，其内在的冲力从欠缺猛然被抛入到预期之中——它为沉溺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生产出一系列的幻想，把碎片化的身体形象纳入一个我称作整形术的整体性形式中——最后被抛入一种想当然的异化身份的盔甲之中。这一异化身份将在主体的整个心理发展中留下其坚实结构的印记。从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76.

此，从 Innenwelt（内在世界）到 Umwelt（外在世界）的环路的断裂，将给自我求证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扰。^①

这又是一段需要过度阐释的超级文本，当然这不是说它里面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梦呓和狂想，恰恰相反，它就像一个结构森严的语词之城，个体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主体的认同与身体的整形术、异化的身份与自我的确证，还有欠缺与预期、（被）抛入与投射，通过一种特殊的时间逻辑被勾连在一起，且处处闪烁着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灵光。这是最为典型的“野性的思维”，是对语词的劫持，语词的意义从固有的历史凝滞中被解放出来，形成为一个个的意义碎片，沿着时间的切线在文本中穿梭、滑行。

如果说在精神分析经验的层面，镜像认同还主要被阐释为个体的一种心理现象，一种欲望的投射和形象的凝注，那么到了哲学化的层面，这一现象进而又被阐释为主体世界的一种“本体论结构”，它既呈现了主体与由他人所构成的社会情境之间的空间辩证法，也呈现了主体在自身发展或历史中的时间辩证法。

镜像阶段是一出戏剧，是个体的形成被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亦是串联戏剧幕间的逻辑线。而“预期”的投射和“体验”的回溯则构成了剧中人物的行为，也决定了这个人物过去和将来的命运，即：由于他是通过预期来产生将来，通过回溯来产生过去，使得他的命运注定是被抛入的、不由自主的；又由于这一系列的预期和回溯都为一个“虚设的复合体”、一个被整形的幻象即镜像所主导，使得这个人物注定要为虚幻的、异化的身份盔甲所困扰，其对自我的确认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误认。

如果说精神分析化的阐释和哲学化的阐释是拉康围绕着镜像认同与自我的形成来阐释镜像阶段的两个水平角度，那么，在这两个角度之上和之外，拉康还沿着纵深的方向探讨了这一认同的机制及其对自我或主体的影响。

在讨论镜像认同的机制的时候，拉康引入了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意象”（*imago*）。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78.

按照戴兰·埃文斯 (Dylan Evans) 的解释, 拉丁词 *imago* 是 1911 年被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 后成为精神分析学的标准术语, 这个词虽然与“形象” (*image*) 一词有关, 但它意在强调“*image*”的主观决定作用, 换言之, 它既包含情感, 也包含一个视觉表象。在荣格学派那里, “意象”尤其指他人的“形象”, 例如荣格就提到过父亲、母亲和兄弟的“意象”, 不过, 它们并非纯粹个人经验的产物, 而是可在每个人心中实现的普遍原型。^①

拉康在 30 年代就已经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象”这个词——那时他时常把“意象”和“形象”等义地使用——例如在 1936 年的《超越“现实原则”》和 1938 年论家庭的论文中, “意象”连同“情结”一起是拉康的两个核心概念, 其中他特别地强调了“意象”的“赋形” (*in-form-ation*) 功能, 即赋予主体某一形象并使其认同于这个形象, 而正是“意象”的这一功能使得它成为了情结的重要构成要素, 每一情结总对应着某一类特定的意象。到 40 年代末, 虽然“意象”和“情结”这两个词在拉康的著作中还在使用, 但两者间的联系不再像在 30 年代那么紧密。

拉康把个体的镜像阶段理解为“一次认同”, 那么认同什么呢? 认同镜中的形象或称之为镜像。但这里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 第一, 所谓“镜中的形象”或“镜像”不仅指凝视的个体和外在之物在镜子中映射出来的物理的或光学的可见之像, 尤其指这一个体通过自己的力比多投射在那一物理的或光学的可见之像中所结构出来的心理的或想象的理想形象, 亦即所谓的“意象”, 认同就是对这一意象的认同; 第二, 认同不是模仿, 不是个体单纯地对认同对象的复制, 相反, 认同是个体与形象之间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 即一方面, 就个体而言, 他是把自己的力比多能量转换为对他者的欲望, 然后再通过将他者形象即意象理想化和对象化来实现与他者的同一, 而另一方面, 就形象或意象而言, 它虽然是个体沿着虚构的方向想象出来的结果, 但其对于个体反过来又构成一种强大的构型力量, 使个体将它视作自身的一个抽象的对等物, 以其理想的形式回复到自身内部, 从而建构起一个统一的自我整体。“因此,

^① 参见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84.

我将镜像阶段的功能视作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这一功能就是要在有机体与其现实之间——或者如他们所言，在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引入格式塔心理学的“格式塔”（Gestalt，又译“完形”）概念将意象的建构功能称作是一种“整形术”，即婴儿通过镜中的意象以一种预期的方式把自己的不成熟的、动作尚不协调的、碎片的身体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协调的整体，由此而形成有关自我的理想统一体的幻象：

事实上，主体在幻象中借以预期其力量的成熟的完整的躯体形式，仅仅是作为格式塔而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得的。在那里，这一形式当然是构成性的而非被构成的。……就这样，这种格式塔——尽管其动力式样还不甚明了，但其完形的作用仍应视作同物种密切相关——通过其外表的这两个方面，象征着“我”的心理持久性，同时也预示着其导致异化的结局。^②

在此，同样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第一，如上所说，虽然镜像认同既关涉主体的方面，也关涉意象的方面，但拉康强调的只是后者，就是说，在认同过程中，他看重的是意象的建构功能，并且重视的还是这一功能的否定性方面，这与他的非主体性的主体哲学观念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既然镜像认同所实现的是主体的自我构型，那身体的意象在这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拉康对碎片化的身体意象的痴迷只是一种个人趣味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简要来说，拉康的用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将碎片化的身体经验视作是婴儿在前镜像阶段的自我状态的一种隐喻，身体动作不协调的事实表明人的身上存在一种“特殊早产”的现象，身体和心智还未发育成熟就来到世间，因而只能在幻想中通过预期来想象自身力量的成熟，以抵御自然的时序，或者说以预期来影响“自然的成熟”。这样，镜像阶段的婴儿通过意象的整形功能来“克服”其碎片化的身体经验的时刻就成为主体或自我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同时，这个整形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78.

^② Ibid., p. 76.

所获得的统一协调的身体意象毕竟是想象的，是一个幻象，碎片化的身体经验并没有被真正克服，其与完形后的理想的身体形象之间的分裂以及主体对这一分裂的体验便构成为自我产生之始的一个原罪式的原始胎记。

另一方面，拉康对碎片化的身体意象的强调也是为了把自我的镜像认同引向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侵袭性：“当精神分析活动抵达个体的某个富有侵袭性的断裂的层面时，这种碎片化的身体……常常会在梦中出现。那时，它总是呈现为断裂的肢体形式，或是外观形态学中所表现的器官形式。……但这种形式在有机体的层面，在决定歇斯底里的幻觉构造的‘破碎化’路线中，甚至都有具体的揭示，就像在精神分裂症和阵发症状中所表明的。”^① 关于这个问题，拉康在前一年发表的《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中有更系统的阐述。

认同是个体与对象之间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其结果体现在个体的方面就是“理想的我”的形成和完整的身体意象的呈现，体现在对象的方面则是作为对体或镜像的他人形象的理想化，但镜像认同的后果远非如此就可以说明的。由于“理想的我”的形成是沿着一个想象的、虚构的方向完成的，也由于完整的身体意象只是个体借助于心理的预期而获得的一种完形形式，因此，在镜像认同中获得的所谓同一性根本上是一种“误认”（méconnaissances）。所谓“误认”，就是把本来属于想象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把本来属于他者的属性当作是自己的，把本来属于外在的形式当作是内在的，就像面对镜像的婴儿，他内在的身体经验本来是破碎的、不协调的，但却在视觉格式塔的完形作用下获得了完整统一的身体形象，并将这一外在形象预期为是自己必将拥有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其的欣悦认定。

而更根本的是，个体不仅在空间的辩证法中通过与镜像的循环往复来完成理想之我的构型，而且还在时间的辩证法中通过预期把这一理想之我投射到自己未来的形象中，形成一个理想的主体。拉康说，这种误认机制给自我或主体带来的只能是“异化”：它给沉溺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产生出一系列的幻想，将其抛入一种想当然的异化身份的盔甲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78.

中，而自我的理想形象与现实的经验之间的不协调，或者说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环路的断裂，将给自我的求证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描述“镜像阶段”就像一座“堡垒”或一个“竞技场”，四周是沼泽和荒野，主体在那里陷入争夺高耸的、遥远的“内部城堡”的斗争。显然，这既是一个精神分析化的意象：它其实是拉康为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描画的一个结构图；也是一个有关主体的异化命运的神话场景：个体用“我”来呼召自己的时刻即是主体宣告诞生的原初时刻，这个“诞生”因为误认而伴随着一种创伤，一个裂口；也许我们还可以做出“过度”想象，把这个场景视作是拉康对自己的精神分析事业的一个“预期”：一定程度上说，精神分析的经验就是一种“侵袭性”的经验，想必拉康会认同这样的精神分析“形象”，侵袭性不仅会把个体带入自身历史的特定结构中，也会把与个体相关联的他者世界带入无穷无尽的争夺城堡的战斗中，拉康与精神分析学的建制和组织——国际协会、法国学会以及他自己的学派——之间的种种纷争恰好可以描述为这一表现自我侵袭性的场景。

需要指出的是，《镜像阶段》的主题并不是主体的认同本身，而是主体在认同中所实现的“我”的功能构型，或者说自我与主体的离心化本质。所以，拉康在论文之始就指出了他思考镜像阶段的理论指向：反对直接源自“我思”的哲学。在论文的最后，他又回到了这里，将目标直指“我思”的理论传统，并且，与他从精神分析学的层面和哲学的层面来解读镜像阶段相对应，在这里，他也对“我思”传统现时代在这两个层面的表现进行了批判。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在其思想发展的前后期有很大的不同：在1910年后的一系列论自恋的作品中，他提出了一种“自恋的自我”，这一自我把自身当作一个力比多对象，从而导致了自我与他人的对抗，导致了主体的分裂；而在20年代有关人格结构图的论述中，他又提出了一种“现实的自我”，这一自我处在追求快感原则的本我与要求现实原则的外界力量的双重挤压下，充当了调解冲突的“代理机构”，即在既不损害现实原则又不危害本我的快感满足的前提下来维系两种力量的平衡，这样，自我便成为一个多少接近于理性的稳定的实体。后来，安娜·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的自我心理学在这第二种自我观的基础上

把自我发展为一套抵御外界压力的防御机制，自我成为一个自主的实体。对于这两种自我观，拉康的态度十分明确，赞成前者而否定后者。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早期的自恋概念不仅揭示了“自恋力比多与性欲力比多之间的动态对立”，而且可以解释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之间明显的联系，可以解释自恋力比多与“我”在同他人的关系里，甚至是以乐善好施为目的的关系里所流露出来的侵袭性之间的明显联系。而对于后一种自我观，他则以一种激进的姿态给以了直接的批评：

分析经验教导我们不要把自我看作“知觉—意识系统”的中心，或者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而成的——此原则正表达了对知识辩证法最充满敌意的科学偏见。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把“误认功能”作为出发点，这一功能体现了安娜·弗洛伊德在所有防御结构中明确地阐述的自我的特征。^①

在哲学的方面，他则把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当作靶子。他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虽然宣告了“存在的否定性”，但它却是在“意识自足”的限度内来理解否定性的，而“这种意识自足是与构建自我的误认以及将自己委身于其中的自主幻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对存在主义的评判必须以它为主体的困境提供的证明为基础，而这一困境其实就是从那个证明中产生的：那是一种只要处在监狱高墙内便无法得到真正确证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无力克服任何情势的介入要求；一种理想化的窥淫—施虐式的性关系，一种只有在自杀中才能达成自我实现的个性；一种只能在黑格尔式的谋杀中得到满足的他人意识。^②

《镜像阶段》对自我的自恋性认同的思考让拉康认识到了自我构型中虚构和异化的性质，使他找到了攻击理性自我的堡垒的入口。而在《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中，拉康通过对自恋认同与侵袭性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分析深化了这一主题。《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是作者于1948年5月中旬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一届法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的报告，从时间上看，它的发表要比1949年的《镜像阶段》早一年，可从

①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80.

内容或理论逻辑上看，它却是后者的延伸和扩充，因此在1966年编排《文集》的时候，拉康把《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放在了《镜像阶段》的后面。

其实，从思想的缘起上说，自恋性认同与侵袭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拉康的理论发展中具有某种共生性。早在30年代初作为精神病学家的拉康刚刚进入精神分析领域的时候，他就涉及了这个问题，埃梅和帕品姐妹的病例都属于与自恋性认同有关的“自罚妄想”，都与侵袭性有关，但那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基本上还局限在精神病学的范围，精神病犯罪或侵袭性主要还是被当作一种病理现象来考虑。而到了《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中，这一主题被置入了更大的理论语境中，侵袭性被纳入了人类学的视野，被看作是主体的一种生存论结构。

再有一点，主体的侵袭性是精神分析理论与临床中常常提及的一个问题，阿德勒早在1908年就提出了侵袭冲动的假设，弗洛伊德在思考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抵抗时也曾把侵袭性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量，而在20年代的死亡驱力理论中更是把侵袭性置于重要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侵袭性的思考在精神分析学界甚为流行，拉加什、克莱茵等都介入过这一主题，而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理论乃是他们共同的入口，在这一点上，拉康也不例外。

拉康说，他对侵袭性的思考乃是源于弗洛伊德在生物学层次阐述人类经验时所遭遇的一个“疑难”。这个“疑难”的本质就是：面对人类经验中时常出现的重复强迫、仇恨、爱恨交织、破坏欲这类顽固的现象，依靠单一本能的理论很难做出说明，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必须设想人的身上存在两种基本的本能，即力图维护生命或机体的统一的爱欲本能和企图摧毁生命、使机体复归于无生命状态的破坏本能，前者被称为“生的本能”，后者被称为“死亡本能”。侵袭性即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何谓“侵袭性”(aggressivity)? 拉康给出了五个描述性的论题，这些论题传达的意思很明确：侵袭性不一定指攻击性或侵犯性的行为，它更多的时候显现为一种精神意向。在精神分析的经验中，侵袭性的意向可以有无数的表现方式：在受分析者的苛求的语气中，在其话语的停顿、迟疑、音调变化和口误中，在他的叙述错误中，在他参加会谈时的

迟到和故意缺席中，在他的指责、批评、虚妄的恐惧、愤怒的情绪反应和威胁中。更重要的是，侵袭性不只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出现，而且是存在于人类主体当中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结构，只要有两个人存在，侵袭性就必定会有所呈现，即便在理想主义者、改革家、教育家，甚至在慈善家的行动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那隐蔽的侵袭性意向。

侵袭性不一定要付诸具体的行动，相反，它常常显现为精神结构中的隐蔽的意向，那么，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些意向呢？或者这些意向以何种方式来发挥其侵袭的效果呢？拉康说，侵袭的效果可以反映为一些形象，尤其是碎片化的身体形象，它们构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象：“在这类形象中，有一些代表了侵袭意向的选择性向量，并赋予其一种可称为魔术般的功效。这就是阉割、截肢、肢解、脱臼、剖腹、吞噬、炸裂的身体等形象，简单地说，就是我个人归入‘碎片化的身体意象’名下的那些意象，这些意象显然是结构性的。”^① 这类意象不仅会出现在精神病人的梦和幻想中，而且会出现在儿童的某些故事和游戏中，出现在诸如荷兰画家希洛尼姆斯·鲍希（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的笔下，还会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文身和割礼以及文明社会的时尚行为中。“与意向相关联，意象是永久地存在于我们称之为主体的无意识的那个象征性的多元决定层面的。”^②

意向性、主体间性、碎片化的身体意象，这便是拉康对侵袭性的基本特征的描述。那么，侵袭性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问题把拉康引向了其思考的核心：侵袭性与自我的自恋性认同的关系。拉康称这一思考乃是从“经验的现象学”到“元心理学”的飞跃，并将其表述为“论题四”：

侵袭性是一种与我称为自恋的认同模式相互关联的倾向，这种模式决定了人的自我的形式结构，也决定了人的世界所特有的实体域（the register of entities）的形式结构。^③

在这里，拉康强调了镜像阶段的自恋性认同的两个本质方面：它决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85.

② Ibid., p. 88.

③ Ibid., p. 89.

定了人的自我以及人的世界所特有的实体域的形式结构。即一方面，自我通过认同于与自身相异化的镜像而将一个“他人”引入了自己的形式结构中，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即是一个他人；另一方面，这一认同也是自我对对象实施的一种“形式的凝定”（formal stagnation），通过这一凝定，自我得以把混乱的经验世界组织为人类知识的普遍结构，“这种形式的凝定类似于人类知识最普遍的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使自我及其对象具有了持久性、同一性和实体性等特质，简言之，具有了实体或‘物’的特质……”^① 拉康这里的意思是说，自恋性认同不仅建构了想象性的自我，而且建构了想象性的对象，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对于自我的经验其实是同一的，因此，我们有关自我和世界的知识根本上就是一种“妄想症知识”（paranoiac knowledge）^②。

正是由于自恋性认同的这两个方面，镜像阶段把主体纳入了一个由他人和自我构成的结构关系中，由此而将主体带到了一个结构性的十字路口：

在这儿有一个结构性的十字路口，我们要想理解人身上的侵袭性的本质以及它与人的自我及其对象的形式结构的关系，就必须使自己的思维适应这个十字路口。正是在这种爱欲关系中——在其中人类个体把注意力固着于一个使他与自身异化的形象上——我们发现了能量和形式，个体对他称为自我的那些情感的组织就来自于这种能量和形式。^③

自我与其镜像的关系是一种爱欲式的关系，因为它对镜像有一种欣然的认同，但同时这也是一种侵袭性的关系，因为它所认同的终究是一个与自身异化的形象，因为它在镜像认同中形成的统一协调的自我形象与它在现实中体验到的碎片化的身体经验之间的不一致终究会将它从魅惑的、痴迷的凝视中惊醒。根本上说，侵袭性乃是自恋的认同模式所固有的一种倾向，自我在看似的爱欲关系中用以组织自身情感的那种能量和形式必定也是将主体引向对自身和他人的侵袭性关系的能量和形式：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90.

^② *Ibid.*, p. 91.

^③ *Ibid.*, p. 92.

这种形式凝结于主体的内在冲突的张力中。此张力终将唤醒他对他人的欲望对象的欲望：在这里，原初的协作迅速演变为侵袭性的竞争，并由此而生发出他人、自我和对象的三元组。这个三元组在奇观式的共享空间中闪烁着，并以其自身的形式结构铭刻在其中。^①

最后，拉康从文化的方面思考了侵袭性的特定表现。他说：在现代社会的“常规”道德中，侵袭性常被混同于力量这个优点，仅此就足以见出侵袭性在我们的文明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把侵袭性理解为表达了自我的发展，因此它在社会中和道德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例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就是这样一种推崇侵袭性的社会理论，它不过是以最强悍的捕食者有为其天然猎物而竞争的自由作为口实来为其弱肉强食辩护的。可在拉康看来，这种在自由竞争掩饰下的个体主义的膨胀在社会中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例如，“很显然，在我们的生存中对自我的推崇——与强化它的那种有关人的功利主义概念相一致——最终导致更进一步地将人实现为个体，也就是说，导致一种更近似于他的原初被抛状态的灵魂的孤立状态”^②。

拉康还指出，其实在达尔文之前，黑格尔就预见到了我们社会的铁的法则，并在人类本体论的层面对侵袭性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论，那就是以主奴斗争来推断我们的历史的进程，进而在这一进程的危机中揭示出由西方有关人的地位的诸种最高形式所代表的综合：从斯多葛派到基督徒，甚至到未来的普遍国家的公民。可是，在这些综合中，自然的个体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事实上死亡之于他即是绝对主人，在这个主人面前，人类主体不过是虚无。人的欲望只有通过他人的欲望和劳动的中介才能获得满足。即便在主奴冲突中关涉的是人对人的承认，这种承认也是以对自然价值的激进否定为基础的，不论这否定是表现在主人的严苛暴政中还是表现在劳动的生产暴政中”^③。

拉康在镜像阶段时期的第三篇文章《对自我的若干反思》乃是已于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92.

② Ibid., p. 99.

③ Ibid., pp. 98-99.

1951年5月2日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的一个报告，1953年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①从内容上说，它实际上是前两篇文字的合成，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他用来连缀那些内容的主线或者说视角有所调整，自我的“否认”（*Verneinung*, denial）或误认功能成为关注的中心。

文章一开篇就直接点出了弗洛伊德有关自我的两个明显冲突的表述：“在自恋理论即力比多经济学的概念中，自我与对象并置而立。力比多投注在某人自己的身体上这一馈赠带来了疑病症的痛苦，而对象的丧失导致了一种抑郁张力，这一张力甚至可能引致自杀。另一方面，在知觉—意识体系发挥功能的拓扑学理论中，自我又与对象共处一室抵制本我，亦即只由快感原则所主宰的冲力的联合。”^②拉康指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抛弃天真的现实原则概念去思考自我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分析语言结构中自我或是作为动词的主体或是作为描述动词的主体这一不同功能，拉康发现，语言中所表现的存在关系其实是一种否定的关系，自我表达自身的首选方式就是“否认”：

我们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当某人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是因为它就是如此，当他说“我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恰恰是有意思；我们知道如何在最“利他主义”的陈述中、在同性恋的嫉妒情感的潜流中、在隐藏在貌似恐怖的乱伦动机背后的欲望张力中确认潜藏的敌意，我们已经提示过，表面的冷淡可能掩藏着强烈的潜在动机。虽然在治疗中我们没有迎面遇到这些阐释所诉诸的激烈敌意，但我们确信我们的研究证明了一个哲学家的警句，这个哲学家说，发出言语恰恰是为了掩盖思想，我们的观点是，自我的本质功能几乎就是系统地拒绝承认现实。^③

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拉康分别考察了否认、拒绝承认或误认在侵袭性的意向、镜像认同以及精神分析经验中的功能体现，这一考察虽然没有给镜像阶段理论带来更多新的东西，但论述角度的改变预示着拉康的

① 参见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3, volume 34, pp. 11-17.

② *Ibid.*, p. 11.

③ *Ibid.*, p. 12.

思想正在发生重要转变，那就是对语言或言语的关注，他已经开始在言语情境中来思考精神分析经验，到1953年，这一转变最终完成。

从40年代中到50年代初，是拉康密集地阐述其镜像阶段或自我认同理论的时期，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地拉出“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帜，但其阐述已显示了他强烈的回到弗洛伊德文本的要求，而其中他对弗洛伊德前后冲突的自我理论的重述也显示出他急切地偏离“正统”的倾向，应当说，拉康后来对自我心理学的激烈批判在此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有关这一批判的具体内容，我在后面会详细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法国精神分析学界就恢复了活动，玛丽·波拿巴回到巴黎，操控着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内政外交，亨利·埃伊重组“精神病学的演进”，为拓展法国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而努力。1947年，埃伊提议创立一个国际性的协会负责定期组织世界精神病学大会。这一提议得到许多学会的同意。1950年秋，第一届大会在巴黎召开，十余个国家约四十个学会参会，与会者达1500多人。参会的法国分析家包括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主要人物：玛丽·波拿巴、博雷尔、勒内·拉福格、埃斯纳、布朗·列弗切-约弗、雅克·拉康、萨卡·纳什特、丹尼尔·拉加什等，还有更年轻的第三代分析家。尽管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反对，但埃伊还是邀请了阿德勒学派和荣格学派的代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主席及美国精神分析运动中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被邀致开幕词。亚历山大还推荐邀请安娜·弗洛伊德，安娜同意赴会。埃伊也想请克莱茵赴会，可克莱茵由于不满埃伊先邀请了安娜而回信拒绝，于是埃伊耍了一个花招，他告诉克莱茵是亚历山大推荐邀请安娜，而他也希望在会上两个对手都能发言，克莱茵最终接受了邀请。

这真是一个节日般的盛会。名流云集，各家各派华山论剑，热闹异常。会议安排的活动也十分丰富。一天晚上，与会者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又一个晚上，他们出席了一个节日表演。会议临近尾声时，他们在爱丽舍宫受到法国总统的接见，最后他们还出席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当男人们争论着新弗洛伊德主义、身心疾病、克莱茵主义的时候，他们的夫人则四处观光购物。

战争已经改变了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格局。1949年的苏黎世大会

开始为美国人所主导，德国人在精神分析帝国中已完全失势，法国人的处境还未见改观，仍被视作一个配角，且在英美人士及安娜·弗洛伊德的眼里，其合法代表依然是玛丽·波拿巴，拉康、纳什特、拉加什等第二代则不受重视。在这个时候，安娜与克莱茵的斗争并未终止。克莱茵的思想主宰着英国学会，而安娜的思想得到了美国人的拥护，在这当中，法国人似乎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有自己的不同倾向，如纳什特代表着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保守派的医学理想，拉加什则是学术自由主义者，想把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拉康虽然与克莱茵有相通之处，但他对克莱茵做了相当大的修正，并且他也很少承认自己曾受到克莱茵的影响。

虽然在这时拉康的身边已会聚了一些追随者——他们将是法国第三代分析家的代表——但他在国际精神分析圈子里仍未得到理解。因为波拿巴的关系，安娜一直不喜欢拉康，认为他的理论是“妄想狂的”，太过晦涩而无法合并到法定的弗洛伊德主义中。至于克莱茵，她对拉康所说的那些东西也不感兴趣，觉得它太难以理解，不可翻译，且对她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克莱茵也清醒地意识到，拉康对她的思想在法国的传播是有帮助的，她知道他在年轻一代的分析家当中是有影响力的，因此她在苏黎世大会上还是同拉康建立了一些私人联系。在拉康方面，他很想得到克莱茵的支持，为讨好对方，他在苏黎世答应将克莱茵的著作《儿童的精神分析》（该书于1932年同时在维也纳和伦敦出版）从德文翻译成法文，克莱茵顺水推舟表示同意。

但是回到巴黎后，拉康便把原书交给了一个正在接受他的分析的“病人”去翻译。不久，该书的前半部分翻译完毕，译者把译稿交给拉康，从此便没有了下文。1951年秋拉康又委托另两位精神病学家（他们是一对夫妇）翻译该书的后半部分，并说他已经完成了前半部分（而实际上他一个字也没有做）。夫妇俩立即着手工作，他们请拉康把译稿的另一半给他们，以便能比较两个译本并确信翻译的术语前后一致。拉康四处寻找手稿，都没有找到。这件事令拉康在克莱茵及其支持者那里信誉扫地，两人的关系宣告破裂。

在1950年的巴黎会议上，拉康就对美国自我心理学的“新政”进行了猛烈攻击，在那时的法国，反对这种新政并不止他一个人，所有第

二代分析家都反对美国学派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主义阐释。不过，在这一对抗中，拉康占据着一个先锋的角色和位置。与他的同伴们相比，拉康拥有更强大的装备——他不仅拥有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技术，还拥有黑格尔的辩证法，且正在收编更加新式的武器即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学——他所需要的只是时机。



第四章

精神分析的政治

虽然拉康是以宣告“回到弗洛伊德”开启其革新精神分析学的事业的，然而，他的事业自一开始就招致了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国际精神分析运动中，尤其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它总是扮演着“正教会”的角色——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强有力对抗，他的事业与精神分析世界之间的交叠重合，是与一系列的排斥和驱逐纠缠在一起的。可以说，自50年代初一直到拉康去世，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返回”始终离不开精神分析建制对他的“排斥”，“返回”与“排斥”在此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共生关系，演绎着那个妄想性主体的事业传奇和思想传奇。

“回到弗洛伊德”，在这个口号之下，拉康扭结了一系列的任务，比如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重述等等，而构成其纽结点的则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正如拉康自己一再地强调的，他的所谓“返回”并不是对弗洛伊德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科学基础上来重新开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发现的伟大意义，那就是要完成对传统的笛卡儿式的自主主体的倾覆，让主体的分裂从此成为包括精神分析学在内的所有主体性思考的出发点，为此，他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作为“返回”的技术引入到精神分析的场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借此使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成为现实。

可是，在法国和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的世界里，拉康的这一理论革新的重大意义并未获得确认，相反，那个保守的建制看到的只是拉康激进的差异化对建制的权威可能带来的危害，其对拉康的排斥和驱逐与其说是基于单纯的理论与技术的分歧，不如说是基于建制自身的政治需

要，是基于建制对内部各派的政治利益的考量。实际上，在拉康之前，在弗洛伊德还在世的时候，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就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政治斗争，并且每一次也都引发了共同体的分化甚至分裂，但在拉康这里，这种后果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在这一章，我将讲述这一系列排斥和驱逐的故事，就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本身而言，这亦是它一次次内部分裂的故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又一个传奇性的文本，个中的许多细节至今仍掩埋在一片迷雾之中，当事人和后来的传记作家们的讲述与其说是对源头的追述，不如说是对那个传奇故事的不断续写，这使得任何的讲述都有可能构成对拉康的又一次“排斥”——可不这正是那个妄想症主体所渴望的吗？！那个主体不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排斥中获得重生的吗？！他不正是在排斥之后又总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归来吗？！

第一节 大决裂

1953年7月16日，丹尼尔·拉加什、拉康、弗朗西斯·多尔托（Francoise Dolto, 1908—1988）以及著名作家让·茹弗的妻子布朗夏·勒韦肖等因不满纳什特的专权宣布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长达一年多的争吵最终酿成了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第一次大决裂。

为了便于看清这次决裂的态势，我们先要回顾一下50年代初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内外形势。

对于国际形势，前面已经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逐渐移到了北美，1949年的苏黎世大会已基本为美国人所主导。同时，由移民分析家所创立而在北美扎根壮大的自我心理学学派已成为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主流。在这样一个格局中，法国人在整个国际精神分析运动中仍被看作是一个配角，并且在英美人士的眼里，其合法代表依然是与弗洛伊德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玛丽·波拿巴，尽管她的地位在法国集团内部早已被边缘化了。至于纳什特、拉加什、拉康等所代表的法国第二代分析家，他们在国际运动中的地位仍未完全确立。

就内部形势而言，亦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是在两个阵营——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文学集团和以精神病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家共同体——当中展开的。二战结束后，文学集团的先锋性为哲学集团所取代，萨特、梅洛-庞蒂、巴什拉乃至神学界成为吸纳精神分析学的主力军——虽然他们对精神分析学总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至于医学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其内部结构就已经发生变化，随着第一代分析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有的流亡，到二战结束时，他们的有生力量已所剩无几，第二代分析家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并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主导力量。

与第一代分析家顽固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并坚守纯洁的科学理想和道德理想不同，出生于 20 世纪之初的第二代分析家身上很少有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他们对精神分析学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至少他们的精神分析科学化的诉求背后不再有文化和道德怨恨的基调，而是让它更理性地指向了医学实践的有效性。对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这种放弃不仅给新一代分析家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修正精神分析学提供了多样的可能，而且使他们与国际运动对接的欲望显得比以往更为强烈。这种对接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建制的方面和理论的方面。在建制的方面，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当然地隶属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是国际协会的成员学会，严格地遵守着国际协会的章程和它所确立的技术标准，没有人想到过要去挑战这个绝对的权威——因此，当拉康后来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注定会在法国内部引起担忧；至于理论的方面，与建制上的绝对服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代法国分析家在理论上显示了更强的自主性，他们没有卷入国际运动内部克莱茵派与安娜派之间的斗争，而是沿着自己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传统来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阐释和修正，当然他们与国际潮流之间的互动也时有发生，例如拉康对克莱茵的吸收和改造，纳什特对美国的自我心理学的间接回应，但总体上说，法国人对自我心理学的那一套较少抱同情态度——在这一点上，拉康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自我心理学的激烈批判对于法国人而言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非凡的叛逆意义，他至多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激进分子。

进一步地，说到第二代法国分析家自身的情形，在 50 年代初，纳什特、拉加什和拉康可以说是他们当中的“三剑客”。三人都接受过洛

文斯坦因的分析，都曾承袭法国动力精神病学的传统，都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且三人对精神分析学都抱有科学的热情。但在精神分析学未来的走向上，三人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纳什特坚守传统的医学理想，致力于为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制定标准性的规则，属于第二代中的技术保守主义；拉加什则基于一个大学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想把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临床心理学”，属于典型的学术自由主义；拉康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他总是以一种“知识恐怖主义”的策略把诸如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数学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术资源整合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意欲实现精神分析的伽利略革命和牛顿革命，即把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进一步推向“科学化”的方向，属于知识激进主义。

与拉康同年的萨卡·纳什特出身于罗马尼亚一个乡村的犹太家庭，在六岁的时候就梦想着做一名医生。1920年他移民巴黎，继续在罗马尼亚就已经开始的医学学业。1925年，他开始接受洛文斯坦因的培训分析，这一分析持续了两年半，最后于1928年他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普通会员，1929年成为学会的专职会员。这样，在28岁的时候，纳什特就成为了第二代分析家中最早拥有那一头衔的培训导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纳什特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声誉比拉康大，但他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圈子以外少为人知。1936年，他同拉康一道出席了捷克的马里安巴德大会，但在会上没有发言。会后他去了维也纳，因为他已与弗洛伊德约定要接受大师的分析，但由于语言障碍，两人无法交流，弗洛伊德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海因兹·哈特曼（Heinz Hartman, 1894—197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什特加入了抵抗组织，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解放后，他在占领时期的事迹使他赢得了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尊重，1949年，他当选为巴黎学会的主席。起初，玛丽·波拿巴对这位竞争对手没有什么好感，曾称他是“奸商”，但后来两人在反对拉康的崛起上又一度结成了同盟。纳什特与拉康也一度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例如纳什特上任不久便成立了一个教学委员会，委托拉康起草这个委员会的章程；又如1952年纳什特再婚时，拉康和西尔维亚应邀分别担任男方和女方的证婚人。

纳什特是一个神经精神病学家，他对精神分析的运用主要着眼于神经症的治疗，但与弗洛伊德强调受到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在神经症形成中的作用不同，纳什特更为重视自我的综合功能，重视从个体自我与自己的内在世界和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来寻找神经症的原因，认为神经症是人格发展出现紊乱的结果，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通过重建自我的功能尤其通过强化自我的防御机制来重建完整的人格。纳什特的这些观点看似与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十分接近，而实际上有着浓厚的动力精神病学的支撑，且在理论方面也谈不上有自己的创新。不过，理论重建本来就不是纳什特所致力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为精神分析治疗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因而他真正关注的是分析师的道德、分析规则、教学分析的原则、分析的程序、分析过程中如何处理移情与反移情的关系等实际的问题，1957年他组织编写的《今日精神分析》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详尽阐述。

丹尼尔·拉加什比拉康和纳什特小两岁，并且与后两位一开始就走上医学道路不同，拉加什在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学习哲学，所以保罗·尼赞、萨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乔治·冈奎汉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这些后来在法国知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他的同学。那个时候，高师的这帮哲学才俊特别喜欢到圣安娜医院听著名心理学家乔治·杜马的课，但只有拉加什因此而改行走上了医学的道路。1934年，拉加什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并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因为他已经在1933—1936年接受了洛文斯坦因的培训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加什的学术兴趣与拉康有诸多重叠之处，例如钟情于德国思想，尤其喜欢阅读雅斯贝尔斯和现象学家的作品；关注疯癫和犯罪学的问题；对法国同行的沙文主义不屑一顾；重视语言与特异人格的关系；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意义；等等。但两人的学术路径却迥然不同，一个囿于大学的学术理想，企图在纯学术的意义上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综合在一起，而另一个则受到寻求文化革命的先锋文人的激励和启迪，企图以一种史诗般的手法重新开启精神分析学的文化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加什也曾投身于抵抗运动。战后他又回到了大学，1945年，他回到斯特拉斯堡参加大学的重建，两年后到了巴黎，成为索邦大学社会心理学的教授。据说，拉加什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这使他在大学赢得了众多追随者。鲁迪奈斯科这样评论他：“拉加什既不是一个语言的文体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创新者，亦不是一个伟大的临床者，他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个出色的教师。”^①

从学术传承上看，拉加什可算作是让内的信徒，他总想把弗洛伊德主义纳入让内主义的心理学传统，在1949年出版的《心理学的统一》一书中，他把心理学分为“自然主义”心理学和“人道主义”心理学，前者即是普通行为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其主要的方法是实验法和统计法，后者是个体行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的单一性，是人文知识的一部分，其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所谓的“临床法”，即通过观察或临床交谈来考察个体的发展，因而他又把“人道主义”心理学称作“临床心理学”。^②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人，因而在研究中必须贯彻三个基本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即主张把具体的个体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加以研究；精神动力原则，即应当研究个体同世界、他人以及自身的冲突的产生和解决；个体发生原则，即应当从个体的发展中来研究他的心理现象。^③ 拉加什把精神分析学纳入这样一个广义的心理学的保护伞之下，认为精神分析学为研究具体的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是体现临床心理学的三大原则的最佳范例。

就这样，在50年代初，纳什特、拉加什和拉康因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而成为法国第二代分析家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和成长中的第三代分析家的三位著名导师，他们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可避免地也就有了各自的角力，由此而形成了50年代初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地形图。鲁迪奈斯科依据一种“精神分析的政治”对这个地形图的形势作了如下的描述：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16.

^② 参见尼·格·波波娃：《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李亚卿译，86~8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③ 参见上书，89~90页。

属于第二代的三位导师——都是由洛文斯坦因分析的——各自的地位揭示了50年代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对立倾向。纳什特赞同把弗洛伊德的教诲吸纳到医学的理想中，建议创立一个具有严格的教学课程设计的等级制学院。……虽然他不是任何理论倾向——克莱茵主义和自我心理学——的拥护者，但他采取的态度跟国际主义路线……是一致的。因而他的计划是与古典的正统联系在一起。他代表着一种捍卫“名流的精神分析”的“美国风格”，并把这一精神分析维系在一个权威主义的、在移情中适应权威个人的政治之内。

至于拉加什，他是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民主地结合在一起的推动者。他的体系的目标是要借助于大学来整合弗洛伊德主义，在这一体系中，心理学的知识占有的位置与纳什特所主张的医学理想是一样的。两人有相同的方面，如对既定秩序的尊重、对适应的崇拜、对与弗洛伊德主义伦理学相左的建制模式的遵从。拉加什很少受医院传统的影响，他首先是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道德主义者，他更倾向于一种基于师生沟通的宽容政治，而不是任何权威主义的谋划。因而他代表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内部一种自由的倾向，敌视纳什特的独裁作风。但这种自由主义远没有走到质疑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强加的规则的地步。他的目标是要使规则适应法国的新形势。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对抗关涉着精神分析学的建制化模式。……

在那一语境中，拉加什的学术自由主义和纳什特的医学独裁主义都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领导层可以接受的。前者与“英国路线”的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后者更适应美国立场。因而，第一次分裂——两个政策相互敌视——并没有导致法国共同体同国际运动的真正决裂。在后者那里给两种倾向都留有空间，尽管代表它们的两位导师都没有提出任何连贯的学说。

拉康的立场则完全不同。战前他就已经含蓄地宣布要回到弗洛伊德，那时我们的主角就意识到需要一个具有培训经验、且与弗洛伊德的发现所要求的原则保持一致的组织。他既不排斥大学，也不排斥医学渠道，但坚持每一个都有赖于一种精神分析的政治的第一

性。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一个立法者或指挥官的角色，这样就与一个民主制和一个独裁制的矛盾现实发生了冲突。^①

鲁迪奈斯科的这个描述的着眼点是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国内国际政治，正如她所说的，在这一政治中，纳什特与拉加什之间的矛盾属于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的矛盾，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帝国”的政治无关，因而后者不必对第一次分裂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次分裂也与精神分析的政治无关，因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分析家对纳什特的专权的反抗恰好是精神分析政治的一种体现，这一政治既涉及一个共同体内部领导层与成员之间、导师与学生之间纵向的俄狄浦斯情结式的关系，也涉及成员与成员之间横向的想象性自恋认同的关系，也许还涉及治疗师与病人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的关系。

引发矛盾的因素有很多，它们最终会聚到一起导致了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的第一次大分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业余分析师的地位确认、纳什特的改革与专权、拉康的“短时会谈”。

所谓业余分析师，就是指非医学出身或者说没有医学背景的分析师，在西方国家，由于不同地区对行医资格的认定标准的差异，对于这类人能否从事分析实践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规定，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内部也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弗洛伊德在1926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讨论这个问题^②，在那里，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限定：精神分析并非医生的专利，非医学出身的人只要接受了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就可以成为专业的从业者。但即便如此，业余分析师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争论在共同体内部还是时有发生。

业余分析师的问题也一直是引发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1926年学会成立之始，这个问题就被本土具有医学背景的分析家们提出来过，但当时由于玛丽·波拿巴——她就是业余分析师的代表——在学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学会本身在整个社会中的处境，使得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p. 223—225.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281～345页。

这个问题还不足以导致分裂，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带有妥协色彩的惯例，即一个人要想从事精神分析实践，首先要获得医生资格，然后再接受一个培训分析师的培训分析，获得专业确认；业余分析师的存在也获得默认，但他原则上必须在专业分析师的监督下从事治疗实践。战后，随着社会对待精神分析的观念的改变，走进会谈室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没有医学资格也不求助于医生的直接权威就从事分析实践，这给学会带来了不少困扰。为了保护专业分析师的利益，它必须施用建制的功能，一方面利用学会和大学的力量大力培训专业分析师，另一方面以制度的形式把针对病人的治疗分析和专一为了培训的教学分析区分开来，前者属于一种私人性的实践，只要是学会成员都有资格，后者则是一种专业技术，只有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分析师才有资格。那么，专业分析师的这一资格如何认定呢？由谁来认定呢？这就要动用建制的作用了，以建制化的形式使资格认证规范化。

1949年纳什特当选为学会主席之后，立即着手对学会建制进行改革，首先是修改学会章程，并决定成立一个教学委员会，负责专业分析师的培训和资格确认，就像拉康后来在《罗马报告》（1953年）中说的，给“驾驶员”颁发“驾驶执照”。不过在1949年，拉康自己就是被委托起草教学委员会的章程的主要负责人。

教学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学会成员原有的结构生态。在以前，业余分析师和专业分析师虽然在实践资格上有所限定，但这一区分并没有被政治化，一个没有接受培训分析的业余分析师照样可以从事治疗实践，因而从前的病人有可能是今后的分析师，当然那时的所有分析师都曾经是“病人”，都曾经接受过分析“治疗”，就像鲁迪奈斯科所说的，“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就像是一个疯人院，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为精神分析家就必须是疯子”^①。而现在，“病人”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按照新的章程，只有培训分析被认为是正规的手段，一个人要想成为分析师，首先就要成为被教学委员会认可的驻会会员（adhering member），而为了获得那一认可，他就要拜访委员会的成员，由后者决定是否接受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27.

他的申请。如果申请人被断定有严重的神经症或精神病，即真的是“病人”，那他所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如果申请被接受了，候选人接着就要从学会的专职会员——现在被称为资深会员（titular member）——中选一个分析家作为他的导师，负责对他进行培训，同时还要学习委员会指定的一系列培训课程和参加培训讲习班。然后导师在恰当的时候会允许他去从事分析实习，这当然要事先获得委员会的批准，并必须在至少两名培训分析师的监督下进行。经过多次见习后，这个候选人便可以向学会提出申请，要求晋升为驻会会员。在听取他的培训分析师和两个监督导师的意见后，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他的申请。如果批准了，他便享有分析师的资格，可以从事治疗实践，但不能指导培训分析或教学分析。再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由其他资深会员推荐，并经过教学委员会的资格评估，他才可以成为资深会员，这时他才可以称为是导师，可以做培训分析了。这一限定政策，鲁迪奈斯科称其为学会的“计划生育政策”，固然有助于维护精神分析技术的国际规范，但却极大地强化了建制的力量，强化了学会内部成员间的层级关系，一定程度上说与战后法国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形势是不相称的。而就学会内部的结构而言，这一计划生育政策无疑让波拿巴这样的业余分析师被彻底边缘化了，所以它注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弹。

另外，纳什特的改革看似是为了改变分析师培训的混乱现状，可结果却导致了权力的集中。教学委员会的成立本来是为了减轻学会的压力，分担教学、课程设计、提名与审定驻会和资深会员的资格等以前属于学会的功能，使学会的行政权和教学权相对分离，可由于委员会的组成同时就是学会的领导层，所以这一分离其实是一个幻觉，例如在1951年，学会行政层的构成是：纳什特为主席，拉康为副主席，拉加什为技术顾问，热尔曼·布维（Germain Bouvet, 1911—1960）为财务主管，菲利普·帕什（Philippe Pasche, 1910—1996）为秘书长；而在委员会的构成中，纳什特是主席，其他几位全是副主席。权力完全就集中在这几个人尤其纳什特的手中。1952年，纳什特又决定成立一个“精神分析学院”，专门负责分析师的课程教学、分析技术的探讨和理论研究，由他自己出任这个学院的主任，培训分析的程序被进一步建制化的同时，纳什特个人的权力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也是在这个时候，拉康的分析技术在学会内部引起了争论。其实，学会中早就谣传拉康违背国际上通行的技术规则，在实践一种所谓的“短时会谈”（short session）——拉康自己将其称作“弹性时间会谈”（session of variable length）。

精神分析的治疗主要是通过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谈话来实施的，当初弗洛伊德在进行治疗和培训时并没有确立什么明确的规则，比如他既没有在治疗分析和培训分析之间做出区分，也没有觉得需要给这些分析制定规则，在他那里，会谈时间的长短不是取决于什么规则，而是取决于治疗过程的效果。可到20至30年代，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就分析技术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其中规定会谈每周要进行三到五次，每次会谈要持续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对会谈时间的这一硬性规定导致了一个现象：每次会谈中，只要时间一到，治疗师就从坐椅上起身结束会谈，而不管病人此时是在说话还是处在沉默中。一直以来，人们都在遵循这一时间规则，谁都没有想过结束会谈时的那一打断行为所隐含的负面的治疗意义，更没有想过这一技术本身所隐含的极权主义的危险，因为它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体性或临床现实的差异。

拉康对技术规则的破坏首要的体现在时间的问题上，他时常缩短会谈时间，不遵守规则所要求的会谈次数，在学会的许多人看来，拉康的这种偷工减料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是利欲熏心的不良行为，有悖于精神分析家的职业道德。实际上，拉康的违规不只体现为缩短会谈时间，他还随时接待来访者，时常是不用事先约定——这也有悖于常规；他今天也许还耐着性子听分析者说上半天，可第二天可能十五分钟就把他打发了；有时他还在会谈期间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动作，发出奇怪的声音，或是做出有力的评论，他甚至会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一边准备第二天的演讲稿一边听病人的倾诉，有时他还把会谈放在饭桌上进行；他对病人的婚姻史和家庭情况有特殊的兴趣，他有时会打破治疗师与病人的界限，向病人索要地址和电话号码，甚至要他们给他打零活；后来他还要求所有的病人都必须出席他的研讨班，在那里继续他的治疗，有时他还测病人的血压而根本不说这是为什么。反正有关拉康会谈的传闻十分之多，虽然拉康不断辩称自己实践的是“弹性时间会谈”，可学会内部只是嘲讽地称之为“短时会谈”，因为在同行的眼里，拉康“缩短”会

谈时间只是为了赚钱——拉康对钱财的确有特别的爱好；再有一点就是，接受拉康的培训分析的人数太多了，人们担心他会利用导师的“魅力”在学会中拉帮结派，而从未想到去探究一下如此多的学生冲向他的躺椅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拉康而言，弹性时间会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拉康自己有过许多的解释，在此可以看一下他在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的解释。在那里，拉康强调了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经验与技术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精神分析治疗的核心并不在于以重申或重建自我的防御力量来治愈主体——相反那只会让主体越来越异化，越来越陷入自我的幻觉无以自拔——而在于透过言语的中介来终结主体的所有确信，使其意识到自身欲望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弹性时间的运用成为终止主体幻觉的重要手段，因为时间在分析中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分析进程的一部分，是技术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恰当的休止可以赋予主体的话语以意义。这就是会谈的终止——当前的技术将其看作是纯粹由钟表决定的一种中断，因而根本不考虑主体的话语的脉络——何以能起到句读作用的原因，这种句读对于分析师而言具有充沛的干预价值，其目的在于加速结论的时刻的到来。因此，我们必须让会谈的终止摆脱其惯常的框架，使其最有效地用于分析技术的目的。”^①

拉康的技术革新乃是对规则的挑战，也是对学会权威的挑战。于是，在纳什特的党徒和拉加什的党徒所投入的战斗中，拉康的短时实践时常成为双方对决的筹码，前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背离国际规范的倾向，而后者则基于其自由主义的学术理念，一定程度地认同拉康的创新。1951年，教学委员会要求拉康郑重承诺调整他的技术，回到常规的轨道上来。拉康口头上做出了保证，而实际上依然故我。面对学会内部一致反对的声音，拉康从理论上为自己的弹性时间会谈进行辩解，强调他的技术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与单纯的治疗技术或培训技术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那就是他要通过弹性时间会谈这种“粗暴”的干预使移情关系辩证化，以充分激发主体的无意识欲望，让主体认识到自身欲望的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9.

真理或真相，走出自我的幻象。

业余分析师的资格、纳什特的专权和拉康的短时会谈技术，这些引发冲突的因素纠集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在巴黎学会内部挑起事端，并最终把学会引向了分裂。

1952年6月17日晚，纳什特在学会的会议上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培训学院，要求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学院的事务，并向主席团直接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他自己将出任未来的学院的主任，他的两位学生将分别担任学院的科学秘书和行政秘书。学会的行政委员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纳什特的提议，纳什特攫取了从行政权到教学权的一切权力。

1952年11月，在学会的行政会议上，纳什特发布了学院的章程、课程计划以及教学大纲，并由他的党徒提议要求延长纳什特作为学会主席的任期，这引发了众多资深会员尤其是像波拿巴这样的业余分析师和行政委员会的强烈抗议。拉加什指责纳什特大权独揽，并宣称6月17日的投票无效。纳什特和他的同党则威胁着要退出学会，被激怒的波拿巴王妃冲到电话前，询问安娜·弗洛伊德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分裂事件中是否会承认纳什特及其党徒的资格，可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几年来一直受纳什特排挤的王妃愤怒地称她的对手是一帮流氓。

12月16日，在学会的扩大会议上，纳什特试图在新的领导班子选举前先投票通过他的学院章程。拉加什拒绝了，以他为核心形成的联盟强迫学院的执行委员会辞职，拉康毛遂自荐成为委员会的临时主任。

1953年1月，拉康向委员会提议对纳什特的学院章程进行修正补充。他以他的镜像理论作为开场说道：“如果此时此刻诸位允许我以新年祝愿和在所有传统中同它联系在一起授权仪式的精神去使用一个私人的笑话，那么我会说，在此我给我们的成员的碎片的身体提供的是一个镜子装置，在那里，上天保佑，它可以预期到它的统一性。”^①接着，拉康重申了1949年的章程，针对纳什特章程中过分的医学倾向，他强调指出，不可把精神分析学简约为神经生物学、医学、教学法、心理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38.

学、社会学、人种学、神话学、交流科学、语言学等等，但另一方面，针对业余分析师过分的非医学倾向，他又指出，所有这些学科还是应当包括在精神分析的培训课程中，因为精神分析学应当考虑成为所有这些相关学科的主人。其次，针对纳什特的章程赋予了组织特权、强化了资深会员和普通的驻会会员的等级关系以及使学会成为了学院的一个附设的倾向，拉康提议把学会和学院区分开来，把学院和教学委员会区分开来。但是，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说的，在此，拉康没有明确权力分离的确切模式。拉康虽然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可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另外，他还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在学院里授予王妃任何荣誉称号——战后，她一直是学会的名誉主席。要知道，波拿巴对拉康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她甚至称拉康是十足的妄想狂；至于拉康，他对这个女人也同样没有好感。由于他的这一疏忽，王妃跟纳什特又走到了一起。

表决学院章程和选举学会新主席的投票日期被定在1月20日晚。下午，纳什特动用自己的外交手腕说服了波拿巴，让她回到了医学倾向的一边，另一边则是拉加什所代表的自由派倾向。晚上，章程被通过，接着王妃利用自己的势力提交动议反对拉康任学会主席，可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结果，拉康获得了拉加什的多数派的支持，正式当选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拉加什被提名出任副主席。

可纳什特和玛丽·波拿巴并未就此认输——其实纳什特派还是给自己保留了一块阵地，未来的精神分析学院的事务仍由他们负责——他们策划了针对拉康的反击。拉康的短时技术再次成为靶子。2月3日，拉康试图向学会的教学委员会证明他的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但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权威主义的部落，不可能接受拉康的辩解，虽然他已经是学会的主席。委员会再次重申了培训分析的规则，即所有的分析师候选人在开始监督分析之前，必须接受并完成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四十五分钟、一共十二个月的培训分析。按照这一规则，拉康的学生很有可能无法成为分析师，因此他只好承诺将遵循这些规则。只有拉加什站在了被指控者的一边，当然这不是说拉加什接受了拉康的技术，他这样做只是基于自己的学术自由主义的信念。

导师们的争斗也传染到了学生中间。1953年5月17日，51个正在

接受培训的分析家集会抗议学院的章程和他们的待遇，一些资深会员也支持学生反对纳什特的专权。5月31日，他们再次集会，在会上有人指责拉康与学生合谋，利用学生打击异己，支持拉康的一方也毫不示弱，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危机一触即发。

6月2日，学会召开科学会议。会上纳什特的党徒指责拉康煽动学生暴乱，就在拉康为这一指控进行答辩的时候，纳什特打断了他的发言，又把短时会谈的问题提了出来，因为纳什特清楚地知道这是拉康的软肋，是他唯一可以用来在学会中孤立拉康的撒手锏。而拉康的回答实在难以让人信服，他声称他的分析除个别情况外，全都符合固定时长的规则。最后大家同意在6月16日就相关问题重新开会讨论。

在这样的气氛下，决裂已不可避免。自由主义者拉加什尤其不堪忍受学会内部的这种暴戾之气，他决定离开学会，创立一个自由的组织，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女分析家弗朗西斯·多尔托和斯特拉斯堡大学人文系教授、拥护拉加什的女分析家朱丽特·法维兹-布托尼埃（Juliette Favez-Boutonier, 1903—1994）首先表示支持。拉康身为学会主席，分裂当然非他所愿，但面对纳什特团体对他的攻击以及权威的培训分析家们对他的孤立，他也觉得自己是学会内部利益斗争的替罪羊，虽然放弃一个已具规模的组织和一个令人眼热的职位是件可惜的事，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拉加什的计划。

6月16日，除拉福格和埃斯纳两位元老级人物之外，所有的资深会员都出席了会议。会上照样是硝烟弥漫，拉加什派和纳什特派相互攻击。一番激烈的争吵过后，受玛丽·波拿巴王妃指使，奥德特·柯黛夫人宣读了她的弹劾动议：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全会已经看到它的主席雅克·拉康与学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和，如在6月2日的会议过程中所表现的，因此全会再也不可能信任他，要求学会副主席接替主席之职，直到依据章程完成新一轮的选举。拉康回应说，他接受主席之职就是为了让自己去接受同行们对他的教学和他关于学院章程的观点的裁决。他没有质疑不信任动议的合法性，但他强调对他的那些指责更多关涉的是学院而不是他作为学会主席的活动，也就是说，与他能否胜任学会主席无关。最后大会以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柯黛的动议获得通过，出席会议的18个会员中有12人投了赞成票。

结果宣布后，拉康提出了辞呈，拉加什作为副主席当即接替了他的位子。可接下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这位刚刚上任的主席随即宣读了已经准备好的决定：“拉加什、法维兹-布托尼埃、多尔托特此宣布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会场一片沉寂。拉加什起身离开，他的两个同伴紧随其侧，接着布朗夏·勒韦肖-茹弗也宣布退会。不久拉康也起身宣布与学会决裂。留在会场的人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拉加什散发给他们的通告会告诉他们个中的缘由，这个通告是拉加什、法维兹-布托尼埃和多尔托三人起草的，它以少见的激烈措辞谴责纳什特的专权和学会对待拉康的无理举动。

退出会场的一帮人来到多尔托的家里庆祝他们给权威们的胜利一击，他们宣布成立“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第二天，新学会发布了一个官方公报，由拉加什起草，公报把巴黎学会的权威主义集团说成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派系”，它把拉康当作替罪羊加以利用。公报还强调他们与巴黎学会的冲突是伦理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并肯定地说新学会得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承认不会有任何问题。最后，公报说：“我们是为科学的自由和人道主义而战。人道主义若是没有战斗性，就不会有任何力量。”^①在宣布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之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临时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正在接受培训的分析者的名单，共有34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还在拉康的躺椅上接受分析，他们当然地成为了新学会的成员。

至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在拉康和拉加什相继辞职后，学会的元老级会员乔治·帕尔赫梅内被任命为主席，可这个任期也是极其短命的，两个月后，帕尔赫梅内就去世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重新为纳什特的势力所控制，纳什特也抓住机会提议学会章程应适应学院章程，提议选举一个改革委员会，他的提议获得通过。1954年6月，“精神分析学院”正式开学，纳什特任学院院长，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在他的掌控下继续坚持着医学上的纯洁理想，尤其在培训技术上越来越谋求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规范保持一致。也正是由于在分析师培训上的出色工作，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51.

1957年，纳什特当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副主席，并一直任职到1969年。

第二节 狙击自我心理学

1953年的大决裂是拉加什而非拉康直接领导的，但拉康被新成立的学会奉作精神领袖，他本人则通过把自己置于受迫害者的位置而心安理得地领受了这一主人角色。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去担当自己的这一角色，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人/导师（Master），而巴黎学会对他的攻击让他更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为主人/导师的使命和方向，那就是去革新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为弗洛伊德的哥白尼发现完成一次伽利略式的革命。为此，他必须为自己的革新找到充足的理由，他必须把自己的革命置于伟大的庇护之下，他还必须为完成这一革命找到所需的工具和资源，让精神分析学在新的科学语境中焕发新生。用福柯的术语说，他必须切入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型”，通过实现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拖出现今的黑暗深渊。在这一点上，拉康对时代知识潮流的敏感度无疑是常人所不及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语境需要以及这样的一个背景支撑，把拉康推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他必须在这个路口做出抉择，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果断地完成主体性的确认，他也的确抓住了这个机会，把1953年变成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的“拉康年”。

法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拉康接连作了两次演讲：一次是7月8日在圣安娜医院为新学会的第一次科学会议作的题为《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的报告，另一次是9月26—27日在罗马的国际罗曼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上作的题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的主题发言，俗称《罗马报告》。在前一个文本中，拉康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并第一次阐述了他的“三界”模式的构想，即以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这个三元组的概念来把精神分析的经验 and 理论置于不同“界域”（register）中，以此完成对弗洛伊德文本的结构阅读和对精神分析经验的结构分析，并最终对组织人类主体的不同

“秩序”（order）做出说明。在后一个文本中，拉康谈到了在巴黎刚刚发生的分裂事件，回顾了弗洛伊德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和精神分析学当前面临的问题，然后通过挪用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理论资源从言语和语言的方面重述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要旨，重读了弗洛伊德的重要文本，并为自己的弹性时间会谈技术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

不论是对于拉康本人而言，还是对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而言，1953年的这两个文本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尤其《罗马报告》，可以说是拉康的理论宣言，它以一种绝对权威的口吻、一种颐指气使的话语、一种巴洛克式的文体表述了一个充满自夸妄想的主体的幻形，在那里，他的自信与自负、他的博学与机智、他的敏锐与纵情，无一不令人动容。请回味一下他开篇的这段修辞，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绝对的主人的声音：

其实，我想起，远在上世至尊高位的荣耀被建立以前，奥路斯·吉里乌斯（Aulus Gellius）在其《雅典之夜》中就对被称为圣梵蒂冈山（Mons Vaticanus）的地方作了语源学的考察，认为这个地名源起于 *vagire*（婴儿的初啼），该词指的是言语的雏音。

因此，如果说我的言辞也不过是婴儿的初啼，那它至少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来更新我们的源起于语言的学科的基础。

进而，这个更新已从历史中汲取了足够多的意义，对我而言，我并不想为了采用一种与彻底地诘问我们的学科基础相称的反讽风格而去和传统风格决裂——传统风格总是把一个“报告”置于汇编和综合之间。^①

英语世界的拉康研究者玛尔考姆·波微对这个开场辞有一段充满联想的评述。波微说，拉康对梵蒂冈的语源学参照说明了某种幻念式的权力游戏被引入其中，如同罗马教皇的权力吸收并改造了罗马异教文化一样，精神分析的新宣言也被期望着来改造目前的言说的形式，以使精神分析再度从其平凡的开端向壮观的预言式语调攀升。波微还说，拉康选择了很好的登台亮相的地方，因为罗马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已经获得了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98.

一个特别象征性的地位：它是这样一座城市，在那里知识和权力——也就是全知和全能——的幻念能够被自由地接受，并且在这座城市里，事物的一种古代的秩序是永不会过时的话题。那种一天天改变着罗马城市风景的埋葬与重新挖掘的过程，为精神分析观察者提供了一种与其职业使命相关的悦人的主体寓言。当初弗洛伊德进入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时，曾把他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新的汉尼拔，而拉康也紧步其后经常以凯旋者的腔调谈及他的罗马演说。但是，作为一个尚未如愿的征服者，他赞美、嫉妒的对象和征服的目标，并不是一座石头城，而是一座词语之城；当被驱逐排斥的震惊仍在天空回首时，他寻求发现、拯救、恢复和拥有的正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对拉康来说，“罗马是这样一种地方，在那里，言说的新的权力应该被重新发现，以及在那里，在那些权力的保护下，精神分析应该被重新奠基。拉康宣告了他的新的科学的第一声哭叫，这哭叫预示着它的最为稳定的成年的声明”^①。

紧接着，还是在1953年，拉康在圣安娜医院开始了他著名的研讨班。实际上，早在两年前，拉康就已经在自己家里举办读书会，带领学生阅读、分析弗洛伊德的文本与病例，只不过规模比较小，参加者的范围也很有限。法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后，他把研讨班搬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圣安娜医院，并向公众开放。为表示对弗洛伊德的纪念，研讨班定在每周三举行（第一期的开讲日期是1953年11月18日），因为当初弗洛伊德的那个研讨性质的小组“星期三心理学社”也是在周三搞活动。并且，令我们中国人——可他的文献来源未必是中国的——感到有点满足的是，拉康研讨班第一期的开讲辞居然是从禅宗的公案开始的：

师傅（master）打断沉默总是很随意——一个反讽式的评论，一个棒喝（kick-start）。

这正是禅师（buddhist master）依照禅的技术去寻找意义的方式。这一技术让学生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师傅并不传授现成的权威知识，他只是在学生快要找到答案时才给出一个回答。^②

① 玛尔考姆·波微：《拉康》，51~53页。

②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 1.

“让学生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拉康对自己的精神分析教学法的一个总体说明。此后的十年间——十年后，因为与法国学会决裂，研讨班易地巴黎高师——拉康的声音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要在这个医院的会议厅里回荡，他就像禅宗公案里的“师傅”，以充满机锋的话语出其不意地掀起主体身上的无意识帷幕。从这个时候起，拉康将通过不断指认自己是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成为一个新学派——拉康主义——的领袖，虽然他常常故作姿态地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拉康主义者。

是的，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角度说，把1953年说成是“拉康年”是毫不为过的。在这一年，他同巴黎学会决裂，进而又创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法国学会；在这一年，他举起了“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帜，提出了一个以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为三元组的“三界”体系；在这一年，他以被驱逐者的身份奔赴罗马，在这个语词之城发表了他著名的《罗马报告》；还是在这一年，他回到圣安娜医院开始了他著名的研讨班，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主人/导师的声音将定期在巴黎的上空回荡。在所有这一切中，任何单一的一个事件都可能具有改变历史的意义。进而，在所有这一切中，其实是围绕着一个目标进行的，那就是革新精神分析学。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可是拉康，他就像一个神射手，稳、准、狠地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三个方向，并以连发的形式将它们一举射落。这三个方向是：狙击自我心理学、回到弗洛伊德和发动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转向。拉康自己很清楚，要想让精神分析学走出建制化的暴戾之气，要想完成其主人身份的确认，要想成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他就必须在这三个方向上实施定点爆破。

在此，需要让我们的故事讲述暂时地停顿一下，在进入下一个分裂事件之前先对这三个方向做一说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的说明可能略显冗长——我不想三言两语就把它们打发掉，那是懒人或不求甚解者的做法——并在时间跨度上会有所延伸。我将先说明对自我心理学的狙击，另外两个方面则留到下一节。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既是理论上的需要，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在50年代初期，自我心理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流，而且在政治上是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主导，拉康要想完成精神分析学的哥白尼革命，首先就要击倒这个貌似强大的

对手。

另一方面，虽然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生涯——尤其集中在 50 年代——只要有就会实施他的攻击，且始终抱有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可他极少对这一精神分析话语的观点给出系统的说明，也很少以真正理论化的方式对其做系统的反驳。他的批判是游击式的，倨傲不恭的，且充满了决绝的姿态，就像布鲁斯·芬克说的：

拉康对他所批评的某一立场极少给以完整的归纳，如先呈现可归于那一立场的诸多论题和观点，然后再逐一加以反驳。拉康的论证可能从不是那一意义上的：他从不通过仔细解释他的对手立场然后逐一加以批判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他更倾向于随时做出贬低的、反讽的或简慢无礼的评论，只言片语便将一个理论的整个大厦打发掉。^①

同时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尽管拉康将其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安娜·弗洛伊德、海因兹·哈特曼、洛文斯坦因和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 1900—1957），且尽管这些人物当时都把持着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权力，可他们自己并未对拉康的攻击做出正面的理论上的回应。拉康的咄咄逼人与对手的这一沉默倒真有点精神分析化的情境意味，就像受分析者企图从分析师那里找回主体的位置但却因为对方的不置一词而归于失败一样，拉康单方面的强势姿态也总让我们觉得他的批判最后似乎变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强迫症意念。

拉康与自我心理学发生分歧的焦点就是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确立的分析技术。为了厘清这一分歧，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的历史。^②

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就出现了，后历经种种变化，其含义有过多次的反复。一般地，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拉康在 1951 年的《对自我的若干反思》中也明确地指出——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存在着两个相对异质的层面，正如拉普朗虚（又译“拉普朗切”）和彭大

① Bruce Fink,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Écrits Closely*, p. 38.

② 有关弗洛伊德自我概念详细的历史，可参见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王文基译，260~272 页，台北，行人出版社，2000。

历斯（又译“庞塔利斯”）归纳的：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自我是基于‘它’与外在现实接触而分化出的适应装置；另一方面则将自我定义为许多认同的结果，这些认同最终在个人内在形成一个受到‘它’所投资的爱恋对象”^①。伊丽莎白·格罗兹则将这两种自我分别称为“现实的自我”（the realist ego）和“自恋的自我”（the narcissistic ego）^②。

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史中，第一种自我出现在先。早在1895年的《歇斯底里研究》和《科学心理学纲要》中，他就将自我设定为人类心理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在于对原发过程实施禁制，但这时自我还没有成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1900年左右，弗洛伊德开始提出他的第一个拓扑论模型，即关于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精神装置，自我在这一装置中同样不占有重要位置，且仍充当着以现实原则调节知觉系统的功能。基本上，在早期，弗洛伊德把自我主要理解为现实的自我，可这一概念在其理论中并不占有核心位置。

自我概念真正的理论化开始于1914年左右，并是在第二种即自恋的自我的层面来理解的。在1914年的《论自恋：导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论文中，弗洛伊德依据自恋、认同、理想化等心理运作过程来说明自我的起源或形成，由此而建构了其自恋的自我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自我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之中，它必然是发展起来的；第二，自恋的自我是力比多的庞大贮存处，它表现为一种原初的力比多投注，并把自身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当作它的一个投注对象；第三，自恋的自我不仅将自身当作力比多投注的对象，而且还将这个对象理想化然后加以认同，由此而形成理想自我；第四，这种理想化也可以指向外部对象，这时形成的便是自我理想，可这一自我理想常常会导致自我的分离，自我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常常会使自我变得贫乏不堪；因此，第五，自我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实体或代理机制，它总是被幻想以及种种形式的认同或内化所控制，它的形成总是受制于个体与对象的关系。

然而，到20年代，弗洛伊德似乎又回到了现实的自我的概念，之

① 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260页。

② Elizabeth Grosz,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pp. 24-31.

所以说是“似乎”，乃因为此时的现实的自我概念与以前已有很大不同。在1923年的《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把自我描述为一种试图从外界施加影响于“本我”——即上面引文中的那个“它”——及其倾向，力图用现实原则来取代支配本我的快感原则的代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我概念是在第二个拓扑论模型即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精神装置的语境中提出的。在这个装置中，自我成为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个中介，本我之中充盈着反社会的非理性冲动，以追求快感的满足为目标，超我属于凌驾于主体之上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居于其间的自我则充当着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尽力让本我在一个压抑快感的社会语境中获得最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尽力让超我免受来自本我的非理性冲动的威胁。基于对自我的这样一个功能设定，弗洛伊德描述了现实的自我的诸多特征：第一，在第一个拓扑论模型中，现实原则存在于前意识—意识系统，快感原则存在于无意识领域，后者属于原发过程，前者属于继发过程，自我只是通过运用现实原则在其间起着防御和调节作用，而现在，在第二个拓扑论模型中，自我被设定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机能，它的作用被大大地扩展，成为现实原则的代理；第二，在第一个拓扑论模型中，自我被置于前意识—意识领域，因此自身之中不包含无意识的因素，而现在，弗洛伊德特别地强调，自我中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因为自我的防御机制使得它对被压抑的东西总会表现出一种抵抗，只是主体意识不到这个事实而已，“既然这种抵抗来源于他的自我并属于自我，这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意料之外的情境中。我们在自我本身也发现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①；第三，就自我与本我的关系而言，自我就像是骑在马背上的骑手，得有控制马（代表着本我）的较大力量，通过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用现实原则来取代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总受到知觉系统的影响；第四，但自我之中还存在一个层级，那就是自我通过认同而形成的“自我理想”或“超我”，超我总是以诸如“你应当如此这般”和“你绝不能如此那般”这样的命令和禁令形式支配着自我，使得超我和自我之间总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第五，因此在本我、超我和外界“三个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139页。

主人”的夹击下，自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总想充当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既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要求去做，又要使世界适应本我的要求，于是它只能在两者之间充当献媚的机会主义者，可是来自三方面的夹击和威胁注定了它吃力不讨好的结局，最终，自我成为“焦虑的真正处所”。^①

显然，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前后充满了意义的含混和矛盾，那么，究竟哪一种代表着弗洛伊德的最后看法呢？——我们常常会这样来问。其实，弗洛伊德的这两种概念是在不同语境中提出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可以确定地用一个来取代另一个的问题，而是需要在各自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对此，拉普朗虚和彭大历斯有很好的说明：

一方面，对弗洛伊德著作通盘的研究显示，无法定位对应于两个不同时期之自我的两个词义：自我的观念始终存在，即使它曾先后因新概念的提出而更新。另一方面，1920年的转折点也不仅限于将自我定义为人格的中心层级：如众所周知，它还包括其他许多重要的新概念之提出，这些修正整体理论结构的新概念，则须从其相互关系加以考量才能彰显其价值。最后，我们认为，不宜一开始便试图断然区分作为个人的自我与作为层级的自我这两种意义，因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正是自我课题的核心所在。^②

可自我心理学家们恰恰不是这样来理解的：他们总想抹除弗洛伊德概念中的矛盾和歧义，把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为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体系。针对弗洛伊德自我概念的前后变化，自我心理学家总想找到一个最后的定义，并认为新定义必然是对旧定义的取代。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弗洛伊德理论的多义性，通过剪裁和修整而提炼出了一个看似统一的自我概念，以此来建立他们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一般地，人们把安娜·弗洛伊德出版于1936年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视作是自我心理学的开山之作，而1939年海因兹·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一书的出版则被认为标志着自我心理学的正式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包括克里斯、洛文斯坦因在内的大

① 参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176～177页。

② 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261页。

批欧陆分析家移民美国，自我心理学被传播到美国，到 50 年代初，自我心理学已成为国际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主流学派，其中哈特曼、克里斯和洛文斯坦因被视为自我心理学的三巨头。

自我心理学的理论和治疗技术整个地是围绕着修正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这一修正集中在将自我从受到本我和超我的禁制中解放出来，认为自我并非本我的产物，而是和本我一样原始，也是从一种“未分化的基质”中分化出来的。自我心理学强调自我的统一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要剔除自我中的性欲力比多成分，把自我纳入普通心理学的范畴来理解。自我心理学视自我为一种防御机能和整合功能，是一个“没有冲突的领域”（哈特曼），并且把坚固自我的防御功能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根本目标。

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在 1949 年的《镜像阶段》一文中就已经出现，1953 年与巴黎学会决裂后，他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其中较为集中的文本如《罗马报告》（1953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研讨班（1953—1954 年）、《典型疗法的变体》（1955 年）、《弗洛伊德的事务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1955 年）、《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 年）、《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1958 年）等等。对于这一批判的具体过程，我不可能去一一评述。总体上，我们可以把拉康的批判归结为三个基本的方面：理论的、技术原则的和意识形态的。^①

首先是在理论上。这涉及自我的起源、性质和功能等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就是“自主的自我”的问题。拉康攻击这种自我观的文字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在《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 年）中：

每当精神分析学家们忙于重塑一个善意的精神分析学——其最高成就就是“自主的自我”这个像诗一般的社会学的东西——时，

^① 实际上，拉康也对自我心理学家们的临床实践有过许多评论，其中最为拉康学派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就是克里斯对一个因为觉得自己有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的冲动而无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所做的分析，拉康曾在第 1、3 期研讨班和《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等多个地方讨论了克里斯的这个案例，其核心无非在于，自我心理学的临床实践乃是基于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一种想象性二元关系以及对自我的功能的一种现实主义理解，而根本无视象征秩序的存在及其对主体的构成作用。有关拉康对克里斯的病例分析的评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Bruce Fink,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Écrits Closely*, chap. 2.

我就想告诉听我的讲座的人如何能辨认出拙劣的精神分析学家：只需一个词，他们曾用这个词来抨击所有那些沿着弗洛伊德经验的真正方向来深化技术和理论的研究。这个词就是：“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①

还有在《弗洛伊德的事务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1955年）中：

确实，这个抽屉里满满当当堆的全是旧的新玩意儿和新的旧玩意儿，这堆杂物至少能娱人耳目。自我是一种功能，自我是一种整合，一种功能的整合，一种整合的功能。它是自主的！这真是一个好东西！它是最新引入神圣的实践的物神，其神圣性乃得自圣贤们的优越感。它所做的工作其实和别的东西一样，谁都知道，能最出色地实现这个功能的东西——这个功能完全是现实的——总是最过时的、最肮脏的、最倒胃口的。^②

说得再具体一点，拉康的观点处处都与自我心理学针锋相对。例如，在起源的问题上，自我心理学家否认自我是本我的产物，否认自我是力比多投注的结果，他们视自我是一种独立的心理机能，是从一种“未分化的基质”中分化出来的；拉康则强调自我是自恋性认同的产物，是力比多投注在自身和对象身上的结果，就是说，自我是被构成的，而不是个体先天带来的。在性质的问题上，自我心理学家强调自我相对于本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存在着一个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而他们的逻辑是，如果说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那么，面对充满冲突的本我的强大力量，自我根本就没有自主性可言；拉康的观点则是，自我是依赖于异己的镜像而产生的，自我的所谓自主性其实是镜像认同的产物，而这个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在功能的问题上，自我心理学家认为，自我的自主性不仅表现在它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对本我和超我的力量的调节，而且还表现在它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现实环境的过程，这种防御和适应正是基于自我所具有的一种整合能力，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435.

② Ibid., p. 350.

一种可以抗衡本我、超我和现实的侵袭的能力；拉康则强调自我的整合功能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整形术，其所形成的那个理想之“我”带来的与其说是自我的完整性，不如说是自我的永远受挫，如拉康所言，“自我的本质就是挫折，而我们的理论家现在却以其承受挫折的能力来界定自我的力量。这不是主体的某个欲望的挫折，而是主体的欲望在其中被异化的某个对象的挫折；这个对象越是发展，主体就越是与他的快感相异化”^①。

其次是在治疗的技术原则上。这同样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如分析师与受分析者的关系、分析师的功能、治疗的方向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我在后面还会讨论，这里只是简要地提出一些结论。例如，在分析师与受分析者的关系问题上，自我心理学家视分析师是有着“理想的”自我的人，是分析进程中绝对的控制者，受分析者是心理“病人”，是需要进行心理矫正、重建其自我的防御机能和适应能力的人，因而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威或典范与从属或顺从的关系；拉康则指出，这一差异的原则实则一个“反动的”原则，它是“以能知者和不知者的对立来掩盖患者和医者的二元性”^②，而他认为，精神分析本质上是一种“谈话的艺术”，是一种“辩证法”^③，参与谈话的双方之间并无主从之分，受分析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分析的人，而是参与到分析情境中、自己去做分析的人，分析师也不是全知的行为者，他的知是一种假想的知，他所处的位置应是苏格拉底或库萨的尼古拉（中世纪哲学家）所说的那种“博学的无知”（*ignorantia docta*，又译“有学识的无知”）的位置，他与受分析者的关系不是二元的对象关系，而是一个四角关系：愚蠢的主体（受分析者）、主体的自我、代表言语之场所及他者主体的大他者以及他者的自我。基于对分析师的自我的那一理解，在分析师的功能问题上，自我心理学家强调分析师应以积极的姿态去干预和引导分析的进程，以帮助患者加强其自我的力量；相反，拉康则认为分析师的功能在于默默地倾听，通过让主体（受分析者）自由地说出自己的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8.

② Ibid., p. 335.

③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 278.

要求——而不是去满足主体的要求——然后在这要求中辨认出自己的无意识欲望，直至抵达主体的真理。最后，在治疗的方向上，自我心理学家把“治愈”和恢复病人适应现实的能力作为治疗的目标，承诺强有力的自我可以给存在带来信心和幸福；而拉康彻底弃绝了这一看似人道主义的理想，称分析师的幸福承诺为一剂毒药，只会把自我带向自欺欺人的幻象，他认为，分析的目标根本在于让主体穿越自我的幻象，直视自己的欲望的真相，在语言的秩序中辨认出主体的位置。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虽然自我心理学的理论阐发自奥地利分析家，但其生存发展的土壤却是在美国，其有关自我适应现实以迎接现实的挑战的主张受到追求自我梦想的美国意识形态的热烈欢迎，而在拉康看来，这种不谋而合既与美国特有的“非历史主义文化”有关，与其行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有关，也是那些移民分析家为解决自己的不适应、为在美国获得承认而不惜牺牲精神分析学的原则的结果，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方面来揭示自我心理学的本质就成为拉康狙击对手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妨再看几段文字，它们属于典型的拉康风格，雄辩与讥讽的完美结合让他的写作简直成了一种文体实验。在《罗马报告》（1953年）中，拉康说：

无论如何，精神分析的概念在美国屈从于个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屈从于行为模式的研究，屈从于“人类关系”这个观念所隐含的所有客观化过程，这已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人类工程学”这个土生土长的术语强烈地暗示了一种排除人这个对象的特许立场。^①

在《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1958年）中，他说：

为了支撑这一明显靠不住的概念，大洋彼岸的一些人觉得有必要在此引入一个稳定的价值，一个可以测度现实的标准：这就是自主的自我。人们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这个自我是许多根本不同的功能被想当然地组织起来的一个集合，以作为主体天生的情感的支撑；之所以说它是自主的，就因为它不会受到人的内在冲突的影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4.

响（它是一个“无冲突的领域”）。

我们在此可以认出一个过时的幻象，连最为学院式的内省心理学都早已将其作为站不住脚的东西给抛弃了。不过，这个倒退却被兴高采烈地视作是浪子们回到了“普通心理学”的老巢。

不管怎样，这个倒退解决了分析师的存在问题。一对自主但无疑不平等（但是在他们足够的自主中他们凭什么出身印记来彼此辨认呢？）的自我把自己献给了美国人，以指导美国人走向幸福，同时又不打扰自主性，不论是不是自我中心的；这种自主性以其无冲突的领域为通向幸福铺设了一条美国式的道路。^①

上面已经说过，拉康不遗余力地狙击自我心理学是有其“政治”图谋的，那就是要从根本上摧毁自我心理学派对国际精神分析学界的主导地位，为自己的“回到弗洛伊德”打开通道。当然，撇开这一“政治”图谋不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拉康与自我心理学派在自我问题上的分歧乃是由于各自对弗洛伊德文本的不同理解所致。如同拉康的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的自恋性认同理论中可以找到有力的支持一样，自我心理学的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也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既然如此，那拉康凭什么认定只有他的理解是正确的，而对方的理解一定是错误的呢？我们若是这样来提问，并非要去对此厘定出一个是与非，那我们可能会被自己引入歧途。实际上，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并不是要去复活一个曾经的、真实的弗洛伊德，而是要去激活一个指向现时和未来的弗洛伊德，那就是以无意识这个哥白尼式的发现来言说——尽管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言说还充满了矛盾和歧义——主体之真理的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是一种精神，是一个总体性，他的身上洋溢着革命性的光辉，只是由于自我心理学派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片面理解，这光辉如今被掩埋了。因此，在拉康看来，自我心理学派的那种主导地位不仅极大地伤害了精神分析学的事业，而且会使弗洛伊德奠定的革命性理论回复到庸常的路线，回复到笛卡儿的“我思”主体的神话性幻觉。也就是说，拉康狙击自我心理学固然是出于一种“政治”图谋，但根本上还是想沿着弗洛伊德已经开辟的道路为他这个时代的主体性确立一个方位：曾经视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493-494.

作透明的、自主的自我和主体只是一个神话，所存在的只能是一个离心化的、异化的自我和主体，一个因为无法满足的欲望的煎逼而在分裂中挣扎的自我和主体。

第三节 回到弗洛伊德

所有阅读拉康的人，不论你对他的理论和思想了解多少，都熟知他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拉康的理论及其阐发理论的技术前后几经变换，但这个口号自他在50年代初提出来以后至死未变，甚至在拉康主义势头最旺的时候，他向他的信徒表达的依然是这种效忠的姿态：做拉康主义者是你们的自由，但我始终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尽管你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姿态。

可是，为什么要回到弗洛伊德？回到什么样的弗洛伊德？如何回到弗洛伊德？以及回到了弗洛伊德的哪些地方？对于此类问题，我们不可三言两语打发了事，因为它们关涉着拉康的事业的意义，关涉着拉康孜孜以求的“历史化”的方向，也关涉着他想把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化的动机。

对于拉康而言，“回到弗洛伊德”首要的是回到其理论的源头，回到弗洛伊德借以阐述其理论的那些基本概念的真正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重建弗洛伊德的技术，去激活弗洛伊德理论固有的革命性力量，用拉康自己的话说，“回到弗洛伊德的意义，就是向弗洛伊德的意义返回”（The meaning of a return to Freud is a return to Freud's meaning）^①。那么，为什么要返回那一理论之源头或者说处在源头的那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呢？

前面已经说了，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就是要为他的这种返回廓清道路，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自我心理学派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片面理解，导致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的革命精神已一片荒芜，其著作的意义越来越被抹杀，其富有创新的技术已变成了一种讳莫如深的技巧，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337.

一种形式化的仪式，至于当初由他亲手创立的那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如今也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一个由少数权威们控制着的教会式组织，在那里，“对术语的来源的无知导致了如何协调它们的难题，而为解决这些难题所做的努力又加重了原初的无知”^①。在拉康看来，自我心理学派对弗洛伊德的片面理解根本上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种遗弃，是对其精神的一种拒斥，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理解弗洛伊德的发现以及这一发现的伟大意义。在《弗洛伊德的事务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1955年）一文中，拉康说：

我认为我提问精神分析干预的问题所用的那些术语足以表明，精神分析的伦理不是个人主义的。

但是，在美国的圈子里，精神分析的实践被如此简略地降格为一种获取“成功”的手段和一种谋求“幸福”的方式，因此必须指出，这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种遗弃，这种遗弃在它的太多信奉者当中甚为流行，很简单，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想理解弗洛伊德的发现，他们也不打算去理解，哪怕是以压抑所意涵的那种方式：因为在此起作用的是系统性误认的机制，这一机制甚至以其集体形式激起了谵妄。^②

当然，回到弗洛伊德并不只是为了去做正本清源的工作，还原被自我心理学模糊了的概念的本来面目。对于拉康来说，返回源头还有着更为严肃的目的，还是出于一个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使精神分析学成为一门“科学”，一门可以解释主体性的经验及其意义的“科学”^③：

如果精神分析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因为它现在还不是），并且如果它不想在技术方面蜕化下去（说不定它已经蜕化了），我们就必须重新发现它的经验的意义。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3.

② Ibid., p. 400.

③ 对于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科学，拉康有自己的理解，即它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科学或实证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和解释的科学，拉康称之为“猜想的科学”；但它也不是世界观，不是那种声称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哲学，而是以主体的经验及其意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为此，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就是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①

那精神分析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派对这个问题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比如自我心理学派就认为它是有关自我及其机能的科学，拉康则坚决地主张精神分析学是有关无意识或无意识主体的科学。表面上看，拉康的回答并无特别之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拉康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对无意识或无意识主体的特别理解，那就是要从语言结构或社会法则的角度把无意识和无意识主体理解为结构化的效果，而不是理解为受到压抑的生物本能的集合。可这一理解的根据在哪里？只有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回到组织那些文本的结构线，我们才可以看到无意识与语言的这一关联，才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伟大意义，才可以赋予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真正的前景。

那么，要回到什么样的弗洛伊德？——既然弗洛伊德有弗洛伊德 I、弗洛伊德 II 甚至可能还有弗洛伊德 III，那拉康所认同的是哪个阶段的弗洛伊德？换句话说，既然弗洛伊德有拓扑论体系 I（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和拓扑论体系 II（本我—自我—超我），那拉康是要回到哪一个体系？沿着这类提问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答案，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因为拉康的“返回”不是要回到一个所谓的“体系”——自我心理学家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体系”而不惜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片面的剪裁——而是要回到一个精神之“源头”，而且这“源头”不是时间或发生学意义上的起始点，而是拓扑学意义上的结构点，它与其说是一个已然在场的东西，不如说是一个有待出场的空位，一个等待着阅读来填充其意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说，拉康要返回的不是哪一个阶段或哪一个体系的弗洛伊德，而是处在主体性的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的弗洛伊德，是那个发现了无意识并以这一发现而倾覆了笛卡儿以来的“我思”主体的传统的弗洛伊德。

或则对于上面的问题我们更应当这样来问：拉康不愿意回到什么样的弗洛伊德？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有一些明确回答的——我们只要看一下拉康反对什么样的弗洛伊德或弗洛伊德主义就行了。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21.

第一，反对生物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时正是生物主义——把人当作一个生物有机体来研究——盛行的时期，受到这一时代风气的感染，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术语甚至研究方法充斥着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痕迹，其中影响最广的莫过于他的本能理论，精神分析学也因为这种生物主义而备受贬斥。弗洛伊德死后，他的许多追随者一方面力图通过祛除其本能概念中的性欲化含义来摆脱道德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其生物主义的模式，继续以本能的压抑和转移来解释心理机制，或则像荣格那样干脆用一种文化主义来取代生物主义。在这一点上，拉康旗帜鲜明，明确地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反对对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做出本能主义的解释，反对精神分析学中的生物主义倾向，他说：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不管是不是基于生物学的观察，在生命体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在本性上必需的各种认识模式中，本能可以说是一种我们因为它不能成为知识（un savoir）而感到惊叹的认识（connaissance）。但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关涉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当然是一种知识，但不关涉一丁点的认识，因为它被写入了一个话语，在那话语中，主体就像古代的信使—奴隶一样，发卷之下刻着他的死刑判决书，他却对其意义和文本一无所知，也不知这文本是以何种语言书写，甚至不知它是人们乘他熟睡的时候刺写在他头皮上的。

这个寓言丝毫没有夸大无意识与生理学的联系的微弱程度。

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测定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给生理学的贡献：其贡献近乎于零，即便说到性器官也一样。任何奇思异想都改变不了这个负债关系。^①

第二，反对心理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精神分析心理学化，把心理学的模式引入自我的研究中，可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当初创立精神分析学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反对心理主义，因为后者把主体看作自明、自主的有意识的存在，只知道以单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680.

一的刺激—反应模式来勘定主体的知觉状态以及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心理主义的研究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或者说行为主义的，而拉康明确地说，“经验主义不能作为科学的条件”^①，那种企图把精神分析学纳入心理学范围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行为。他说：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构成的东西，它有着心理学的名称，且带着一个科学的标签。

可我要挑战这个名称，原因恰恰如我将要说明的，弗洛伊德的经验所确立的主体之功能自一开始就拆穿了借“心理学”的名称所宣讲的东西，这东西纯粹是为了维持一个学院式的框架——不管人们如何去装扮它的前提。

它的准则就是主体的统一性，这也是这种心理学的前提之一；甚至具有症状意义的是，这一主题比以前更明显地被突显出来，仿佛某种意识主体的返回是至关重要的，仿佛心理的东西必须作为有机体的替身来获得确认。^②

第三，反对人道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拉康在许多地方都讲到，弗洛伊德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人道主义所讲的那个“人”实际只是“自我”，是主体的想象性维度，而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或主体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并不在自己的家里，而是一个分裂性的东西，以拉康的话说，人是以语言而在世，而语言的在场意味着能指对人的写入，意味着无意识之于主体完全就是“另一个场景”。为理解拉康的这一思想，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在关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的第7期研讨班（1959—1960年）中的一段话：

至于我们，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人道主义思想谱系的尾端。从我们的观点看，人正处在分裂的过程中，就仿佛是光谱分析的一种结果，这种人亦是我在此所探讨的东西的一个典范，我的探讨主要围绕着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结合来进行，我们力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672.

② Ibid., pp. 672-673.

图在这种结合中找出人与能指的关系，以及这关系在人身上所引发的“分裂”。^①

拉康所理解的弗洛伊德不是生物主义的弗洛伊德，也不是心理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弗洛伊德，是的，你可以说这种排除法只是告诉了我们拉康不想回到什么地方，而仍然没有说出拉康想要回到什么地方。但你从这一系列的排除——也许还可以列出其他的方面——当中应当能够看出，拉康是要回到一种精神的“源头”，那就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发现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用拉康自己的话说，这意义就在于实现对笛卡儿以来的自主主体的“倾覆”。拉康正是带着这样的知识意志走向弗洛伊德的文本深处，在那里寻找可以倾覆（自主）主体的堡垒的引爆点，并从外面接进一根导火线，以最后一跃的姿态把主体投入熊熊烈焰中。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回到弗洛伊德？按照拉康的理解，回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源头，就是要去重新厘定他的那些概念的意义，在《罗马报告》（1953年）中，他说：

我们这个学科的科学价值只可归于弗洛伊德在其经验历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一直未经足够辨析，因此还保留着日常语言的含混性，虽然它们受益于后者的弦外之音，可时常会招致误解——故而在我看来，与传统术语决裂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我认为一件紧迫的任务是在那些已被日常用法弄得僵死的概念中发掘出意义来，只要我们重新考察它们的历史，反思它们的主观根源，就可以重新找到它们的意义。^②

因此，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就成为拉康实施其返回的最基本策略：

因此我要指出一点：为了掌握弗洛伊德的任何概念，阅读弗洛伊德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对那些与日常观念用词相同的概念。^③

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曾对作为话语实践的书写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pp. 273—274.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99.

③ *Ibid.*, p. 205.

和阅读中的“返回”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返回不是模仿，相反，那是一种“构成性的省略”，一种并非偶然或因为不理解而造成的省略；返回总是向源头的返回，是向文本本身的返回，是向原初的、未加渲染的文本的返回，它尤其关注写在文本的空隙、空白和虚无中的东西，“我们回到那些空的空间，它们被省略掩饰起来，或被隐藏在一种错误的、令人误解的丰富性中”^①。福柯还说，向文本的返回不是一种“历史的增补”，而是转变话语实践的有效而必然的方式，对伽利略的作品的研究可以改变我们对力学历史的认识，但不能改变对科学历史的认识，可是，重新考察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却可以改变我们对精神分析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福柯的这段话简直就是对拉康的返回的一个注解，拉康自己也说，“我们不是追随（following）弗洛伊德，而是伴随（accompanying）弗洛伊德”^②，对于他而言，返回不是要去模仿和复述，而是要去重写，返回的道路恰是重新开始的道路，是到源头中、到原初文本的缝隙和空白处找寻入口的过程。拉康把研讨班作为他进行这种重读的圣所，至少在前十年，即在1964年研讨班易地巴黎高师之前，他的确在恪尽职守地带领他的学生一本接一本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且他的阅读无疑是建构性的、诗学化的，流淌着结构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异彩。

具体地说，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强力阅读不外乎如下几种技巧：第一，语言学的，即以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为模型重新阐释无意识的结构机制，从而使精神分析学脱除心理学的阴影，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结构分析”；第二，拓扑学的，即以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为基本叙事框架，通过引入拓扑学的变换来重述弗洛伊德的概念的复杂含义、基本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三，修辞学的或诗学的，即以—种症状阅读的方式深入到弗洛伊德文本的隐意之中，去挖掘文本的深层逻辑，为了让阐释脱除字面意义的限制，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超现实的链接、语义的双关、词义的滑行、语境的漂移等等技巧。

^①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p.135,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 120.

那么，拉康到底重读了弗洛伊德的哪些东西？或者说他到底回到了弗洛伊德的哪些地方？在此我不可能去一一列举，那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想特别地指出几个方面，它们可以说是拉康展开其阅读的基本着力点。

首先是文本的方面。拉康的阅读涉及弗洛伊德的大部分奠基性文本，从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1895年）和《科学心理学纲要》（1895年），到第一个拓扑论时期的《释梦》（1900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年）、《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年）、《论自恋：导论》（1914年）等，再到第二个拓扑论时期的《超越快感原则》（1920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自我与本我》（1923年）等，及至更晚的《文明及其缺憾》（1929年）、《女性性欲》（1931年）、《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等，所有这些文本对支撑拉康的基本理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拉康的大部分核心概念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并未出现或是不居有重要地位，但拉康在阐发自己的几乎每一个概念时，都会把它的源头追溯到弗洛伊德那里，以示他的术语不过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拉康阅读的弗洛伊德文本甚多，但有一类文本却少有提及，那就是弗洛伊德的“美学”文本，如有关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文字，就连他在讨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也很少说到弗洛伊德的相关评论。是拉康对文学艺术不感兴趣吗？当然不是，他也阅读了许多文学艺术文本，不过，与弗洛伊德主要是将精神分析技术运用于文学艺术文本不同，拉康则是把文学艺术文本本身就看作精神分析的文本，他没有阅读弗洛伊德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的批评观有着根本的差异。

其次是病例分析的方面。弗洛伊德一生做过许多病例分析，但最有名的还是他写的五大案例：《一例癔症分析片段》（“杜拉”）（1905年）、《对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小汉斯”）（1909年）、《一例强迫性神经症的说明》（“鼠人”）（1909年）、《精神分析对一个偏执狂病人的自传性叙述的说明》（“施列伯”）（1911年）、《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狼人”）（1914年）。对于这五大案例，拉康在阅读弗

洛伊德的时期经常提及，并对它们有过或完整或片断的分析。例如：在1951年的一个题为《论移情》的大会发言——这个发言后来被收入《文集》——中，他以黑格尔式的主体间性的辩证法专题讨论了杜拉的病例；在第3期研讨班《精神病》（1955—1956年）中，他以“父之名”的除权作为精神病的临床结构讨论了施列伯的病例；在第4期研讨班《对象关系》（1956—1957年）中，他以俄狄浦斯阶段的理论讨论了“小汉斯”的病例。所有这些讨论都可视为是对弗洛伊德的分析的强力重写，它们都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拉康在临床方面的阐释技巧——一种极具先锋诗学色彩的拉康技术。需要说明的是，拉康的这些讨论都有很强的技术性，但他从不会依循一种因果的逻辑——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分析模式——去进行所谓的病因学探讨，就是说，他的分析技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临床技术，而是一种高度理论化的症状阅读和症状分析技术，是一种精神分析阐释学，所以我们在阅读他的这些病例研究的时候，仅有临床“医生”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确切地说，拉康的临床分析首先不是为了“治疗”的目的。另外，拉康对所有这些病例的分析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研讨班中时有提及，且其所关注的主题或者说阅读角度随语境而变，比如杜拉的病例，既可以用主体间关系的辩证法来阅读，也可以用来说明人的欲望即是他者的欲望，还可以拿来阐明分析情境中分析师的位置与欲望以及分析过程中移情和反移情的问题，等等。

再有就是概念的方面。除奠基性的文本的重读和病例史的重写外，概念的重造也是拉康返回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刚刚说过，拉康对自己的几乎每一个概念——不管弗洛伊德是不是使用过它——都会到弗洛伊德那里去寻找“源头”的支撑。同时，他的几乎每一个概念——包括弗洛伊德使用过的——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用法，与我们平常的理解完全脱节，就是说，拉康几乎所有的概念和术语，不管是他从别的学科中引入的还是从别人那里挪用过来的，在使用中都经过了改装，弗洛伊德的概念也未能幸免。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概念的改写在30年代写作“家庭情结”的文章时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时他的语言学转向还没有发生，改写大都停留在“新解”的层面，可到50年代初开始研讨班的时候，“三界”框架的引入使得这种“改写”彻底变成了概念的“重造”——在全新的“科学”框架或知识型中对概念

的结构和含义重新组织，由此而形成一条全新的知识生产线。在历经十年的文本阅读之后，1964年，随着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拉康的研讨班易地巴黎高师，面对知识背景较之以往远为庞杂的听众，研讨班也以全新的面孔亮相，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阅读差不多就此止息，所需要的是一个总结。同时，拉康也开始了对自己的理论的重述，他要重读他自己。1964年的第11期研讨班——这是拉康在巴黎高师的第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就是这一双重重读的经典文本。

在这一期研讨班上，拉康着重讨论了弗洛伊德的四个“基本概念”：无意识（the unconscious）、重复（repetition）、移情（transference）、驱力（drive）。何以这四个概念成了“基本概念”？拉康并没有说精神分析学“只有”这四个基本概念，而他之所以要特别提出这四个“基本概念”，与刚刚发生的那次决裂有关，也与他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技术的重建有关。简略地讲，拉康提出这四个“基本概念”，一方面是为了从根本上击溃自我心理学派的理论防线，如他们为了“自主的自我”的概念而极力贬低无意识的价值，为了突显“抗拒分析”（analysis of resistance）的作用而无视“重复”的存在，为了强调治疗过程中分析师的主导地位而只是把移情理解为一种想象性的二元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总结性地阐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发现的意义，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总结说，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从不同层面对无意识和分析经验的说明，“借助四个基本概念，拉康仿佛是在四个不同的方面对无意识做出说明。其实，这也是对分析经验的四种不同表述——四种不同的把握分析进程的方式。这绝不是一次抽象的研讨班，而是一次与实际的分析实践紧密相关的研讨班”^①。

然而，这也决不只是对弗洛伊德的概念的说明。拉康在说明弗洛伊德的每一个概念时都引入了自己的概念：在说明无意识时引入了分裂主体的概念；在说明重复时引入了能指或能指链的概念；在说明移情时引入了大他者的概念；在说明驱力时引入了对象 *a* 的概念。更确切地说，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Maire Jan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9.

拉康是在用自己的概念重写弗洛伊德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说“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而不是“弗洛伊德”的四个基本概念，根本上，这个“精神分析学”是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是拉康借弗洛伊德的外壳重述出来的精神分析学，所谓的“四个基本概念”其实是拉康的基本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拉康的基本概念只有四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64年有关四个基本概念的研讨班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政治的一次成功表演，它以返回的姿态对源头的“省略”进行了构成性的增补，返回的道路彻底地成为重新开始的道路。

最后还应特别提及一下拉康的另外三个重要的返回，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拉康返回的三个重要场景，它们对结构拉康的精神分析话语皆具有“源头性”的意义。

第一，弗洛伊德在论及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时有一句名言：“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英语世界将其译为：“Where the id was, there the ego shall be.”（中文据此译为：“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①）法语世界则译为：“Le moi doit déloger le ça.”（“自我必取本我而代之。”）这两个译法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自我终将驱逐本我、取本我的位置而代之。拉康不认同这一译法。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这句话不是在讲本我与自我的关系，而是在讲无意识的“我”即主体与异在性的“它”的关系：主体在“它”之中。基于这样一个理解，拉康以一种过度阐释和语义滑动的方式对那句话给出了自己的翻译：“在它所在的地方，我必在那里生成——这是我的责任。”^② 他在许多地方指出，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最为鲜明地提示了一点：主体总是且只是无意识的主体，而无意识作为“另一个场景”总是处在彼处，主体在无意识之中的存在根本上只是主体在它处的存在，主体根本上是分裂的——这正是拉康的主体理论的先在条件。

第二，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的创立时期有三个重要的文本：《释梦》（1900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年）和《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年），拉康总喜欢把这三个文本并置在一起，因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552页。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347-348. 有关这个翻译，我在后面会给以论述，参见第八章第一节。

为它们都指示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指示了无意识的场景，如梦、口误或日常语言错失、症状；指示了无意识主体在“另一个场景”中的构成；指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源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省略”：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而我们知道，这正是拉康理论的基本教义。

第三，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1920年）中曾讲到被外出的母亲留在家里的小孩玩的一个抛出和拉回线轴的游戏，并认为这个游戏是儿童对母亲的“消失和再现”的一种戏拟，儿童通过游戏的重复让自己身临其境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以缓解母亲的不在场所引发的痛苦经验。拉康称这个游戏为“Fort/Da”游戏——这是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发出的两个音节——并在许多地方强调这个“言语”（他称之为一种“牙牙之语”）场景正是主体进入象征维度的开始，亦是主体的欲望之门得以开启的时刻——而这恰是拉康的精神分析阐释得以展开的场所。

如上所说，拉康的返回实际是对源头的一种回溯性建构，是一种重新开始。回到弗洛伊德并非要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弗洛伊德，而是要通过重读来打开弗洛伊德文本中已被遗忘、被封闭或被扭曲的意义。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或者说“普罗米修斯式的发现”远远不只在在于他潜入了无意识这一以前被忽视的神秘大陆，而在于他在以前被认为自足、自明的自我与主体概念中看到了异己的他在性的因素，看到了隐匿在其中的离心化力量，精神分析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种因素或这些力量被置入的机制，以此揭示出主体的真理或真相。

那么，如何找到这些异己的或分裂的东西以及如何对它们的运作机制做出解释呢？拉康说，那就必须引入语言学的模式和人类学的术语，必须引入哲学的概念，还必须引入数学的模型来重述弗洛伊德的理论 and 概念，把精神分析学的话语形式化。在《罗马报告》（1953年）中，拉康说，虽然弗洛伊德从其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术语和概念还保留着日常语言的含混性，但我们也没有必要与之完全决裂，而是应当运用新的科学语言对其语义进行辨析：

在我看来，只有通过建立起这些术语同人类学的时下用语甚或哲学中的最新问题的等义关系，才能进一步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

在这些领域中，精神分析学常常只需坐收渔人之利。^①

就我而言，我认定，如果你不懂得作为技术之基础的那些概念，那就不可能懂得这个技术，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地运用它。我的任务是要表明，只有定位在语言的领域，只有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②

通过强调言语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唯一媒介，通过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技术中不自觉地隐含和运用的语言学维度，通过用语言学的模式来重写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并进而通过把自我和主体的结构置入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这一“三界”的框架加以科学化的探讨，拉康完成了其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述，让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在他那里获得了所意想的一次伽利略式的“科学”飞跃。因此，如果说文本阅读是拉康实施返回的策略，那么，至少在50年代，语言学、人类学及哲学（主要是科耶夫所阐释的黑格尔哲学以及海德格尔哲学）就是他完成这个返回的工具。这样，我们在论及拉康的返回时还需要谈一下他的“语言学转向”的问题。

早在30年代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时候，拉康就已经对语言现象发生了兴趣，如他对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和埃梅的妄想症写作的思考与研究就已经显示了他思维触角的某种深广性。基于这样的兴趣，在他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之初，语言问题就作为一个关键问题被提出来，例如在写于1936年的《超越“现实原则”》这篇论文中，他从现象学的方面讲到，语言是精神分析经验的基本素材，是分析实践中结构分析师和受分析者的关系的核心要素；40年代末，例如在1948年的《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提出精神分析的活动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而展开的，并开始把语言看作是精神分析经验中最基本的媒介，不过这时他仍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把语言理解为主体间的一种意向性活动，将对意义的辩证把握视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到50年代，一种新的语言学视野的进入使得拉康对语言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语言的问题不仅关涉到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经验，还关涉到一种认识论或方法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199.

② *Ibid.*, p. 205.

论层面的运用，拉康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

拉康的“语言学转向”当然是指把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可问题在于，为什么语言学可以与精神分析学进行这样的对接？从拉康的角度说，至少有三点可以证明这一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第一，就精神分析实践而言，拉康说，不论我们把精神分析学看作一种治疗手段和教学手段还是看作一种探测主体真相的手段，它都只有一个媒介，那就是“病人的言语”，“这一事实的显而易见并非可以忽视它的理由”^①。病人以言语向他人（分析师）言说，他人（分析师）则通过病人的倾诉来引导病人走向主体的真理，精神分析学不同于精神病学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只以言语作为媒介。并且这一点还昭示了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总是关涉着主体间性的问题，“主体的言谈行为总伴有一个对谈者，即是说，言谈者在那里被构形为主体间性”^②。在分析中，所有的言语都召唤着回答，即使言语碰到的是沉默——不论是病人的沉默，还是分析师的沉默——可只要有一个聆听者，就必定要求有回答，或者这沉默本身就是要求，就是应答，拉康说，“这就是言语在分析中的功能的关键”^③。

第二，就精神分析理论而言，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本人也说过，其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无意识。可对于无意识的概念，弗洛伊德并没有一个严格一致的使用，有时他在形容词意义上将无意识理解为所有不会出现在意识领域中的东西，有时他又在拓扑论意义上把无意识理解为一个由被压抑的内容所构成的精神系统。^④ 弗洛伊德还在世的时候，精神分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6.

② Ibid., p. 214.

③ Ibid., p. 206.

④ 拉普朗虚和彭大历斯在《精神分析辞汇》一书中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总结为三大方面：其一，“形容词无意识，有时被用于涵指所有未呈现于意识当下领域中的内容……亦即，前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的内容在此处未被区分”；其二，“就拓扑论意义而言，无意识指称弗洛伊德在第一精神装置理论架构下所定义的各种系统之一：它由被压抑内容所构成，这些内容由于抑制作用（原初抑制与后遗抑制）而被拒于前意识—意识系统之外”；其三，“在弗洛伊德第二拓扑论架构中，无意识一词主要被以形容词形式使用，实际上，无意识不再专属某一个别层级，因为无意识同时形容‘它’[即我们说的‘本我’。——引者注]以及部分的自我与超我。”（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213页。）

析共同体内部就有人——例如荣格——对无意识概念进行修正，弗洛伊德死后，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我心理学占据主导，无意识概念的重要性大为削弱，用拉康的话说，无意识的维度根本上被遗忘了，其它的断裂维度因为自我的统一性幻象而被彻底遗弃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就是要重启这个受到压抑的维度。那么，该从哪里去开启这个维度呢？通过对弗洛伊德早期作品如《歇斯底里研究》、《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等的阅读，拉康发现，弗洛伊德对精神症状、梦、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语言现象的研究都揭示了无意识跟语言的特殊关系，尤其在那种可称为“语言障碍”的现象中，如在断裂的梦文本中，在日常生活的口误、笔误、玩笑、双关语中，或在病人的不连贯的言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无意识运作的踪迹，找到语言之于无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拉康说：“精神分析经验在无意识中发现的就是在言语之外的语言的整个结构。”^①

因此第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仅仅承认无意识与语言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在于找出这种关系的基本法则，找出无意识在那些语言裂口中的运作机制。拉康认为，当代的语言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为什么语言学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弗洛伊德在讨论无意识的运作时曾提出过一个概念：无意识的思维，就是说，无意识也是一种思，也有一种不同于我们日常的智性活动的思维结构，弗洛伊德因受时代局限而未能找到进入这个结构的科学方法。我们的时代要幸运一些，结构语言学就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精神分析学家的最大馈赠，因为它不仅把探寻语言的深层结构以及语言的运作法则当作自己的研究目标，而且还为这一研究创立了一套革命性的研究方法，例如它的音位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就是通过运用这个方法而掀起了人类学研究的革命，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激励了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不仅证明了语言学方法在探寻人类社会、文化及精神活动的深层结构方面的有效性，而且阐明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语言学领域的紧密关联，甚至说，精神分析学要想获得科学的严密性，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学的工具。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413.

我们已经知道，拉康转向的是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经历了一个过程。1953年发表《罗马报告》的时候，拉康对结构语言学的了解还极不完整，大体上只是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获得了一些音位学概念。这就是说，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个转向中充当了一个跳板，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跳板，因为正是这个跳板让他的象征界概念获得了语言支撑。总体上，从1953年到1955年，拉康对象征界的阐述基本是人类学层面的。但1955年开始，确切地说，是他写作讨论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论文时——即收在《文集》首篇的那篇论文，它于1955年8月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故乡完稿，比照一下这篇论文与在刚结束不久的第2期研讨班上对《被窃的信》的讨论，就可以知道拉康思想的这一转变——索绪尔语言学才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能指的逻辑成为界定象征界的工具。紧接着在1955—1956年的第3期研讨班上，拉康又引入罗曼·雅各布森的转喻和隐喻概念来说明无意识的构成机制。

雅各布森曾是俄国形式主义集团的成员，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到了捷克，和特鲁别兹柯伊（Trubetzkoy）一起创立了布拉格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雅各布森流亡到美国，在那里与列维-斯特劳斯相识，两人成为好友，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知识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1950年，雅各布森到法国旅行，经由列维-斯特劳斯介绍，与拉康相识，就这样，雅各布森又成为拉康走向索绪尔的一条通道。^① 1956年，雅各布森发表了一篇研究儿童失语症的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其中讨论了语言的两种组合原则——相似性原则和邻近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两种修辞学功能：隐喻和转喻。拉康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兴奋，立即在第3期研讨班上做专题介绍，并将其用于解释梦的机制。1957年，在《字符的代理作用》——这是拉康在索邦大学的一个演讲——中，拉康对索绪尔的能指理论和雅各布森的语言结构原则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改写），然后把它们嫁接到精神分析经验中对无意识的构成进行说明。拉康的“语言学转向”至此算是真

^① 按鲁迪奈斯科的说法，除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森之外，拉康还从梅洛-庞蒂那里了解到一些索绪尔的理论，甚至皮雄也发挥过作用。参见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05.

正完成，此后的几年间，他都在利用这个语言学工具扩展和丰富他的理论。

再者，对于拉康的“语言学转向”，还有另外两条线索需要说明。

第一，法国本土的语言学理论在这个转向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爱德华·皮雄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影响最为明显。

皮雄的职业是一名医生，接受过索科尔尼卡的分析，是“精神病学的演进”和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在1926年新成立的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就弗洛伊德的术语翻译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皮雄曾说弗洛伊德的“*Ich*”一词不能译作法语的“*moi*”（自我），而必须译作“*je*”（我），但这一意见并未被采纳。后来他撰文对这两个法语词进行了语法学的探讨，视它们为主体的两种表达自体（*self*）的语态：“*je*”（我）属于“弱人称”（*attenuated person*），“*moi*”为“强人称”（*ample person*），前者是严格的语法意义上的，后者往往表达一个具体的人格。这意思是说，“*je*”只是句法意义上的一个称谓，“*moi*”则指示着对人的存在的某种描述，所以在法语中，“*moi*”（自我）和“*non-moi*”（非我）构成一个对立的描述。拉康在1949年的《镜像阶段》一文中同时使用了“*je*”和“*moi*”两个术语，但并未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可到5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的时候，这一区分便被赋予了超出语法意义之外的特别含义，“自我”（*moi*）和“我”（*je*）的分离被解释为想象性自我与无意识主体之间的分离，“我”作为能指的主体在句子中只是一个转换词，仅指示着一个主体的存在，但不意指主体的任何内容。“自我”与“我”的分离对于拉康建立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模式以及主体的分裂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引入这个分离的依据恰是法国的语言学传统。

本维尼斯特是法兰西学院的语言学教授，法国结构语言学的代表人，他的代名词理论——尤其“我”与“你”之间的极性关系理论——实际延续了皮雄在纯语法意义上来讨论“我”的传统，但他在讨论中置入了一个主体间性的关系结构，即所谓的“我”和“你”实际都是在具体的言说状态下指示出来的“话语的现实”，“我”是那个正在对你说“我”的“他”，“你”是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他”，正是这种主体间

性，个体的语言交流才是可能的。同时，本维尼斯特还从话语行为中区分出独立于语境的陈述的层次和依赖于语境的叙述的层次，本维尼斯特的这些思想在拉康对言说主体的阐述中将发挥核心的作用。

第二，海德格尔的言语观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得拉康的语言学转向呈现出一种别具意味的杂色。

“海德格尔”，只要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让我想起心中渴望的那种“哲学”：澄澈，明净，纤尘不染。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哲学”，如同他的异在是一种“反哲学”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的那段纠葛让海德格尔成为“冷战”时期世俗的践行者思考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个标本。盟军攻占德国后，海德格尔被勒令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他被幽闭在弗莱堡的黑森林，但这个“此在”的磁力并未因此而消失，法国的让·波弗勒（Jean Beaufret, 1907—1982）就是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那一刻因领悟到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存在经验而成为海德格尔的信徒的。

在战后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盛极一时。1945年10月29日，萨特面对着一大堆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夜之间，迷惘无助的法国人似乎在这个“介入”哲学中找到了生存的希望，“负起责任，用你的行动不断创造你自己”，这就是萨特抛给那些“绝望的主体”的一个救生圈。可波弗勒对这个救生圈的可靠性抱有怀疑，他于是致信海德格尔请教“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人道主义一词重新获得一种意义”，海德格尔在1946年给予了回复，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在信中，海德格尔讲述了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传下来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则逸事：一群陌生人想去看看思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在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到的是哲人正在火炉旁烤火取暖，这让他们大吃一惊，而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哲人招手对他们说，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在场。^①这真是一个神谕性的场景，其“泰然处之”的思的境况不正是海德格尔的夫子自道么？其汨汨流淌的“寂静的力量”不是正好揭示了萨特那喧闹的人道主义幻象的欺哄性么？

拉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对海德格尔哲学有所了解——科耶夫阐

^① 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397～39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释黑格尔的时候就大胆地借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但肯定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大约在1951年，波弗勒因受到同性恋倾向的困扰而走向拉康的躺椅接受分析。有一天，因为被拉康的沉默所激怒，波弗勒抛出了一个让他的分析师开口的诱饵，他对拉康说：“几天前我在弗莱堡海德格尔家里的时候，他向我提到你。”——其实，这时的海德格尔根本不知道拉康为何许人——果不其然，拉康听后兴奋不已，急忙满怀期待地问道：“他跟你说了什么？”——这个不断教导别人穿越自我的幻象的主体性自己有多么迷恋幻象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就这样，通过波弗勒，拉康开始重新阅读海德格尔。到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海德格尔式的腔调了：“存在的意义”、“真理的敞现”、“言语的功能”等等，贯穿于报告中的这些主题总会在某个地方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遇。尤其对言语之功能的探讨，最能体现拉康开始其语言学转向之初的某种知识纽结：他一方面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上把言语行为说成是主体间的一种“象征性交换”，另一方面又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把言语说成是主体之真理的实现或揭示，当把这两个方面置于精神分析经验中去讨论“病人的言语”的时候，如何把病人/主体从想象性的关系中道说的“空虚的言语”或“虚言”导向能揭示主体之真相的“充实的言语”或“实言”就成为分析实践的关键。如同许多人说的，拉康在此有关虚言和实言的探讨乃是在精神分析学的层面对海德格尔区分出的两种言语即作为言语之非本真形式的“闲言”和作为言语之本真形式的“话语”的一种改写。不过对于这个“改写”，我们不可做过度的想象性阐释，以为拉康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如同他挪用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框架但并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哪怕是科耶夫意义上的——一样，他也不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他充其量只是挪用了海德格尔的某些说法。在这个意义上，雅克-阿兰·米勒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他说：

是什么使拉康在1953年相信他已真正开始掌握精神分析的功能和实质？这不是一个传记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如下事实最好地表现了那一理论的时刻：拉康已设法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之间定位一个交汇点……我相信拉康直到1953年都还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因为他当然不是萨特的信徒，但尽

·管如此我还是接受这一说法。1953年不是他为了结构主义而抛弃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年份，而是他融合两者的年份：《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即是这两者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拉康那时的言语理论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而他的语言理论是结构主义的。^①

说1953年拉康的言语理论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这个结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因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言语观的一个根本点在于把言语行为视作主体的一种意向性活动，这与拉康视言语是主体之真理的实现并不能完全等同，在他那里，主体之真理并不是在主体间的意向性活动中实现的，而是要借着语言这个象征性维度的介入才有可能；其次，说1953年拉康的语言观是结构主义的，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那时的拉康还不是一个严格的结构主义者，他还没有在索绪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他至多只是借用了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称语言是主体间的象征性契约，而这个观点与其说是结构主义的，不如说是人类学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罗马报告》在拉康的转向中的意义，这个报告对于他的转向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所标示的转向本身，而在于它所开启的两条转向路线：对言语的关注使他转向了对言说主体的构成机制的说明，对语言的关注使他转向了对无意识主体的语言结构的探讨，而这两条路线的真正完成还有待于能指的逻辑的引入，到那时，言语的现象学维度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摒弃。

拉康与海德格尔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波弗勒抛出的那个诱饵还在发挥着捕获的效力，拉康很想当面获得海德格尔对他的“主体身份”的指认。终于，1955年复活节这天，在波弗勒的陪同下，拉康亲赴弗莱堡拜见了海德格尔，由于语言不通，两人的交谈不是很顺畅。席间，拉康请求海德格尔允许他翻译后者写于1951年的一篇评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哲学残篇的论文《逻各斯》，海德格尔同意了。1956年，拉康的译文发表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刊《精神分析学》（*La Psychanalyse*）的第一期上——拉康自己的《罗马报告》也首次在这一期上发表。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I and II: Lacan's Return to Freud*, p. 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1955年8月底，海德格尔赴法国参加一个有关他的作品的研讨会，会后，拉康邀请海德格尔夫妇到家里做客，并驱车陪同海德格尔夫妇游览了普罗旺斯和夏特尔多大教堂，据说，拉康的超速驾驶引得海德格尔夫人一路上抱怨不已。

第四节 逐出教门

再回到1953年。

前面已经说到，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决裂后，拉加什和拉康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学会——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与巴黎学会强调其医学理想，力图把精神分析学纳入医学的体系不同，法国学会宣称它将向医学以外的人士开放，强调精神分析学是人文和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正如学会的创立者们所说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科学的自由和人道主义而战”，并且他们声称，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没有理由不承认这个新的学会。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他们的人道主义激情最终激活的将是一种精神分析政治，这一政治将把他们的事业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无谓的纠缠。

当拉加什一伙脱离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时，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危害到他们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间的会员关系，因为他们还记得，半年多以前，当纳什特少数派威胁要脱离学会时，愤怒的波拿巴王妃从安娜·弗洛伊德那里得到证实，分离者的会员资格的确认在国际协会那里不会有问题。其实安娜弄错了一点。按照惯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只接受地方学会，而不接受个人入会。一个人从地方学会中退出，就意味着自动退出了国际协会，除非他加入到另一个获得协会承认的学会中，就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情形，在那里，有多个隶属于国际协会的地方学会，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学会，只要他加入另一个学会，他与国际协会之间的会员关系仍将保持着。可法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在这里并没有多个平行的学会，一直以来，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被国际协会承认是法国唯一的合法学会。所以，当拉加什们离开学会后，他们与协会之间的会员

关系就随之成了问题。

危机的征兆很快就显示出来了。1953年7月6日，拉康接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总秘书的来信，信中说：“我们确信你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你的决定同时意味着你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员的地位。不过，如果你想作为客人参加第十八届伦敦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科学会议，就请你告诉我们结果。不幸的是，我们不能邀请你参加行政会议，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那个会议只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开放。”^①

拉康和拉加什立即行动起来，给他们在国际精神分析学界的朋友写信寻求支持，强调他们离开巴黎学会只是为了抗议精神分析学院中的权威主义，而不是要背叛精神分析运动本身。可他们的敌人也已经行动起来，波拿巴王妃动用其非凡的外交关系，致信国际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说明”事件原委。很快地，结论已经私下敲定：即将就任协会主席的海因兹·哈特曼和作为副主席之一的安娜·弗洛伊德决定将分裂者逐出协会，并将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整个事件。需要注意，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与这两个掌权者对拉康的成见有关，但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可以容忍理论上的创新和分歧，甚至可以容忍由此而导致的分裂，但绝不容忍技术上的擅自背离，国际协会的技术规则乃是维系这个帝国统一的一个象征，是所有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循和认同的无意识“真实”。拉康的自由技术再一次成为帝国重申其绝对权威的替罪羊。

1953年7月26日，伦敦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行政会议上，在有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与会者就精神分析的规则问题和巴黎事件进行了讨论。^②哈特曼主席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去考察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人申请和培训分析中的“离轨”行为。洛文斯坦因恳求协会对分裂者宽容处理，他把分裂比作父母的离婚，只会对学生有害处。玛丽·波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50.

^② 有关这次讨论的记录，参见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p. 71—74, ed. Joan Copjec, trans. D. Hollier, R. Krauss & A. Michelson,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拿巴虽没有提到拉康的名字，但强调有必要认真地调查新团体的成员的技术。纳什特则声称他打算同拉加什达成和解，以便减轻正在接受培训的学生因导师间的不和而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有人提议在调查期间暂时保留那些退会者作为国际协会的会员的资格，可哈特曼和安娜·弗洛伊德拒绝了，他们十分恼火这些法国人已经将他们的分裂公之于众，让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集体蒙羞。最终哈特曼的调查动议被通过，调查委员会由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等五个人组成。国际协会正式介入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事务。

1953年秋天，调查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大多数的学生和包括多尔托在内的部分教员都接受了讯问。经过一年的调查，委员会在1954年底做出了它的结论：不同意法国学会入会。这个结论令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十分兴奋，它立即在其会刊《法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发布了一条消息：“通过对1953年国际大会的行政决议特别委派的国际委员会提供的事实和报告的审慎研究，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做出了如下结论——这一结论刚刚传达给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做出如下决定：考虑到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目前的教学状况，还无法批准承认那一学会作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①

第二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国际协会正式宣布并表决通过了委员会的结论。会后，拉加什多次致信国际协会主席哈特曼，对国际协会的决定表示不解，他清楚地知道一切的障碍都来自拉康，因此他在为拉康的技术进行辩解的同时，也不断向哈特曼强调一点，即人们针对拉康的技术所作的批评已被用于政治目的。拉加什说得没错，拉康的分析技术的确被精神分析共同体政治地看待了，且被他的敌人政治地利用了。但问题在于，对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帝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最大的政治之一就是技术的规范化，唯一的“导师”死后，就不再允许有卡里斯玛式的英雄或魅力领袖出现，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帝国既定的规则。这正是国际协会始终对拉康的理论创新不置可否而一味抓住他的技术违规不放的主要原因。所以，当拉加什很委屈地指出有人在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19.

借技术的由头搞政治打击的时候，他真是太天真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保证技术的统一性正是帝国作为一个规范化机器的力量的真正体现。

那么拉康呢？在别人为他的事四处奔走的时候，他自己又在做什么？他在做他的知识英雄，他正沉浸在由某种分析情境所构建的魅力领袖的梦幻之中。如果说1953年的决裂在拉加什那里确实有为“科学的自由”而战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它在拉康那里却有几分被迫的意味。拉康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导师和革新者，他与纳什特之间的冲突固然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诱因，但对权力的崇拜或认同也是使他把占有理想主体的位置的纳什特想象为迫害者的驱力之一。现在，当那个“理想主体”在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中被想象性地击倒之后，拉康的权威妄想终于获得了一个自由的投射空间。当然这只是一种“看似”的自由，因为这个从“理想主体”的镜像中暂时逃逸出来的“欲望主体”现在又遭遇了另一个他者、一个“大他者”的欲望捕获。国际协会对新学会的“主体性”即会员资格的确认必须以主体放弃自己的欲望为前提，主体性的逻辑可能就是必须成为非主体，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逻辑，它以一种吊诡的形式昭示出了精神分析学的那个隐秘核心：无意识主体的构型。对于无意识主体的这一悖论式语境，拉康可谓是深谙个中滋味，现在，他“终于”要谈论这个“主体”了^①，并且是把它置于“语言结构”的框架中、置于海德格尔式的言谈情境中来谈。

显然，同拉加什那略显天真的学者气相比，拉康对精神分析政治的领悟要老练得多。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技术所隐含的政治意味，他也知道国际协会要求于他的是什么，他当然也知道，若是不满足这些要求，会给他自己、他的学生以及他所在的学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他所不愿意面对的，他更不愿意让自己为这个后果负责，可同时，他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想要成为大师的欲望。问题在于，他的这个欲望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的事业之上的，这个欲望的实现是与一个建制的认可密切相关的。我们可能会奇怪：会员资格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就连拉康这样的人都难逃其诱惑？这正是拉康这种人在精神分析建制中的困境

^① 1966年拉康在编辑其《文集》时，在《罗马报告》的前面插入了一篇为这个报告新写的类似于“序文”的文字：《终于问及了主体》。

所在，因为在 50 年代，精神分析运动在法国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少数人的事业，其影响力基本上还局限在较小的专业圈子内，失去了与建制的联系，一定程度上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的主体位置。

面对这一困境——既想成为合法的大师，但又不想向建制屈服——拉康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针对外界只抓住其技术的形式方面大做文章而丝毫不考虑这一技术的理论意义，拉康开始了一项工作，就是试图将精神分析技术理论化，把这一技术从单纯的医学层面引向人文的层面。他强调技术规则若是脱离了其所赖以确立的、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语境，若是不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时下的思维建立起某种可阐释的联系，那它就永远只是一些治疗方法，而无法赋予精神分析经验以理论的力量，就像他在《罗马报告》中明确地说的：“如果你不懂得作为技术之基础的那些概念，那你就不能懂得这个技术，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地运用它。我的任务是要表明，只有定位在语言的领域，只有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①正是在这一理论化的过程中，拉康以“回到弗洛伊德”作为口号，通过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通过把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阐释框架嫁接到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展示了自己的弹性时间会谈技术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

另一方面，他当然也知道国际协会的决定关系着整个新学会的命运，而他又是整个问题的关节所在，他自己不便于亲自出面，拉加什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因此，在拉加什和学会的其他领导人的一系列努力失败后，拉康把三个年轻人推到了前台，他要利用他们来谋求自己的合法化。这三个人是：塞尔日·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 1924—1994）、弗朗西斯·皮埃尔（Francois Perrier, 1922—1990）和瓦拉迪米尔·格拉诺夫（Wladimir Granoff, 1924—2000）。这三个人都有着医学背景，都属于法国第三代分析家，也都是 1953 年学生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新学会的内部，他们被称为“三套车”——一个带有革命的苏俄色彩的称呼。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就会员资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05.

格的漫长谈判中，这三个人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拒绝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人会申请，随后的两年间，拉加什继续为会员资格四处奔走，但在1957年的巴黎会议上，事情仍未得到解决。在巴黎会议上，哈特曼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之职为英国人威廉·吉勒斯皮埃（William Gillespie, 1905—2001）接任，国际协会的权力又回到了欧洲人的手中，法国人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决定在两年后的哥本哈根会议上重提入会事宜。这一次，“三套车”正式接手了谈判事务，尤其勒克莱尔和格拉诺夫在整个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959年7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再次提出入会申请，并按要求提交了过去六年来学会的研究和培训活动的报告及其成员的基本信息，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学会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调查，于是决定组成一个新的特别委员会，对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入会资格进行评估。1960年3月，国际协会主席吉勒斯皮埃通知法国学会新上任的主席、法国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元老级人物埃斯纳，特别委员会即将访问巴黎。

新委员会由四个人组成，三个英国人和一个荷兰人，其中有两名妇女，带队的是一个英国人，名叫皮埃尔·图奎特（Pierre Turquet, 1913—1975）。图奎特本人比较赞成精神分析运动的革新，所以对法国人抱有些许同情态度，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拉康的分析技术必须遵守标准规则，尤其其他的培训分析必须规范化。可在这个四人小组中，同情法国革新者和敌视法国革新者的两种态度同时存在，四个人分成两种倾向，且在人数上谁也不占多数。幸亏勒克莱尔和格拉诺夫从中斡旋，使得委员会刚开始时对法国人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全盛时期，其会员的人数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两倍多。拉康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59年他的躺椅上已有大约20个受分析者在接受治疗或培训分析，且还有不少人在等着走上他的躺椅。在技术上，他已经越走越远，他甚至把分析过程搬进了他的研讨班，并有意识地挑战国际协会的技术规则。这当然会给谈判带来很大麻烦。面对这一形势，勒克莱尔和格拉诺夫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外的方面，勒克莱尔负责与图奎特委员会打交

道，格拉诺夫则利用其外交家的手腕在国际协会内部拉关系。对内的方面，勒克莱尔负责去说服拉康，希望他收敛一点，即便不想严格地遵守规则，也至少努力不要再增加病人的数量——拉康答应了勒克莱尔的请求，但仅仅停留于口头；格拉诺夫则更具战略眼光，他知道，要让拉康尊重规则——哪怕是假装尊重——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设计的路线是把拉加什作为挡箭牌，利用拉加什在国际协会有较好的人缘和口碑让国际协会接受学会，从而无奈地吞下拉康这个苦果。

1961年5月，图奎特委员会登陆巴黎，开始了对法国学会的人会资格的正式考察。培训分析师和接受培训的学员全都接受了讯问。所提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拉康的分析和培训技术：如会谈的时间长度、同时在接受分析的人数、培训分析的具体细节等，各人出于自身利益及与拉康的私人关系的考虑，回答不尽一致——虽然拉康事先已私下对有些人做了统一口径的工作——有的拒绝回答或保持沉默，有的则对拉康的技术提出批评。拉康本人也被叫去接受提问，他照例从理论上为自己的弹性时间会谈进行辩护。

问讯结束后，委员会同勒克莱尔和格拉诺夫交换了意见，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大体上还算温和。两人的努力看样子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就在这个时候，学会内部在拉康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的人觉得自己是拉康的实践的受害者，公开表示不愿意成为他的牺牲品。图奎特委员会很快了解到了学会的这一隐情，这使他们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法国学会内部多数人不赞成拉康的实践。事实证明，这一印象将影响到学会的命运。

1961年8月初，第二十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勒克莱尔、格拉诺夫、皮埃尔、拉加什等一行人都来到这里等待国际协会的判决，拉康这个敏感人物当然最好不要在场，但他也无法安心地待在巴黎，因此他偕夫人一起到了罗马，表面上是观光旅行，实际上是在那里幕后操控。

执行委员会很快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了审理，结论依然是拒绝法国学会的人会请求，理由则是这个组织内部还存在“不健康的”力量，而其“健康的”势力又不足以支撑它作为国际协会的一个成员学会的资格。不过，国际协会同意法国学会以“研究小组”的身份存在，前

提是它必须接受一个特别指导委员会的“监督”。要知道，在国际协会的组织层级中，除中央委员会以外，在地方，最高级别的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多个地方学会构成的“地区协会”和独立的“成员学会”，它们有权培训分析师和颁发资格证，当然要严格遵循国际标准；其次是“临时学会”，即还没有成为正式会员但已经被国际协会承认且正在接受资格评审的预备学会；再往下便是“研究小组”，这种组织需在一个成员学会或国际协会的某个委员会的监督下才有权培训分析师；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协作机构”，它无权颁发培训分析师的证书，但可以与国际协会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可以想见，当国际协会只准许法国学会以“研究小组”的身份从事精神分析活动时，对本来就已经因为会员资格问题而在内部不断引起分歧的法国学会该是多么大的打击。

为了使“研究小组”的身份合法化，国际协会特别地批准拉加什、勒克莱尔和法维兹-布托尼埃三人为它的会员，因为按照条件，一个被正式确认的研究小组中必须有至少三个人是国际协会的成员。至于那个特别指导委员会，则由先前的图奎特委员会再加上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分析家共五个人组成。指导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监督”研究小组的培训程序和治疗程序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为此，国际协会向这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包含十九个条款的“函告”（Recommendations），其中既涉及治疗 and 培训分析的技术规则，如要求每周四次会谈、每次会谈四十五分钟、时段至少为期一年等；也涉及分析师的权限问题，如规定对于来自国外（法国以外）的学生，若无该学员所在国精神分析机构的授权，则法国小组不得给以培训。“函告”还特别规定，学生若是没有先行得到研究委员会的允许，便不准出席他们的分析师的研讨班。很显然，这个十九条是针对拉康特别制定的，其目的就是想把他孤立起来，在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中将他边缘化，直至最后将他的导师资格除名。最后的这个难以示人的隐秘动机在一个特别的附加条款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从爱丁堡回伦敦的飞机上，拉加什、皮埃尔、格拉诺夫和勒克莱尔遇到了图奎特，后者告诉他们，遵照巴黎学会的意愿，在国际协会的十九条“函告”中，有一个隐秘的条款被插入了第十三条，条款内容是：

把埃斯纳博士和拉福格博士从培训活动中排除出去的通行惯例

应该维持。至于埃斯纳博士的学生，他们或是接受常规的分析培训，或是不得成为学会的学生。多尔托博士和拉康博士必须逐渐远离培训课程，不得给他们再行安排分析或控制的案子。拉康博士和多尔托博士的候选人，不论目前是在接受分析还是在接受监督分析，在有关他们的任何动议被实施之前，其地位的任何改变应由指导委员会加以讨论。他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分析和控制分析必须依据该函告的其他所有条款来进行。^①

很明显，这个条款的用心就是要将拉康从培训分析师的名单中清除出去，这无疑给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学会想继续保护拉康，可又不敢得罪国际协会，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理想的折中，这将是“三套车”勒克莱尔、格拉诺夫和皮埃尔未来需要不断面对的难题。

爱丁堡会议期间，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曾有人说服拉加什牺牲拉康去跟国际协会合作，拉加什当场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他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爱丁堡会议之后，巴黎精神分析学界再次谣言蜂起，巴黎学会利用法国学会的这次失败，四处散布言论，称法国学会已经解体，拉加什和拉康已经发生争执，拉康和多尔托已经被驱逐，格拉诺夫和皮埃尔也被边缘化，等等。这些谣言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爱丁堡的再次失败的确令法国学会内部人心浮动，要求与拉康划清界限的声音时有出现。面对这内外的交困，法国学会必须证明它是团结的，为此学会顶风而上，提名拉康任学会主席，多尔托任副主席。这当然是做给外人和学会的一般成员看的，在学会的领导层，已经有人在策划牺牲多尔托来保护拉康，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对改变学会的处境根本起不了作用。拉康是唯一的、绝对的，在国际协会的规范化机器中，他的原罪是任何别的人所无法替代的。

1962年，学会为争取国际协会的承认再次行动起来，与那个指导委员会的谈判仍由“三套车”负责。但这一次，由五个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主张将拉康清除出局的力量占了多数，连抱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32.

同情态度的图奎特也无能为力。为扭转局势，“三套车”决定与国际协会主席做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在爱丁堡会议上，国际协会的权力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中，出任主席的是有着犹太背景的马克斯威尔·吉特尔森(Maxwell Gitelson, 1902—1965)，此人属于芝加哥的自我心理学学派，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1962年底，勒克莱尔、格拉诺夫和皮埃尔致信吉特尔森，希望后者能在芝加哥接待他们，就拉康的相关问题进行商讨。吉特尔森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学会的内部再次出现了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了获得资格确认的重要性，他们把自己当下的处境完全归于拉康的拖累，觉得自己整个地是拉康事件的受害者。在这种无辜受迫害妄想的驱使下，拉康的分析风格在他们眼里也变得难以忍受了。这种不满在1963年初愈演愈烈，有人甚至公开表现出对拉康技术的敌意，要求学会与拉康决裂，以获取国际协会的承认。至于一直忠诚于拉康的“三套车”，立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月底就任学会主席的勒克莱尔仍梦想着以拉康为中心维持学会的统一；格拉诺夫则选择了国际主义的道路，他去了芝加哥，与吉特尔森相谈甚欢，两人成为好朋友；正在接受拉康的培训分析的皮埃尔也打算离拉康而去，但难以下定最后的决心。

1963年1月初，图奎特委员会进行了新一轮的问话。这一次，图奎特的态度有明显变化，在爱丁堡会议前，他一直希望说服拉康做出妥协，而这一次，他预感到拉康将要倒台，因此格外注意反对者的声音，因为越多学生抗议拉康的技术，委员会就能找到越多把拉康边缘化的理由。

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拉加什坐不住了，他必须直接介入，他要以自己的权威向拉康施压。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就培训分析师同国际委员会的关系进行说明，强调学会的成员必须严格执行国际协会的“要求”。这样，拉加什不点名地批评了拉康的程序，同时使自己的态度公开化了，那就是忠于国际协会的伦理规则和技术规则。这份报告在学会中广为传阅，使那些反抗拉康的学生们知道拉加什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勒克莱尔想要保护拉康的企图失败了。

1963年6月22—23日，图奎特委员会同法国学会的核心成员做了最后一次会谈。在此之前，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提交给了国际协会，这次

会谈不过是为履行报告的结论做准备。图奎特提出，拉康的名字必须从法国学会的培训导师的名单上划掉，正在接受拉康的培训分析的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更换导师，否则很难让国际协会接受法国人的入会申请。勒克莱尔表示反对，拉加什则表示同意。拉康与拉加什的决裂已在所难免。

面对内外交困，拉康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他要亲赴即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向国际协会说明他的理论和技术的的重要意义。此时的他就像是悲情故事中的主角，明知面对的是一个强悍的规范化的机器，明知自己的努力将是徒劳，并可能会成为敌人的笑柄，可他还是要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不是为了扭转乾坤，而是为了不放弃自己的欲望，为了让那些曾经忠于他而现在背叛他的人直视到自己的怯懦。不过，拉康想得太简单了，国际协会根本不会在斯德哥尔摩接待他，更不会在科学论坛或行政会议上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

7月2日，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学会主席勒克莱尔宣布谈判已告破裂，并公开了图奎特委员会的报告的部分内容，但他补充说，学会的委员会没有理由将拉康的名字从培训分析师的名单中划掉，可是，如果学会不履行这一要求，那将导致与国际协会的决裂并由学会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这一消息令许多人大为震惊，他们决定舍弃拉康。第二天，勒克莱尔向拉加什递交了辞呈。他要站在拉康的身边，伴随后者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8月2日，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再次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爱丁堡的十九条，并提出了一个包含三点内容的最后通牒：

(1) 必须告知所有的预备会员、受培训者和候选人，学会不再承认拉康博士是培训分析师。这个通知必须最迟在1963年10月31日前生效。

(2) 所有接受拉康博士培训的候选人必须告知研究委员会他们是否想继续他们的培训，他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他们需要增补一个时期接受由研究委员会指派的分析师的培训分析。这个通知必须最迟在1963年12月31日前生效。

(3) 研究委员会经得指导委员会的同意，可以访谈那些已经表

示愿意继续培训的候选人，以确定他们的能力。这种访谈应在1964年3月31日前完成。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指导委员会都可以发表意见，不论是涉及候选人的能力还是有关第二位分析师的选择。^①

虽然结果早在预料之中，但这个最后通牒的发布还是给了拉康重重的一击。这一天，他在多尔托、皮埃尔、勒克莱尔和女儿朱迪丝的陪伴下来到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郊区散心，一路上，拉康满脸阴霾，他的心情显然沮丧到了极点，最后在路边的一个小酒馆里，拉康借酒消愁。

最后通牒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激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如何处理拉康的问题上，学会分化为两派，占据多数的一派要求学会执行国际协会的命令，把拉康的名字从培训分析师的名单中划掉，占据少数的另一派还想保护拉康。格拉诺夫和拉加什已经决定与拉康决裂，勒克莱尔和皮埃尔则继续做拉康的支持者。至于拉康本人，他一直以来都认为他的学生会支持他，并幻想着这种支持可以迫使国际协会做出妥协，而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觉，学生们的背叛令他怒不可遏。实际上，拉康的愤怒未必有多大道理。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绝大多数人一直是希望拉康能够屈服而没有想要真的开除他，可国际协会的意图是要开除他而没有想要真的让他屈服，因此，导致学会背叛他的真正祸首是国际协会这个建制化的机器。拉康与国际协会的冲突场景颇类似于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间的欲望之战，在1959—1960年的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拉康对安提戈涅的欲望的精湛分析就像是一次自我分析，安提戈涅就是他的一个镜像对体，当他面对台下的听众大声说“不要向（他者的）欲望让步”时，这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呢！

10月13日，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不远了，法国学会必须做出选择，这天上午，学会的研究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一个决议：从即日起，拉康博士将不再出现在培训分析师的名单中。接着在11月19日，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研究委员会的决定被通过。学会主席勒克莱尔和副主席皮埃尔当场宣布辞职。两周后，法维兹-布托尼埃当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50.

选为新主席，拉加什任副主席，格拉诺夫任秘书。

11月20日，就在多数派投票同意把他的名字从培训分析师的名单上划掉的第二天，拉康如期来到圣安娜医院的会议厅向他的研讨班听众做题为《父之名》的演讲。这本来是他新一期研讨班的第一讲，可他一上来就宣布，这将是他在圣安娜医院的最后一次讲演。一直以来，拉康试图把精神分析学视作一种拒绝简单的“真理与虚假”的模式科学，而现在，他怀疑这一真理已经被人盗用了，他宣称，有一些人——他指的是格拉诺夫和拉普朗虚，后者在前一天投票的时候宣布自己将站在多数派的一边——将用他教给他们的语词和概念、用他指示给他们的途径和方法转而反对他。他告诉人们，有人声称他的教学的意义不过就是向人灌输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人不可能把握真理，他说，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误解、多么幼稚的急躁心理：“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一种科学——甚至是数学——它的各个章节不是相互关联的！但这与判断真理的转喻功能是一回事吗？你们难道没有看到，随着我的深入，我正在不断接近那个稠密地带一个具体的点，而没有我先前的这些努力，你们就不可能抵达那个点吗？”^①显然，多数派尤其学生们的背叛令拉康痛心不已，最后他说：“我在这里不是为我自己寻找借口。然而我应该说——两年了，我完全听信小组中他人的政策执行，为的是给我必须教给你们的东西留出它的空间，它的纯洁性——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给予你们理由觉得在我看来，yes和no之间根本没有区别。”^②这种溢于言表的怨恨的确令我们动容，因为它最为真切地暴露了拉康此刻的孤独与无助。

其实，拉康只是被禁止从事培训分析，他仍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他的教学活动并不在禁止之列。可拉康本人并不这么理解，他把学会的决议视作是对他的驱逐。他对学会已经失望至极，他要选择一条自己的路。当务之急是为教学活动和研讨班找到新的地点。在这时，两位精神分析圈子以外的人物给了他帮助：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邀请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继续他的教学活动，30年前，拉康的“导师”科耶夫正是在这所学校举办

^{①②}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 /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 95.

他的研讨班的；与此同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供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则安排他到高师重开研讨班。

1964年1月15日，新一期即第11期研讨班在巴黎高师著名的迪萨纳礼堂（Salle Dussane）开讲，原先的“父之名”的题目被换成“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拉康面对的将是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阶层的新的听众。为了表示将以新的面貌来重新开始他的事业，拉康邀请了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和亨利·埃伊在内的许多名流出席他在高师的第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精神分析学的要义”。一上来，拉康便——既是向他的听众，也是向他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我有资格谈论这些吗？”这个提问显然是在暗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法国精神分析学会针对他的培训分析师的资格的决定。其实，此时此刻对拉康来说，有无资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者的确认，因而他在此特别地向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表示了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阿尔都塞——因为就在他身处危难之境的时候，正是他们向他伸出了援手，给予了他所需要的确认，同时还提供给了他获得进一步确认和重新投入战斗的“基地”（base）：

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地形学甚至军事意义上的“基地”这个词——我的教学的基地。^①

接着，拉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谈到了他目前在精神分析共同体中的处境。此时他又想到了斯宾诺莎，那个曾伴随他走过青春叛逆时期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荷兰哲学家，不过这一次他不是要谈论斯宾诺莎的思想，而是要比较他跟斯宾诺莎的相同遭际。1656年7月27日——拉康把这个时间同弗洛伊德联系在了一起，后者正好出生于1856年：“一个奇特的两百年”——斯宾诺莎因其无神论思想而被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开除教门，接着市政当局应教会要求又对他下了驱逐令。拉康断言，斯宾诺莎是遭到了犹太教会的“绝罚”（excommunication），先是成为“大绝罚”（kherem）的对象，接着又成为“永久驱逐”（chammata）的对象。对斯宾诺莎的这一双重的开除，在拉康看

^①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2.

来，正好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针对他而下的禁令和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对这一禁令的认可相对应，这一相同的命运使拉康说出了这样的言语：

我不是说——尽管这并非不可想象——精神分析共同体是一个教会。不过，有一个问题会不容置疑地冒出来：在这一共同体中，那使人常常联想到宗教实践的东西是什么？若不是因为与我今天不得不说的这一切有几分相像，我也不会强调这一点——尽管把那个散发着霉味的丑闻抖出来就足以说明问题……^①

显然，拉康在此把自己置于了一个受迫害者的位置，且不说他把本属于天主教的“绝罚”概念混用到犹太教中并用来描述斯宾诺莎的命运是否恰当，单就他转喻性地把“绝罚”理解为逐出教门、革除教籍——其实，在天主教的意义上，“绝罚”并没有革除教籍的意思，它只是终止了受罚者的宗教权利——而言，他所受的处罚并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因为他仍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仍享有教学的权利，他只是不得从事培训分析，但并没有被逐出精神分析共同体。当然，拉康以教会来暗示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建制特征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他确实是遭到了“正教会”的迫害。

还有，他接下来说的一点也有几分道理。他说，在对他的“绝罚”中，他其实是别人——他曾经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用来进行交易的砝码，他是个人之间、两个共同体之间完成其交易的牺牲品。正是基于对自身处境的这一指认，拉康以他所特有的那种辩证的逆转手法对这一处境作了一个强有力的颠倒，即通过把自己受到迫害或充当牺牲品的处境置换为一个“喜剧”场景，以回击那些交易“主体”所自认的“神圣的自主权利”：

如果说主体的真理，即便在他处于主人的位置的时候，并不存在于他自身，而是像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存在于某个其本性被隐藏着的对象那里，那么，让这一对象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实际上正是喜剧的本质。^②

^①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4.

^② Ibid., p. 5.

什么意思呢？拉康说，主体的真理并不在主体自身的一边，而是在对象的一边，主体的欲望真相总是在对象那里显现，当精神分析共同体以“正统”的名义完成对他这个对象的驱逐时，恰恰暴露了那个主体的欠缺，暴露了在这个对象的身上恰恰藏有主体所欲望的真理，所以，驱逐事件看似是证明了那个主体的强悍，实际是暴露了它的虚弱，对他的驱逐最终变成了一个喜剧、一个闹剧。这便是拉康变失败为进攻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他说的并非虚言，“绝罚”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精神分析共同体这个无意识主体的“真理”，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揭穿这个主体的幻象。

其实，失败形势的逆转已经在事实上渐成气候。1963年11月以后，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中，一股新生的力量开始形成，学会的教学委员会和正式会员做出的取消拉康培训分析师资格的决定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即让学会中那些没有投票权但人数众多的见习生找到了认同对象。这些无权力者也认为自己是建制的牺牲品，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使他们很容易走向对建制本身的攻击，现在，遭到建制驱逐的拉康就像一个象征性的父亲，使他们可以在建制以外找到一个认同对象，使他们可以在这个人的名义下完成自我确认。而拉康也需要这样的力量，他清楚地知道，仅有教学和军事“基地”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帮助他冲锋陷阵的战士。就这样，分裂派的学生和孤独的领袖一拍即合，一种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政治逐渐成形。1963年12月11日，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精神分析研究小组”的“地下”组织，其核心人物名叫让·克拉维里尔（Jean Clavreul，1923—2006），此人在1948年至1953年曾接受拉康的分析。小组创立后，拉康曾写信给克拉维里尔说：“你是一个剩余（residue）；你知道我使用这个词的价值；这是你的机会，抓住它。”确实，在这个时候，拉康只能指望学会的这些“剩余”——“residue”这个词本为“剩余”、“残余”的意思，但按照拉康的理论，所谓“主体”，不过是存在被语言切割后的效果，是不完整的切割的剩余，所以我认为把这个词译作“人渣”最为合适，只是我们不可在纯粹的贬义中来理解主体作为“人渣”的含义——去帮助他实施报复。

但是，与“人渣”或“剩余”的联合会使拉康陷入一个两难：自

50年代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以来，拉康就把自己视作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正统，而把英美的自我心理学所代表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变体”视作是对弗洛伊德的背叛；现在，当他在“残余们”的“绑架”下不得不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一个学派时，那意味着他将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另一个“变体”，而这与他坚持正统的姿态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承认自己是“拉康主义者”，按照他的理论的逻辑，他就不能宣称自己是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这对于拉康的事业来说是极其冒险的，它有可能会使这一事业变成另一个“丑闻”。拉康很快就找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路径。

1964年1月，克拉维里尔向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教学委员会申请资深会员的资格，遭到委员会的拒绝。拉康、勒克莱尔、皮埃尔、多尔托等提出抗议，并要求把他们的声明写进学会的官方备忘录中。这其实是拉康主义者制造分裂的一个战术，老练的格拉诺夫识破了他们的策略，于是催促图奎特委员会赶紧通过学会的入会程序，在他看来，如果国际协会批准法国学会的会员资格，“精神分析研究小组”就将回到国际协会的共同体中，这将有助于孤立和瓦解分裂者的势力。而实际上他想错了，激进分子们根本没打算得到国际协会的确认，他们只需要自我确认，他们结成反对派的阵营就是因为不愿意向国际协会这个建制机器妥协，他们甘愿充当拉康的马前卒就是因为他是这种不妥协精神的象征。

法国学会的形势也让国际协会感到坐立不安，谈判的进度随之加快，既然拉康这个障碍已被踢开，其他的一切就好说了，尽管这个团体中有许多人都曾是拉康的学生。1964年5月10日，法国学会和国际协会达成协议，学会作为“研究小组”的身份被更改为“法国研究小组”，接着在5月26日，学会改名为“法国精神分析协会”（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斗争了十多年，终于乌云拨开，获得帝国的确认已经指日可待。

分裂分子当然不会坐以待毙。1964年6月21日，在皮埃尔的家里，拉康当着几十位信徒的面用录音机播放了事先录制好的一份题为《创建行动》（*Founding Act*）的声明，宣布他“只身一人”创立“法国精神分析学派”（*Écol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三个月后更名为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两者的简称是一样的, 都称“EFP”。在那个宣言式的文件中, 拉康强调了新创立的这个组织“正统的”和充满战斗性的特征, 它将完成一项“劳作”, 这就是: “在弗洛伊德所开创的领域里, 恢复他的发现的锋芒; 回到他以精神分析学的名义创立的本源性实践……通过不懈的批评, 驳斥那些使它的进步受挫同时也使它的应用退化的各种变体和折中。”^① 而之所以选择“学派” (school) 一词, 按照拉康的解释, 暗示着古老的传统: “在古代, 这个词意指着避难的场所, 实际上是对抗所谓文明的缺憾的作战基地。”^② 正是为了体现这种正统性和战斗性, 拉康取消了传统中意味着一种权力结构的教學精神分析与治疗精神分析之间的区分, 而只在纯理论化的层面提出了“纯粹精神分析”与“应用精神分析”的区分, 意在使精神分析走向科学化,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为了使拉康自己的理论和技术在“科学”的外衣下合法化, 而实现这种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策略, 在拉康那里, 就是使理论技术化和使技术理论化的双重运作。这一运作在 50 年代就已经开始, 到 60 年代将以更为繁复的科学的伪形被推向极端。

就这样, 随着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更名和激进派的另立山头, 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第二次分裂最终成为现实。不过, 法律意义上的解散手续还未完成。1964 年 10 月 1 日, 格拉诺夫和勒克莱尔在相互没有通气的情况下, 分别给已经名存实亡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法维兹-布托尼埃发了一个正式函, 请求学会解散。1965 年 1 月, 解散手续正式完成。6 个月后, 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 法国精神分析协会正式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所接纳, 成为帝国的成员学会。

^①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 /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 97.

^② Ibid., p. 104.

第五章

拉康的王国

如同 1953 年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把拉康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潮一样，1964 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再次把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功劳全都归于决裂本身，那毕竟只是一种契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 50 至 60 年代巴黎的知识氛围的变化，其中结构主义运动的兴盛和左派或新左派运动的崛起对于拉康声誉的提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再者，就第二次决裂而言，借以展开确认之战的“基地”的转移也是扩大影响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一转移，拉康研讨班的听众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在圣安娜医院，研讨班的听众以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分析家和学生为主，基本还是局限于专业的圈子，而现在，背靠巴黎高师这个精英荟萃之地，加上被逐出教门所带来的新闻效应，当然还有结构主义浪潮的推波助澜以及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这样的知识英雄的鼎立助阵，研讨班吸引了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听众，其盛况甚至超过了当初科耶夫的研讨班。听众结构的这种多元化把拉康的事业推向了更广阔、更复杂的语境，“拉康主义运动”就在这样的语境中发展、演绎出了形形色色的拉康主义“变体”。

但另一方面，由这种种拉康主义变体所构成的拉康王国自一开始就被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所渗透，尤其是它的组织政治经常充斥着暴戾之气，其斗争之惨烈甚至超过此前的两次分裂，那些妄想症的主体利用其特有的移情一反移情策略把精神分析的政治可谓演绎到了极致，最后甚至连拉康本人也无法收拾残局。

我们都知道《皇帝的新衣》中那个道出真相的孩童的角色，拉康的

精神分析学充当的就是这个角色，它总想通过揭穿主体的幻象来让主体逼视自己的真相，走向自身欲望的真理。可是，拉康及其王国自身却是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在他们的自我与主体之间，一道“语言之墙”阻挡了他们的视线，阻挡了主体向着真理的穿越。在这个意义上说，拉康主义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以自己的“误认”行为而成为拉康极力要倾覆的主体“误认”功能的一个明证。拉康的王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高举反建制的大旗，可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建制；它标举反权威的口号，可自身就拥戴了一个绝对的权威。

第一节 光辉岁月

如果说在第二次分裂以前就已经有所谓的“拉康主义”的话，那它也只是局限在精神分析共同体的范围内，且主要地是以分析实践的形式发生着影响，而拉康本人一直追求的将精神分析技术理论化和将精神分析理论技术化的理想在那个自恋的共同体内部并未引起多大的共鸣，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的真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到了60年代，结构主义运动在人文领域引发了一种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倾向，拉康此前就已经在此找到了重述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便利工具，而拉康主义运动也在此找到了适合其生存发展的土壤。这一次，推动这个运动的不再是那些有着医学背景或想走医学道路的分析家，而是成分更为混杂、思想更为激进、更热衷于一切形式的“革命”的理论家和先锋文人，他们对精神分析或者说拉康主义的兴趣首要的不是治疗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理论意义上的或思想意义上的。运动的中心当然离不开研讨班所在的巴黎高师，而阿尔都塞则是推动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至少在60年代初是如此。

路易·阿尔都塞是巴黎高师的哲学教师，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更值得提及的是，他还是一个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接受过药物治疗、电击疗法，也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但他找的不是拉康，而是以前接受过拉康的分析的一位神经科医生，这就是说，阿尔都塞与拉康的交叠跟他的“病人”

身份无关，阿尔都塞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把后者看作是自己的同盟。

阿尔都塞在 50 年代后期就对拉康产生了兴趣，那时，拉康对国际精神分析运动中的美国“变体”的激烈批评让阿尔都塞联想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拉康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下对创始父亲的原始文本的强力阅读也让阿尔都塞看到了把法国共产主义带出自我封闭的理论贫乏的出路所在，那就是“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说，至少刚开始，在阿尔都塞的眼里，拉康之于他更多地是一个战略性的参照对象。但是到 60 年代初，由于对拉康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的系统了解，使阿尔都塞认识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关涉着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而拉康版的弗洛伊德主义似乎进一步揭示了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理论对接的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的和理论的动机，让阿尔都塞决定向拉康伸出橄榄枝。1963 年 7 月，阿尔都塞发表了一篇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举，认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完成了革命性的“决裂”，并对拉康的工作表示了赞扬，他说：

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斥“经济的人”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斥“心理的人”的基础上。拉康已经看到且体会到了弗洛伊德的解放性的决裂，他在那个词最丰富的意义上理解了那一决裂，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采纳了它，并迫使它不加保留地产生出自己的结论。像其他人一样，他在细节上甚或在哲学方向的选择上可能犯有错误，但幸亏有他，我们才有这基本的东西。^①

阿尔都塞的赞美当然令拉康的确认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两人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但都没有谈到将研讨班移到高师的事，因为那时拉康还未脱离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到 1963 年底，与学会的决裂已成定局，拉康请求阿尔都塞帮忙解决研讨班场地的问题，因为他知道后者早有把研讨班搬到高师的想法。就这样，那个失败者很快就找到了发起反击的新基地。

从复仇的角度说，1964 年 1 月 15 日拉康在高师的演讲是成功的，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78.

面对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学术精英，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面孔，面对坐在前排的亢奋的追随者，拉康就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君主，向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帝国、这个建制机器发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阿尔都塞没有出席这次盛典，但他肯定感受到了那个英雄的力量，他要更系统地审视那个声音的政治潜能，他要以更具诱惑力的姿态拉拢那个文化斗士——虽然最后是他自己被对方所俘虏。拉康演讲后不久，阿尔都塞完成了《弗洛伊德与拉康》一文，以一种论战的笔调把拉康版本的弗洛伊德主义提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上。

一上来，阿尔都塞就以共产党人所熟悉的那种句式把一个政治化的弗洛伊德和拉康推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他指出，在“美国学派”的宣传之下，精神分析学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帮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指斥这种宣传时，也把弗洛伊德的“革命性的发现”说成是“反动的意识形态”，但是：

今天我们也一定要这样说，这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他们独有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跟弗洛伊德的革命发现混淆了起来，因而在事实上接受了敌人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关系的整部历史，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不清和不实的基础上。^①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回到弗洛伊德，拒绝对弗洛伊德作粗俗神秘化的宣传，提防修正主义的别有用心者的含混，以一种历史的理论批判澄清弗洛伊德所不得不使用的那些概念及其思想内容之间具有的“真正的认识关系”。在这些方面，拉康的努力显得尤为珍贵：

没有在法国实际上由拉康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认识论的澄清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弗洛伊德这项发现的特点。^②

那么，通过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认识论的澄清，拉康最终获得了什么样的结论呢？阿尔都塞说，拉康的结论是，精神分析学其实是一门

^①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211页，杜章智等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

^② 同上书，211~212页。

“科学”，一门有关无意识的“新科学”，它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实践”（即治疗）和“技术”（即分析方法），其中，只有在“理论”中才有这门科学的“秘密”，而在建立于“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和“技术”中，则只有精神分析的部分现实，“技术和方法都没有精神分析的秘密，除非像每一个方法那样，由理论而不是实践赋予秘密”^①。因此，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是：“回向已经建立、确立和巩固在弗洛伊德自己身上的这个理论，回向成熟的、深思熟虑的、论据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理论，回向在生活（包括实际生活在内）中已站稳脚跟、产生方法和实践的这个先进的理论。”^② 这一理论的对象便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意识。如果说弗洛伊德对这一对象的研究还带有其时代的热力学模式的阴影，那么拉康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引入结构语言学这一新的科学研究模式而把笼罩在对象上的那个阴影驱散得无影无踪，尤其他引入“秩序法则”（阿尔都塞将其解读为“文化法则”）来解释主体的建构，更是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意识形态研究所关心的“误认结构”打开了一条通道。

阿尔都塞的这篇文章于1964年12月发表在法国共产党的杂志《新评论》上，其要求法国共产党承认精神分析学和弗洛伊德著作的科学性以及拉康的解释的重要性的主张立即招致了党内的批评，但阿尔都塞并未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他只是在1969年该文以英文形式重刊于《新左派评论》时承认自己当初对拉康的“秩序法则”的解释带有太重的“文化主义”味道，“而拉康的理论是彻底反文化主义的”^③。阿尔都塞说得对，拉康的理论是反文化主义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机智的阿尔都塞继续从文化主义的角度去阅读和挪用拉康的理论，他的写于1969年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就属于这种拉康主义“变体”的一个典范，也许我们可以称阿尔都塞是第一个拉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都塞不仅撰文声援拉康的弗洛伊德主义，还利用大学这个建制机器来扩大拉康的影响。就在拉康到高师重开他的研讨班的时候，阿尔都塞在自己的课堂上把拉康的作品列为学生的阅读书目，建议高师的学

①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217页。

② 同上书，218页。

③ 同上书，209页。

生跟着拉康有关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的研讨班去就“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进行研究，并要求他们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呈现出来，供大家共享。就这样，拉康的理论和文本第一次走出了精神分析共同体，被人们从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角度加以解读，例如有人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和拉康的创新，有人研究了拉康 50 年代有关精神病的研讨，有人致力于精神分析与人类学的关系，还有人比较了胡塞尔、梅洛-庞蒂和拉康对“结构”概念的不同界定。阿尔都塞自己则研究了拉康的欲望理论，同时他还带领学生以拉康的回到创始之父的精神重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父亲的文本，即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其阅读方法也有许多来自于他的老师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概念的启发。

在阿尔都塞的学生们所做的拉康解读中，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1944— ）的评论可能最具特色。在 1964 年之前，米勒对拉康还一无所知，阿尔都塞很欣赏这个年轻人，推荐他去读拉康的作品和参加拉康的研讨班。米勒欣然从命，先是到书店把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刊《精神分析学》的全部八期买了一套——因为几乎每一期的上面都有拉康的文章——然后到乡下钻研这些文本，尤其登在第一期的《罗马报告》让他震惊不已，20 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二楼阅读《罗马报告》，然后在午餐时间我下楼告诉我的朋友——他整个早上都在读斯宾诺莎——我刚刚读了一篇前所未见的东西”^①。从此，他便与拉康结下不解之缘。1964 年，他在研讨班上见到了拉康，他问拉康：“你的主体概念意味着一种本体论吗？”这个回答式的提问令拉康喜不自胜，就这样，这个年轻人走进了拉康的世界，并将影响拉康所缔造的事业。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米勒对拉康的理解自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比阿尔都塞、比他的同学们走得更远，他甚至比拉康还要激进，为了强调拉康理论的独创性，他干脆把弗洛伊德都扔到了一边。正如鲁迪奈斯科所描述的：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79.

自一开始，雅克-阿兰·米勒的表述就与他人不同。在这个年轻的学生看来——他不久就要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阅读拉康的著作再也不必参照弗洛伊德。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有自身的历史和自身的内在逻辑。1964年米勒所阅读的拉康是一个“现在时”的拉康，一个象征着科学性的拉康，与他的超现实主义、科耶夫主义、瓦隆主义甚或法国的过去已无多大关联。米勒的拉康是《罗马报告》和《字符的代理作用》中的结构主义的拉康，其所谓的回到弗洛伊德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说辞。在那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只有米勒那样读拉康。在结构主义爆发的中心，整个知识界发现的恰恰都是那样的拉康：科学的、理论的、反心理学的、敌视“美国”的精神分析。但是，米勒给拉康主义的这一理解添加了一个注释，因为为了在一个已然拉康主义的拉康的基础上理解弗洛伊德，他读的是没有弗洛伊德的拉康。^①

如此激进的态度怎能不让拉康暗自欣喜呢?! 如果说是阿尔都塞把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拉康带进了法国的知识界，那么，米勒这一代人则以自己的方式把拉康主义引向了一个科学化和理论化的新阶段，是他们赋予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全新的形象。

1964年6月，阿尔都塞的大多数学生都加入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组成了一个致力于“话语理论”的小组，拉康给了它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建制称谓：“卡特尔”（cartel，“联盟”的意思，尤指“政治联盟”）。的确，这是一个有着旺盛的政治热情的团队，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共产主义分子，有许多人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分子，即将开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让他们的身体激情在一场政治狂欢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当然，对于拉康来说，他们的加入补充的是“学派”的政治血液，以及他们带来的新的理论方向。

1966年1月，由高师的学生主编的一份名为《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的杂志出版，这个名称是米勒取的，他采用“pour”（相当于英文的“for”，有“保卫”、“赞成”的意思）一词，有向阿尔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379.

都塞致敬的意味，因为后者在前一年出版的一个文集就叫 *Pour Marx*（《保卫马克思》），至于选用“分析”一词当然意指着这些学生将聚集在拉康主义的旗帜下，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分析，而是要用一种科学的“分析”精神来讨论包括逻辑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的问题，尤其是话语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范式的构成机制的问题。高师的学生们对科学性和理论化的这种追求深深地吸引了拉康，他决定利用学生们提供的科学工具对自己在50年代所阐发的混杂着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能指理论与主体理论进行科学的重述。在1964年的研讨班上，拉康演讲的主题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在1964—1965年的研讨班上，他的主题为“精神分析学的关键问题”，期间他特别邀请米勒到他的课堂上讲授德国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哥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的符号逻辑；接着，在1965—1966年以“精神分析学的对象”为主题的研讨班上，拉康在第一讲中便利用米勒的概念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重述。这两个演讲都刊发在《分析手册》的创刊号上，米勒的题目为《论缝合》，拉康的题目为《科学与真理》。

“缝合”（suture）这个词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指外科手术中对伤口的处理，在米勒的理解中，它指的是话语和主体得以构成的一种语言学机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它是对“能指的逻辑”的一种说明。而这一说明又是在弗雷格的语境中进行的。弗雷格是德国耶拿大学的数学教授，一生致力于为传统建立在直觉之上的数学概念及公理体系提供逻辑的基础，成为现代符号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性人物。他的思考充满了现代的“分析”精神，这一点正是高师的年轻一代所渴望的。米勒在他的演讲中，通过讨论弗雷格《算术基础》（1884年）一书中的基本理论，尤其是自然数系列中“零”这个概念与后续数之间的关系，提炼出了“缝合”的概念。进而他又将这一概念用于思考拉康的能指理论，称拉康所讲的主体与能指链或者说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就犹如零与后续数的关系，那其实就是一种“缝合”关系；主体在能指链中的位置就如同零在自然数系列中的位置，都指谓着一种匮乏、一种不与自身同一的分裂，或者说指谓着匮乏与结构的关系，它们都是真理或知识得以构成的某个原点；拉康的理论就是关于“能指的逻辑”的理论，其中处处都充满着这

种“缝合”关系，只是他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米勒一有机会就声称自己是在忠实地阐述拉康的理论，而实际上他所做的是一种激进的重述，他想依据“能指的逻辑”将拉康的理论系统化、逻辑化和科学化，在他的叙述中，弗洛伊德已不再重要，拉康成了一个彻底独创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一个绝对的导师，一个与一切心理主义做卓绝斗争的知识英雄。正如鲁迪奈斯科所说的：“1965年米勒的话语使拉康的话语激进化了。理论上，那一话语假装是严格的拉康主义，而实际上，它带给拉康主义一种好斗的冒进主义的压力。”^①

对于米勒的激进的阅读，拉康立即做出了反应。1965年末，在“精神分析学的对象”的研讨班第一讲“科学与真理”中，拉康就利用缝合概念——但他没有提及米勒的演讲，他总是这样，只要有可能，就把给予他恩惠的人的名字从文本中抹去——去对他的主体理论和能指理论进行了逻辑的重述。必须说明的是，在拉康那里，“科学”与“真理”这两个概念都有其特殊而且复杂的含义，简单地说，前者指的是一种统一的、形式化的话语，因而必定与人类存在的象征性维度相关联，或者说与主体性相关联；与对“科学”的这一语言学理解相对应，“真理”在拉康那里总是指主体的无意识欲望的真理或真相，因而它在每一个主体那里都是极其独特的，它是精神分析学的对象，是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辩证法即分析师与受分析者的辩证法中揭示出来的。因此，对于“科学与真理”这个题目，我们不能在通常的认识论意义上理解，而必须在拉康的主体间性科学的意义上理解。

在演讲中，拉康首先引入了柯瓦雷和哥德尔（Gödel, 1906—1978）的思想。柯瓦雷通过科学史的研究指出，源自笛卡儿的我思的现代科学——拉康时常称其为“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s），即我们所说的实证科学——引发了存在的贬值，拉康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科学乃是建立在对作为原因的欲望概念的“除权”（foreclosure）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移民美国的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理，也就是不完全性定理，即真理的概念不能完全被形式化，在任何一个严格的数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403.

学系统中，必定有用本系统内的公理不能证明其成立或不成立的命题。拉康由此发挥说，形式化的这种失败正是寻求缝合的科学本身失败的症状。

在拉康看来，事实上，科学本身不可能缝合主体，不可能使主体完全形式化，无意识的主体总是一个离心化的主体，它与科学相互关联，正是这种相互关联，使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主体称作“科学的主体”（subject of science）。因此，精神分析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拒绝心理学在人道主义的口实下所虚构的那种“丰盈的”主体，必须回到无意识主体的位置，以逻辑学的方法来对那一主体实施形式化的运作。当然，这个逻辑学是一个不完全性的逻辑学，是一个陷落的主体的科学，一个未被缝合的相互关联物的科学，总之，它是不可能的主体性的科学。拉康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还很晦涩，我在后面会给以更具体的说明。在此我们要记住的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们似乎正在把拉康变成一个拉康主义者。这个独特的主体喜欢谈论主体的陷落，可他自己会陷落吗？不完全性定理可以保证他的独特性吗？

拉康的生涯中常常会出现特殊的年份，它们就像生命的标记，标识着那些特殊的时刻：1931年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以及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接触改变了他的精神病学研究的方向；1934年参加科耶夫的研讨班让他找到了重述弗洛伊德理论的新角度；1936年出席马里安巴德会议使他与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1953年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成就了他事业中的第一次辉煌；1963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让他在精神分析共同体之外获得了所梦想的确认。现在，1966年，他又遭遇了这样一个时间点，他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精神分析共同体之外的世界对他的确认将进一步巩固，可同时，他的事业将再次面临分裂的危机。

1966年10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学术讨论会，法国的众多学术名流悉数到场，其中有黑格尔专家让·伊波利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叙事学家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解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阐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等。雅克·拉康也在邀请之列，他被邀请当然不是作为法国精神

分析运动的代表而是作为对弗洛伊德作结构主义阐述的代表。

这是拉康的第一次赴美，他当然想在这里一展其在研讨班上的那种魅力，虽然他与这个“新大陆”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在会上，他作了题为《论作为融摄他者性的结构是任何主体的先决条件》(*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 的报告^①，这个冗长而且拗口的题目就足以让美国人无所适从，而其对语言、主体的位置、弗雷格的算术基础的解释更是令美国人听得一头雾水，尽管相对于拉康在巴黎的演讲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版。不过，这些美国人与精神分析共同体没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会受到精神分析的建制政治的干扰，他们只是把拉康看作一个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重写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家，拉康的理论化——虽然有些过分——让他们看到了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缝合带给批评领域的前景，他们将把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中。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拉康的《文集》由色伊出版社出版，算上193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这是他面对公众发表的第二部作品。编写这个文集的想法早在1963年6月就有了，当时色伊出版社的编辑、拉康曾经的分析者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 1925—)希望拉康把自己的作品辑录成集出版，以扩大影响。拉康起初还有些犹豫。他受着两个强迫性的观念的影响，一是总担心别人会窃取自己的思想，将时间性的口头语言变成空间性的书面语言会使这种窃取变得更容易，再就是他对(书写)“文字”这一特殊的能指符总有一种不信任，他后来称“书本”是一种“poubellication”[两个法语词“poubelle”(垃圾箱)和“publication”(出版)的组合，大约可译为“文字垃圾”]，对书本的这种不信任也许还隐含着担心别人会对他的作品做出误读。^②最后在瓦尔的坚持下，拉康总算答应了出版的请求。但他表现得还是很消极，两年过去了，辑录工作并无多大进展。直到1965年，保罗·利科事件的出

^① 该文被收入此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参见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pp. 186-195,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② 1990年，在一次有关“拉康与哲学家”的学术会议上，德里达回忆了一个情景：1966年10月在美国参加那次关于结构主义的学术会议的时候，拉康曾对他谈到即将出版的《文集》，看起来拉康很不高兴，因为把那么多东西放在一个长达900多页的大部头里，他担心装订不够结实，整本书会散架。参见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 319。

现才让拉康最终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作品交付给精神分析共同体以外的世界。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1965年5月，保罗·利科研究精神分析学的专著《论阐释》出版，在书中，利科依据阐释学的精神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阐述，虽然源自于现象学的阐释学在这时的巴黎学术市场已非主流，但该书出版后还是受到学界和社会公众的推崇，成为一本畅销书。利科与拉康于1960年在埃伊组织的一次以“无意识”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即波纳瓦伐尔会议上相识，那时的利科在学界已颇有名气，于是拉康邀请他去参加自己的研讨班，利科答应了。虽然利科根本听不懂拉康讲的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东西，但他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此后的五年间，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密切，直到《论阐释》出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利科在他的书中提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著作的阅读，但并未给予拉康所期待的那种评价，也丝毫未提及他出席了拉康的研讨班，这令拉康十分恼火，他觉得自己成了“剽窃”的受害者，拉康的信徒更是激愤，纷纷撰文攻击利科的不良行径，令利科百口莫辩。

利科事件令拉康很受刺激，他决定立即着手将自己的东西整理出版。终于，1966年11月，长达900多页的《文集》作为拉康主编的丛书“弗洛伊德领域”（Le Champ freudien）的一种由色伊出版社出版。《文集》共收录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1936—1965年的各类文章28篇，有曾经发表的，也有从未刊行的，但几乎所有的文本这次刊印时都经过了拉康的润色和修订，这得感谢瓦尔出色的工作，他自一开始就决心把这本书做成一本学术经典，拉康的修订都是在他的要求下进行的。

除对每篇文章进行修正以外，拉康还给一些文章附加了说明性的文字，解释文本的产生过程。另外，他还为《文集》的出版写了两篇东西：《卷首语》和《关于我的经历》。

在《卷首语》中，拉康通过对法国18世纪散文家布封（Buffon, 1707—1788）的格言“风格即人”作巧智般的戏拟，把读者引渡到他在60年代提出的“对象 a ”（objecta, 读作“对象小 a ”，但书写时“ a ”必须写成斜体）的概念上，喻示着那所谓的“风格”就像对象 a ，不过

是结构主体之幻想的一种欲望对象—原因，它驱使主体用对象替代去填充由自身的匮乏所开启的裂口，就像人们用特定的衣饰来装点布封的形象一样，而实际上，这个对象正是“使主体从中消失的欲望之因”，是将主体维系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力量，所以，在人们用风格来标识布封的地方，正是这对象的“滑脱”。拉康对风格的这番戏拟无非是在告诉读者他的理论要讲的东西，那就是主体的离心化，他希望读者能从他的一篇篇论文所标记出来的旅程中、从它们呈现给读者的风格中导出这一结论，并因此而接受一次精神分析的洗礼。拉康说：

恰是对象回应着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风格的问题。在人们为布封做标记的地方，我诉诸这个对象的滑脱，这一滑脱富于启示性，因为事实上是它使这个对象孤立出来，既作为使主体从中消失的欲望之因，又作为把主体维系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东西。依照这些论文所标记的这样一个路线，依照它们发送给读者所必需的这样一种风格，我希望将读者引向一种结果，在那里，读者必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①

在《关于我的经历》中，拉康提到了他的博士论文，提到了这一论文在超现实主义圈子中的反响，也提到了克莱朗博尔对他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自己还仰仗过克劳德。他说自己是通过埃梅的病例走向精神分析学的，但他把1936年出席马里安巴德大会算作是自己进入精神分析学的开始，他称“镜像阶段”是他的发明，而没有提到瓦隆和科耶夫给予他的巨大启示。拉康特别喜欢他的学生用来恭维他的一个词：“已然”（already），意思是说他后来的理论“已然”蕴涵在早期的思考中，在《卷首语》中他使用了这个说法，在《关于我的经历》中，他又不无谦虚地提到了这一点，并告诉人们，他在30年代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及了语言的问题，这个发现让他相信“主体的经验是精神分析工作的唯一素材”^②。接下来，他又依据结构主义时期的拉康对“镜像阶段”时期的拉康进行了重述，就这样以一种未来完成时来对自己的工作加以评述。可以看出，拉康坚信自己早在30年代就“已然”是一个成熟的结构主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4-5.

② Ibid., p. 53.

义精神分析理论家，他对自己的学术履历的描述是想象性的、修辞性的，其意义是依据事后效果而回溯性地建构出来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回溯性地建构的意图，拉康在《文集》的编排上颇下了一番工夫，所收入的 28 篇文字并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排列。

首先，在《卷首语》之后，便是 1956 年发表于《精神分析学》第二期的《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而这个文字稿是根据前一年研讨班的讲演内容修订而成的。拉康把这篇文字置于卷首，既是为了让读者提前预期到一种理论的成熟状态，也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分析性的诱惑，引诱读者依据 50 年代中期的拉康即结构主义的拉康去阅读 50 年代以前的拉康即现象学的拉康。

对于拉康的这一诱惑性的预期行为，瓦尔起初并不接受，但拉康坚持如此，最后瓦尔只好妥协，但要求拉康另写一篇导论性的文字说明自己的意图。于是，我们现在看到，在那篇文章的后面，拉康附上了一篇题为《括号中的括号》（“Parenthesis of Parentheses”）的文字。而这篇文字又是在引诱读者依据 60 年代中期的拉康去阅读 50 年代中期的拉康。

在《括号中的括号》中，拉康以重叠加括号的形式对前面阐述的象征界的结构图式再次进行重述，以此来说明主体不过是能指的链条在象征界运作的效果，象征界作为“绝对的他者”以其数量有限的或然性法则主宰着主体和主体间性的性质。在这一重述中，拉康引入博弈论、概率论、控制论的概念对象征域的可能组合的链条进行分析，然后结合爱伦·坡的故事或者说通过把那个故事读作一个博弈游戏来对此加以说明。科学性的这一运用乃是拉康给读者设下的埋伏，即要求他们以未来的拉康去阅读过去的拉康，因为他在最后说，在按照书面语的要求对口语原稿进行重新整理的时候，他“忍不住对在那时就已经提出的某些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他在这一回溯中对象征界的能指法则的数学化或形式化乃是为了让读者在这里去预期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他相信，“通过一种历史的伪装来模糊能指概念的特性对学生来说是做作的。我只能希望我没有这么做不会令他们怀着失望回忆到它”^①。这不正是希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46.

望读者按照“已然”的回溯方式去阅读吗?!

另一例典型的年代倒错就是有关“镜像阶段”的那篇文章。在编辑文稿的时候，拉康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1936年的文字稿——这个遗失的对象/对象的遗失也许跟那个无意识主体当初在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中所遭受的“诞生”创伤有关，但遗失的/“被窃”的“信”/“文字”终归要回到它的目的地，1949年，它以另样的面目重新出现在那同一个共同体的面前，而现在，在1966年，它要反扑性地居有或攫取当初的那个位置，缝合那个时间逻辑的裂缝。本来，拉康开始是打算用1938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写的《论家庭》一文替代那个位置，因为他在那里对“镜像阶段”有一个扼要的叙述。但瓦尔不同意这么做，他觉得《论家庭》太缺乏拉康主义的气息。的确，那篇文章的弗洛伊德主义太过国际化了，克莱茵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味道太重了。最后他们决定采用1949年的版本：《镜像阶段》，并将其置于1936的《超越“现实原则”》和1948年的《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之间。在这三篇文章之后，则依次是1950年的《精神分析学在犯罪学中的功能的理论导论》和1946年的《谈心理因果》，再下来则是1945年的《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和1951年的《论移情》。这一系列的年代倒错都说明了一点：拉康极力以这种“历史伪装”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化，让自己的理论呈现出早熟的征兆。

不管怎样，有关《被窃的信》的讲演就像是拉康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纽结”、一个“缝合点”，因此和《卷首语》一起被置于卷首的位置。在它之后，历史的帷幕将渐渐拉开，并且是一幕接着一幕地拉开，幕间将不时地出现旁白——它们都写于1966年——以引出下文。一篇《关于我的经历》过后，是七篇写于30—40年代的论文；接着又是一篇《终于问及了主体》，引出著名的《罗马报告》及50年代以后的文字；再下来又两次穿插针对某些文本的补充说明。就这样，前后三十年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听众或读者宣讲的近三十篇东西被拉康以其拓扑学的方式连缀成一个相互缝合的整体，但总有一个东西要从这缝合中溢出，那就是拉康的欲望：作为理论大师、作为学派领袖、作为研讨班导师、作为躺椅后的分析师被确认的欲望，更确切地说，这些东西正是激发拉

康的欲望的对象 a ，是他的欲望之因。下面是 1966 年正式面世的《文集》的全部目录：

I

1. 卷首语（1966 年）；
2. 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1956 年）；

II

3. 关于我的经历（1966 年）；
4. 超越“现实原则”（1936 年）；
5. 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1949 年）；
6. 精神分析中的侵袭性（1948 年）；
7. 精神分析学在犯罪学中的功能的理论导论（1950 年）；
8. 谈心理因果（1946 年）；

III

9. 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一种新的诡辩（1945 年）；
10. 论移情（1951 年）；

IV

11. 终于问及了主体（1966 年）；
12. 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 年）；
13. 典型疗法的变体（1955 年）；
14. 一个设想（1966 年）；
15. 对让·伊波利特评论弗洛伊德的“否定”概念的导论（1954 年）；
16. 对让·伊波利特评论弗洛伊德的“否定”概念的回应（1954 年）；
17. 弗洛伊德的事务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1955 年）；
18. 精神分析及其教学（1957 年）；
19. 1956 年精神分析学的处境及精神分析学家的培养（1956 年）；
20. 自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1957 年）；

V

21. 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初始问题（1958年）；
22. 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1958年）；
23. 评丹尼尔·拉加什的报告《精神分析与人格的结构》（1960年）；
24. 菲勒斯的意义（1958年）；
25. 纪念欧内斯特·琼斯：论他的象征主义理论（1959年）；
26. 事后的一点说明（1966年）；
27. 给女性性欲大会作的指导性发言（1960年）；

VI

28. 青年纪德或文字与欲望（1958年）；
29. 康德同萨德（1963年）；

VII

30. 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60年）；
31. 无意识的位置（1960年）；
32. 弗洛伊德的“驱力”概念及精神分析学家的欲望（1964年）；
33. 科学与真理（1965年）。

再往下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让·伊波利特对弗洛伊德的“否定”（Verneinung）概念的评论，一个是拉康写于1960年的论文《主体的隐喻》。

就在所有整理好的稿件交付印刷厂付印的时候，拉康在一天深夜突然打电话给瓦尔，说《文集》绝对要一个核心词的索引，瓦尔已经被这次编辑工作弄得筋疲力尽，于是任务委托给了即将成为拉康的女婿的雅克-阿兰·米勒。不得不承认，米勒在理解拉康理论的方面是有天分的，他很快就整理出了一个“主要概念的分类索引”，而且还在索引的后面为《文集》中出现的各类拓扑图形逐一作了评注；而更让我们佩服的是他在迎合拉康的“已然”渴望方面所显示出的天才，他明确地提示应当以回溯的方式来理解拉康的理论，应当把拉康的理论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因此，在他编写的“索引”中，并没有依照编年顺序或字母顺序排列所选的概念，而是按照一个结构主义的拉康体系、

以一种重叠环绕的缝合术把每个概念置于其与整体的结构关系中。这样，在他的阐释下，拉康理论被分成五个大的方面，每个方面又由一些主题或分主题构成，概念则被分配在主题之下，有时同一个概念或主题因语境的不同而被置于不同的结构关系中。在此我们有必要看一下米勒所阅读出来的这个拉康，因为这应当算是对拉康理论的第一个系统“说明”，而拉康对这个“说明”也给予了认可，例如在《文集》出版后不久的一次研讨班上（1966年11月30日），拉康称米勒的索引为人们把握其概念的结构提供了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下面是米勒所编的关键词的索引，我只列到分主题一级，具体的概念及页码索引一并略去。^①

I. 象征界

A. 能指的优先性

1. 能指的外在性、自主性和置换；能指的缺口
2. 能指单位
3. 结构：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
4. 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性

B. 能指的裂口

1. 自我的发生：想象性认同
2. 主体的产生：象征性认同

C. 意指链

1. 重复（重复的自动性；能指链的坚持）
2. 两个原则（现实原则和快感原则）
3. 逻辑时间的多元决定（预期与回溯；偶然、机遇与命运）
4. 回想与记忆
5. 死亡、第二次死亡、死亡驱力、不可能的实在、实存

II. 自我与主体

A. 躯体、自我、主体（机体、某人自己的躯体、碎片化的身体）

B. 自我的功能

1. 自主性的幻觉

^① 参见 Jacques Lacan, *Écrits*, pp. 853-857。

2. 投射
 3. “集体心理学”
 4. 自我的几何学（想象性空间）
- C. 主体的结构
1. 真正的主体
 2. 主体的分裂和消隐
 3. 主体的拓扑学（象征性空间）
- D. 主体间性的交流
1. 实证主义批判
 2. “我”的功能和言说的主体
 3. 大他者
- Ⅲ. 欲望及其阐释
- A. 无意识的构型
1. 症状
 2. 无意识的修辞
- B. 分析的经验
- C. 菲勒斯
1. 驱力
 2. 对象 a
 3. 原乐、阉割
 4. 欲望
- Ⅳ. 临床实践
- A. 弗洛伊德的病例
1. 杜拉
 2. 鼠人
 3. 狼人
 4. 施列伯法官
 5. 小汉斯
 6. 伊尔玛
 7. 西诺列里
 8. 肉店老板娘的梦



B. 精神病学的临床范畴

1. 神经症
2. 倒错
3. 精神病

V. 认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

A. 认识论

1. 认识论的断裂
2. 真理
3. 猜想

B. 意识形态理论

1. 自我的意识形态
2. 自由事业的意识形态

就这样，拉康的声音终于以文字“残余”的形式出现了。《文集》于11月正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首印的5000册不到两周便告罄。评论界的反应也很热烈，他立即被封为结构主义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是他期盼已久的。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60年代中期是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巅峰时期，其标志性人物的代表作品大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1964年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第一卷《生食和熟食》出版，接着在1966年和1967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卷《从蜂蜜到烟灰》与第三卷《餐桌礼仪的起源》（最后一卷即第四卷《裸人》出版于1971年）；1965年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出版；1967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出版……1966年更是结构主义出版业的滥觞之年，以至有人说：“结构主义在那一年到处爆炸，几乎造成一场地震。”^①除列维-斯特劳斯的《从蜂蜜到烟灰》以外，在这一年出版的还有福柯的《词与物》、罗兰·巴尔特的《批评与真理》、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的问题》、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皮埃尔·马歇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以及拉康的《文集》等等，其中以福柯和拉康的作

^①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4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品最为轰动。因此可以想见，一个结构主义的拉康何以会在这个时期成为米勒和拉康本人的欲望对象，虽然其理论运作的方式远非“结构主义”这一个标签所能说明。

第二节 通关的政治

出版的成功让拉康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来听研讨班的人越来越多，可也是在这个时候，拉康学派内部的矛盾日渐浮出水面，拉康的精神分析政治又一次出现了危机。

在1964年的“创建行动”中，拉康把自己说成是从精神分析学的各种“变体”那里收复失地的领袖，他要以全新的组织形式来狙击那个让弗洛伊德主义走向没落的陈旧建制。为了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尝试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一方面，他把学派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自己任学派的主席，自己组建学派的各个小组，自己组织学派的教学和培训，他就像一个君主，在自己的辖地行使着一切的权力，没有人可以监督他，更别说与他对抗；而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复活一种带有共和国色彩的政治，就像弗洛伊德于世纪之初在维也纳成立的那个读书小组一样，成员之间没有等级区分，没有贵族式的特权，更没有强加的建制规则，拉康有一句话最能体现这一想象的无意识政治的图景：“只有分析师能授权自己是一名分析师。”可以看出，拉康是想建立一个“君主制共和国”，那里除了一个绝对的主人、绝对的导师、绝对的分析师以外，其他成员之间将遵循民主共和的理想，只有这个绝对的主人、绝对的导师和绝对的分析师与成员之间保持一种直接的君主制关系。

在《创建行动》中，拉康已给他的学派设计了一个结构框架，他宣布成立三个小组：第一个是“纯粹精神分析小组”，或称“精神分析实践和理论小组”，主要负责培训事务，就是说这是一个教学性和研究性的小组，小组下设三个分组，即“纯粹精神分析的理论”、“精神分析培训实践的內部批评”、“接受培训的精神分析家的督导”；第二个是“应用精神分析小组”，负责治疗和临床实践的问题，它也有三个分组，即“治疗理论及其变体”、“决疑”、“精神病学的资讯和医学探讨”；第三个

被称作“弗洛伊德领域编目小组”，负责编录和批判性地审查这一领域的所有出版物并负责发布使分析实践获得其科学性的原则，它同样下设三个分组，即“精神分析运动的持续评论”、“相关科学的阐述”和“精神分析的伦理学”。

为了打破常规的学会建制的权力结构，拉康取消了传统在普通会员、资深会员、见习生之间进行的等级划分。在传统的学会里，一个人要成为正式会员，需要经过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比如必须完成相应的教学课程，必须在某一个由学会授权的分析师那里接受培训分析或教学分析，甚至还必须在至少两名导师的监督下完成多次临床实践，即所谓的“监督分析”，而这每一步都需要向相应的委员会提交申请。现在，在拉康的学派里，任何学生和专业外的个体——不论你是不是分析师——都可以成为“会员”，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分析师，或者如果你有接受分析的意愿，你只需要拜会一下拉康，然后在一个被称作“卡多”（Cardo，有“联结”、“联络”的意思）的联络或准入委员会面前审查通过就可以了。进而，在传统的学会里，分析师之间有着复杂的等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权从事培训分析的分析师与没有这一授权或资格的分析师之间的区分，而现在，在拉康的学派里，不再有这样的区分，不再有一个特殊的可以培训其他分析师的分析师群体，培训分析与私人分析或治疗分析之间不再有区别。并且，虽然要成为一个分析师还需要另外的程序，但你只要被接纳为学派的成员，不论你从事的专业是什么，在学派内部你都有投票权，并可以通过参加一个被称作“卡特尔”（cartel，“联盟”的意思，尤指基于某一共同信念而结成的“政治联盟”）的小组与学派保持联系。

取消了成员之间意味着权力等级的区分，拉康为学派成员设立了三个头衔：“普通会员”（member of the EFP，简称 ME）、“分析师会员”（analyst member of the EFP，简称 AME）和“分析家”（analyst of the EFP，简称 AE）。第一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只要你有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意向；后两种是针对获得分析师资格的人而言的。一个普通会员要想成为分析师，只需自己去选定一个已经是分析师——不论是什么头衔——的会员接受培训分析，这一私人分析无须任何委员会的授权。然后，他就可以向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评审委员

会通过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定而确定是否授予他所欲望的分析师资格。在获得 AME（分析师）的头衔以后，如果愿意，再经过一定的控制分析，他还可以再申请 AE（分析家）的头衔。

除准入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以外，拉康还成立了一个被称作“内阁”（directorate）的类似于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协助他处理学派的重要事务，这个内阁的成员都是由拉康从 AE 中挑选的。原则上，评审团是要在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但由于学派创立时还没有举行这样一个会议，因此它的成员也都是由拉康任命的，他自己则是评审团的主任。这样，第一批获得 ME、AME、AE 头衔的成员都是拉康和他的内阁任命的。拉康成为绝对的主导。

那么，学派的这些成员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呢？1964 年分裂前，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共有会员 182 名，分裂后，只有 28 名加入了被国际协会收编的法国精神分析协会，有百余人跟着拉康离开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创立时，就有会员 134 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前法国学会的人，其次便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尤其是《分析手册》的那个群体，还有少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牧师和神职人员。这样的人员构成使得拉康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依照原先的级别去复制会员的头衔，所有前法国学会的资深会员自动成为学派的“分析家”（AE），以前的大部分预备会员和部分见习生则通过一定的评审程序也被提升为 AE。至于“分析师”（AME）的资格，任命程序也大致相似，来自以前的“精神分析研究小组”的分析家成为其中的主角，还有一些属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中的第四代人，他们将和新加入的会员——到 1967 年初，由于《文集》出版的影响，又有许多人加入进来，学派人数超过了两百——一起在学派中扮演着第三代在前法国学会中扮演的角色。

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倾向，而这些倾向的相互交织和冲突将构成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派的整个政治生态。来自前法国学会的第三代——以勒克莱尔和皮埃尔为代表——属于身居要位的少数派，他们两次目睹了老师们的分裂，对一个强势的权威建制或独裁统治深怀敌意，他们对拉康应当说是忠诚的，但他们无法领会这位导师的精神分析政治的逻辑，对精神分析事业的现代化也缺乏想象，不论理论上

的还是建制上的；在出生于 30—40 年代的第四代人的眼里，建制不过是驯服欲望的机器，他们所渴望的是那种权力最小化的兄弟会式的集体生活，在他们的眼里，第三代是保守的权威，是导致拉康此前的失败的祸首；还有来自高师的“手册”派，他们是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是激进的左翼政治的狂热追随者，拉康在他们眼里首先是一个知识英雄，他们要用科学的、逻辑的、形式化的工具重新武装他的理论，再乘机将那种激进的政治渗透到这一理论中；除上面几种倾向外，学派里还有一支力量，他们都属于普通会员，他们加入学派与其说是出自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热情，不如说是出自对拉康的偶像崇拜，他们对拉康可谓是言听计从，绝不会想到去挑战老师的权威，他们是一群教条主义者，没有理论的创新，也根本不追求这种创新，他们是一群“匿名者”，因为他们很少写作。

拉康任命的第一任内阁由六个人组成，他们全属于第三代，且都来自前法国学会，他们是：塞尔日·勒克莱尔、弗朗西斯·皮埃尔、让-保罗·瓦拉布热加（Jean-Paul Valabrega，出生年不详）、皮拉·奥拉格尼埃（Piera Aulagnier，1923—1990）、居伊·罗索拉托（Guy Rosolato，1924— ）和让·克拉维里尔。从第一次内阁会议起，冲突就出现了，内阁中多数人不愿接受拉康的独裁，他们更喜欢那种少数精英主导的寡头政治，他们想沿袭已有学会的某些建制设计，希望学派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出版阵地，以便更有效地传播权威们的影响。至于拉康，这些曾追随他甚至帮助他同精神分析“教会”的教廷作斗争的第三代分析家现在已不再重要，因为那个绝对的、否定性的“主体”已经从他的结构网络中被彻底删除了，遭到“绝罚”后的他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冲锋队，他现在需要的是以绝对的态度去施以复仇，去收复精神分析事业或者说弗洛伊德领域的失地，而在他眼里，只有第四代分析家可以帮助他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

拉康的抛弃——更像是一种过河拆桥——令第三代分析家心灰意冷。1966 年 12 月初，皮埃尔向拉康递交了从内阁辞职的报告，拉康接受了他的辞职。皮埃尔辞职一周后，拉康给所有会员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申请会员资格和头衔的人只需向主任（即他自己）和他的秘书（克拉维里尔）提出报告即可，这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权力，而架空了联络

委员会和评审团的权力。通告还提出设立一个新的头衔：“实践分析师”（*analyste praticien*，简称 AP），即接受过分析的普通会员可以自己授权自己是精神分析实践者甚至是分析师，而不必经由学派的委员会特别批准，具体的程序是，当一个受分析者准备作为一个分析师去接待病人的时候，他或她只需向学派的秘书通报一下，然后就可以作为“实践分析师”登录在册。正如图克勒所说：“这意味着根本不需要学派委派分析师做‘担保人’，因为决定开始实践和安排督导完全属于受分析者个人的事。……这一自我授权的观念最为直接地挑战了精神分析学——和其他专业尤其其他医学专业一样——为确保安全而以一个明确的质量控制标准进行工作的观念。”^①但在学派精英们看来，这同样是拉康专权的表现。因此，通告宣布后，让-保罗·瓦拉布热加也从内阁辞职，以抗议拉康的独裁。但这些局部的冲突并不能阻挡拉康前进的步伐，因为他有广大基层会员的绝对支持，还因为1966年底《文集》的成功让他对自己的事业获得了绝对的自信。

随着学派队伍的迅速膨胀，拉康意识到需要以新的建制策略来稳定他的王国。由第三代分析家所组成的内阁是靠不住的，他们没有能力对新的形势做出有效应对，拉康必须自己动手。1967年夏，拉康开始酝酿改革方案，10月9日，一份文本被分发到会员手中，文本的题目就叫《10月9日提议》。提议分两个部分，在比较长的第一部分，拉康追述了精神分析运动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创立到集中营时期的历史，思考了精神分析“教会”的等级制问题，在第二部分，他提出了一些预示着新的学派条例的原则。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其外延——这是激活一个学派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上来考虑，精神分析领域的经验的根源只能在精神分析经验本身中去找，我们的意思是说要在其内涵上来界定：对于一种入门性的精神分析学的必要性，唯一值得说明的理由就是为了那一领域的运作。”^②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所谓“从外延上来考虑”，指的是对精神分析运动建制层面的考量，而所谓“在内涵上来界定”，则是指精神分析经验的理论层面的评判，因此拉康的意思是说

①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122.

② 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445.

建制的运作必须取决于精神分析经验本身，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分析家，取决于他的精神分析经验，而不是外在的建制，而这经验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理论化，对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论化。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拉康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路：以前的五人评审委员会改由七个人组成：主任（当然是拉康本人）、三个任意选出的“分析家”（AE）、三个也是“任意”选出——其实是由 AE 挑选——的普通会员（ME）。原则上，最后的三个人必须自己也在接受 AE 的培训分析，这些人被称作“放行人”（passer），他们的作用就是接受来自 ME、AP、AME 的申请人的证言；后者被称作“通关人”（passant），因为他们在申请“分析家”（AE）的资格，为此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所谓的“通关”（the pass）测试。这一测试的程序是：申请者或者说“通关人”先向两位“放行人”陈述他的培训和他的分析的结果（end of analysis）；接着“放行人”把陈述转交或“放行”给评审团的 AE 和主任，由他们来得出“yes”或“no”的结论。如果被通过了，申请人便可获得 AE 的头衔——即便他还不是 AME——相应地，他的分析师也可直接晋升为 AE。注意，在这里，评审团并不是一个教学委员会，它的作用不是去对申请者的临床能力做出评判——那是申请“分析师会员”（AME）资格的时候需要的——而是对他的精神分析经验亦即理论化的能力进行评判；而且这一评判并无预设的准则可以依据，因为整个“通关”程序乃是基于一个原则，即每个人的分析都是独特的。

关于这个“通关”程序，因为它关系到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后来的发展以及拉康晚期研讨班中的许多思想，在此需要稍作几点解释。

首先，这一程序的性质。埃文斯对此有很好的归纳：

通关乃是一种手段，意在使一个人可以获得学派对他的分析结果的确认。通关不是一个法定的过程；一个分析师决定走不走这个程序，完全在于他自身。它不是对分析实践的一种资格认定，因为“一个分析师的授权只来自他自身。”它也不是学派对会员的分析师地位的确认，这一确认在拉康的学派中由另外的、整个地独立的手段完成，并对应的是 AME 的头衔。它唯一确认的是一个人的分析已经得出了其逻辑的结论，这个人可以从这一经验中导出一个系统的知识。因而通关关心的不是临床功能而是教学功能，它旨在验证

通过人将他自己的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理论化并由此得出精神分析知识的能力。^①

其次，设计通关程序的理论目的。对拉康而言，这主要是针对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精神分析技术理论化的问题，用他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分析的结果”的问题。对于分析，一直以来，都与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治疗和成为分析师：一个人去接受分析可能是为了治疗，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分析师。在传统的认识中，能否从一个受分析者变成为一个分析师，主要看临床的经验和能力，看你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己和病人的问题，成功地消除症状。可在拉康看来，分析的目标不在于治疗，而在于让受分析者或病人学会阐释其欲望的真理/真相。不论是受分析者还是分析师，去做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症状，因为症状乃是无意识的构成物，是能指的结构化，它只能被置换而不可能被消除。如果一个分析师能让他的受分析者学会穿越欲望的幻象，直面其欲望的真理/真相，就表明他达到了“治疗”的目标，进而，如果一个受分析者对这一治疗或分析经验可以得出自己的理解，亦即可以将其理论化，那就表明他达到了“分析的结果”，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分析家”而不仅仅是临床的分析师。通关程序的设计就是为了检验这个逻辑的分析结果。

再者，设计通关程序的实践意图。这当然是为了打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一直以来在治疗分析与培训分析之间所做的强行区分。依照那一区分，“治疗分析”单指治疗过程，受分析者接受分析是为了治疗某些症状，而“培训分析”则单指受分析者为成为一个分析师而接受分析。更主要的是，按照国际协会的规则，一个人要从事分析实践，首先都得接受培训分析，并且这一分析必须由学会或协会授权某些培训分析师来进行。拉康并不认同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所有的分析都是培训分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一种精神分析，那就是培训分析”^②。这话的意思是说，在实践的层面，治疗分析只是一种分析，培训分析也只是一种分析，两者并无区别，但在理论的层面，培训分析是治疗分析基础上

①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136.

②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274.

的“加一” (plus-one), 这“加一”就是指加上一个理论化的维度。通关程序就是这个“加一”的测试, 其中“放行人”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打破权威主义的僵局而设计的。

可这样一来, 通关程序将在学派内部引发一个结果: 一个分析师 (AME) 可能是一个出色的临床者, 但未必能把分析经验逻辑化和理论化, 反过来, 一个普通会员 (ME) 可能根本没有治疗经验,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把培训或分析的问题理论化, 因此借由通关程序, 一个普通会员有可能成为“学派的分析家” (AE) ——只要他通过了那个测试——尽管他还不是“学派的分析师” (AME)。正是在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 通关程序的政治意义可能远大于其理论意义, 对此, 鲁迪奈斯科有一段评述:

10月提议无疑是精神分析史上有关培训的一个最具创新意义的议案。关键的是它让培训分析摆脱了教学的模式, 后者模糊了分析治疗所特有的通过过程。拉康因而想把躺椅上所教的或传达的东西作为行使某一职能的唯一原则重新引入, 因为这一职能在当时与精神分析学的特殊性已不再有任何共同点。在这个方面, 这一程序考虑的是给分析补充“又一个”场所, 既非控制亦非躺椅的场所。虽然拉康没有使用这个词, 但它根本上就是要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第三场所”施以建制化, 既不是参与学术意义上的考试, 也不是参与任何博士答辩或学位答辩, 而是参与一种特殊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培训政治。在街垒战之后, 拉康会说, 他已经在他的学派中提前完成了一次1968年五月革命。^①

拉康的提案一经提出, 立即在学派里引起轰动。反对的声音中有两种意见比较突出, 一是认为通关程序不过是在强化拉康个人的权力, 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其实就在他手上,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放行人”这个角色的设立会损害到受分析者之间的关系, 因为一个受分析者被他的分析师选为“放行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分析是成功的呢, 或者他不会这样来觉得呢?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449.

不满的情绪很快就反映出来了，且主要是在第三代分析家当中。皮埃尔给拉康发了一个公开信，指责学派的章程不够完整，要求起草新的章程，成立专门的培训机构。瓦拉布热加也写了一篇长文指责主席的专权，称内阁形同虚设，并对10月提议中的观点逐条反驳，强调控制分析或监督分析是一个人的分析的唯一语境。罗索拉托没有发表意见，但在11月宣布退出学派，并于1968年1月加入了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奥拉格尼埃也没有正式提出批评，但她在罗索拉托退出后不久也宣布从内阁中辞职。还有勒克莱尔，他虽然赞成“通关”程序，但不久也辞去了内阁职务。六人内阁只有克拉维里尔继续留了下来，但他实际上也不赞成“通关”程序。

1968年2月，新的领导班子组成。第三代人中只有克拉维里尔真正赢得了拉康的信任，他成为学派中权力仅次于拉康的人，当然多数时候只是摆设。虽然一切都被置于拉康的绝对控制之下，但批评的声音还是不绝如缕，对“通关”程序的讨论一直在继续。

在这个时候，第四代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人身处学派最底层，自一开始就注定只是拉康的棋子，而他们自己也乐于充当这一角色，他们很享受主体的那种自愿臣服状态，很享受与这种臣服相伴随的有限的自由，在他们看来，“通关”程序乃是对传统分析培训程序中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亦即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那种等级关系的颠覆，是对倚老卖老的那些精英们的权威的挑战。当然，在1968年初，这些声音还缺乏足够的震撼力，可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最令这些年轻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声音不久便汇入了五月的巴黎学生反叛风潮，他们居然在五月风暴之前就已经在拉康的学派内部预演了伟大的革命！

1968年12月，拉康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正的改革方案，其中对学派各个头衔的性质和评审团的功能再次作了说明，对“通关”程序中争议较大的某些条款作了删改，一个重要的变更就是同意不让“放行人”参加评审团。拉康告知说，这个修改方案并非最后定案，大家仍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然后他会从中选出几个方案和自己的方案一起提交第二年年年初的学派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1969年1月底，学派召开全体会议，有三个方案——其中一个当然是拉康自己的——提交会议投票表决，拉康的方案赢得了多数，获得

通过并被写入学派的章程。投完票后，皮埃尔、瓦拉布热加和奥拉格尼埃给拉康递交了辞职信，彻底退出学派，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的第三次分裂就这样完成了。三次分裂都与精神分析主体所处的“莫比乌斯带”有关，且引发三次分裂的焦点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培训问题上，只是这一次，拉康不再是受到驱逐的一方，他好像永远都是胜利者。

皮埃尔、瓦拉布热加、奥拉格尼埃等退出学派后，伙同一批以女性为主的第四代分析家组成了一个新的精神分析组织：“第四小组”（Quatrième Groupe），又称“法语精神分析组织”（Organis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langue française）。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既不认同“学会”或“协会”模式的等级建制，也不认同拉康的“学派”模式的领袖崇拜。它强调的是精神分析的多元化存在，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学式的集体主导的组织结构。所谓“第四”，在此既暗示着它在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史中的历史位置，即它是继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和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之后的第四个精神分析团体，同时也指示着小组提出的所谓“第四分析”（Fourth analysis）的理论。

“第四小组”的创立者深深地体会到，法国精神分析运动总是被原则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困扰，而“能力”、“会员资格”和“培训”这三个东西常常是引发不可解决的冲突的源泉，其中“培训”的问题更像是无意识政治的症状，它以一种纽结的方式缝合着精神分析学从理论到实践和建制的各个地带。例如，能力的问题时常跟培训分析的效果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如拉康所界定的，培训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纯粹”分析亦即一种理论化的能力，问题就会变得更为严重；再如会员资格的问题，它总是与忠诚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时常取决于受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分析关系；至于培训本身，它会导致一个危险，即把分析师的地位建立在证书的获得或确认的仪式之上。那么，如何走出原则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困境呢？如何避免出现那种种异化的现象呢？“第四小组”以一种社会学的想象设计了一个新的建制模型，而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就是他们所说的“第四分析”。

何谓“第四分析”？1969年，小组的理论家瓦拉布热加在一篇题为《精神分析培训的道路》的文章中对此有系统说明。瓦拉布热加批评拉

康的纯粹教学分析或培训分析的理想是一种“纯洁派精神分析”，它强化了一种三角结构关系，即正在接受分析的病人或受分析者、分析师和分析师的分析师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在培训分析的情境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传统的监督分析师或控制分析师的位置，瓦拉布热加把这一位置的分析称作“第四分析”，他说：“第四分析——下面会看到，它与‘古典的控制分析’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就是一种培训程序，因为确切地讲，培训分析总是在四个参照点上同时实施的，故而有必要赋予那些盲区的分析、那些含有倾向性的曲折变化的区域的分析一种特权，以此去定位在四个参照点当中循环往复的无意识移情。因而，‘多维参照’这个词在这一语境中也并非不着边际。”^①可以看出，所谓“第四分析”或“多维参照分析”其实是对培训分析的情境的一种描述，依照这一描述，一个申请人只要接待了他或她的第一个病人，就不再只有教学联系在调节主体与无意识的关系，而是还有临床经验及其所有未知的东西，因为，在这一情境中，病人面对的是三个分析师，即分析师、分析师的分析师（不再被称作教学分析师）和第四分析师（不再被称作监督者），他们各有自己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各有自己的知识局限性，因而需要多元参照来参与无意识主体的对话，以解决分析过程中移情与反移情的问题。实际上，“第四小组”的“第四分析”和“多维参照”理论是对拉康的培训理论的一种发展，其建制的实践也是“参照”拉康的学派来建立的。“第四小组”与其说是反拉康主义的，不如说是拉康主义的又一个“变体”。

第三节 结构的街垒战

1968年五月风暴常常被一些史学家们描述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对于这种善意的类比，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五月风暴并非一帮密谋者有目的地策划出来的一场革命，它不过是欲望机器在适当的引爆点上启动的一次内燃工作，在我们现下的语境中，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无

^① 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474.

意识主体的一次宣泄疗法，是这个精神分析化的社会的绝对症状，是拉康意义上的“幻象的逻辑”的绝对表述。一夜之间，那个在绵延的时间之梦中沉睡的自主主体全都变成了精神分析化的暴戾的主体——歇斯底里的主体，当那些欲望的碎片飘荡在巴黎上空的时候，拉康也许很“享受”主体的那种症状吧，他的理论正在以一种异样的方式被集体地践行着，整个巴黎城都成了主体们的“对象 a ”。我这样说是不是以另一种绝对的方式把五月风暴描述成了一次精神分析运动呢？是的，至少一定程度上说，它是精神分析化的主体性对集体移情的一次演习，它以其绝对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分析场景。以此言之，我认为，迄今为止对五月风暴做出最佳表述的并非事件经历者们琐碎的事实罗列，也不是历史学家们的夸夸其谈，而是两位哲学家的著作，那就是德鲁兹和瓜塔里1972年所写的《反俄狄浦斯》。

“结构不上街”，这句被套用在罗兰·巴尔特身上的谣言常常被人当作是结构/后结构主义者的政治标签，似乎五月风暴所激活的主体性激情宣告了结构主义的破产，宣告了“结构人”的失败，因为在自以为是的庸众和理论家眼里，结构/后结构主义意味着对主体性的驱逐，意味着“人”的死亡，意味着主体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彻底失败。可问题在于：上街就一定是革命的吗？！或者革命就必须上街吗？！福柯不上街都是革命的；巴尔特即便上街也是非革命的，因为在他眼里，革命和上街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暴露癖的一种症状；拉康呢？他不上街都是不革命的，或者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他的理论有革命的效果，可那只是参与移情的无意识主体依循某种幻象的逻辑指认出来的一个貌似革命的位置；虽然他以对抗建制的英雄自居，可实际上对建制的对抗正是他借以认同建制的手段和方式，他的主体性恰恰是建立在对建制的移情上的，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利用也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拉康为什么对五月学潮持一种积极的支持态度，那不是因为他对左派、对革命、对共产主义或毛主义有什么热情，而是因为那一运动的颠覆性正符合他的精神分析政治的需要，符合他“貌似”的革命精神。5月15日，学潮正闹得如火如荼，拉康在他的周三研讨班上面对着那些亢奋的信徒说：“我正处在杀死我自己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们，精神分析学家应当对反叛有所期待。如果有人

问，反叛对我们应当有什么期待？反叛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回答。从你们那里我们所期待的就是不时地用我们的手扔出一些铺路石。”拉康还宣称，铺路石和催泪弹正在发挥“对象 *a*”的作用。^① 这就是拉康，一个把革命当作激发主体性激情的欲望工具的拉康。

其实，在拉康学派的眼里，真正的“对象 *a*”就是拉康本人，他才是那个欲望的成因。正是在拉康的鼓动和支持之下，年轻的第四代分析家们既积极投身于街垒政治，也把街垒政治的精神运用到学派的精神分析政治中，把拉康的“通关”程序视作是他发起的又一次精神分析历险，是弗洛伊德主义在新时代的充分体现。而拉康也立即意识到他的事业的未来将掌握在这新一代人的手中，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利用这支新生力量在他的学派内部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五月风暴改变了法国社会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改变了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当然，一个社会或一种运动的改变是多元决定的，非单一一个事件所能解释，但至少五月风暴是一个标志，是一个纽结点。

1968年以后的几年里，一切都已改变。弗洛伊德主义的结构主义成为法国知识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如文学批评、数学、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一改变甚至超出了知识界的范围：精神分析学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弱小的、无足轻重的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已成为一种法国精神分析文化，深深地且广泛地嵌入了政治和社会中。法国分析家的人数迅猛攀升，公众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亦上升到新的高度。育儿指南、职业咨询、教育和社会工作全都“变成了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学成为法国医学、精神病学和出版的头号新闻。一家最流行的法国电台甚至声称在通过电波做迷你精神分析（mini-psychoanalyses）。^②

在精神分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同时，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文化”出现了。如果说五月事件期间还只是出现了许多具有精神分析症状的标语和口号的话，那么，1968年之后，精神分析的“语言”就

^① 参见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455.

^②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6.

成了一种时尚，就像图克勒所说，“一种指涉可见背后的不可见、显意背后的隐意、公共背后的私人的精神分析语言成为有关家庭、学校、教会的标准话语的一部分。以前诸如流产、避孕、性教育这类‘私人性的’话题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①。同时，精神分析的话语不再局限于专业学会的圈子，也不再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论坛，而是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流行文化更是将精神分析学视作帮助其打开市场的宠儿。社会与文化的这种高度精神分析化其实正是步入消费社会的资产阶级主体性的一种症状享用。

在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化的时代，法国精神分析共同体本身也走向了一种多元化。在以前，一个精神分析团体首先追求的就是得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确认，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第一个走出了这个确认欲望的陷阱，但它并没有摆脱建制化的欲望本身，而是以帝国建制为否定性的参照把自己抛入了另一种建制的逻辑，使自己同样陷入建制的邪恶性难以自拔。而现在，随着社会对精神分析学的需求日益扩大，各式各样的精神分析团体涌现出来，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论坛一个接着一个，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左翼政治家、宗教学家、文学批评家、先锋艺术家、女权主义者、文化研究者、社会工作者纷纷投身于精神分析的事业，而他们并不一定要有一个严格的建制形式，也根本不需要为得到建制的确认而奋斗，他们致力于一种真正的精神分析事业，以精神分析学为武器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至于精神分析建制内部，其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还有第四小组，会员人数在五月风暴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拉康的弗洛伊德学派当然增加得最多，1967年的时候它还只有210人左右，到1971年已增至276人，1975年的时候更是增至401人，到拉康去世的时候则增到了570人。

人数的增加其实也意味着另一种现象的出现，那就是代际的更替。第一代法国分析家早在40年代末就已所剩无几，活着的也已被边缘化；到70年代，第二代分析家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丹尼尔·拉加什于

^①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p. 45.

1972年去世，萨卡·纳什特和亨利·埃伊于1977年去世，拉康也已是垂暮之年，虽然幸运的他并未因此而被边缘化，但他已经只是他所缔造的伟业的一个象征，他已经成为他人手中的一个棋子。这没有什么可伤感的，谁能与主体的必然性作对呢？！又有谁能胜过这必然性呢？！现在，该轮到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上场了，五月风暴已经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将作为精神分析共同体的主力主宰运动的历史。那么，第三代呢？他们真是命运不济的一代，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命运由老师主宰着，1968年五月革命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号召力去像拉康那样引诱革命的青年，相反倒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理而受到攻击，到70年代，他们的位置又被另一些主体所占据。当然，与第四、五代的匿名性主体不同，第三代人中不乏才学之士，例如让·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 1924— ）和让-贝特朗·彭大历斯（Jean-Bertrand Pontalis, 1924— ），又如费利克斯·伽塔里（Felix Guattari, 1930— ）和穆斯达法·萨福安（Moustafa Safouan, 出生年不详），他们都是拉康之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佼佼者，可在70年代，他们在建制中的位置都算不上显赫。

再有一个变化就是，五月风暴后，精神分析学开始在大学建制里确立自己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法国的大学里，精神病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归属于神经精神病学，这符合法国身心二元论的传统。五月事件后，法国教育部对大学建制进行改革，其中就包括对传统学科设置的调整，精神病学终于从神经病学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建制。分离后的精神病学在学科建制上更像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一个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在大学里，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都是该学科的必修课程。精神病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大学建制中的独立改变了法国精神病学的结构，也顺带地改变了精神分析学的地位。精神分析学在大学里获得了其独立的教席，甚至成为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学生最为追捧的课程，而在此之前，它都只能在心理学或神经精神病学的课堂上被顺便提及。精神分析学成为大学课程，于是有大量的精神分析学家走上了大学讲堂，精神分析共同体有了新的谋生之处。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将因为这一改革而发生巨大变化，拉康的学派同样会卷入这场改革浪潮。

好了，回到拉康的场景。刚刚讲到第四、五代分析家的“匿名性”，这其实说的是他们的出场情境。总体上，法国的第四、五代分析家都集中在拉康的部落里，他们是拉康最忠实的信徒，许多人对拉康的理论怀有一种教条主义式的虔诚；他们加入拉康的共同体常常不是为了职业实践，而是出于对拉康刻意追求的隐晦风格的膜拜，在他们眼里，那种风格就是一个“对象 a ”，就是一种分析行动，就是精神分析学的“真实”。面对拉康这个绝对的主体，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是虚弱的，且是绝对的虚弱，因为他们甘愿以匿名的形式为拉康的事业服务，也许这正是那绝对虚弱的主体唯一可行的迂回之路，即通过把主体置于匿名的缺席位置来召回它的存在，而这存在之真实就是它根本不存在，或者反过来说，这匿名性本身即是一种存在。

匿名性是主体的一种症状，也是主体借以显形的一种环路。匿名性决不意味着主体不施为，恰恰相反，匿名性正是主体施为的条件，它就是施为本身，是主体“使”自己处于不施为的位置，它使主体在缺席中在场。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第四、五代分析家获得了拉康的宽容和支持，他们为拉康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经营拉康产业，以出版的形式传播拉康的思想。在70年代，有三个刊物值得一提：《即是》（*Scilicet*）、《精神分析学家必备》（*L'Ordinaire du psychanalyste*）以及《奥尼卡？》（*Ornicar?*）。

“Scilicet”是一个拉丁词，有“不用说”、“即是”、“当然”的意思，拉康把它翻译为“你要明白”。在《即是》杂志的创刊号中，拉康写道：“‘你要明白’，这就是这个刊名的意思。”接着，他评论说，整整十二年（指从1951年到1963年），他只给精神分析学家讲课，结果发现他的教学是失败的，于是，他又到了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整整讲了四年（即从1964年1月到1967年12月），这四年他都献给了数学。他强调，创办这个评论不是为了分析家，而是为了学员，为了那些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但还没有加入学派的新手，拉康用了一个英语词，称他们是“bachelors”，并承诺他的“教学帝国”和杂志将给新手们提供一个“文化管道”。拉康还声称，杂志不排斥任何人，“但凡是没有加入进来的，就不算是我的学生。”这种专横还真是让那些屈从的主体受用，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拉康强加于他们的匿名性，他们在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文

字都没有署名——拉康自己当然除外——因为按照拉康的说法，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复性的写作（plural writing），一种理论努力不可能是单一个作者的功劳，而是教学的功劳，就是说，只是他拉康的功劳，而别人所能做的就是对他的理论加以评论。《即是》由色伊出版社出版，从1968年至1976年，前后八年间共出版七期，拉康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文章于2001年收入由米勒整理出版的《文集别章》（*Autres Ecrits*）中。

如果说《即是》杂志的出版显示了一种强加的匿名性和一种自发的教条主义，那么创办于1973年的杂志《精神分析学家必备》则称得上是一种自发的匿名性和一种自发的反教条主义的阵地。主持这个杂志的是两个爵士乐爱好者，他们奉拉康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并不接受拉康的“通关”程序，因为在他们看来，获得一个头衔与享受匿名性下的自由是相背的，他们要的是真正的匿名性，是真正的复性写作。所以，他们的杂志更像一个先锋的自由主义论坛，其大部分的稿件都来自拉康主义的阵营，既有理论性的评论，也有私人日记，甚至还有类似于艺术宣言一样的无意识呓语和诗歌断章。杂志一共出版了十二期，1978年停刊。

《即是》和《精神分析学家必备》的停刊，都与拉康的兴趣转向另一份刊物有关，那就是他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于1975年创办的《奥尼卡?》。“Ornicar?”这个题目是米勒将帮助法国学童记忆法语连词的一句歌谣“mais où est donc or ni car?”的后三个词加以组合新造出来的，并保持了其提问的形式。一开始，这个杂志就确立了一个主要任务，即出版拉康的研讨班讲演，至拉康逝世时已出版1974—1975年、1975—1976年、1976—1977年、1977—1978年以及1980年五个研讨班的讲演。拉康逝世后，这一工作仍在继续，很长一段时间里，《奥尼卡?》成为拉康产业的重要基地。

当然，拉康支持第四、五代的这些出版计划——其实，除了上面的三个刊物，拉康的学派还有别的出版计划，色伊出版社的“弗洛伊德领域”系列丛书就是其中之一——既是为了扩大学派的影响，也是为了部署自己的队伍，让他们除了研讨班以外还有别的进行集体移情的场所，因为这对于他的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五月风暴让拉康的学派变得热闹起来，前来参加研讨班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就在这时，一起事件再次把拉康变成了焦点人物。1969年3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主任罗伯特·弗拉塞力埃尔（Robert Flacelière, 1904—1982）通知拉康，高师的迪萨纳礼堂再也不适合他，下学期开始他再也不能在那里举办他的研讨班。至于理由，弗拉塞力埃尔没有说明。在拉康眼里，这显然又是一次驱逐，他向来是以牙还牙的人，他必须做出反击。6月26日，在该学期研讨班的最后一次讲演上，拉康出示了那个逐客令，当众宣读并向听众散发它的复印件，宣读中途还不时地拿主任的名字开涮，称后者是“Flatulencière”（“flatulence”在法语中为“胀气”的意思）、“Cordelière”（方济各会修女）等，不必奇怪，拉康的尖酸刻薄是有名的。驱逐的消息令台下的听众群情激愤，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决定占领弗拉塞力埃尔的办公室。参加者中有拉康的继女、一个激进的毛主义者劳伦斯·巴塔耶，还有著名的“泰凯尔”（Tel Quel）集团的两位核心人物：菲利普·索勒尔斯（Philippe Sollers, 1936— ）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这对夫妇也是激进的毛主义者，他们来参加拉康的研讨班既是为了从这里汲取理论养料去说明他们的文本实践和对抗他们所在的法国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为了他们的理论实验，即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之间谋求超理论的结合。抗议者们在办公室里静坐了两个多小时，后被警察赶了出来。

拉康被逐的事件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拉康的好友列维-斯特劳斯的态度也许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某种看法：当弗朗索瓦·瓦尔找到曾经支持过拉康的列维-斯特劳斯，要他在一个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后者拒绝说，一个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做客的客人不应该大声喧哗。是的，拉康的愤怒是没有道理的，他忘记了这个圣地曾经给予他的庇护，忘记了那个讲台所带给他的荣耀。他甚至以怨报德，责怪阿尔都塞和德里达没有阻止校方的行动。

还好，拉康并未因此被逐出大学，他的研讨班转移到了先贤祠对面的法学院的演讲厅。1969年11月26日，新一期研讨班如期开讲，该期研讨班的主题是“精神分析学的另一面”，在这里他将讨论到四种话语：主人话语、大学话语、歇斯底里话语和分析家话语，并要把分析家

话语置于其他三种话语之上，只有它处在发现“真理”的位点上，大学话语则被视作一种霸权性的话语，表面上是向他人灌输“中立的”知识，实际上是要借此实施对他人的主宰——他总是这样，就像他所研究过的那个病人埃梅，当自我的理想受挫时，就转而去攻击所欲望的理想对象。

拉康对大学话语的评论无疑具有某种“知识”的真实，现代性谋划下的大学建制的确如他所言是一种霸权建制；可他的评论同时也泄露了其自身的欲望的“真理/真相”：正因为大学话语是一种霸权话语，他才渴望着在这里获得确认，赢得其主体的位置。因此，对大学建制的怨恨恰好与对它的嫉妒是缝合的，对大学霸权的揭露恰好与对它的认同是扭结的。拉康主义者在文森大学的建制运作就是最好的说明。

刚刚我们提到五月风暴后法国教育部门的大学改革，对于官方而言，实施这一改革既是为了革除旧弊，缓解战后一代的年轻人对旧的建制的不满情绪，也是为了消除学生运动的危害性。这一改革酝酿出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巴黎第八大学的创立，由于这个大学位于巴黎东部郊区一个叫文森（Vincennes）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称它为文森大学。自创立之初（1968年秋），这个大学就发誓要以其民主化的管理和跨学科的院系建制充当大学改革的样板和实验区，这个远离市中心的校区于是成为好战的五月运动激进分子的避难所，一群称为“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组织成为最活跃的力量，他们把校园变成了红色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试验田，变成了重温五月革命的街垒之战的场所，而他们自己则变成了蛰伏在资本主义机体中的“毛泽东细胞”。

文森大学在许多方面的确表现出非凡的实验性，且不说其在建制上体现出来的充分的开放性，也不说它对法国当时最具才华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任命——他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单就院系的设置而言，这所大学居然在哲学系的下面另设立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系，这在法国的大学建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精神分析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其系主任就是曾为拉康的“三套车”之一、后在拉康的学派中受到冷落的勒克莱尔，其老师也全都来自拉康的弗洛伊德学派——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和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许多分析家都到了巴黎第七和第五大学，不过在这两所大学里，没有单独的精神分析学系，而是只有一个实验性的教研

组——其中包括让·克拉维里尔、露西·依利加雷、米歇尔·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阿兰·巴丢、雅克-阿兰·米勒等。米勒此时已成为拉康家族的一员，他于1966年同朱迪丝结婚，后者是拉康和西尔维亚的孩子，可父姓一直用的是巴塔耶的名字，1964年才在法律上确认了拉康的父亲身份。朱迪丝也在文森大学，不过是在哲学系，她和米勒都是“无产阶级左派”的成员。勒克莱尔还曾邀请从拉康的学派中分离出去的“第四小组”的核心成员加盟，但是遭到拒绝。

在未被巴黎高师驱逐之前，拉康对勒克莱尔的实验一直抱观望态度，但1969年3月接到驱逐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当然明白大学建制之于拉康主义的重要性，他决定进军文森，第一步就是要把勒克莱尔赶下台，为此，他一方面让他的内阁向勒克莱尔不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打算亲自出马，以他的魅力征服或者说驯服那里桀骜不驯的学生。1969年12月3日，拉康应哲学系邀请来到文森大学第一报告厅作演讲，面对那些时刻准备着向权威发起攻击的狂热分子，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就像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一样，把他的想象力简直发挥到了极致：

雅克·拉康（一只狗在他站立的讲台上溜达）：我要谈谈我的缪斯女神，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我不是说她正在说什么——那不是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因为她不用言辞来说。当她焦虑的时候，她就会说些什么；那时，她就会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她知道我会死，这个事实别的许多人也都知道。她的名字叫朱斯蒂娜……

插话：嘿，怎么回事？他在向我们谈论他的狗！

雅克·拉康：这是我的狗，她真漂亮，你会听到她说话的……与四处闲逛的人相比，她唯一缺少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上大学。

此时我在这里，作为一所所谓的大学的实验中心的正式客人，有一种对我而言极其特别的经验。既然那是经验的问题，你可能会自问自己有什么用。如果你问我，我会给你一个示图，我会尝试这么做，因为你知道，大学毕竟十分强大，它有深厚的根基。^①

^①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 117.

接下来，拉康开始向下面的人讲他的四种话语，中间不时地有人插话，或是抗议，或是提问，拉康则巧妙地把他们引向对大学话语和勒克莱尔的学分制的批评。突然，一个抗议者站起来，开始脱衣服。拉康不停地鼓励他：

听着，伙计，昨天晚上我就目睹了这一幕，是在开放剧场，有个家伙也这么干，不过他可比你胆大，他脱了个一丝不挂。继续吧，我是说你为什么不继续！笨蛋。^①

下面的人开始起哄，拉康则以嘲弄回应他们。最后他又回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对精神分析学系和勒克莱尔冷嘲热讽，施以攻击。他的战役是成功的，他以他的充满机智的语言暴力打垮了那些崇尚语言暴力的“笨蛋”的嚣张气焰，他以他不可一世的主人话语把自己确立为绝对的“主人”。

拉康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成效。1970年，四面楚歌的勒克莱尔辞职，他的位子由拉康的忠实信徒克拉维里尔接任。现在，米勒该上场了。

米勒在高师的时候就深受拉康赏识且后来又成了拉康的乘龙快婿，尽管其激进的政治倾向并不为拉康所认同，但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影响。1972年，米勒主动请缨，整理出版拉康的研讨班讲演，这个庞大的计划使得拉康的事业从此将紧紧地与这个年轻人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个出版计划，我在后面会专门叙述，在此要说的一点是，它使得米勒成为了拉康的代理人，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对他则是言听计从。1974年，已经是精神分析学系副主任的米勒建议拉康亲自对这个系进行改组，让这个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机构变得更纯洁一些，因为勒克莱尔创建这个系的时候拉来了不少属于分裂主义的学派成员。拉康同意了——虽然他并不是这个系的一员，可他是这个系里所有老师的主人——于是写信给克拉维里尔，要求后者配合米勒，执行自己拟定的新的人事分配计划。忠诚的克拉维里尔当然不敢抗命。

9月，新学期开始，岗位分配计划被公示出来，那些有异心的分析家全被降格为没有任何头衔的普通授课老师，还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必须

^①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 122.

把自己的教学大纲交给拉康审核通过。这种越权行为自然引发了大家的抗议，连克拉维里尔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米勒于是向拉康进言，建议把查尔斯·梅尔曼（Charles Melman，出生年不详）吸收到领导核心中来。梅尔曼是拉康的信徒，属于第四代人当中的教条主义者，自愿的匿名性主体，曾运作编写一个庞大的精神分析辞典为拉康树碑立传，但计划最后流产。拉康接受了米勒的提议。就这样，精神分析学系变成了三人执政，克拉维里尔受到孤立，他只能缴械投降，不久便把实权交给了米勒。要知道，在那种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只有两种选择，或是站在拉康的一边，或是与他为敌，后一个选择面临的结果就是被驱逐，而对于忠诚的拉康主义者来说，如果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屈辱，那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大权在握的米勒立即开足马力，全速实施其人事更替的计划，到10月底，一切都大功告成。11月，在米勒的运作之下，拉康成为文森大学精神分析学系科学委员会的主任，米勒为行政主管。拉康终于借他人之手对大学建制进行了一次嘲弄，可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理论的嘲弄?!

其实，对拉康而言，真正的嘲弄可能才刚刚开始，因为在他的放纵和支持下，米勒的专权已经在学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到70年代末，这种不满逐渐公开化，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拉康，建制的危机再次一触即发，需要的只是导火索而已。

1976年12月，一本题为《如此悲惨的命运》^①的新书出版，作者是弗洛伊德学派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出生年不详）的年轻人。在书中，作者指责拉康主义是操控群众的鸦片，是彻头彻尾的宗教，其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三部曲其实就是圣三位一体的神学，其通关程序不过是煽动偶像崇拜的工具，是借移情来实施对他人的控制。鲁斯唐的攻击在学派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梅尔曼——其实他对通关程序是持保留态度的，但他是拉康的忠诚的卫士，是米勒的忠诚的合作者——在《奥尼卡?》上撰文展开反击，以大师的口吻对鲁斯唐极尽嘲讽之能事，而他的这种霸道作风又招致了学派外的德里达的不

^① 该书的英译名为《糟糕的手艺》，参见 François Roustang, *Dire Mastery: Discipleship from Freud to Lacan*, trans. Ned Lukacher,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满，后者在一次演讲中拿梅尔曼的名字开涮，以文字游戏的伎俩讽刺梅尔曼（Melman）是英文中的邮差（mailman）。

鲁斯唐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使通关程序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1977年3月初，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一名年轻的属于第五代的女分析家因为“通关”失败而自杀，学派内外立即谣言蜂起，目标直指通关程序，评审团力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只有拉康还算清醒，他意识到通关程序可能隐藏着危险。1978年1月，学派就通关程序举行科学会议，会上大家对通关程序及评审团的功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激烈的争吵不时发生，拉康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好斗的战士们尽情表演，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性发言，他承认，通关程序总体上是失败的。这一次，他可能真的体会到了失败的味道。他的结论同时意味着否定了评审团的合法性，这给了米勒以可乘之机，他与评审团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后者是妨碍他攫取学派权力的最大绊脚石。

对拉康的批评不只是来自学派内部，学派外部的激进的新左翼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毕竟，结构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那些以结构主义赢得大师地位的一代巨人如今已成为新生代成长之路上的压抑性阴影。1979年，青年哲学家弗朗索瓦·乔治（François George, 1947— ）出版了一本题为 *L'effet'you de poele* 的小册子，把拉康当作一个恶搞的对象加以调笑。在书中，作者称拉康主义是冒牌货，拉康是巫师，他的学生是骗子。在书中，作者并没有分析拉康的理论，而是以歪批的方式调侃拉康玩弄的那些神秘术，称拉康的被划了斜线的主体 S 令人想起美元，想起精神病患者用园丁铲切断的蚯蚓，拉康以此要求自己的患者结束治疗，享受自己的“分裂”；至于拉康的著名的“对象 a ”，并不比一小堆排泄物、一小滩平凡的大便神秘多少；他还称拉康试图“用斜线的神话取代十字架的神话”，进而创造一种新宗教。^① 这本书称得上是妙语连珠，才思敏捷，作者在语言暴力的快感中享受着分裂主体的症状，享受着拉康的“残余”带给他的“思维奔逸”，他与鲁斯唐的讥讽可谓一唱一和，提前敲响了拉康主义的丧钟。

乔治的书出版后，在市场上风行一时，9月21日，《世界报》发表

^① 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卷），503页。

热情洋溢的评论，在赞美乔治的著作的同时，称“拉康的研讨班长期以来吸引的都是假内行和笨蛋，他们更多地是被导师的谜一般的话语所吸引，因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那些。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幌子，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除名的雅克·拉康在1964年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为了让精神分析学不致陷入伴随着它的医学化和令其停滞不前的平庸，他借助于被减少到几分钟的自杀式会谈实践，在几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制止精神分析学临床上和知识上的声誉受损的绝技。在那个方面，他堪称是另一位‘救世主’”^①。

攻击并未就此结束。10月底，巴黎另一家著名报纸《新观察家》也发表了一篇赞扬乔治的著作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属于那种典型的软暴力：“向拉康同志致以最后的敬意”。文章称，拉康对譬喻的偏爱，对制度的嘲弄，都令这个组织威信扫地，并为大师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某些方面，他成了‘匮乏’的交换价值，‘匮乏’像钞票那样在拉康派中流通着。”^②人心就是如此，当初，人们如潮水般涌向研讨班是为了从拉康这个“对象 a ”身上享受到剩余原乐，而今天，他们就像对待一条死狗一样转而向他索回自己赠送的一切。

此时的拉康已经是风烛残年，学派内部不时地有人谈起他的大限之日，而人们更为关心的还是他死后学派的权力移交，他们当然清楚，米勒将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一个二选一中做出抉择：或者赞成米勒，或者反对米勒。而米勒也知道自己在学派内部权力根基不稳，他必须尽快打进权力结构的内部。1979年2月，米勒创立了一个称作“弗洛伊德领域基金会”的组织，把学派内部相对独立的“卡特尔”成员——他们大都来自高师——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7月，他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讨论拉康在70年代所热衷的“数学型”（*matheme*）和各种拓扑学“纽结”（*knot*）的理论问题，许多第五代分析家被拉拢进来；9月，在许多学派成员反对的情况下，拉康一意孤行，强行让米勒入选内阁；12月，米勒和另一位分析家联合作题为《如今在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内部哪里可以找到拉康的教诲？》的讲演，指责学派

^① 转引自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p. 641—642.

^② 转引自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卷），504页。

的分析家只会把分析神秘化，而无法做到理论化。米勒运用其毛主义的斗争策略，步步进逼，为自己成为拉康的接班人铺平道路。

虽然危机四伏的建制大厦已经是摇摇欲坠，但不管怎样，直到1979年底，除拉康和米勒等极少数几个人以外，学派内部还没有人想到解散的问题，因为那个强有力的象征毕竟还活着，因为这个象征在创立学派之时就已经强调了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原则：“我只身一人创立巴黎精神分析学派”。就像鲁迪奈斯科说的：“如果象征性地是他独自一人创立了学派，那也就只有他能解散学派。这就是这个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象征性法律——尽管不是法定性的法律。”^①

而实际上，在拉康的家里，解散行动已经在酝酿之中。1980年1月5日，拉康在致学派成员的公开信中宣布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想说我不抱一丝希望——尤其不抱被人理解的希望。

我知道我必须这么说——这样便可以让它所隐含的东西也增添一点无意识的意味。

我胜过他人的地方就在于，人们只是思考而没有觉察到自一开始他就会说话。我把这一优势唯一归功于我的经验。

因为人们总是把他所误解的话和他认为他作为思想陈述出来的东西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于他毫无促进。

因此，人的思考是很虚弱的，在他发怒的时候尤其如此……那恰恰是陷入混淆的时刻。

学派存在一个问题。这不是什么秘密。因此，我把它宣布出来，这是不久前的事。

问题就摆在那里，得有一个解决：那就是解—解散。^②

弗洛伊德学派解散的消息立即成为巴黎各大左翼报纸的头条，有人为此欢呼雀跃，例如那个借恶搞一夜成名的青年哲学家弗朗索瓦·乔治，他觉得自己就是拉康学派的掘墓人；当然也有人痛心不已，例如那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649.

^②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p. 129.

些坚定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在媒体和学派内部发起保卫战，反对解散；至于雅克-阿兰·米勒，他直接参与了解散行动，解散信就是由他起草的，可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如果说拉康同意解散学派部分是因为身心俱疲的他已经厌倦了那种无谓的权力斗争，那么精力旺盛的米勒从中兴风作浪更有可能是一种自杀式的阴谋，一种打击敌人的策略，一种纯洁队伍的狡计。

果然不出米勒所料，解散信发出后，拉康收到了近千封请愿书——其中三百多封来自学派成员——要求继续效忠于主人。这令拉康深感意外。于是，一出闹剧上演了。2月21日，请愿者们收到了一个公告：“鉴于有上千人写信表示想继续追随他，雅克·拉康于今年2月21日宣布他将创立‘弗洛伊德事业’(Cause freudienne)。”

3月15日，300余名不赞成学派解散的会员被邀请到一个宾馆开会，为防止不受欢迎的人前来捣乱，与会者必须凭邀请函入场。路易·阿尔都塞也赶来了，在宾馆门口，门卫要求他出示邀请函，他说：“我是被力比多和圣灵召唤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人都知道圣灵即是力比多。所以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圣灵与那个玩意儿完全无关。”^①说完他就冲进会场坐在了第一排。

拉康向与会者致欢迎辞：“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这里参加这个集会。学派行将走向其旅程的终点。诸位仍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离开是因为学派已经死亡了，虽然还没有变成现实。”接着他宣布他已经成了一个能指，成了“拉康标签”，但“拉康女士”只能给予她已经给予的。拉康的话音刚落，阿尔都塞便走到中间过道上，在鞋后跟上慢慢地嗑着他的烟斗，再慢慢地装上烟丝，走上前握住拉康的手，然后开始发言。“他把这位大师描述成伟大而又可怜的小丑，只会发出他单调的信息。他评论说，分析家们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话语中，就像一个忙于家务的农妇，丝毫不知道战火已经燃起。……最后，他提醒说，在整个事件中被遗忘的是那些受分析者。他称出席会议的人是可怕的。”^②

^{①②}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659.

9月27日，学派召开全体会议，会上解散的动议被通过，拉康苦心经营十几年的伟大事业最后由他自己动手拆散了。

10月22日，“弗洛伊德事业”正式创立，米勒成为钦定的接班人。这再也不是雅克·拉康的弗洛伊德事业，而是雅克-阿兰·米勒的拉康事业，一个数学化的拉康主义变体，一个喜欢内斗、喜欢玩弄宫廷权术的精神分析组织。拉康自己已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愿意，做拉康的信徒是你们的自由。至于我，我是弗洛伊德的信徒。”^①

1981年6月，埃梅去世。埃梅就像是拉康的一个对体，她就像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串联着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的命运开始和终结的两个端点，在30年代初，正是她以其妄想症式的存在把拉康引向了对自我确认问题的思考，而在将近五十年后的现在，她又以其朝向圣灵的存在——她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开启了拉康朝向不可能之真实的道路，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但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而言，巧合也许正是无意识主体的一种遭际。1981年9月9日，星期三，雅克·拉康去世。星期三是拉康的节日，从1953年一直到1980年，他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每个星期三——到70年代，这个惯例经常被打破——以他低沉的声音向他的信徒布道，1981年9月的这个星期三是他此生最后的一次宣讲，只讲了一句话，且是以一种逼视死亡的姿态向世人划出了主体的界限：“我很固执……我正在消失。”^②

三天后，拉康的遗体被葬在他的乡间别墅附近。三十多个人出席了她的葬礼，主要是他的家人，“没有一个以前的同事，没有一个私人朋友，没有一个来自弗洛伊德主义阵营的名流。”墓碑上只是简单地刻着一个生卒日期：“雅克·拉康，1901年4月13日—1981年9月9日。”^③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662.

② Ibid., p. 679.

③ Ibid., p. 680.

第六章

研讨班的岁月

拉康终其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要革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革新是在三个“分析场景”中进行的：躺椅上，其分析实践——包括治疗分析和培训分析——的焦点乃是分析师的位置和欲望，而并非所谓的“短时分析”，后者充其量只能算是引发他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的政治焦点；学派建制，这是体现拉康派精神分析政治的典型场所，其斗争的焦点在于作为主人/导师的绝对主体的位置，在拉康那里，这个政治是与一系列的分裂扭结在一起的，它最好地印证了弗洛伊德说的那句话，“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便是他的研讨班，这是拉康阐发和发展其理论与技术的基地，也是他借以实施分析实践和运作建制政治的重要场所。因此，要理解和认识拉康，研讨班是绕不开的一条通道，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突入其理论腹地时必定会遭遇的一道屏障。

正如我们看到的，拉康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讲台或学术论坛上宣讲出来的，他的文本大都是口语的而非文字的，他也很少专为出版而写作，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属于那种“述而不作”的人。的确，古往今来，在学术或知识共同体中，总是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深，追随者甚众，但却只是口头宣讲而不着一字，令后世为其才华的空空流逝而唏嘘不已，我们中国人称这种人是“述而不作”。中国的孔子，希腊的苏格拉底，两位都算得上是文化的至圣先师，可两位都是“述而不作”的典范。拉康当然算不上是至圣先师，但若就“述而不作”而言，在写作和出版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典范。然

而，笼统地这么讲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拉康的“述而不作”并不是基于一种高尚的道德实践，他不是那种轻薄名利的道学之士，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个靠言语去捕捉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他的“述而不作”有着独特的旨趣，那是靠一种分析经验作支撑的，即言语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唯一媒介。因此，对于他的研讨班，我们不可单一地理解为只是一种教学手段，而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特别的理论阐述方式，同时还应当把它看作是拉康建立其分析情境的手段，是他借以实施集体移情的装置，也是他为分析诱惑设置的特别场景。

在这一章，我并不打算按编年顺序去逐一叙述拉康的历次研讨班的内容，在还有多期研讨班演讲未被整理出版之前，这一工作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的，也是我眼下的能力所不及的。实际上，即便是所有的演讲都整理出版了，我们也未必能够建立起拉康理论的全视图，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拉康的“原始文本”，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二手文本”，哪怕是演讲的录音或录像，对其断句、语调、手势、口误、停顿乃至那些难以捉摸的表情的不同解读，都会让他的文本歧义顿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文本的考古学将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打算立足于拉康研讨班的时段性语境，围绕着其主题的转变，对研讨班的进程及相关问题做一描述。当然我所提供的只是一个轮廓，而没有具体的分析，读者也许更应当把这个“历史的”追述看作是一种背景描述。

第一节 声音的诱惑

埃文斯在《拉康精神分析学简明辞典》（1996年）中对拉康的研讨班有这样一个总体的界定：

1951年，拉康开始在里尔街3号西尔维亚·巴塔耶的公寓举办私人讲座。出席讲座的是为数不多的正在接受培训的精神分析师。讲座主要是阅读弗洛伊德的病例史：杜拉、鼠人、狼人。1953年，讲座的地点移到圣安娜医院，那里可以容纳更多的听众。虽然拉康时常称1951—1952年和1952—1953年的私人讲座是他的前两次“研讨班”，可这个名称现在通常指的是1953年开始的公开讲

座。从那时一直到1981年他去世，拉康每学年选取一个不同的主题，针对它作一系列的讲演。这27个年度系列讲座通常以单数形式被集体称作“研讨班”。^①

这一界定中丢掉了并非毫无意义的细节：拉康研讨班的开讲时间定在每年11月至次年6月的每周三（1969年研讨班易地法学院以后，这个时间变成了每个月的第2、3个周三，但后来连这个惯例也没有严格地遵守）。前面已经说过，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最早的“星期三心理学社”，那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私人性集会，十来个人（刚开始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只有五个人）每周三晚聚集在弗洛伊德的家里进行案例讨论，案例素材或是取自医学文献，或是取自文学作品甚至公众人物，有时也会针对某个成员的报告或心得以及弗洛伊德的释梦技术进行讨论，最后由弗洛伊德作总结性发言。不过，与拉康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并没有想到把这种聚会看作是集体移情的场所，更没有想到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套可加以利用的分析机制。

法语中“Séminaire”这个词原始的含义是“神学院”，其现代含义（“研讨班”）大约源自反宗教改革时期，指的是专事年轻人的宗教培训的机构，后引申为“塑造”年轻人的地方。在大学里，研讨班成为与课堂教学相配合的一种教学形式。举行研讨班是法国学术界的一个知识传统，法国文化名流都喜欢以研讨班——以及同仁刊物——的形式来传播其学术思想。开设研讨班也是精神分析共同体的一个传统，是各个学会的教学机器的一部分，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和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中，举办研讨班的并不只有拉康一个人，许多培训分析师都有这样的活动，只是其规模和影响远不及拉康。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人把研讨班只是当作一种非正式的教学手段不同，拉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研讨班的性质，他不仅把研讨班当作理论交流的场所，当作其精神分析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把它当成分析实践的一部分，当成引导无意识主体发现自身的真理的手段。当然，对于拉康来说，研讨班也是他用来对抗精神分析建制机器的一个“战斗基地”。雅克-阿兰·米勒曾在一篇题为《拉康的夜莺》的文章中评论说，拉康研讨班

^①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p. 175-176.

是“精神分析学家的‘播种机’，是阐发精神分析学和构型无意识的场所”^①。

再有一点，在法国，研讨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场所，它至多只是教学的一个补充。研讨班与教学机器之间的这种游离关系使得它可以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一般地，研讨班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一点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院士们定期向学院发布其最新的研究计划已成为惯例，每当这个时候，社会公众，不论学历，不论职业，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去聆听大师们的声音。并且这种研讨班是不颁发任何文凭或资质证书的，它有点像非正式的学术论坛。拉康的研讨班沿袭了这些传统，尤其在移师巴黎高师之后，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讲座和论坛。一般地，每次讲座都是拉康作为主讲，然后听众可以针对他所讲的内容提出问题，再由他来作答。有时他也会邀请他的同行、朋友或学生做与研讨班主题相关的专题报告，然后他再加以评论和发挥。总体上，这是一个充满自由气氛的讲堂。

不只如此，拉康研讨班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由于拉康强调精神分析学家和分析师的培训不能只局限于技术和自身专业的狭隘领域，而是应从其他学科中汲取方法和思想的灵感，因此他要求分析家尽可能去掌握哲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甚至数学家的知识。为此他时常会邀请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到他的研讨班上讲课，例如黑格尔主义哲学家让·伊波利特、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精神分析学家及文学批评家让·德雷等等都曾受到这样的邀请。

除自由和开放以外，法国人的研讨班还秉持着一个传统，就是对前沿知识的关注。在研讨班上，主讲人不仅要向公众展示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还要对相关的前沿研究加以讨论，以谋求在对话和激辩中来深化所论的主题。这一点在拉康的研讨班中同样有充分的体现，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他的演讲中，或是与之对话，或是加以批判，或是对其做激进的改写和挪用。因为涉及的人物和作品众多，在此

^① Jacques-Alain Miller, "Lacan's nightingale", in www.lacan.com.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

当然，说到拉康的研讨班，我们还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的启示。除思想的方面以外，这一启示还体现在形式的方面，那就是对原典的创造性阅读。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的阅读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强力阅读，黑格尔的文本从此被打开了全新的意义维度，且因此而成为战后法国理论的重要源头。拉康采取了科耶夫的那种阅读模式，先是对结构语言学 and 人类学技术做强力的改写，然后加以挪用，以完成对弗洛伊德的作品创造性重读，至少在前十期研讨班中，拉康忠实地贯彻了这一路线。对于这一点，米勒有一段说明：

拉康有一个模型。它不全是原创的。我认为，这个模型就是科耶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引入的黑格尔研讨班。科耶夫在研讨班上所做的阅读乃是对黑格尔的再创造。他创造了一种阅读，那是基于主奴辩证法来对《精神现象学》的一种句读。这一创造性的阅读可谓意味深远，以至于评论家们只是到现在才尝试着去揭示科耶夫对黑格尔著作的阐释的影响力。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一阅读的基础是语言及言语的功能，或许我们应当说，它是结构语言学的结果，后者则被看作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所谓“人文科学”的一种先锋科学。这一形式是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出发点，但它是由索绪尔提出而由雅各布森修正和重新编订的。实际上，发明那一公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而不是拉康。因此，总而言之，拉康的研讨班首要地是一种阅读风格的研讨班，其模型是科耶夫，但却是由结构语言学的一种特殊理解提示出来的。^①

按照埃文斯所讲的惯例，今天说到拉康的研讨班都是从 1953 年算起，从 1953 年 11 月 18 日开始的第一期到 1980 年（而不是埃文斯所说的 1981 年）7 月 15 日结束的最后一期，一共是 27 期研讨班，各年度的演讲主题分别为：

^① Jacques-Alain Miller, “Lacan’s nightingale”, in www.lacan.com.

1. 《弗洛伊德论技术》(1953—1954年)
2. 《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1954—1955年)
3. 《精神病》(1955—1956年)
4. 《对象关系》(1956—1957年)
5. 《无意识的构型》(1957—1958年)
6. 《欲望及其阐释》(1958—1959年)
7.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年)
8. 《移情》(1960—1961年)
9. 《认同》(1961—1962年)
10. 《焦虑》(1962—1963年)
11. 《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年)
12. 《精神分析学的关键问题》(1964—1965年)
13. 《精神分析学的对象》(1965—1966年)
14. 《幻象的逻辑》(1966—1967年)
15. 《精神分析的行动》(1967—1968年)
16. 《从小他到大他》(1968—1969年)
17. 《精神分析学的另一面》(1969—1970年)
18. 《论一种不是伪装的话语》(1970—1971年)
19. 《……或许更糟》(1971—1972年)
20. 《再来一次》(1972—1973年)
21. 《未被复制的错误/父之名》(1973—1974年)
22. 《R、S、I》(1974—1975年)
23. 《症候》(1975—1976年)
24. 《人们知道那是爱的翅膀上错会的月亮》(1976—1977年)
25. 《做总结的时刻》(1977—1978年)
26. 《拓扑学与时间》(1978—1979年)
27. 《解散》(1980年)

关于拉康研讨班的盛况和他的演讲风格，人们说得很多，这里引述几个人的描述。

鲁迪奈斯科说：

1951到1953年，研讨班在西尔维亚的家里举行。每周三拉康

评讲弗洛伊德的重要文本：《狼人》和《鼠人》……第一次分裂后不久，他移到圣安娜医院演讲厅，让·德雷把那里租给了他。十年间，他在那里以一种游移不定、时而支支吾吾时而兴奋有力、时而叹息时而犹豫的声调发出他的话语。对于他将要讲的东西，他会事先打出草稿，然后在听众面前即兴发挥，就像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一名演员……拉康的表演之所以如此夸张，就因为他是在宣讲真理，仿佛通过始终濒临于嘶哑的严厉声调，他就能像口技表演者一样使无意识的隐秘之镜得以复现，使无有终结的濒临崩溃的自控力的症状显示出来。他就像一个不会魔法的巫师，一个不懂催眠术的古鲁，一个不信神的先知，他以奇妙的语言吸引他的听众，在欲望的边缘唤醒启蒙的时代。

拉康不做分析，他只是联想。他也不详细说明，而只是发出回应。在实施集体治疗的每一次演讲中，他的学生都有一种印象，觉得导师就是在言说他们，就是在为他们而言说，以一种被编码的信息隐秘地向他们每个人单独宣讲。然后他们冲进最有名的书店去搜寻他提到过的每一本书，或啃噬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的某一段落。十年间，进而在二十多年间，这位主人掌控着法国弗洛伊德主义的劳作。^①

美国的拉康研究者斯图亚特·施奈德曼（Stuart Schneiderman）说：

（拉康的）“研讨班讲演”是一件大事，在任何的一次研讨班上，在会场内开动的录音机数量，比出席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或罗兰·巴尔特的研讨班的听众人数还要多。每次听拉康演讲的人大约有 800 之数，挤在一个只能够容纳 650 人的会场内。拉康的演讲是充满舞台风范的，举手投足，从容自若，而且直接面向观众，令每个人都产生他好像是同你单独谈话那样的感觉。他的演讲内容，经常是抽象和隐晦的，但是，聆听大师的亲口演讲，又会令人产生一种有幸参与了一件重要的、具有刺激性的文化事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 296.

件的感觉。^①

克莱芒则是这样描述 60 年代拉康在高师的讲演盛况的：

你必须很早就到那里：只提早一个小时几乎就找不到座位。我们这些未来的教授聆听拉康的讲座，仿佛他能为教授的世界——那正是我们将要从事的职业——提供一服强有力的解毒剂。1968 年 5 月已经临近，但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有一丝的预感。拉康的教学在形式上与法国大学最纯洁的传统完全一致，那些传统一直是大学皇冠上最明亮的珍珠。但我们对一个修辞学家的禁果有敏锐的嗅觉，这个修辞学家就在我们的教师以其古典主义、人道主义和无休无止的重复培育我们的地方攻击他们。尽管我们通常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至少这个伙计在说一些新的东西，有点罗曼蒂克，有点苦行主义，也有点艰涩。

演讲厅很快爆满。除精神分析学家和高师人——他们起先只是好奇，但很快就被征服了——以外，还有演员和作家。每个新的学期都会有新的面孔加入到人群中。而且每个新的学期菲利普·索勒尔斯一行人都会回来，他们的面孔也会几乎同步地发生改变……器材的改进也改变了一些东西：现在有了卡式录音机，演讲厅里布满了电线，我们很开心地用它们缠着脚。在拉康身边，他的秘书极其冷漠地站在那里看护，一名速记员在速记机上记录着拉康的演讲。就好像所有这一切设备还不够，人们还要做笔记：有人只是偶然记一记，有人决心点滴不漏，把每句话都记下来，如果偶然有一个字或一句话没听清楚，还要侧身问身旁的人。^②

类似的当事人描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引述。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结构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氛围。如同人们常常把 1966 年拉康《文集》的出版和热销看作一个文化事件一样，对于他的研讨班，我们亦可作如是观，尤其是第二次分裂之后在高师的演讲。只是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说它是一个“文化事件”，并不单单是

① 引自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7~8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② Catherine Clément,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Jacques Lacan*, pp. 12-13.

指它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而且还指这轰动所折射出来的文化意味。至少有两个方面是我们要明白的。

首先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精神分析文化的发展。与战前精神分析运动主要局限于其共同体的小圈子相比，战后尤其是五月风暴之后公众对精神分析学产生了一种文化需求，拉康的登高一呼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要知道，巴黎左岸区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就是所有新式的文化潮流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总是满怀无法满足的求知欲涌向一个又一个的演讲厅，去聆听最前卫的文化英雄的声音。

再就是它也反映了结构主义语境下人们对晦涩风格的某种崇拜。因为正如那许多的描述中所说的，前来参加研讨班的人当中绝大部分其实根本听不懂拉康在说些什么，可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要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晦涩远不只是一种文体风格，它本身就是“理论”，就是挑衅性的文本，是打破我们的语言无意识迷梦的利器；晦涩是语言的倒错，是欲望的倾覆，是不可能之真实的呈现，它与“革命”是等义的。所以，当拉康把他的晦涩与一种精神分析运作、与一种传召谕旨般的宣讲姿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所带来的无意识震颤无疑是巨大的。以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拉康何以如此抗拒人们“阅读”他的“文字”，而是要求人们去“聆听”他的“声音”，因为“阅读”常常会令我们把晦涩视作阻挡之墙——阻挡我们进入思想深处——而“聆听”则可以让晦涩直击我们的耳鼓，切断我们的意识，令我们在意识瘫痪的状态下去穿越自我和主体的幻象。拉康的研讨班讲演是一种没有断句的话语流，他以这种形式吸引着那些懵懂的人们走进他的分析室。这才是拉康真正具有诱惑性的一面，是他的集体治疗所欲望的效果。

本来拉康是很沉迷于自己的声音所制造的这种效果的，但随着参加研讨班的听众越来越多，随着人们对拉康的“阅读”需求的不断扩大，坊间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未经授权的讲演文本，拉康的“声音”注定逃脱不了变成“文字”的命运。出版研讨班讲演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可在此人们——包括拉康自己——遭遇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何种版本可视为是研讨班讲演的标准版本？因为拉康在演讲前通常会就所要讲的东西写出一个草稿，可在现场他常常又会脱稿即兴发挥，当然，在现场有专人进行笔录，还有听众的或详细或简略的笔记，后来还出现了录

音版甚至录像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与他的文字稿不同的口语记录稿，有时他还会把他的讲演稿修改后拿到杂志上发表，那么这众多版本中哪一个才是原始版本或标准版本呢？在研讨班讲演的出版过程中，拉康主义者围绕这一问题将引发诸多的讨论，且这些讨论时常与拉康主义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这样，研讨班讲演出版的历史成为了拉康研讨班的历史中深具意味的一章，鲁迪奈斯科在她的著作中给我们叙述了这一历史的某些过程和细节。^①

早在1953年，拉康在圣安娜医院刚开始其面向公众的研讨班时，就雇了一个速记员笔录他的讲演，这些笔录稿都交由瓦拉迪米尔·格拉诺夫管理，后者那时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资料室的负责人。一般地，只要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都可以去资料室翻阅这些讲演稿。三年后，让-贝特朗·彭大历斯经拉康的同意开始为当年的讲演整理出一个摘要，这一工作持续了三年，到1959年共整理了《对象关系》（1956—1957年）、《无意识的构型》（1957—1958年）和《欲望及其阐释》（1958—1959年）三期研讨班，并都在杂志上发表。

1962年开始，卡式录音机成为研讨班的记录工具，但速记员仍然保留着。从此开始出现依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讲演稿。拉康对这些整理稿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他既鼓励别人这样做，甚至自己还把讲演稿打印分发给他的信徒，因为这样可以强化信徒对他的移情，可同时他又担心别人因此更容易窃取他的思想——保罗·利科的“剽窃”事件让他的这种戒备心理越发强盛。60年代中期，随着拉康的研讨班移师到巴黎高师以及《文集》的成功出版，拉康成为结构主义大师，坊间开始出现研讨班讲演的盗版。这些盗版质量参差不齐，给拉康及其信徒带来了很大困扰，他必须考虑出版的问题了，他先后找了几个学生整理他的讲演，但都做得很不成功。出版事宜一拖再拖，难见下文。终于，1972年6月，雅克-阿兰·米勒与拉康的一次闲聊使问题的解决现出了转机。米勒后来回忆说：

在1973年我开始那一工作之前，拉康的许多学生已经问拉康

^① 参见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p. 413 - 427;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pp. 564-569.

他们能不能编辑出版他的研讨班讲演，但他们总想把速记稿重新编排或是把拉康所说的跟他们自己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因此拉康对他们的工作从未真正感到满意。他总是抱怨那个工作无法完成，甚至在他允许某些摘要不定期面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刚刚拒绝了由他以前的一个高师学生编辑（他为此花了一年的时间）的某一期研讨班的全稿出版，他告诉我说，这个工作应逐步进行。我说，它应当逐句地进行，每次讲演构成一章，既不有所遗漏，也不有所挪动。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可在当时人们还不认为拉康所讲的一切都值得记录下来加以研究。

当我说应当那样做的时候，拉康注视着我。我想大家都从他的注视中看出点名堂了。他注视着我，目光有点凝重，然后只说了两个字：“Prove it（证明看看）。”在他说“证明看看”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要亲自去做这件事。而在那一刻，我才明白了这一点。“证明看看”是下的一个挑战书。我相信他在我身上看到了那一欲望，同时，证明看看也是对证明我自己的一个邀请。进而，他以逻辑的语言说出那句话足见他是多么的狡猾，因为它就是以那种语言下的一个挑战书。他也是这样看出了我的逻辑的方面。他抓住了我话中的要害，向我发布了一道命令：“不要只是口头说说，付诸行动吧。”事实上，我只能通过付诸行动来证明它。^①

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启动了。米勒选择出版的第一个研讨班是1964年在巴黎高师的第11期《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这一选择并非毫无用意——对于米勒这个毛主义者，他在拉康学派内部的任何运作都带有“政治”的图谋——因为这是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决裂后入主高师的第一期研讨班，也是米勒以其形式化或科学化的阐释重写拉康主义的开端，是他介入拉康主义运动的肇始。接到任务后，米勒依据速记员的手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夜以继日整理出了一个版本。拉康看后表示认可。定稿交付色伊出版社，出版社很快起草了一份合同，计划采用单数的“研讨班”（The Seminar）作为这个系列的总称。拉康同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4.

意这个想法，但提出应该让系列的名称更明确一些，因此建议用“雅克·拉康的研讨班”（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作为总称；同时他还指出，米勒的作用被低估了，他要求和米勒共同署名，但被米勒拒绝了。米勒将作为编校者出现在封面，不过对于版税的份额，米勒没有拒绝。

1973年初，第11期研讨班出版。书中有一些严重的印刷错误，尤其是几个图表的错误令拉康十分恼火，但米勒的工作堪称上乘，包括拉康学派内部那些一贯敌视米勒的人都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议。紧接着，米勒着手他下一步的出版计划，一种米勒主义的阐释路线更加明确地显示出来。他以1964年为标志，把研讨班系列分成两个时间段：1964年以前和1964年以后，计划每次出版两个研讨班，一个按照编年顺序从1953年第1期开始往下逐期出版，另一个则从拉康最新一期的研讨班开始逐期出版。鲁迪奈斯科把这一双重时间的划分称为“米勒前”和“米勒后”，且不说这一叫法是否妥当，但米勒的用意的确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但米勒的这个计划仅仅执行了一次就终止了。1975年，第1期（1953—19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论技术》和第20期（1972—1973年）研讨班《再来一次》出版。这年1月，米勒的杂志《奥尼卡？》面世，他将发表拉康最新研讨班的计划纳入了杂志的运作，至拉康逝世时，《奥尼卡？》已发表的研讨班有第22期（1974—1975年）（发表于1975年）、第23期（1975—1976年）（发表于1976—1977年）、第24期（1976—1977年）（发表于1977—1979年）、第25期（1977—1978年）（发表于1979年，但只是部分）以及第27期（1980年）（发表于1980—1981年）。这样，每次出版两期的计划被打断了。到拉康逝世前，色伊出版社只在1978年又出版了第2期（1954—1955年），然后在1981年拉康逝世时出版了第3期（1955—1956年）。拉康死后，起初的安排就不再执行了，研讨班的出版不再依照特殊的时间次序：1986年出版了第7期（1959—1960年），1991年出版了第8期（1960—1961年）和第17期（1969—1970年），1994年出版了第4期（1956—1957年），1998年出版了第5期（1957—1958年），2004年出版了第10期（1962—1963年），2005年出版了第23期（1975—1976年），2006年出

版了第16期（1968—1969年）。还有十分重要的第6期《欲望及其阐释》（1958—1959年）于1981—1983年发表在《奥尼卡？》上。剩下的第9期（1961—1962年）、第12期（1964—1965年）、第13期（1965—1966年）、第14期（1966—1967年）、第15期（1967—1968年）、第18期（1970—1971年）、第19期（1971—1972年）、第21期（1973—1974年）、第26期（1978—1979年）还未整理出版（英语世界出版过其中的几种，都是译者自己编辑整理的，而不是米勒的“钦定版”），不过它们当中有一些以摘录形式在《即是》或《奥尼卡？》上发表过，这些摘录后来又被米勒收在2001年出版的《文集别章》中。今天，拉康所有研讨班的录音以及许多研讨班的文字稿在一些主题网站中都可以找到。

由于研讨班全都是拉康的口语讲演，米勒在编订它们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速记版本，加上拉康那巴洛克式的演讲风格和炫技式的知识跳跃，这类版本存在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对此，米勒做了许多技术处理，例如他清除了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删改了累赘重复的地方，并重新加以断句和标点，尽可能地使一种无法理解的话语变得可以理解。但他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加进了许多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在“研讨班”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米勒主义的拉康，他所提供出来的文本是一个经过了“阐释”的文本。正如鲁迪奈斯科在将米勒的工作和编辑《文集》的弗朗索瓦·瓦尔的工作加以对比时所说的：

弗朗索瓦·瓦尔通过他的编辑工作已经使《文集》的出版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事件，而雅克-阿兰·米勒对研讨班的编订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对于《文集》的出版，从来没有人产生过异议，尽管确实有许多批评，且可能是补充一些注释和不同版本来完善拉康的这本巨著的时候了。可即便出现了这样的修订版，它也应看作是瓦尔的原始版的延续。瓦尔版已经存在了20多年，从未有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过质疑，人人都确定地知道拉康是它真正的唯一作者，尽管上面留有瓦尔的痕迹。并且当研究者比较其中的文本的不同版本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觉得有必要怀疑那个确定的版本。从没有人想到要编辑另一个版本的《文集》，并敢说他的版本比瓦尔的版本更“真实”，属于拉康讲演的所谓原版。

瓦尔同《文集》的关系是一个自由人自由地运用他自己的判断的关系。他完全地使拉康作为一本书的唯一作者，使后者成为一个最终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思想体系的创立者。

“研讨班”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当米勒让拉康去接受一个可能的版本的挑战时，他就已经代表了对大师作品的一种米勒主义阐释。他不是像瓦尔那样的一个编辑，而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趣味和怀有家族利益的个体，并且不久便获得了共同作者的合约地位。他没有让文本以自身的形态变成文字性的存在，没有让自己与文本保持距离，而是合法地且在理论上拥有了整个作品。^①

米勒的编订工作还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文字版的研讨班都没有注释，没有参考文献，没有索引，也没有批判性的注解，包括对拉康明显的口误和记忆错误都没有加以订正或指明。他这样做看似是为了忠实于大师的原始声音，表明他所编订的这个版本的绝对原始性，而其实他也是为了表明这个版本的绝对权威性和唯一性。并且，为了强化这种绝对的权威性和唯一性，1978年，米勒说服色伊出版社对市场出现的各种研讨班出版物的发行人提起诉讼。这些出版物依据的是速记或录音记录，它们很早就市场上出售，一直都没有遇到所谓版权的法律问题。米勒为了强化他的理论立场和他的版本所拥有的法律效力，宣称那所谓的原始版本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他的被授权的版本是唯一真实的。法律自然是支持米勒的主张，市场上未经授权的同类出版物全被视作盗版遭到查禁，米勒的特权以法律形式得到重申，但这场诉讼也进一步加深了米勒与弗洛伊德学派成员之间的裂痕，他与其他拉康信徒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拉康在世时，研讨班共出版了四期（第1、2、11、20期），这四期在学派内部并没有引起抗议——只要拉康这个象征还活着，米勒所获得的授权就没有人敢去挑战。可拉康一死，王国的“宫廷”立现乱象。随着1981年第3期研讨班的出版，争论便出现了，米勒被指控用自己的定本去“冒充”研讨班，研讨班已经成为米勒阐释自己的理论的工具，而不再是拉康的原作，而米勒则极力以合法性来捍卫自己的权威，攻击

^①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p. 415-416.

那些反对他的人是权力的觊觎者。自那时开始，围绕着研讨班版本的争论在拉康主义圈子里持续了多年，这些争论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很少有真正严肃的科学探讨。

米勒的版本引起最多争议的是他对文本的处理方法。没有注释，没有注解，没有索引，没有文献目录，对于拉康的明显错误也不加纠正，这使得原本就十分艰涩的拉康话语更难以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于是，在80年代初，开始有人自动组织起来为一些研讨班编写人名及核心概念的索引，以期为阅读和研究提供方便。1983年，更有一帮人组成了一个整理拉康研讨班的学社，并创办了一个名为“Stécriture”的丛刊。所谓“Stécriture”，乃是“St.”（圣）和“écrit”（文集）两个词的合并，其意思大约相当于是拉康的“论语”吧。这个丛刊依据速记本整理发表了第8期研讨班《移情》的几次讲演，其中记录者和拉康本人的所有错误都被纠正，对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加了注释和注解，并提供了多个不同版本作为参照。丛刊出版后，被拿到市场上销售。这当然是不合法的。色伊出版社和拉康的家人又一次提出了控诉，1985年，法庭的判决下来了，结果可想而知，米勒又一次取得胜利。在版权问题上，反对者们是不可能获得法律支持的。

1986年，米勒编订的第7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出版，这一次，米勒的敌人没有实施太多的攻击，他们受官司失败的影响，选择了沉默。但是，这期研讨班定本的错误比以往的更多。米勒可能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给一位希腊专家寄去了一本样书，希望他读一下其中有关安提戈涅的三次讲演。这个专家读后发现每页至少有两个错误，除引文错误和印刷错误以外，希腊术语的使用也是错漏百出。专家于是提笔给米勒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列出错误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可他没有收到米勒的任何答复。事后不久，希腊专家碰到了米勒的妻子朱迪丝，向她提到那封信的事，而朱迪丝回答说，他们根本没有收到那封信，并请他重发一封。这位教授真的又写了一个自己的意见寄给了米勒，这一次仍然是石沉大海。也许德里达是对的，在回应拉康对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讨论时，他针对拉康讲演结尾的那句话“（被窃的）信总是会抵达它的目的地”回敬说：有些信是从不会到达目的地的。

其实，指出这类错误的人不只有这位希腊专家，还有一位语义学家曾告诉米勒，第2期至少有二十几处笔误，第3期至少有17处关键错误和21处小错误，还有79处印刷错误，第7期有25处关键错误、43处小错误和72处印刷错误。可是，米勒似乎是有意要把这些错误保留在文本中，将它们视作原始的诞生创伤一样的东西来铭刻文本的权威性和原始性。例如第1、2期研讨班的英译者约翰·弗里斯特（John Forrester）在他的译本（都出版于1988年）中不仅纠正了拉康的所有错误，而且补充了注释、索引和文献目录，米勒看到后十分生气，要求译者删除注释，恢复拉康原有的错误，尤其不允许出现“拉康此处有误”、“法语文本是错误的”这样的评注。米勒如此霸道地行使其作为合法继承人的特权，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把拉康变成米勒主义的拉康。

1991年初，第8期和第17期研讨班出版。编辑方法一如从前，且同样是错误百出。很快地，那个拉康“论语”小组在他们的丛刊上刊发了米勒版第8期研讨班的错误列表，其中包括记录错误、外文引用的错误、拉康自己的口误等等共计587处。并且这一次，反对者们还采取了新的策略，利用媒体的力量对米勒施加压力，一些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以及非米勒派的拉康主义者联名发了一个请愿书，要求所有研讨班的文字版附上文献目录和注释，以便于人们查阅和研究。米勒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他拒绝介入科学争论，而是一味把反对者视作自己的“政敌”加以攻击。对于这种无谓的政治性争论，我们在此没有必要多谈，反正类似的争论在法国精神分析政治中是家常便饭，拉康学派包括拉康本人尤其热衷和擅长此道。

第二节 研讨班的演进

在研讨班讲演还未全部整理出版之前，要完整地谈论“研讨班的演进”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这里，我只能对拉康研讨班的阶段性语境做一描述，这个描述可能是粗略的，但它对于我们把握拉康思想的发展应当有所帮助。

有几个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

首先是研讨班与弗洛伊德文本的关系。一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拉康把“回到弗洛伊德”视作是他的事业的锚定之地，而对于他而言，“回到弗洛伊德”既是指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回到那些文本的原初语境去对其进行重读，也是指回到弗洛伊德理论本始的意义与精神，回到其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内核。但不论是哪一种，它都不是对某个本源的简单返回或还原，相反，拉康所要做的是一种理论的穿越，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文本和理论更像是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引导着拉康的行进，而在这行进的路途，则是精神分析领域以外的分析技术和理论参照的不断介入，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介入，弗洛伊德的文本和精神分析理论得以被不断重述。

然而，拉康向弗洛伊德文本的这个返回只坚持了十年，即前十期研讨班，在那里，他每一期都特别地对弗洛伊德的某些文本进行重读，而他自己的理论阐述也都围绕着这些文本的问题展开。而自1964年第11期研讨班开始，这种直接的文本阅读便越来越少，到70年代的研讨班中，则更多地是拉康对自己的理论的重述或改写，对弗洛伊德文本的仔细阅读几近消失。但即便如此，对拉康研讨班的阅读也不能脱离弗洛伊德的文本或主题，总之，对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与拉康研讨班的关系，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要把握拉康的阅读技术，要理解每一次阅读的具体语境，抓住拉康进行阐释和发挥时的逻辑。

其次是研讨班与《文集》的关系。出版于1966年的《文集》收录了1936—1965年的各类文章共28篇——若加上附录中的一篇就是29篇——其中与研讨班的时间段重合的篇章占据了约四分之三，而在这四分之三的文章中，又有很多乃是对新近一期甚或多期研讨班内容的提炼，因而与研讨班之间有一种互文性的关系。那么，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两类文本的参照性关系呢？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如何阅读拉康》（2006年）一书中曾就这个问题有一段论述：

拉康的研讨班与《文集》的关系就如同治疗中受分析者的话语与分析师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在研讨班中，拉康表现得就像一个受分析者：“自由联想”、即兴发挥、跳跃、对公众宣讲，公众由此而被置于一种集体分析师的位置。相较而言，他的论文要更为凝练、更加公式化，它们抛给读者许多不可阅读的、模棱两可的、时常像

神谕一般的命题，要求读者由此而开始他的工作，去把它们转译成明确的论题，并为它们的含义提供例证和逻辑的证明。与通常的学术程序相反，在那里，作者阐发一个论题，然后试图通过论证来维系它，而拉康不仅把这一工作留给了读者，甚至还经常要求读者在众多相互冲突的论述或某个含混的神谕般的论述中去决定拉康实际的论题究竟是什么。在这一确切的意义上说，拉康的《文集》就像是一个分析师的评论，其目的不在于给受分析者提供现成的意见或陈述，而在于给受分析者设置工作任务。

那我们该读什么以及如何去读？是《文集》还是研讨班？唯一恰当的回答就是那个流传的“茶还是咖啡”的笑话的一个变体：是的，请便！你应当两个都读一下。如果你直接去读《文集》，那会一无所获，所以你应当从研讨班开始——但不能止于研讨班，因为如果你只读研讨班，你同样会一无所获。认为研讨班比《文集》更加清晰、更为透明，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误导：它们常常是摇摆不定的，常常实验着不同的研究路径。恰当的方式是先读一期研讨班，再去读相应的论文以便“领会”研讨班的要点。我们在此论说的是 *Nachtraeglichkeit*（累赘的翻译是“延宕的行为”）的时间性，这一时间性恰好与分析治疗本身相对应：《文集》明确清晰，提供了准确的阐述，但我们只有在阅读了提供背景的研讨班以后才能理解它们。有两个明显的例子：第7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与《文集》中对应的《康德同萨德》，第11期研讨班《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与《文集》中的《无意识的位置》。^①

齐泽克用受分析者与分析师的关系类比研讨班与《文集》的关系，这个巧智的类比固然新颖，但用处不大。不过，齐泽克主张在研讨班与《文集》之间做对比性阅读，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实际上，齐泽克所说的那种对应有很多，如《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1956年）对应第2期；《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年）对应第1、2期；《典型疗法的变体》（1955年）对应第1、2期；有关伊

^①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pp. 128–129.

波利特的两篇文章对应第 1 期；《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 年）和《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初始问题》（1958 年）对应第 3 期；《菲勒斯的意义》（1958 年）对应第 4、5 期；《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1960 年）对应第 5、6 期；《康德同萨德》（1963 年）对应第 7 期；《无意识的位置》（1960 年）对应第 11 期；《科学与真理》（1965 年）对应第 13 期；等等。对于这种对应，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集》的文本是对研讨班的缩写或浓缩，因为拉康的每期研讨班涉猎的主题甚多，而论文则相对集中于某一个主题。再者，拉康在研讨班中喜欢以回溯的方式复述、修正或重写此前的理论，就是说，体现在研讨班中的思想是流动的、不断繁殖的、没有终结的，同时也是循环回复的、交错分叉的和叠加的，这意味着，内容相对凝定的论文更多时候像是研讨班的一种旁白，没有研讨班的参照，它们的位置将难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把《文集》和研讨班的互文性关系视作一种回溯性而非单一增补性的参照关系。再有一点，由于 60 年代中期以后拉康的思想有很大转变，所以《文集》并不能涵盖晚期拉康研讨班的内容，不妨说，《文集》的拉康是一个古典的拉康，一个结构主义气息较为浓重的拉康，而 70 年代的研讨班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形象构成了一种倾覆。

再就是各期研讨班之间的联系。拉康在他的研讨班中不仅要回到弗洛伊德，还要不断地回到拉康自身，所以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总能看到一种未来的预期，也总能看到一种已然的回溯，他总是以重述的方式回到曾经的主题，而每一次的返回又构成对已然存在的东西的一个重写，并且也只是一个“重写”，而不是“完成”。这表明，对于拉康的近 30 期研讨班，我们需要把它们看作一个开放的总体，也就是说，对于他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我们需要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来理解。如同对无意识症结的分析是一个无有终止的过程一样，拉康的理论宣讲也总是处在意义的不断延宕之中。

如同对弗洛伊德的返回一样，拉康对自己的返回不是理论的重复或复述，但也不是完全的断裂和自我否定，而是理论机器的一种叠加，是随不同界面或不同问题的引入而引发的不同理论效果，所以，把拉康的研讨班看作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总体，意味着对拉康理论做全面、系

统的讨论是不可能的，意味着我们对他的每一种阐述或返回都只是暂时的意义凝定。

最后是研讨班分期的问题。拉康近三十年的研讨班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演进？这个问题在拉康学派当中讨论得比较多，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是把拉康的研讨班分为三个阶段，但接下来在如何划分这三个阶段的问题上，各人因取舍标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例如，齐泽克依据对死亡驱力的不同界定而将研讨班划分出三个不同阶段：

在第一阶段（研讨班报告 I，《言语和语言……的功能和范围》），它表现为黑格尔的现象学观念——词语是死物，它谋杀了事物：一旦现实被符号化了，陷入了符号网络之中，事物本身就会呈现于词语、概念之中，而不是呈现于直接的物理现实。更确切地说，我们无法回到直接的现实之中：即便我们从词语回到了事物——例如，从“桌子”这个词语回到物理现实中的桌子——桌子的表象也已经打上了某种短缺的烙印——要想知道真正的桌子是怎样的，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求助于词语，词语暗示了事物的缺席。

在第二个阶段（拉康对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解读），强调的重点已经从单词、言语转向了语言，语言是共时性结构，是无感知的自治机制，它把意义作为自己的结果制造出来。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拉康的语言概念基本上还是一个现象学概念的话（拉康不断地重复这一点——精神分析领域就是意义的领域，即 *la signification* 的领域），那么我们在此看到的是“结构主义”语言观，它把语言视为分化的因素系统。死亡驱力现在被等同于符号秩序本身：用拉康自己的话说，它“不过是符号秩序的一个面具而已”。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意义体验的想象层面，与制造出意义体验的想象层面的无意义的能指/意指机制之间的对立。想象层面是由快乐原则所支配的，它努力寻求动态平衡，而处于盲目自动调节中的符号秩序总是干扰这一动态平衡：它就是“超越快乐原则”。人一旦陷入了能指网络，这一网络就会对他产生禁欲效果；他就会成为陌生的自治秩序的一部分，不断地干扰其自然性的动态平衡（例如，通过强制性的重复）。

在第三个阶段，拉康教学的主要重点放在了作为不可能的实在界上面，死亡驱力再次根本性地改变了其含义。这一改变，可以通过快乐原则与符号秩序之间的关系，极其轻而易举地检测出来。^①

齐泽克还依据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后时刻”的认定来解释这三个阶段说：

在第一阶段，重点放在了词语上，词语是主体间欲望识别的媒介，征兆被设想成白点（white spots），设想成主体历史的非符号化的想象性因素，而分析的过程就是将其予以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将其融入主体的符号世界的过程：分析将为一开始即表现为无意义的踪迹的事物，回溯性地提供意义。所以，当主体有能力向他者连续地叙述其历史时，当主体的欲望融入了“完整言语”（parole pleine）也能从“完整言语”中识别出来时，精神分析的最后时刻就来到了。

在第二个阶段，拉康设想符号秩序对于主体具有禁欲效果，并把一个创伤性损失强加于他——这一损失、这一短缺的名字当然是阉割——当主体准备接受这一根本性损失，准备同意进行符号性阉割，以此为代价换取对于欲望的接近时，精神分析的最后到来了。

在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大他者，符号秩序，在其内心深处存在着创伤性因素；在拉康的理论中，幻象被设想为允许主体与这一创伤性内核予以妥协的建构。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分析的最后时刻被界定为“穿越幻象”：不是对它进行的符号性阐释，而是对下列事实的体验：幻象客体以其诱人的呈现，只能填补他者中的短缺、空隙。幻象的“后面”一无所有；幻象是一种建构，其功能就是要隐藏这一空白、这一“一无所有”，即隐藏他者中的短缺。^②

严格地说，齐泽克的这个划分主要针对的是 60 年代之前的研讨班，且他对拉康的阅读有一个关键的切入性文本，那就是讨论精神分析伦理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80~181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引者对文中个别字词做了改动。

^② 同上书，183 页。

学的第7期研讨班，就像他所说的：“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由拉康总结出来的精神分析伦理学的格言（‘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完全契合了精神分析过程的结束时刻，‘穿越幻象’：我们决不能对之做出让步的欲望，并非由幻象支撑的欲望，而是穿越幻象的他者的欲望。‘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意味着完全放弃那建立在幻象脚本基础上的丰富多彩的欲望。”^① 他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无疑与自己的这一逻辑论定有关。可问题在于，他的这个划分如果用来说明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拉康研讨班倒是很恰当，但肯定不适合描述拉康的所有研讨班。

再如维罗尼奎·沃鲁丝（Véronique Voruz）和博格丹·沃尔夫（Bogdan Wolf）——这两位伦敦分析家都是米勒于1992年创立的自称“新拉康学派”的“世界精神分析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Psychoanalysis）的成员——也把拉康的研讨班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持续十年，且各以“三界”体系中的某一个界域为中心。按照他们的说法，拉康教学的第一个阶段（1953—1963年）关注的是“镜像阶段、自恋、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的构型”，在这个阶段，拉康“依据对称性他者之间的竞争重述了自我所提出的临床问题，重述了由爱、恨以及无知这三种想象性的激情所产生的障碍，重述了想象轴上自我力比多的可逆性，以及在分析移情中想象轴的侵入”^②。在第二个阶段（1964—1972年），随着对象 a 这个“实在”概念的提出，象征界成为关注的中心，“从第11期研讨班开始，拉康一直着手思考在大他者或象征秩序中定位主体的参数。主体的已经与其想象性构成物结合在一起的象征坐标，现在也随这一残余的实在而获得说明。由于对结构和定位的这种关注，拉康着手思考异化和分离的十分有用的逻辑运作，并把这两者同症状和幻象的概念关联在一起”^③。第三个阶段始于1973年的第20期研讨班，这是拉康教学的“晚期”，其所关注的是不可能的实在，“在这个阶段，原乐成为人类生存的特征。原乐不仅扰乱和倾覆了象征性的平衡和比例的快感原则，而且成为对于言语来说特殊的和必要的组成部

①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66页。

② Véronique Voruz and Bogdan Wolf (eds.), *The Later Lacan: An Introduction*, pp. viii-ix,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③ Ibid., p. ix.

分，后者现在被看作是原乐的承载物。言语的象征功能不是减少原乐而是产生原乐”^①。

很显然，沃鲁丝和沃尔夫的这个划分过于简单化，且不符合拉康思想发展的逻辑。就“三界”的角度而言，拉康对它们的阐述从来不是单独地进行的，而是一开始就把它置于了一个共时态的交互作用中，只是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转移。真正说起来，拉康对想象界的阐述在研讨班开始以前就已近完成，50年代虽然还在继续且有所补充，但研讨班的侧重点已转向象征界，转向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关系；60年代初随着关注的焦点转向实在界和对象 a ，实在界与象征界和想象界的关系成为这个时期研讨班讨论的主要问题；到70年代，原乐的问题成为关注的重心，围绕这个重心，“三界”的拓扑学进一步得到重述。

齐泽克等人的这些划分犯有一个通病，就是想在一个逻辑的框架里对拉康研讨班的时间性进行“音节分析”，而问题在于，拉康的研讨班存在这样一个节奏性的时序吗？要知道，自50年代开设研讨班开始，拉康的思考一直是致力于分析技术的理论化和分析理论的技术化，这是他的目标所在；而这一目标又被嵌入一个以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为框架的结构模型中，不同的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要纳入这个“三界”来讨论；进而，虽然从时间上看，拉康在不同时段的侧重点经历了从一个界域到另一个界域的转移，但从“三界”框架作为一个共时系统的层面看，这个转移与其说是侧重点从一个转到另一个，不如说是阐述“三界”的认识论模型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并不完全遵循时序的节奏，而是像一个连通器，前后时期总是在某个交叉点上以重述的方式发生分形。这样，在拉康的研讨班进程中，处在不同认识论模型中的同一个问题常常会导出不同的结论和意义效果。因此，逻辑时间的分期固然可以让我们对拉康的研讨班获得一个清晰的线索，但容易导向对拉康的“疑难”的省略，而疑难和悖论正是拉康理论的一个典型特征。

下面，我将试图对拉康研讨班的进程给出另外一种描述。基于上面所说的分期的困难，我选择了一条取巧的路线，即依据研讨班地点的转移来描述它的进程：1953—1963年的第1—10期为圣安娜医院时期；

^① Véronique Voruz and Bogdan Wolf (eds.), *The Later Lacan: An Introduction*, p. ix.

1964—1969年的第11—16期为巴黎高师时期；1969—1979年的第17—26期为法学院时期。如果你非要说这还是一种分期，那也是一种非逻辑的分期。并且我在这个分期下所要描述的主要不是理论的逻辑演进，而是拉康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语境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他的话语的影响，因此我不会去逐一叙述每一期研讨班的具体内容，而是会专注于他进入问题的方式或认识论模型的变化。

首先是圣安娜医院时期。这个时期正好贯穿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整个历史，就是说，这个时期正是拉康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因为技术问题而发生政治冲突的时期，也是他以语言学转向来革新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时期，这一语境对于拉康研讨班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三个相互重叠的方面：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以及在语言学基础上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述。

第一，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重读。这一重读既涉及弗洛伊德的理论文本，也涉及弗洛伊德的技术文本以及病例分析。这个时期的每期研讨班都会重点讨论弗洛伊德的一个或多个文本：第1期的研讨文本主要是弗洛伊德在1904—1919年写的有关分析技术的论文^①；第2期主要涉及弗洛伊德写于20年代的三部著作：《超越快感原则》（1920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和《自我与本我》（1923年）；第3期讲的是弗洛伊德在1911年写的一个病例研究，即著名的施列伯病例；第4期也是一个病例分析，即“小汉斯”的病例；第5期涉及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无意识运作机制的文本；第6期讨论了弗洛伊德的两篇短文

^① 拉康依据的是1953年出版的题为《精神分析技术》的法文版，该版本收录了弗洛伊德1904—1919年间的相关论文共计十二篇，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程序》（1904年）、《论心理治疗》（1905年）、《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展望》（1910年）、《“野性的”精神分析》（1910年）、《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1911年）、《移情动力学》（1912年）、《对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医生的几点忠告》（1912年）、《治疗初始（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一）》（1913年）、《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二）》（1914年）、《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三）》（1914年）、《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体验调查》（1914年）、《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进展路线》（1919年）。拉康认为这些论文尤其写于1904年至1909年间的论文是弗洛伊德思想发展的中间步骤，对于理解精神分析实践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东西的逐步出现，如“对分析治疗的操作模式至为基本的概念、抵制的概念和移情的功能、移情中的操作与介入模式，甚至还有移情神经症的基本地位”（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 8）。

《哀悼与抑郁症》(1917年)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年);第7期主要考察了弗洛伊德早期的《科学心理学纲要》(1895年)和晚期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第8期是弗洛伊德有关移情的文本;第9期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第10期则与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与焦虑》(1925年)有关。这里的列举并不全面,但仅此也足以看出拉康为“回到弗洛伊德”而做的努力。

第二,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前面说过,拉康对弗洛伊德文本的强力性重读既是为了重启精神分析理论的革命性维度,也是为了对抗自我心理学派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主义改写。所以在前10期研讨班中,拉康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批判自我心理学派——但也包括对象关系学派——的理论和技術,尤其关注了自我心理学派的自我理论和治疗中的移情与抗拒的问题。有关这个批判,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较为集中的交代,尽管在那里我没有太多地引用研讨班的材料。

第三,对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重述。弗洛伊德称精神分析的技术是谈话疗法,拉康据此读出了两点:一方面它表明言语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唯一媒介,主体的无意识必要在言语中且通过言语呈现出来,所以运用语言学的模式去重述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和必需的;另一方面它还表明分析关系必定涉及主体间的关系,而主体间的关系又因语言维度的介入而关联着诸多的方面,要说明这诸多的方面,就需要借助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这个“三界”框架,就是说,对精神分析学的重述必定要在“三界”框架的范围内进行。

总体上,在第1—10期研讨班中,拉康重述的重点不外乎四个最基本的方面:无意识的构成、主体性的认同、欲望的辩证法和分析师的位置。不过,这些方面在许多地方是相互交叉的,比如无意识的构成,它既是对无意识机制的说明,也是对主体性的认同的说明,而主体性的认同又必定涉及欲望的辩证法,也涉及分析过程中受分析者与分析师的关系,涉及分析师的伦理位置。所以,在阅读拉康的研讨班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处理连通器一样,知道如何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进行拓扑式的变换。

当然,上面说的四个基本方面只是一个轮廓,实际上,在拉康的重述中,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了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比如在无意识的构成

中，拉康的基本观点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而在这个观点的下面，隐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对索绪尔能指理论的改写；无意识的构成及运作的能指法则；主体在他者场域中的结构化；主体的分裂等。又如在主体性的认同中，既涉及主体（自我）的想象性认同（理想自我），也涉及主体的象征性认同（自我理想），还涉及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而在欲望的辩证法中，拉康不仅引入了需要—要求—欲望的三元组概念，还引入了他者欲望的维度；同时，欲望的辩证法亦可看作是主体认同的辩证法，在此拉康又引入了精神分析经验中的俄狄浦斯阶段，并把一系列的问题扭结于其中：母亲的欲望、菲勒斯、阉割、父之名或父亲功能、主体性的构成、主体性别位置的确立、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 a 、焦虑等等。至于在分析师的位置中，虽然无意识的构成、主体性的认同和欲望的辩证法皆与之有关，但所集中的焦点主要是受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的移情关系以及分析师在这一关系结构中应当占据的伦理位置。

进而，上面的所有四个方面以及每一方面所涉及的问题都离不开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界”框架，正如拉康自己说的：“没有这三个体系对我们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弗洛伊德的任何技术和经验。”^① 所谓“三界”，简单地说，是构成主体性存在的三个界面，也是在主体身上交互作用的三种秩序，同时还是拉康借以思考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技术的基本认知框架，是他对精神分析经验进行形式化和科学化处理的手段，当然也是他用来克服形形色色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局限的武器。

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作为一个三元组的体系是 1953 年首次提出的，拉康不仅用“三界”去处理精神分析的经验 and 理论，也用“三界”的交互作用去说明精神分析的技术运作，但在不同时期拉康对“三界”本身有不同的运用。在 50 年代的研讨班中，他主要集中于说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功能，并较为关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互运作，到 60 年代初，随着拉康的兴趣点渐渐转向实在界，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交互运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 73.

作受到重视。而由于这一转向，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述也越来越激进，批判意识越来越强。

接下来是1964—1969年的巴黎高师时期。由于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彻底决裂以及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分道扬镳，拉康研讨班的地点移到巴黎高师，由此而来的是研讨班听众结构的变化；与国际协会和法国学会决裂后，拉康创立了自己的弗洛伊德学派，由此形成了新的学派政治环境，拉康迫切需要以真正主人/导师的身份为新学派确立可用来集体移情的幻象；阿尔都塞和雅克-阿兰·米勒等人所阐释的拉康主义意味着拉康作为“法国的弗洛伊德”的主体性身份开始被指认，也让拉康更激进地认识到革新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紧迫性；还有1966年《文集》出版的成功和1968年五月事件的推动，拉康的大师/主人形象进一步得到强化，而他自己似乎也沉浸在这一主体性的幻象中享受着某种快感满足，由此一种带有妄想性质的精神分析政治开始愈演愈烈。在这一情境中，拉康的研讨班似乎成了他者政治的一个表演场所，一方面他在欲望着他者的欲望，而另一方面他也把自己当作他者的欲望对象。

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拉康在巴黎高师时期返回弗洛伊德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圣安娜医院时期的“回到弗洛伊德”至少在文本的阅读上还体现了某种向源头的“返回”的话，那么，在巴黎高师时期，拉康则在回归的名义下更明确地走向了对弗洛伊德的“超越”，米勒称其为一种“内部的超越”：“不是置弗洛伊德于不顾的那种超越，而是在弗洛伊德之内进行的超越。”^①拉康不再像以前那样围绕弗洛伊德的某一个或几个文本来组织自己的研讨班，而是以自己的概念和逻辑来挖掘弗洛伊德理论中所没有言及或未能言尽的东西，虽然仍在使用弗洛伊德的某些术语，但现在完全是以拉康的方式进行重写，且许多时候是对自己的重写。这种激进姿态在高师的首期研讨班中就已经有所显示，在那里，对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的阐述实际已经成为拉康版的拉康主义的经典版本。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8.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巴黎高师“分析手册”派的进入，把拉康带到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弗雷格的算术理论、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以“逻辑实证主义”得名的维也纳学派对知识确定性的寻求等等，这些都让拉康领略了科学性的魅力，他要把这种科学性引入精神分析学，对精神分析的经验与实践重新进行形式化和科学化的阐述。就这样，圣安娜医院时期的拓扑矩阵开始被各种拓扑变换所取代，如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曲面等等。现在几乎每一期都置入了一些令人头疼的科学伪形，它们成为这个时期的研讨班最具特色的知识作料。

与这一形式化和科学化的动机相适应，与时代对结构/后结构主义写作风格的迷恋相适应，当然也与研讨班易地后听众构成的变化相适应，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问题成为贯穿这个时期的基本问题，从1964年的第11期到1968—1969年的第16期，几乎每一期都关涉着这个主题，就像布鲁斯·芬克所说的：“在这一期〔即第11期〕及接下来的几期研讨班中，拉康关心的是在科学的内部或外部来定位精神分析学的地位，这必然地使他要去做一种理论，以说明科学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构成了科学、一种科学领域是如何被建构的、科学的对象是什么等等。拉康在此关注的是确定精神分析‘知识’以及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至为关键的那种真理的本质和地位。”^①

在以前，“三界”框架主要用来说明主体性的认同、他者的法则、分析中的移情以及欲望的辩证法这类问题，现在，对象 a 、原乐以及幻象的逻辑成为各期关注的中心，此前的问题都在这些新概念的结构中被重述，“三界”的拓扑学中实在界与象征界和想象界的交互作用成为关键。例如，在第11期，对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无意识、重复、移情和驱力——的阐述最终都要指向属于实在界的对象 a 的功能；在第12期，关键问题（该期的主题为“精神分析学的关键问题”）依然是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依然是无意识主体的离心结构，但不再是以语言学模型的能指逻辑来说明的，而是以莫比乌斯带和曲面拓扑来重述的，并通过这一重述，穿越主体的幻象被确立为分析的目标；在第13期中，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p. 57.

重提了莫比乌斯带、曲面等拓扑学模型的意义，即它们不是结构的单纯隐喻，而就是结构本身，“精神分析学的对象”（该期的主题）必须在这些模型中获得理解，各类对象 a （排泄物、乳房、凝视、声音）必须在这些模型中被结构化；在第 14 期“幻象的逻辑”中，拉康提出，要理解基本幻象的结构，就必须确定对象 a 的逻辑地位，而那只能借助拓扑学模型才能完成，同时，在这一期，拉康依照幻象的逻辑重新讨论了笛卡儿的我思主体、他者的欠缺以及主体性别位置的确立等；在第 15 期，再次讨论了第 14 期言及的主体性别位置的问题以及第 11 期阐述的移情及分析师的欲望的问题；在第 16 期，拉康又回到了他者之欠缺、欲望和原乐的问题，并通过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阅读提出了剩余原乐的概念，然后以剩余原乐对对象 a 的功能和性关系重新加以界定。拉康的所有这些讨论都充满了先锋理论的特色，一种疑难和悖论的风格让每一个概念都指向没有结论的意义延宕。

高师时期是拉康理论最具活力的一个时期。对象 a 、原乐、幻象的结构、驱力的机制、分析师的欲望、主体的性别位置以及“三界”的拓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拉康理论的高级教程，圣安娜医院时期的古典拉康现在需要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曾经的认同、移情和欲望辩证法现在需要依照不可能性的逻辑、剩余的逻辑、非对称的逻辑来重新阐释，现在挂在拉康口头的常常是这样的东西：主体在能指中意义缝合的失败、能指切割的剩余、原初对象的永久失落、不可能的对象的返回、主体在凝视中的陷落、性关系的不可能性等等。

最后是 1969—1979 年的法学院时期。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开启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时代，到 70 年代初，一种“精神分析文化”已渐成气候，拉康主义也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可另一方面，拉康学派的内部政治也愈演愈烈，有时，权力的斗争不免让学派的撕裂带有些许残酷的意味，拉康虽然名义上还是学派的绝对主人，但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已让他回天乏力，他的权力正渐渐被边缘化。

1969 年，拉康被逐出巴黎高师，研讨班再次易地，迁到了先贤祠附近的法学院。拉康又一次发挥其迫害妄想的逻辑，把这次驱逐再度想象为建制的迫害，并将再度在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的“迫害与写作技艺的关系”——拉康曾在《字符的代

理作用》一文中提到过列奥的这个问题^①——中来倾覆自以为知的主体的位置。与此同时，作为对五月风暴的一种回应，法国政府在文森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实验性大学——第八大学，在福柯主持的哲学系的资助下，成立了法国的大学里的第一个精神分析学系，拉康派成为这个阵地的主导。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在1969年的新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学的另一面》中，拉康承接上一期研讨班讨论过的主题——大学话语、知识与原乐的关系、剩余原乐的生产等等——一上来便围绕知识与原乐的关系讨论了包括大学话语在内的四种话语，即主人话语、大学话语、歇斯底里话语和分析家话语，讨论了这些话语之间的结构转换。精神分析学的政治维度在此得到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新一期的研讨班中，拉康特别地讨论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著作《逻辑哲学论》（1921年）。不管学院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这部作品怎样的喋喋不休，反正在拉康眼里，它就是一部关于“分析”的著作：从分析“世界”开始，转而分析“思想”或世界的逻辑表现，再分析“命题”（即思想的逻辑形式）与命题的“意义”，最后获得了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剩余”——世界上存在着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对于这个不可言说的神秘，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拉康把这个不可言说的神秘解释为追求原乐的欲望主体必要遭遇的那个创伤性内核——欲望的不可能的对象。“唯一的意义就是欲望的意义。这便是人们在读过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以后所能说的东西。唯一的真理就是被言说的对欲望之欠缺的欲望所掩盖的东西——为的是显明他正在寻找的东西——的真理。”^② 这真理不可言说，但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它是“可显明的”——可以用一种形式化来显明，使之成为可传达的。拉康现在要借用话语的结构来传达其精神分析学的秘义，因为在这个构建社会联系的

^① “值得花点时间读一下列奥·斯特劳斯的著作，他在那块传统上为选择自由的人提供避难所的土地上反思了写作的技艺与迫害的关系。通过沉思把这个技艺和这个条件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同质性，他让我们得以窥见到此处以真理的效果将其形式强加于欲望的东西。”（Jacques Lacan, *Écrits*, p. 423.）

^②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VII,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p. 61.

结构中，代理、他者、产品、真理四个位置分别为主能指、知识、原乐、主体这四个变项依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配置在一起，从而形成不同的话语形式，各自显示出主体之言说与无意识真理的不同关系。就这样，曾经相对分离的主题现在被扭结在四种话语结构中反复地重述。拉康现在不再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去对创始之父进行创造性的重写，而是径直以“回到拉康”作为目标去完成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法学院时期的拉康已是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在研讨班上，他的语调更加深沉，语速也更加缓慢，说话的节奏也不如以前那么流畅连贯。但他的教学风格却变得更加诡异，自造的新词一个接着一个，语义的叠加和联想越来越不着边际，有时直接的言说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是在黑板上划满各式各样缠绕的“纽结”，他开始创造一种“拉康数学”。这位博学与巧智的大师在言说不可言说的神秘时终于向世人道明了1966年《文集》开卷语中说到的“风格即人”的格言的真实含义。

70年代的拉康与其说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不如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炫技的艺术家，曾经的“三界”拓扑学现在以“波罗米结”和“纽结”的形式玩得花样百出，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数学，而更像是荷兰版画家艾舍尔（M. C. Escher, 1898—1972）画的那些富有创意的图画。虽然拉康时常煞有介事地声称拓扑学不是结构的象征，而就是结构本身，虽然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其精神分析学的拓扑化形式，可我们大可不必把他所说的一切都当真，因为那不过是他用来捕获我们的欲望的伎俩，那只是大师的狡黠。

当然，70年代的拉康也有灵光乍现的时刻。其中第20期研讨班《再来一次》（1972—1973年）和第23期研讨班《症候》（1975—1976年）就是这个时期难得的佳作。前一期的主题是“女性性欲”，实际讨论的仍是主体性别位置的确立，但现在的立足点是他者的原乐，而不是以前的菲勒斯能指和对象 a ；后一期的主题是症状，通过对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的作品的阅读，拉康思考了语言、心理结构的纽结和写作的关系，思考了主体的创伤、原乐追求和自我创造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了，把拉康的研讨班分为圣安娜医院时期、巴黎高师时期和法学院时期是一个讨巧的做法，但这样做也是别有用心，即提防我

们轻易地滑向对研讨班的历史进行逻辑主义的划分，或是简单地在“断裂”的意义上区分出所谓的拉康Ⅰ、拉康Ⅱ、拉康Ⅲ甚至更多。我已经强调了，对于拉康的研讨班进程，我们更应当视作是新的概念的不断叠加、同一概念在不同界面的不断重述、不同概念或理论的相互交叉与变换的过程，是拉康对弗洛伊德和自己不断地返回和宕出的过程，是拉康让自己的精神分析学朝向无限可能的过程，这一切都意味着，拉康的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特征，那就是它对抗有关于它的所有封闭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如果无有终止的分析即是精神分析学的命运，那么，拉康在其研讨班中宣讲的无有终止的理论就是他向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学效忠的最佳见证。

第三节 科学的伪形

单就写作作为一种技艺而言，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代可以说是把这种技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一定程度上，他们其实也是杰出的文体学家和修辞学家，他们的写作浸染了一种强烈的先锋意识，对他们而言，先锋不只是一种姿态，也不只是一种风格，而就是一种精神，他们在风格化的写作中实现着对日常意识和日常思维的跳跃。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神话学第一卷《生食和熟食》（1964年）中为超越“可感知的东西和可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而在符号运作的层面引入音乐的形式构成来对神话结构进行分析，因为“这种分析过程应沿许多轴线进行”，有前后相继的轴，也有共时性的轴，还有表现紧张的轴和置换代码的轴，它们之间的对比如同音乐中独奏与合奏、歌唱与宣叙调或器乐合奏与咏叹调之间的对比一样。^①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写作倒是朴实无华，可到后期他进行“文之悦”的实验的时候，片段的剪接就如同心绪的跳跃，喃喃自语的文字倾诉加上充满刺穿效果的智性运作，令写作和阅读成为了主体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调情，写作的技艺就是一种色情学的技艺。还有米歇尔·福柯，他的写作算不上晦涩，

^①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中译，“绪言”，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在他那里，激情与智性运作相得益彰，但不晦涩不等于容易理解，福柯同样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对愚人船意象的描述，对边沁的圆形敞视监狱的结构分析，还有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型进行的考古学式的考察，对身体控制的权力谱系学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性话语中的权力运作的解读，每每读到这些地方，主体就像被置于了一个异度空间中。至于雅克·德里达，他的解构理论的一个重要运作就是要让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建制化区分陷于崩溃或趋于瘫痪，写作之于他不是寻求或确定某一固定意义的过程，而是把意义交付给符号嬉戏的无限延宕的过程，例如他的《论文字学》（1967年）就是一种典型的幽隐式写作，在其文字的行进中，总有一些非主题性的概念出入字里行间，瓦解着所论“主题”的结构封闭性，如原罪、手淫、接缝这类意向或概念在文本中的出没，使得文字的意谓活动总处于一种外溢状态，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那么拉康呢？与上面这些人相比，拉康的“晦涩”属于典型的不可理解。他的晦涩有风格上的，每一个初涉拉康理论的读者，首先都会感受到他那巴洛克式的论述风格带来的阅读阻塞；他的晦涩也有技术上的，且不说他对弗洛伊德文本做的出人意表的解读，单是他对精神分析领域以外的理论或概念妄自的挪用、任性的剪接和非凡的重写，就足以把我们拖入难辨方向的云雾之中；他的晦涩还有情境上的，例如他对格言、隐语、双关的运用，他的词义的缠绕与反转，他在音与意之间的联想与切割，他对达利式的妄想症批评和禅宗式的棒喝教学的刻意追求等等，这些远不只是写作或言说技巧的运用，还是一种分析情境的营造，他总想以此让我们落入情境的诱惑。除此之外，拉康的晦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研讨班中不断变换运用的各种科学的伪形——即所谓的数学型、代数式、拓扑图和拓扑变换，在许多人看来，它们唯一的意义效果可能就是把把我们拖入一场绝望的智力比拼游戏。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有阅读和研究拉康的人都想一探究竟。然而，我们注定要铩羽而归，因为那就像是庄家布下的一个赌局，意在诱人投注，这赌注就是我们的欲望，就是我们的无意识“原质”。我们要想从那里取得我们想要的，首先就要让自己成为他想要的。一定

意义上说，要想彻底弄明白拉康的那些代数式、拓扑图和数学型的“最终意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最终意义”，而只存在一种阐释的无限可能，就像弗洛伊德所讲的梦的意义的多元决定一样。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给我们逃避解释寻找借口。拉康的那些数学型、代数式、拓扑图和拓扑变换固然有故弄玄虚的嫌疑——所以我把它们称为“科学的伪形”——但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理论的可有可无的装点，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精神分析的科学化和形式化的完美表征，是他为自己特立独行的培训分析或教学分析提供的最佳道具。它们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智性法则，它们执行着无意识语言的运作方式，有属于自身的索解路径。在拉康的眼里，学会读“懂”这些东西乃是进入其理论的入门功课。

为什么要引入这种形式化的运作呢？理由有三。

第一，形式化是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猜想科学”所必需的。拉康把科学分为两类：“精确科学”和“猜想科学”，前者是基于经验的事实、依照线性因果逻辑来对事实进行描述，后者是基于事件的表征、通过事后回溯来寻找事件的原因。前者大约对应于我们现今所讲的实证科学，但后者并不完全对应于我们所谓的人文科学，因为有许多人文科学的研究，比如实证主义的史学或诗学研究实际也是一种经验研究。拉康理解的“猜想科学”研究的是存在的问题，而存在之为存在，就在于它是不可言说的，它需要诉诸能指的象征化，但这一象征化又不可能完全和彻底，也是因此，猜想科学长期以来不被视作是科学。但是，随着索绪尔语言学的出现，尤其是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人类学研究中対这种语言学模式的成功运用，猜想科学获得了其科学化的标本，这一标本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如同列维-斯特劳斯以准数学的象征化运作来表达人类的野性思维一样，精神分析学要想获得可理解性的地位，也必须超越直观式的心理内省和实证主义的经验因果，必须借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示范，以数学化的形式指引人们进入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根基。

拉康引入形式化得益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启示，尤其得益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 构分析方法。列维-斯特劳斯一反英国功能学派停留于生

理或心理需要层面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主义传统，提出人类学应当研究社会的“无意识结构”，他从雅各布森和特鲁别兹柯伊的音位学中获得启示，引入语言学的方法来对人类社会“野性思维”的无意识基础进行分析。这一方法的根本在于先依据差异性原则找出构成某一结构体系的功能单位（音素），如亲属关系中某些亲属称谓就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然后把它们整合到系统中，找出人类思维在无意识层面的运作法则，如透过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就可以解开整个亲属制度的结构法则。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分析方法称作一种象征化的运作，并以准数学的算式形式来表达他所找到的各种二项对立与无意识结构的关系，如生食：熟食/自然：文化，即生食与熟食的对立相当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象征化表达。拉康认为列维-斯特劳斯使用的这个语言学方法为不同于实证科学或精确科学的猜想性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典范，也为属于后者的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提供了典范。例如在1953年的《罗马报告》中，拉康说：

语言学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示范，因为当代人类学已经赋予了它先锋的作用。我们不能对此视若无睹。

表达音素——它是由可把握的最小语义区分要素所组成的各个对立组的一种功能——之发现的数学化形式可把我们引向弗洛伊德的终极教义所指示的那个根基，这根基在语音所意涵的在场与缺席中乃是象征功能的主观源泉。^①

第二，形式化是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所必需的。拉康不仅在“猜想科学”的范畴内讨论了精神分析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而且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明了那一运作的必要性。他依照著名科学史家柯瓦雷的科学史观点，认为古希腊人所代表的“古代科学”与16、17世纪科学革命和笛卡儿哲学所代表的“现代科学”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人们构想存在或实在的总体方式或者说主体对于被描述对象保持的位置关系的不同：在前一种情形中，主体与存在——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所谓不动的推动者——之间是一种整一的“爱”的关系，是知觉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 235.

对象与理知能力相统一的关系，故而是其所研究的存在实际是一种“现实”，一种依照幻象来建构的“心理现实”；在后一种情形中，由于哥白尼革命在开普勒和伽利略那里的真正完成，主体的中心位置被倾覆——正如弗洛伊德所暗示的，哥白尼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并不只是中心星体的位置的颠倒，而是人作为宇宙之中心的位置的倾覆——主体与对象之间那一原始的整一性关系受到质疑，“现实”的科学转而让位于“实在”的科学，存在之存在再也不能通过知觉来揭示，而只能通过纯理智的思来揭示，主体作为能知的主体也只能通过纯粹的理知来获得，就像笛卡儿的“我思”主体的确立，它只有通过排除知觉对象的作用、通过把主体设定为纯粹能知的主体才是可能的，而这个主体转而也只有通过纯粹理知的方式才能获得有关实在的知识。拉康说，现代科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就属于这种纯粹理知的方式，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分析”的方式，不需要假借任何知觉经验，单凭理智的纯思就可以完成。比如，对于古希腊人而言， -1 的平方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在可见世界中的知觉经验，但对于现代科学而言，我们通过纯粹理知的分析就可以证明它的存在，而无须经验的证实。

当然，早期现代科学在转向“实在”的研究方面做得还不彻底，许多时候它还在寻求把“实在”等同于“现实”，把纯粹的理知等同于现实的存在，例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但到19、20世纪，非欧几何、 n 维空间、不完全性定理、集合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的出现真正地确立了一种实在的科学，在那里，实在被设定为不可想象、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借数学的形式化来揭示。对于精神分析学而言，这个实在实际就是主体之实在，是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的过程中留下的不可象征化的创伤性内核，但主体又只有借助能指来揭示这个内核的真理，在数学的形式化中来定位自身与这个实在之物的悖论性关系。

第三，形式化还是拉康的精神分析临床和教学所必需的。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实践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就是构成主体的象征维度，故而精神分析临床和教学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让分析师学会摆脱想象的诱惑，在象征界的网络中来定位主体的位置，以调整其与受分析者或学生之间的关系。为了让受分析者、接受培训分析的人甚至那些没有治疗经验的人能够更完整地理解主体构成的秘密，从而有效地明确自己在分析

情境中的位置，可以整体地传达的“科学形式”是最为理想的手段。例如在第2期研讨班上，拉康提出其L图时曾解释说：图示“不是一种仿佛能提出一个解决的图示。它甚至不是一个模型。它正是凝定我们的思想的一种方法。它是为回应我们的话语容量的弱点而提出的”^①。还有在第20期研讨班上，拉康说：

数学形式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为什么？因为只有形式化是数学型，换言之，只有它能被整体地传达。^②

虽然拉康觉得他的形式化有助于听众或读者——不论是正在接受培训的分析师还是一般的非专业人士——更清晰、更准确地领会他的理论和技术，有助于更简洁明了地确证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有关（无意识）主体的科学的地位，可实际上，那些天书般的科学伪形给人们造成的智力困惑似乎远远大于其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它们就像是嵌入本就复杂的理论织体中的一些斑点或洞孔，就像是拉康在他的文本或话语中布下的一个又一个诱饵或那种不可思议之物，既散发出一种诱惑，又让人感到陷阱重重，因为拉康运用这种形式化的数学语言固然是为了寻求科学性，但决不是因此要消除理论的多义性，相反，他正是想借此制造出多样的意义效果。面对这些理论异形，我们总有一种茫然和懊恼，总想让自己摆脱隐匿在它们背后的那种陌生性的纠缠，而我们也知道那肯定是徒劳。是的，无意识主体的这种症状正是拉康要从我们身上攫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把我们拉进精神分析的情境，把我们变成了拉康主义者——不管这是不是违背了你的意志，也不管你是拒绝还是接受这种伪形，在拉康看来都属于“通关”的必修课程。因此，面对这些科学的伪装，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如果你想要领略一下拉康的智力游戏，那就需要走近它们，尽可能让它们从一种纯然的陌生性变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性，以此掀开拉康理论的真实一角。

为了实施理论的形式化，拉康“发明”了一系列的“代数”符号。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p. 243.

^②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p. 119.

一定程度上说，了解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基本含义将是我们进入“拉康数学”的入门课程。下面是埃文斯在《拉康精神分析学简明辞典》（1996年）中列举的拉康最常用的符号，我将其照录于此。^①

- A = 大他者
 \bar{A} = 被划杠的大他者
 a = 小他；他人
 a' = 对体；镜像
 S = 1. 主体（1957年以前）
 2. 能指（自1957年起）
 3. 原始的原乐主体（在萨德图中）
 \bar{S} = 被划杠的主体
 S_1 = 主能指
 S_2 = 能指链/知识
 s = 所指（在索绪尔算式中）
 $S(A)$ = 他者之欠缺的能指
 $s(A)$ = 他者的意指作用（音讯/症状）
 D = 要求
 d = 欲望
 m = 自我（moi）
 i = 镜像（R图）
 $i(a)$ = 1. 镜像（欲望图）
 2. 理想自我（光学模型）
 I = 自我理想（R图）
 $I(A)$ = 自我理想（欲望图）
 Π = 实在的非勒斯
 Φ = 象征的非勒斯（大写的 phi）
 ϕ = 想象的非勒斯（小写的 phi）
 $-\phi$ = 阉割（负 phi）
 S = 象征界（R图）

^①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8.

- R =实在界 (R 图)
 I =想象界 (R 图)
 P =象征的父亲/父之名
 p =想象的父亲
 M =象征的母亲
 J =原乐 (jouissance)
 $J\phi$ =菲勒斯原乐
 JA =他者的快感
 E =陈述
 e =言说
 V =求原乐意志

对于埃文斯列举的这些符号，有几点要提示一下。

第一，这些符号基本是取自其含义所对应的法语词的首写字母——菲勒斯除外——所以有研究者明确地反对人们用他种语言的字符来对它们进行对译，比如英语世界曾经把表示大他者的符号“ A ” (Autre) 译成“ O ” (Other)，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保留拉康的原始形式。

第二，对于这些符号的书写形式，比如大写、小写、正体、斜体，拉康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埃文斯对此有一个说明：

排字上的细节与区别在拉康的代数式中是极其重要的。大写与小写符号之间的差异，斜体与非斜体符号之间的差异，对撇号、负号及注脚的使用，所有这些细节都在代数式系统中扮演着它们的角色，例如大写字母通常指象征界，小写字母通常指想象界。横杠的使用同样重要，它甚至在同一公式中也有变化。^①

第三，埃文斯的这个列表有一点问题：由于对拉康的代数符号和拉康的数学型没有加以区分，所以埃文斯在列表中混入了一些数学型，比如 S 、 A 、 $S(A)$ 、 $s(A)$ 、 $i(a)$ 、 $I(A)$ 、 $-\phi$ 等——严格地说，这些都属于拉康的数学型。一般地，代数符号有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含义，而数学型已经属于一种符号运算（斜杠和加减号就是运算符号），其含义——

①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p. 8-9.

按照拉康的说明——则有多种可能的读解。比如“ S ”，既可以代表能指的主体，也可以代表被阉割的主体，还可以代表在他者场域消隐的无意识主体，同时它还是分裂和异化的主体。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基本含义。

A、 a 、 a' ：它们都是法语词“*autre*”（他人、他者）的首写字母。拉康在30年代就使用“*autre*”这个术语了，大约是从科耶夫所阐释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理论中借过来的，不过在那时，他并未赋予这个术语特别的含义，基本上就是“他人”的意思；在40年代的镜像阶段理论中，“*autre*”虽然仍被理解为“他人”，但已经作为自我认同辩证法中的重要环节开始获得其理论的意义。到1955年的第2期研讨班上，拉康首次引入“大他者”（*Autre*）并将其与“小他者”（*autre*）区分开来，从此这些词在他那里便具有了特别的含义。简单地说，在拉康那里，“他者”——不论是“小他者”还是“大他者”——首要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他人”或“与某一主体相对的另一个主体”，而是指一种他在性、他者性。

“小他者”指的是自我力比多的投注对象，例如自我在镜子中投射出来的镜像，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镜像”并非指实际镜子中的物理成像，而是指自我通过预期或想象在对象的位置投射出来的一个理想形象，这个对象可以是自己的镜中之像，也可以是一个他人甚或物恋意义上的一个物的镜像，“小他者”是这种投射的结果，但自我又把它作为理想对象加以认同，从而使得“小他者”对自我有一种构型作用，拉康的所谓“自我即是他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拉康那里，“ a ”和“ a' ”都是指自我的镜像（the specular image）或对体（counterpart），所不同的在于：“ a ”指的是被自我认同为自身之一部分的理想形象，故而在L图中标示在自我的位置，表示自我即是一个他人，而“ a' ”则代表自我在他人位置投射出来的理想形象，故而在L图中标示在他人的位置，表示自我与他人形象之间的某种映射关系。

“大他者”的提出与拉康对无意识主体施以语言学的思考有关。总体上，小他者属于想象界，大他者属于象征界，甚至就是象征界；小他者代表着自我的理想构型，大他者代表着他者不可还原的他在性，它就是象征界的语言和父法，是构建言语的场所。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大他

者的位置常常为拥有菲勒斯的父亲/母亲或分析师所占据，这个时候，也可以称父亲/母亲或分析师是“大他者”。从“小他者”到“大他者”，意味着拉康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镜像阶段对自我发展的“时间辩证法”的描述转向了对主体结构的空间图绘，镜像或“小他者”将被纳入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的空间辩证法中加以重述。

S: 在1957年以前，S这个字母仅表示“主体”(sujet, subject)，例如在L图中；但自1957年起，它还用来表示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s则表示所指(signifié, signified)，例如在描述能指的公式中。

早在1932年的博士论文中，拉康就使用了“主体”这个概念，不过那时还没有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只是一般地指“人类存在”或心理主体。到1945年的《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一文中，他区分了三种主体：独立于他人的纯语法意义上的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确认出来的主体以及通过自我论定行为构建出来的个人主体。1953年，他又区分了自我与主体，前者属于想象界的构成物，后者属于象征界的构成物。另外，由于符号“S”与弗洛伊德的“Es”（它，本我）一词发音相同，所以拉康时常把“S”置放在“Es”的位置，以示主体根本只是无意识的主体，主体总是在作为“另一个场景”的无意识中，主体在“它”之中。

在拉康那里，主体既非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我思”，也非传统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主性存在，总之，主体不是那种透明的自我意识。主体根本上是且只是无意识的主体，而无意识又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故而主体乃是能指在象征界或他者场域运作的效果，主体总是一个效果主体；在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中，不是主体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使主体言说，是语言借主体在说。因此，主体的言说、主体的欲望、主体的原乐总是与作为能指之场所的大他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主体总是分裂的主体，是在言说中消隐的主体，拉康在1957年开始使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主体的这种分裂特征，这时，S和\$表示的实际是一回事。

S、s: 前者指的是“能指”，后者指的是“所指”。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和所指作为构成一个符号的不可或缺的两面有着同等的价值，前者指的是符号的声音—形象的方面，后者指的是符号的概念方面，两者结

合在一起使符号具有了一种意指功能。拉康对索绪尔的这个符号概念做了一种激进的改写，如认为能指单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在与别的能指形成一个能指的链条时，才能有所意指；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稳固的关系；所指或者说意义是被生产的，是对能指链进行阐释的结果，所以它具有想象的特质；能指是象征界的运作工具，能指的领域就是大他者的领域——后者乃是能指的场所；能指并不直接表征主体，一个能指总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等等。对于所有这些论断，我在后面会做出解释。

Π 、 Φ 、 ϕ 、 $-\phi$ ：这一组希腊字母都与“菲勒斯”（phallus）有关， Π 表示“实在的菲勒斯”， Φ 表示“象征的菲勒斯”， ϕ 表示想象的菲勒斯， $-\phi$ 表示“阉割”。在拉康的理解中，菲勒斯不等于阴茎，后者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一个解剖学器官，但他有时也在生物学意义上称阴茎是“实在的菲勒斯”，认为它在儿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想象的菲勒斯和象征的菲勒斯指的是菲勒斯的不同功能：前者指主体作为一个部分对象在想象中呈现的形象，例如儿童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想象母亲的欲望对象是菲勒斯，这个菲勒斯就是一个想象的菲勒斯，它结构了母婴间想象性关系的辩证法；后者指菲勒斯作为父亲功能的能指，它结构了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主体的性别差异或性化位置，但象征的菲勒斯的功能是悖论性的，它在结构主体的位置的同时，也是对主体的一种阉割，这当然不是对真实的器官的阉割，而是对想象的菲勒斯的阉割，是对想象的菲勒斯所代表的母亲欲望的禁止，所以“ $-\phi$ ”实际是一个数学型，其中的负号“ $-$ ”代表阉割。

S 、 R 、 I ：这三个符号分别代表“象征界”、“实在界”和“想象界”，它们曾在 R 图中出现，后来又在波罗米结中出现，主要用于描述“三界”的拓扑学。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里，三个符号用的都是大写的斜体。

至于其他符号，在此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当然，只熟悉这些符号以及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含义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拉康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它们的运算法则，要把握这些符号在各种数学型、代数式和拓扑图中意义的流转、衍生、嫁接、叠置。自1953年第1期研讨班开始，拉康几乎每一期都会用到一些代数式或拓

扑图来对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做形式化的阐述，它们往往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以拉康的理解言之，它们构成了对理论和技术进行形式化阐述的母体或基质。

拉康实现科学化和形式化的手段有很多，例如，早在1945年的论文《逻辑时间及预期确定性的论定》中，他就通过对一个逻辑推论的分析来讨论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对主体的自我论定的影响；在1953—1954年的第1期研讨班中，他采用一个光学模型来说明镜像的作用以及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别；在1954—1955年的第2期研讨班中，他不仅提出了一个所谓的“L图”来重新说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结构关系，而且还运用所谓的控制论模型和概率论算法来说明语言结构或象征界的自动重复功能；接着在1955—1956年的第3期研讨班期间，由于对索绪尔能指理论的重述和对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理论的引入，他又开始谋划以算式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再往后，尤其60年代中期以后，他不仅在研讨班中运用集合论、形式逻辑、符号逻辑等手段，还大量运用拓扑学的技术。

总体上，我们可以把拉康的科学化手段分为三大类：数学型（*matheme*）、代数式（*algebra*）和拓扑学（*topology*）。

先说说数学型。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数学或者说现代数学不仅有一套严密的记号或符号体系，还有一套利用符号进行运算的运算规则，其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往往是通过记号或符号运算进行的。拉康同样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符号运算，它们不仅被普遍用于各类代数式和拓扑学，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一个特定的形式化类型，拉康称之为“数学型”。

“*matheme*”这个拼写取自音位学中的“音素”（*phoneme*）。在语言学中，音素指的是某一语音系统中用来区分语词的最小功能单位，例如在英语的“*bad*”和“*pad*”这两个词中，正是辅音 [b] 和 [p] 的语音差异使得它们区分开来，即使你说的是方言，即使你的声调运用有误，只要不妨碍人们的理解，这两个语音单位的区分功能就不会受到影响。音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传统分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其地位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是雅各布森等人最终奠定了现代音位学的基础，在那里，“音素”作为语言的最小功能单位被提升到重要位置。进而，列维-斯特劳斯把雅各布森的音位学引入神话学的结构分析中，他甚至

把结构分析还原为“音位”分析，提出了“神话素”（mytheme）的概念，认为神话结构分析的关键首先就是要找出某一神话体系内部发挥作用的基本神话单位即神话素，通过对这些单位的组合和置换规则的分析找出整个神话系统的意指机制。随后，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者用“-eme”造出了许多新词，比如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德里达的“哲学型”（philosopheme）等等，它们指的无非是构成某一话语系统的最小功能单位。

拉康并没有就“数学型”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如同“音素”是指语音系统中具有区分功能的基本构成单位一样，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福柯的“知识型”、德里达的“哲学型”大约也是指某一相对稳定的话语系统中具有意义构成功能的基本单位，就是说，在他们的运用中，强调的都是结构性的单位的区分功能。可在拉康那里，采用“数学型”是为了教学的目的，意在强调字母或符号表达式的整体传达功能，“我们也许对它们所说的意思没有一丁点的认识，但它们被传达着”^①。拉康甚至认为数学型的作用要胜过口说的乃至书写的语言，因为后者很容易把话语凝固在某一个意义点上，尤其在传达过程中很容易因为移情关系的作用而导致对话语做直观的或想象性的理解。而数学型只是一些代数符号的组合，其本身不表征任何的意义，它们是愚蠢的字符，以其所是单纯地在场，允许人们对其做不同的解读，所以是最理想的传达工具，就是说，在话语的传播过程中，不论话语的内容或材料如何多变，但其基本的功能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完整地从一个主体传送到另一个主体那里。

拉康的数学型有很多，它们一般都是一个或多个代数符号和一些运算符号（比如括号、加减号、斜杠）的组合，比如上面提到的 S 、 A 、 $S(A)$ 、 $s(A)$ 、 $i(a)$ 、 $I(A)$ 、 $-\phi$ 等，还有基本幻象的公式“ $S \diamond a$ ”、倒错的公式“ $a \diamond S$ ”和驱力的公式“ $S \diamond D$ ”，甚至“对象 a ”（*objet petit a*）也被称作数学型。需要注意的是，拉康一再地强调，数学型本身并不表达单一的、明确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形式化的手段，其功能主

^①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p. 110.

要在于直观地和整体地呈现（无意识）结构的运作，比如“S”（可读作“被划杠的主体”），在主体S的上面划上一个斜杠，这就是你所能看到的，至于这个表达式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就要看它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被运用，比如在幻象的公式中，它就代表“欲望主体”，而在倒错的公式中，它还代表“寻求原乐的主体”，如果是在能指运作的语境中，它则是“能指主体”，代表能指的运作就是在主体S的上面划开一道切口。反正在拉康的运用中，每一个数学型都包含有一套复杂的拓扑学逻辑。

代数式是拉康较早使用的形式化手段，自50年代到70年代都有运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能指的“算式”、转喻和隐喻的代数式、父之名的隐喻算式，还有晚期研讨班中有关男人和女人的性别位置的公式以及有关四种话语的表达式，有时拉康把基本幻象的公式、驱力的公式和倒错的公式也称作代数式（一定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代数式视作数学型的扩展形态）。对于这些代数式或公式，拉康在有些地方都指出了其特别的“读法”，也就是它们所表达的特定含义，但和数学型一样，他似乎更强调它们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就是说，它们只是类似于叙事框架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框架中填入不同的“材料”，公式的含义也将随之变化。

拉康运用的另一种形式化手段就是拓扑学。拉康数学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那些花样百出的拓扑图形，尤其在晚期研讨班中，他的痴迷使得他在拓扑图形中注入了一种宗教般的肃穆气氛，而他对图形含义的解释完全是妄想症式的，听起来更像是无意识的梦思的流淌。

那么，拉康的拓扑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鲁迪奈斯科的说法，主要来自他的多位数学家朋友，其中有一位名叫乔治·吉尔波德（Georges-Th. Guilbaud）的年轻人对他帮助最大。乔治是一个天主教徒，在50年代初就与拉康交往甚密，那时，他们俩常和列维-斯特劳斯、本维尼斯特一起就语言和结构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想在人文科学和数学之间搭起一个桥梁。这种讨论在别人那里可能仅是一种纸上谈兵，可拉康不想做这种没有结果的事情，他要在他的教学中利用所学的知识。据说，拉康对数学十分着迷，自50年代到他去世，他几乎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做数学题，有时在旅行的时候碰到解不开的难题，他就

会打电话给吉尔波德。吉尔波德从未出席过拉康的研讨班，但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数学智力游戏，两人的友谊就这样维持了三十年的时间。

拉康的拓扑学名目繁多，技术复杂，有时候他会按照所使用的语境对它们的含义给出自己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都只是在增加理解的困难，所以许多研究者干脆对它们置之不理。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不免也有畏难的嫌疑。我个人认为，虽然拉康在许多地方的拓扑学运用——尤其是在70年代的教学——属于纯粹的炫技，但有一些的确具有临床和教学的效果。有关拉康拓扑学的问题，我在后面会给以专门讨论。

